# “四人帮”选集

# “四人帮”选集

本书编写组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王洪文

# 本书的出版说明

这本选集收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讲话，除此以外，还收录了在张春桥、姚文元领导下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些代表文章。

本书的文章主要来源于《人民日报》《红旗》《学习与批判》《工人造反报》、一九六七年新湖大革命委员会政宣部《江青文选》、网络版《江青十年讲话汇编》《春桥文录》《姚文元文录》《王洪文文革讲话集》、一九八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一九六六年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办公室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宋永毅《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二〇一五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张春桥狱中家书》等，大部分文章都在和谐历史档案馆网站有收录。

需要声明，本书书名虽然叫《“四人帮”选集》，但是不代表本书编者支持拉帮结派的做法，毛主席说过：“‘四人帮’不要搞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本书编者

二〇二三年九月

# 目　　录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 1

谈京剧革命 ........................... 10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15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 16

一个假海瑞 ........................... 18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 24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 28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 36

一 ........................... 36

二 ........................... 38

三 ........................... 51

评“三家村” ........................... 53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 ........................... 57

一条黑线几股妖风 ........................... 60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 76

退兵时的策略 ........................... 83

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 86

父母革命儿接班 父母反动儿背叛 ........................... 89

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93
支持“工总司”的革命行动！……………………108
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体工人要求……………………112
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13
非造“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不可！……………………124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31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134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151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66
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180
传达毛主席最高指示……………………188
一 关于夺权问题……………………189
二 抓革命、促生产……………………199
三 镇压反革命……………………200
四 组织整顿……………………201
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204
一 为什么要进行整风？……………………205
二 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几个“怕”字……………………210
三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218
四 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树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发展革命的大联合……………………224
五 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反对“打倒一切”，也反对“肯定一切”

........................................238

六 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244

七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249

为人民立新功........................................254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工作的总结........................................266

整掉不良作风........................................279

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282

评陶铸的两本书........................................294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296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301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308

腐朽不堪的“文采”........................................310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314

工人阶级要正式武装起来........................................320

附：关于上海工人要求成立武卫组织的请示........................................322

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324

给毛泽东的一封信........................................328

一 “九大”问题........................................329

二 精兵简政问题........................................331

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333

关于当前形势与方针的几点意见........................................339

一 当前的形势……339
形势大好……339
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340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341
二 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346
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346
团结对敌……349
发动群众要靠搞好学习……350
当前要注意的三点……351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354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362
一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363
二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371
三 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375
四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379
五 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382
六 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382
七 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387
八 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394
掌握党的政策，深入发动群众……397
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410

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430

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432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442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452

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谈话..........................461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476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483

关于九大路线 ..........................483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486

关于形势和任务..........................491

论尊儒反法..........................499

孔子是坚持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顽固派 ..........................499

法家和儒家是两个对立的学派..........................501

“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 ..........................505

尊儒反法思潮说明了什么？ ..........................509

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摘录..........................516

“批孔”问题 ..........................516

研究《红楼梦》问题 ..........................519

关于批判《十批判书》..........................520

谈《盐铁论》 ..........................521

谈自然科学..........................523

怎样批邓？……524
关于唐山大地震……528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531
一 为什么要正确对待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531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536
关于批“走后门”问题的讲话……550
附：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552
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554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567
关于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讲话……573
经验主义是当下的主要危险……580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588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601
关于“评《水浒》运动”的讲话……613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623
一……624
二……626
三……631
四……634
批判洋奴哲学……637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645

关于“批邓反右”运动的讲话……650
暴风雨式的斗争……650
领导班子“怕”字当头……652
反右斗争进行到底……652
极“左”思潮正在抬头……654
关于“镇反”的作法……655
当前几项重要工作……656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663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671
我的一点看法……677
《张春桥狱中家书》摘录……684
评“优胜劣汰论”……684
评深化改革……685
给外孙十六岁生日的寄语……685
谈苏联解体……687
毛主席是人民领袖……689
鲁迅与“国民性”……690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693
谈“仁政”……695
资产阶级革命一去不复返了，无产阶级革命还刚刚开始……697

#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张春桥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

* 此文最早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六期上，张春桥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毛泽东十月十一日回信：“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问，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人民日报》后于十月十三日刊载了此文，并采用了毛泽东的“编者按”。

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着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着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着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着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

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

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着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

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地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 Q 只因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

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爹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

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着人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 谈京剧革命*

江青 一九六四年七月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

* 这是江青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刊载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及《红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

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在这次观摩演出中，革命历史剧占的比重就不小。描写我们党成上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剧也还是要的，而且也要树立标兵，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观众，可以得出结论，传统戏如果不认真进行加工，是不会有人看的。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

其次，说说从何着手的问题。

我认为，关键是剧本。没有剧本，光有导演、演员，是导不出什么，也演不出什么来的。有人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话是很对的。所以，一定要抓创作。这些年，戏剧创作远远落后于现实，京剧的创作更谈不到。编剧的人少，又缺乏生活，当然创作不出好剧本来。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先由领导出个题目，剧作者三下生活，并且亲身参与了一次歼灭敌人特务的军事行动。剧本写好之后，广州部队的许多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剧本的讨论。排演以后，广泛征求意见，再改。这样，不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搞出这样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好戏来。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短时间内，京剧要想直接创作出剧本来还很难，不过，现在就要抽出人来，先受些专门训练，然后放下去生活，可以先写小戏，再逐渐搞出大戏来。小戏搞得好也很好。在创作上，要培养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会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是移植，这也好。

移植要慎重选择，第一看政治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与本剧团条件是否合适。移植时要好好分析原作，对人家的长处要肯定下来，不能改变；对人家的弱点，要加以弥补。改编的京剧，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合乎京剧的特点，有歌唱，有武打，唱词要合乎京剧歌唱的韵律，要用京剧的语言。否则，演员就无法唱。另一方面，对演员也不要过分迁就，剧本还是要主题明确，结构严谨，人物突出，不要为了几个主要演员每人来一段戏而把整个戏搞得稀稀拉拉的。

京剧艺术是夸张的，同时，一向又是表现旧时代旧人物的，

因此，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也有人对此很欣赏。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树立起先进的革命英雄人物来。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现在把定河道人的戏砍掉了一场，座山雕的戏则基本没有动(演座山雕的演员是很会做戏的)，但是，由于把杨子荣和少剑波突出起来了，反面人物相形失色了。听说对这个戏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一番。要考虑是坐在哪一边？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在反面人物一边？听说还有人反对写正面人物，这是不对的。好人总是大多数，不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大多数的还是劳动人民。在修正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者也还是少数。我们要着重塑造先进革命者的艺术形象，给大家以教育鼓舞，带动大家前进。我们搞革命现代戏，主要是歌颂正面人物。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的《草原英雄小上姐妹》很好，剧作者的革命感情被这两个小英雄的先进事迹激动起来，写成这样一个戏，那中间的一段还是很动人的。只是由于作者还缺乏生活，搞得又很急，还没有来得及精雕细刻，一头一尾搞得不大好，现在看来，好像是一幅好画嵌在粗劣的旧镜框里。这个戏，还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为我们的少年儿童写了京戏。总之，这个戏是有基础的，是好的。希望剧作家再深入生活，好好加以修改。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劳动，搞出来的东西不要轻易丢掉。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次观摩演出的剧目，回去都应该继续加工。立起来了的，不要轻易把它打倒。

最后，我希望这次大家能抽出些精力来互相学学戏，这样，

可以使这次大会的收获在全国舞台上与各地广大的观众见面。

#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九日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2]；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3]；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4]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

* 此文的创作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江青和张春桥也参与了此文的写作。此文的写作和批判是为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筹备此文写作时，北京还被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党内走资派把持着，于是此文的写作无法在北京展开，只好转移到上海进行。在写作完成、修改多次，并经过毛泽东同志审阅三遍以后，此文发表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而后其他报刊分别转载，北京方面《人民日报》却较晚才转载，并在其附加上的编者按语并未对此文表示明确赞同。

#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5]，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6]，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

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7]，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8]。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

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〇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

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二十四万亩，有的说四十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

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9]。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10]，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

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

百，徒三年。”[11]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

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象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

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12]，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

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13]。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

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破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地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

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14]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15]，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16]，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

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17]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十五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彭吹什么“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

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

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

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一九五七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18]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象《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

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1] 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2]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3]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评〈海瑞罢官〉》。

[4] 《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谈到‘清官戏’》。

[5] 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6] 《海瑞罢官》单行本前的内容介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页。

[7] 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五页。

[8] 吴晗：《海瑞罢官》序，单行本第Ⅵ页。

[9] 《二十二史劄记》中记载了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搞投献的例子，明显地反映出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摘录如下：“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赀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七月版，七二一页）。

[10] 《被论自陈不职疏》，见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的《海瑞集》。

[11] 《明律集解》，卷五。

[12]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一五五页。

[13] 如一四五○年（景泰元年），黄萧养领导的盛大农民起义队伍包围了广州城，断绝了城内外交通。攻势凌厉，地主阶级的军队“战辄败”。这时封建皇朝见武装镇压失败，就派了当时有名的“清官”杨信民去，杨一到，立刻用软的一手“多方招抚”，做了许多欺骗、分化、软化工作，农民起义军被“清官”迷惑，“不敢伤”，放松了武装斗争。接着董兴调集两广江西的大批地主军队来到，对农民和农民军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起义失败，黄萧养也中箭牺牲。事见《明史》中《杨信民列传》及《董兴列传》。

[14]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第一五二页。

[15] 《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执笔，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年四月出版。此剧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一年演出时，《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都曾发表评论文章加以赞扬。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及十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及《文汇报》分别发表《〈海瑞上本〉中的海瑞形象》及《试评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二文。一九六一年春节重新上演时，《解放日报》在二月十一日又发表《杂谈京剧〈海瑞上疏〉》一文。

[16] 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九页及第三十五页。

[17] 《明史·徐阶列传》。

[18]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

#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江青 一九六六年二月

##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刘志坚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 这是江青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日通过林彪安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谈话纪要。该纪要由刘志坚、李曼村等人起草，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修改，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下发，完整的文件名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也称“二月纪要”。该会议实际上是江青发起的，并非林彪约请，毛泽东亲自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

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此件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两篇著作，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并先后同刘志坚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

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 二

在这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

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题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

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

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

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所谓"创新独白"，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

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

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工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

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对一些思想糊涂的群众，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

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工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步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

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

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

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

不容易的。

## 三

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

一、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读和每年五月集中时间总结检查一次的制度。这一制度一定要认真地坚持下去。

二、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三、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争

取在两三年内搞出反映三大战役的好的作品。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把拍好这部片子，当作自己的“试验田”。并通过这次创作活动，来组织、培养自己的骨干队伍和文艺工作的接班人。

四、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优秀的大量复制、翻印，在部队反复放映、阅读；内容很好，但有缺点的，重新加工、重拍；不好的没有修改价值的作废。

五、整顿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配好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理、整顿创作队伍。

六、要认真摸一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学问题，进行教学改革。这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七、在文艺工作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戏剧、电影、文学作品的审查要走群众路线，大家把突出政治的关。

八、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首先写出批评肖洛霍夫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开辟专栏，加强文艺评论。

九、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地方各个协会的活动，以及军队作者的作品交由地方报刊、出版社、制片厂出版和拍摄，都应制定出一套妥善的管理办法，加强管理。

十、总政治部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 评“三家村”*

##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姚文元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

* 此文原载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红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转载。

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策谋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的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向党和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当时看看吴晗的问题掩盖不住了，慌忙由邓拓出来搞假“批判”；反面人物唱久了，要装正面人物，总是装不象，露出了不少马脚。现在，看看邓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编辑部的名义出来搞一个假“批判”，顽强抵抗，阻碍斗争进一步深入。但装得更不象，马脚就露得更多了。什么“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什么“没有及时地批判”，统统是骗人的，无非是想用“批判”邓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装作还是站在正确

方面，欺骗读者，欺骗党。

采取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把问题说得清楚呢？怎么可能去“展开严肃的批判”呢？按语中说：吴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这件事他们曾经想掩盖，但早就掩盖不住了，现在只好被迫承认；按语中又说：廖沫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可是在末尾说到邓拓呢，只是“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使人很难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许多毒草，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吗？只是宣传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吗？只是一个思想错误而不是政治问题吗？“三家村”有两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另一家写得最多的反而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而已，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假批判，真蒙混，无非是演一出“批判”的戏给人们看，以抗拒党中央的指示，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配合这个按语而整理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虽然长达两版，却同样掩藏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

古讽今，旁敲侧击”。标题表现着编者的倾向和判断。这种编法从侧面告诉读者：《燕山夜话》没有或极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容，与《海瑞罢官》性质不同。把歪曲双百方针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讽今”放在最后，寥寥数语，轻描淡写，略加点缀，勉强凑了两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者苦心所在。

我们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不予编入或加以删节；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话》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问题的内容，大事铺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定会出现种种假象，只有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

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才能不为各种假象所欺骗。既然《前线》《北京日报》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问题，又掩盖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们当然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它的反动面目。《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内容十分庞杂，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在这几年中国的政治气候中刮起了一阵乌云。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揭开“三家村”这家大黑店的内幕的时候了！

##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这个戏的反动本质现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头对准庐山会议，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它要翻庐山会议的案。戏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罢官”是“理不公”，右倾机会主义者应当再回来主持“朝政”，贯彻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支持右倾机会主义者东山再起重新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

就是《海瑞罢官》作者当时的迫切心情。这也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在当时的共同心情。

剧本一发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场和支持，“三家村”的兄弟们以为先锋出马得胜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廖沫沙在《北京晚报》上摩拳擦掌地说：“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这是“三家村”的早春气候。接着，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而合作”。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史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要破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门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吴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一文中，大呼“一层层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基层”，“因为基层的成员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实际，问题更具体，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层中“怀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动起来。他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并且得意地自我吹嘘说：“读了四十多年书，教了一二十年大学，也写了几本书，似乎也可以算个知识

分子了。”这表明，他自以为有本钱，又有后台老板撑腰，现在是他们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场大施威风的时刻了。

就在这一阵阵的密锣紧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吴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阵之后，紧接着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将登台了。《燕山夜话》“按照朋友们的建议”“破门而出”了。邓拓说，他是“被人拉上马的”，错了，应该改作“被人请上马”的。先锋开路，“兄弟”执鞭，主将不是该上马了么？

《三家村札记》的登台，则是紧接着吴晗《海瑞罢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吴晗在剧本的前言中特别指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重新发动进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说到他的“朋友”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并且声明要“抛砖引玉”，“引”出大批毒草来。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

很明显，邓拓觉得现在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只隔几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邓拓主编的《前线》中，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开始几期就射出了《“伟大的空话”》等等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的炮弹。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场表明，这是《海瑞罢官》抛出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继续进攻。要把“三家”的作品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彻底揭露这家黑店的内幕。

## 一条黑线几股妖风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什么人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

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全会的公报中尖锐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他们刮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极力诽谤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紧接着这次全会而开场的《燕山夜话》，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些经济上的困难，集中地掀起了

一股攻击总路线和支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提出了“欢迎‘杂家’”的口号。这些“杂家”是什么人呢？据他说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人。他还说：“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警告党说：“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请注意“领导工作”，这是要害。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邓拓文章里当作大菩萨抬出来的帝王将相、三教九流、封建顽固、直到风水先生这些“杂七杂八”的死人，都是“杂家”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拼命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他自己就自命为一名头号“杂家”。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不正也跃跃欲试地要“领导”“重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博知识”吗？他们不是想用自己这种“知识”使社会主义企业变质为资本

主义企业吗？“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而提出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句空话。“三家村”里的“杂家”们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领导工作”吗？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相提并论，说什么“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剥削阶级“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

观规律”，计算出“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的限度。邓拓要求“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谁都知道，我们是最爱护劳动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史上一切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来只会对劳动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他们怎么会认识什么“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呢？这不过是利用当时我们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暂时困难，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是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用地主阶级的所谓“统治经验”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你们搞自力更生是“力不胜任”的，是“过于勉强”的，赶快下马，赶快放弃，还是照地主阶级“杂家”们的老办法办事吧！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恶毒攻击么？如果照了这条路线去做，我们不但没有大庆和大寨，没有原子弹，而且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从三到万》一文里，又咒骂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

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决不能学修正主义。我们热烈欢迎一切革命事业的大发展，但是决不能去欢迎修正主义。邓拓这一系列的指桑骂槐，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腔调一模一样，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在掀起这股妖风的时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为牛鬼蛇神的出笼呐喊助威，大力开路，里应外合；一方面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的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登台制造舆论。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尖锐的斗争中，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引导着中国人民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被“罢”了“官”但不甘心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进一步刮起“翻案风”，想否定庐山会议对他们的批判，否定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的成果。“三家村”里的“兄弟”们，这时

向党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一个“诬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了”，“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恢复名誉”是今天我们的语言，皇帝根本不会说这种话。吴晗不过用来透露他的一种心情：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先后失败”，很快就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恢复名誉”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紧接着吴晗提出于谦的案子，邓拓又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恶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进《燕山夜话》集子里。我们是从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上找到的。作者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才把它从旧书堆中翻出来。文章隐喻地说了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画龙点睛在最后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是用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腔调，恶毒的诬蔑我们的党，借攻击“明肃太后”“宰相”为名，刻毒咒骂我们党中央，用“为所欲为”的“下面的官吏”来刻毒咒骂党的各级干部，为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喊冤。甚至连“扩大化”这种现代的字眼也喊出来了！要“打开”什么“思路”呢？不就是要打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翻案”的“思路”吗？不就是要打开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脚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不收进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时，邓拓还在《两座庙的兴废》中，对“两座庙的一兴一废”大大发了一通“感慨”。一座庙香火盛了，“远近闻名”；另一座庙却“废”了，“一直无人理睬”。为怕别人不懂，特别要我们推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指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冷淡了，没有人再去烧香了。邓拓对那些从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烂泥菩萨，对那些被党和人民彻底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党分子“一直无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要党重新“重视”他们，把“废”了的菩萨重新供起来！

紧接着，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叫嚣要有“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了！这是“三家村”当时的共同呼声，决非孤立事件。他们不但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

而且自己“干”得更起劲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里抛出了十分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仇恨和诬蔑党中央的语言一模一样，而且简直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棍子打死。这多么狠毒！他们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让修正主义上台么？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对党充满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攻击我们的党！

上面一连串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了《海瑞罢官》不仅代表吴晗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而是“三家村”集团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一个前奏曲。这个集团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丝毫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辉，只能暴露他们的罪恶面目，激起人民的愤怒，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从《三家村札记》开场到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时期，“三家村”的进攻，可以说是达到了

疯狂的程度。这时，首先是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完整体系，进一步推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阶级和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利用我们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发出了更加猖狂的全面进攻，妄想在我们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能代表“三家村”在这段时期对形势估计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吴晗的《说浪》。他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热烈欢呼“这半年多来”冲击着社会的一股“浪”，他高兴地喊叫“这股浪头可真大”，把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当作“浪”的成绩而大行鼓吹。他对今后形势的估计是“浪头”将“越来越大”。吴晗利令智昏地认为：他们这一伙人会胜利，修正主义的逆流即将变成主流。不久，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的《今年的春节》一文中，更加赤裸裸地说：“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解冻”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斯大林时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语言吗？这伙人利令智

昏地估计：一九六二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结束了”，无产阶级专政会被反社会主义的逆“浪”冲倒，“代之而起”的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的天下了，“三家村”的人们将更加得势，可以为所欲为了。同志们请看：“三家村”是多么希望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解冻”的局面啊！

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三家村”疯狂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了《“伟大的空话”》。他假借批评一个孩子的诗，指桑骂槐地咒骂“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自鸣得意”。这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邓拓说：“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暗示读者，他并不是在咒骂小孩子的诗，而是咒骂在“特殊场合”即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中我们党进行斗争、教育群众的思想武器。邓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刻毒地诬为“空话”；要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泽东思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竟然狂妄地要求我们的党“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毛泽东思想“休息”了，修正主义思想不就可以大泛滥了吗？他们疯狂咒骂毛泽东思想，不但不能损害毛泽东思想一根毫毛，反而更加显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连发表了一批攻击毛泽东思想、诽谤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话》抛出了《“放下即实地”》，中心是要党“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讽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讨苦吃”。他要求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让自己跌下去，跌到所谓“实地”即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孔之卓”在哪里？》《怕鬼的“雅谑”》。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说：“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欢迎人家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要党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反动分子起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后一篇用仇恨的语言诬蔑毛泽东思想，诬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这种英雄气概能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廖沫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话》立刻又登出了《两则外国寓言》，进一步攻击所谓“说大话”。说什么“直到如今，

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恶狠狠地喊叫“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你要革命吗？你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吗？这都是“大话”，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账。这篇文章在收进集子的时候，作者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困难不但不会被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们是多么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啊！他们竟认为困难会“越来越多”。不久，吴晗在《赵括和马谡》中，再一次用两个所谓“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故事，借古讽今地教训我们“今天来重温”所谓“失败的经验”，“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显然，吴晗妄想伟大的中国人民“摔了大跟斗”，总路线已经“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要上台了。这一阵从邓拓《“伟大的空话”》开始的大黑风，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进入一个新高潮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是永远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他们在估计政治形势上比瞎子还要瞎！

同志们、朋友们请看，这以邓拓文章为核心的诬蔑和攻击，在一个短时间内，目标这样集中，语言这样一致，难道不是经过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合吗？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多么疯狂啊！我们怎能不激起强烈的义愤！怎么能不彻底粉碎他们！

接着“破门而出”的一连串文章，矛头更加露骨地对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攻击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到组织问题，其恶毒和疯狂的程度是罕见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广谋”。他特别强调“不必谋自己出”，别有用心地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决不是要领导干部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而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妄地警告党：如果“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见”，“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这是公开要求把复辟资本主义的“计谋”变成党的路线，恶毒地咒骂党中央。他们的“好意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于痛苦黑暗的被压迫境地。这是最坏的主意。正同什么是香花毒草一样，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好”“坏”的区别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其骨子里都是霸道，“仁政”之类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过：“在中国的王

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〇页）邓拓却大捧“王道”，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这种荒谬已极的歌颂地主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我们”去接受邓拓捏造的“经验教训”：“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并且特别翻译成为“我们的（即‘三家村’的）语言”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个腔调我们不是听过多次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捧为和平天使，恶毒地诬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是“好战”，“霸权主义”；国内的反动阶级积极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支援要少，攻击我们“孤立”、“到处树敌”。只要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燕山夜话》恶毒地攻击“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充当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应声虫！它决不止是《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说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

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盗”，“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所谓“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是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的，历史上明明记载着一批官吏“往勘”。邓拓不过借此极力吹捧当时已经“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阴挠革命的人们继续查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斗争，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罢官”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用“上疏”向党猖狂进攻。

《为李三才辩护》是《海瑞罢官》的续篇，“李三才”就是

罢官之后的“海青天”，“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的材料太多了，举不胜举。仅就《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几股妖风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看到“三家村”里的黑幕多么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这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

##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除了露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外，《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还有一批以所谓“学术”“考据”“休息”的形式出现的大毒草，它们在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知识”的掩护下，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它们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它配合那条露骨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用“历史”“学问”“兴趣”打掩护，麻痹人们的革命警惕，欺骗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全面地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领域中坚持的无产阶级路线，全

面地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变”。任何人对这一套上瘾了，入迷了，就会变质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锋＋毕露的毒箭，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是“三家村”中使出的两手。

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一篇文章，就以占领“生命的三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招牌，说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业余”时间，但“三家村”当然决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为占领其他“三分之二”作掩护。要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读《燕山夜话》，是为了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们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被他们腐蚀掉，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燕山夜话》大量运用了答复读者的形式，邓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谈到如何接见青年，如何从“老乡”“同志”“朋友”“孩子”“编辑”“学生”“文化教员”……以至在各个部门的“工作”的业务人员中得到“启发”“建议”，或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他们活动面之广。宣传反社会主义思想，是同广泛的活动相结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拢一批人。他们竭力想在“学问”

的掩护下把青年诱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里。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邓拓在《人穷志不穷》中说到：“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贫士传》是一本为破落地主阶级分子立传的书，特别鼓吹地主阶级所谓“骨气”，对今天人民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这位学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但还没有拿定主意。一到邓拓手里，他如获至宝，不但赞扬他这个想法“很好”，而且立刻发挥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译《贫士传》作为向地主阶级“肃然起敬”、向地主阶级学习“崇高的气节”联系起来，并且暗示这可以作为某些人物“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时作为“学习”之用。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并且落井下石么？这不是利用这个青年为今天那些“贫士”即反社会主义分子服务么？“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进一步走向腐化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拢的青年，应当起来控诉他们这种罪恶的勾当！

从这个观点去看那些宣扬反动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

他们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他们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教育的基础，说什么“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反对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护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他们竟然鼓吹“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要“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用所谓“量才而用之”取消阶级路线，“有计划”地大量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极力向青年提倡什么“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途径”，什么用“苦读”成为“著名的学者”，什么“读尽一切资料”来“打基础”，……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成名成家问题，主要是想用这个办法腐蚀、拉拢一批人，收罗一批“三家村”的信徒，成为他们反共言论的传播者，使某些青年变成“三家村”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用“学者”“名人”作诱导，其言极甜，其心极毒。

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他们提出一个“多学少评”的口号：“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恶毒地讽刺高举革命旗帜的人是“喜欢挑剔”，“动辄加以讥评”“一定会吃大亏”。什么叫“多学少评”？就是只许他们咒骂毛泽东思想和吹捧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只许他们

用“学术”去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不许我们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取消一切革命的人们批评他们的权利；这就是说，对剥削阶级文化要全盘接受，奉为圣旨，不能动一根毫毛。打击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巩固黑店对学术部门的控制权，支持一切毒草包括“三家村”中的大毒草不受任何阻碍地大批出笼，这就是他们反动学术路线的核心。

在文艺上同样是这样。同“多学少评”一样，他们制造了所谓“一视同仁”的口号：“任何剧目都是平等的，现代剧目也好，传统剧目也好，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平等”，根本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只能是谁战胜谁。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就一定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古代戏；吹捧“戏剧遗产”中“有完全适合今天需要的好戏”，就一定要打击、压制革命的现代戏。“一视同仁”是一箭双雕：打击任何大力支持革命现代戏的做法；抬高和保护大批毒草不受批判，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服务。

他们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他们向人们推荐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骨气”“清高”“涵养”“赚钱”……这一套腐朽透顶的人生哲学，要向反动哲学家朱熹学习“涵养功夫”，要向张诗学习“鄙视劳动”的“反抗精神”，要向孔子学习“克己复礼”……甚至大力鼓吹恢复地主阶级的“作揖”！这是公开要求我们倒退到封建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旧中国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实现了，岂不是把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统统践踏光了吗？我们的社会不是变成一个以封建秩序为准则的黑暗世界了吗？看见剥削阶级分子就要“肃然起敬”，这不是反革命复辟了吗？广大工农兵不是将重新受到那些有“骨气”的“君子”即顽强的剥削阶级分子残酷压迫了吗？

他们以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身份，公开要求为地主阶级立传了。请读读邓拓这段话吧：“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指明清官僚米万钟、米汉雯）以适当的地位。”“过去”，是封建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照例”是“照”地主乡绅特别是恶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乡贤”的统统是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要“我们现在”为这批“乡贤”立传，就是要把土改以来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来，让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沦为“乡贤”的牛马！这不是猖獗得无法无天了吗？响应主将的号召，《三家村札记》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为军阀、官僚、地主、“反面人物”立传。这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复辟活动。这正是为了增加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为他们重新统治中国人民创造条件！广大工农兵决不允许这种罪恶活动得逞！

以上所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在“学问”

“知识”的幌子下，各方面的宣传都集中到这样一点：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家村”津津有味地描绘的一切腐朽反动的事物，都是他们反动世界观的表现。人们从这里，可以看透“三家村”的将士们腐烂了的灵魂。吴晗有一句“名言”：“业余时间是第一兴趣广泛驰骋的自由天地”。这句话揭露了他们平常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开会、工作、报告……等等都是假象，都是勉强的，都不是“第一兴趣”；到了“业余时间”，到了“三家村”里，他们的本来面貌——“第一兴趣”才放肆地暴露出来了。除了密谋策划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外，吃喝玩乐，谈猫吹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将，做买卖，追求苏联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套，从狂诵杜甫“纨＋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而“心里是酸酸的”，直到从“美人”的“长发的奇迹”中得到“启发”而心里甜甜的……什么腐烂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是两面派，伪君子。其中一部分就形诸文字，用来腐蚀人民，腐蚀我们的党。

要懂得什么叫“和平演变”吗？请看“三家村”这个活标本。他们这一套丑恶的言论，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在最准确的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从这些触目惊心的反面教

员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训。

## 退兵时的策略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次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响亮地吹起了向企图复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号角，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主将先退，一九六二年十月，邓拓立刻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奉告读者"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

《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是九月二日发表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表明要溜了。在编印集子时作者心虚地把它夹在当中，不按发表时次序放在末尾，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迹。这篇文章含义深长地说："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走。""三家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除了继续进攻外，的确用了"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想在革命人民发起反击时"安

全退走”。所以还演了不少“好戏”。请看他们的“计策”：

一、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假惺惺地“奉告”：“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一面表白并不是有意识的进攻，“上马”“下马”都是被动的；一面暗示“将来”某个时候形势有利时要“再写”、再干。

二、继续保持《三家村札记》的阵地，一面继续发动进攻，一面也写一些《石油颂》之类的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的文章，以掩护退却。

三、鼓动各地响应《燕山夜话》而办起来的“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阵地。

四、一九六三——六四年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展批判，为了避免由廖沫沙而暴露整个“三家村”，一九六四年七月收起了《三家村札记》的招牌。

五、由廖沫沙出面做一篇假检讨，说什么“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我的头脑中”“还占居统治地位”，是“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请注意，这同吴晗后来在“自我批评”中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又说他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廖沫沙既然只是孟超的“帮手”，当然不会再去追究“三家村”了。此计不可谓不妙。

六、批判《海瑞罢官》之后，向阳生即邓拓又赶紧出来写一篇“批判”文章，说什么《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思想基础”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只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一面掩盖《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反动性，向吴晗抛救生圈，企图把讨论引到死胡同里去；一面又表明“三家村”并不存在，同吴晗“决裂”。末了又透露一笔：“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指示吴晗下一步棋如何下。

七、吴晗立刻响应号召，一再写文章对向阳生表示“感谢”，继续以“自我批评”之名进行猖狂的进攻，有恃无恐地大捧自己，并把廖沫沙“检讨”中的法宝搬过来：“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又说经过向阳生的“批判”，“使我认识了错误。”似乎可以蒙混过关了。

八、最后，看看形势不妙，又突然以编辑部的名义来“批判”邓拓，使尽了金蝉脱壳之计，来掩护退却。

这么多的“计策”“相互配合”，可以“安全退却”了吧！？耍了这么多花招，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但是，他们把革命人民的辨别力估计得太低了！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估计得太低了！他们包得住么？他们溜得掉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教育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决心要彻底挖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得很的种种计策，其实做了蠢事，适足以暴露自己。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反动政治思想”，而且有共同的行动计划，是一小撮人组成的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九六二年三月，正当“三家村”疯狂进攻达到高潮时，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首词，叫《黑天鹅》，其中有句道：“春风吹梦，湖波送暖，唯我先知！”他是多么得意地以灵敏的“先知”自夸啊！但是这一回，“先知”不灵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才是真正的先知。请看“三家村”的内幕，不正在被广大人民逐步地揭露出来吗？

## 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人们不禁要问：“三家村”这样猖狂、这样狠毒、这样放肆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竟能连续达数年之久，原因是什么？难道只是一个“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么？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什么在挂帅呢？

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人们揭露了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它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历史。但是，只有从整个“三家村”的活动来看《海瑞罢官》，弄清整个“三家村”在这几年剧烈的阶级斗

争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毛泽东同志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三家村”集团步步为营且战且退的策略，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普遍真理。反动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只有经过一步步艰苦的斗争，无产阶级才能逐步从那些“杂家”手里把阵地夺回来。

“三家村”集团的触角伸到了不少部门。《燕山夜话》在全国散布了恶劣的影响。由于它以“知识性”“文笔美”为幌子，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政治辨别力的人，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都不乏赞赏者和追随者。邓拓自己也吹嘘，“许多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也有一批“响应”《燕山夜话》某些论点的文章。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北京晚报》还用大字为《燕山夜话》的出版大做广告，吹嘘“作者抓住当前的一些问题”，“既富有思想性，又可以丰富知识”，千方百计扩大它在人民中的毒害作用。腐蚀极大，流毒极广。需要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从各个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才能肃清它们的恶劣影响。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

毛泽东同志这样地鼓励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我们多么需要发扬这种从共产主义事业出发的原则精神和批判精神！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雾迷尘，在千千万万手执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的工农兵的奋起斗争下，它一定会被彻底澄清。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将照透那些阴暗的角落，使一切魍魉鬼魅都显出自己的原形！

# 父母革命儿接班
# 父母反动儿背叛*

江青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

同志们好！毛主席问你们好！我们是接受同志们的邀请前来参加你们的会议的。我受全组的委托讲几句话。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革命精神，革命干劲。我们是很支持你们的。过去，教育文化战线上面，存在着一条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路线，专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现在我们要把它夺过来。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今天因为是自己人，自己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了，我们就改嘛！对了，就坚持嘛！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抓我小辫子的。我说错了，你们就告诉我，我改。

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是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

* 这是江青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在北京天桥剧场“红旗”战斗小组与“红卫兵”辩论会上的讲话。“红旗”战斗小组与“红卫兵”分别是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和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员以高干子女为主，拥护刘少奇、邓小平的工作组方法，并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持血统论观点的对联，而“红旗”战斗小组与其相对。在此次辩论会上讲话的还有王任重和康生。

旧习惯。做法相互就叫一斗，二批，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改，教育改革。那么，那么你们都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我听说你们为一付对联争执不下。我觉得这是很好解决的。你们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匆忙拿出来的。我想讲一讲这“老子英雄儿好汉”是从哪里来的。有一出京戏叫《连环套》，看过没有？（场内回答：没有。江青同志笑了。）窦尔墩对黄天霸这个叛徒说的，他唱“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们若是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法前进了。我们要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写出之后，上海书记处又改过十几次。他现在还有一篇文章讨论了好几次，还不肯拿出来，我搞京剧改革两年了，谁有好的意见我都接受。你们现在老是顶在这儿。就不能斗那些家伙了。内部老紧张。我们有好多成语是过去的。你们不改，我们也不勉强。你们请我们来了，我们出点主意行不行？既然革命就不怕有什么错误缺点嘛！你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也可以，另外改也可以。我们觉得这样改比较妥当：

父母革命儿接班，

父母反动儿背叛。

横批：理应如此。

我们只是作个建议，你们去讨论讨论。我们是关起门来开会的，没有外人，怎么样？你们自己决定，我不能强迫你们，我们

不强加于人。

《造反歌》，我想找一个作曲家，请人帮你们忙。但是他们都在整风，不知道他们谁能担负起这个任务。我们的确是想把它流传下去。国歌不是田汉编的吗？田汉是个叛徒。所以我很谨慎，你们先这样唱着。

我想讲一讲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是有指示的。第一，要有马列主义修养。我再补充一下，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

第二，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

第三，要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你们想一想，就咱们这几个人行不行？还是要尽可能团结大多数噢！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先锋队脱离了大队就糟糕了，是不是？

第四，就是要民主。要大家充分发表不同意见。不仅要听和自己相同的意见，还要听和自己相反的意见。这样经过反复的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没有民主，哪里来的集中呢？民主集中制要在民主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酝酿，集中起来，然后统一起来。

第五，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没这一条不行。这一条，好多人是不容易办到的。总而言之，一定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现在，我们只要有时间，就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还可以贴我们的大字报，这是一种提意见的方法。你们自己是不是要来

点自我批评，光批评别人，不批评自己行不行？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样才能孤立打击少数。总之，就是团结中间的，把孤立打击的面缩小。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队伍要建立起来，要团结大多数，才能斗倒，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说对不对？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吧。

有一个问题我要解释一下，等会儿，我们的顾问再跟你们谈一谈。看一个人，第一要看阶级立场，这是本质问题。第二不要唯成份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是表面。（看一个条子后说）有一个外语学院附中的红卫兵递了一个条子，没写名字，叫我表示明确态度，同意不同意那付对联。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讲了，很简单，那种对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这是匆匆忙忙拿出来的。我觉得应该少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干得很好的！

# 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

姚文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朋友们！

我们在热火朝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四次检阅了一百五十万文化革命大军之后，来隆重地纪念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这在国际和国内，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只有革命的人们，才有资格来纪念革命的战士。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才是对于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最好的纪念。那些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面前卑躬屈膝的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那些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死抱住资产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反革命两面派，还有那些在剥削阶级腐朽文化的垃圾堆上飞来飞去不肯离开的苍蝇蚊子们，他们是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什么纪念鲁迅的。今天，在

* 此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十四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下，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广大工农兵和英雄的红卫兵战士，正在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的全世界革命人民，才是最有资格来纪念鲁迅的。红卫兵战士们向剥削阶级旧事物猛烈进攻的丰功伟绩，就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

毛主席对鲁迅的历史贡献，作了最正确、最全面、最充分的评价。

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的灵魂，它的核心，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抛弃鲁迅的革命精神，就是抛弃了鲁迅的灵魂，也就是抛弃了整个鲁迅。纪念鲁迅，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大发扬这种大无畏的、彻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锻炼出一身无产阶级的钢筋铁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同那些反华大合唱中乱跳乱叫的啦啦队、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同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到底。

我们纪念鲁迅，他在五四时代，用他那枝锋利泼辣的笔，向着反动腐朽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进行了英勇的冲击，无情地批判了整个人吃人的旧世界。真是笔锋纵横，所向披靡，使那些封建老顽固和叭儿狗们闻风丧胆。

我们纪念鲁迅，他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斗争中，在阶级斗争的血的教训面前，不断地严格地“解剖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从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们纪念鲁迅，他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向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着文化战线上的各种鬼魅，向着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冒充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伟大的英勇的斗争，粉碎了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反动文化，彻底揭露了胡适、梁实秋、“民族主义文学”者……等等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的卑鄙面目，反映了革命的“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我们纪念鲁迅，特别要纪念在他的晚年，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上，保卫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痛斥了周扬等人所执行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鲁迅尖锐地揭露了他们打着“所谓革命作家”的招牌，“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的反动本质，揭露了他们“嘁嘁嚓

嚓，招是生非”的宗派主义的手段，揭露了他们两面派的“恶劣倾向”，揭露了他们借“联合战线”之名，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卖国主义和叛徒哲学的罪行。鲁迅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批判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表现了鲁迅晚年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引起我们深深的崇敬。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总是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革命事业中，当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时，革命就胜利发展前进；当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一度占统治地位时，革命就会遭受挫折、失败。文艺斗争是反映政治斗争，并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三十年代的文化战线上，鲁迅同那些披着“左翼”或“共产党员”外衣的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在文化战线上的尖锐的反映。在鲁迅逝世以后，周扬对鲁迅的种种攻击和歪曲，直到一九五七年，动员他手下的那一小撮无耻之徒进行了颠倒历史、围攻鲁迅、为“国防文学”这

个资产阶级口号翻案的大阴谋，其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王明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翻案，为一小撮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今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在这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座谈会的《纪要》中，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许多重大问题，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三十年代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揭露、批判了周扬篡改历史、打击鲁迅的阴谋，揭露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这是一场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并且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而采取了某些新的形式，我们要坚决保卫和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批判各种反毛泽东思想反群众路线的错误倾向，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

一九三六年五月，鲁迅在一封信中，针对着那些披着“左翼”外衣暗中陷害、打击他的修正主义分子，曾经愤慨地说：“上海所谓‘文学家’，真是不像样子，……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

的一点遗产。”这是鲁迅想对周扬之流的坏家伙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回击。可惜鲁迅没有实现他的愿望就逝世了。今天，我们应当实现鲁迅的这个愿望，把揭露、批判文艺战线上以周扬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行彻底，搞深搞透！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吓得掉了魂。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洪水猛兽，心惊胆颤，做梦也会被革命的吼声吓醒。他们一听见“红卫兵”三个字，就像宣告了死刑一样害怕，惶惶然不可终日。他们动员了一切宣传机器，来发泄他们的恐惧和仇恨，咒骂红卫兵运动，咒骂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正如鲁迅所说：“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革命潮流的奔腾冲击，革命真理的四处传播，决不是反动派的几声叫喊所阻止得了的。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形形色色的御用文人，混入“左翼”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对鲁迅都进行过“围剿”。结果怎样呢？正如毛主席所说，“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可以断定，世界上反动派们咒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只能是从反面帮助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火种在全世界的传播，只能促进他们自己的垮台，只能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楚这场大革命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更加看清楚这场大革命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的伟大推动作用！

最近，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竟利用纪

念鲁迅的机会，无耻地用诬蔑鲁迅来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竟然把鲁迅诬蔑成什么“人道主义者”“博爱的歌手”。他们胡说什么鲁迅主张旧时代的文学和艺术有“永久的价值”，鲁迅反对文化领域中进行革命，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真是对鲁迅极其卑鄙的捏造。鲁迅一生最痛恨宣扬阶级调和的骗子手。他针对那种宣传什么“博爱”“忍从”的奴才哲学说：“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这是多么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这真是对那些用“博爱”“人道”来欺骗和麻痹被压迫人民的修正主义者的迎头痛击，戳穿了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奴才的面目。鲁迅一辈子反对追求什么“永久价值”，他从来都是文化革命最热烈的支持者和歌颂者。他说过：“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他痛斥了那种“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揭露了唱着这种调子的“第三种人”，正是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服务。他从来就坚持文艺要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指出资产阶级的“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不过“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其实，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所标榜的“永久价值”，不过是从资产阶级文艺中抄来的一些人性论的陈词滥调罢了，不过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文化中拾来的一些堕落生活和时髦商标罢了，厚颜无耻，空洞无物，穷极无聊，是它们

的特色，这些都是很快就要被历史潮流冲洗掉的渣滓，哪里有什么“永久价值”。

在鲁迅留下的战斗的遗产中，有许多很深刻的思想，概括了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现在只举出几点：

第一，我们要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政权需要这种战斗精神，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同样需要这种战斗精神。鲁迅对人民的敌人有很高的警惕性，他看透了阶级敌人是很毒辣很狡猾的，对于他们决不能讲什么慈悲，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不“疾恶如仇”，他却“疾善如仇”，你想放松他，他却决不会放过你，他会玩出许多使你妥协的假面具，但他自己是决不妥协的。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总结了许多血的教训，指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如果不把“落水狗”彻底打垮，等它们爬上岸来，就要咬死许多革命的人，就要付出更多的血的代价，至少也要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他说：如果“将纵恶当作宽容”，对鬼蜮讲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以后的革命者“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鲁迅对有些不肯打“落水狗”的所谓“老实人”说：有的狗表面上“落水”了，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罢了，他日重来，首先就从咬“老实人”下

手。他还说：“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鲁迅的一生，是对国内外反动派不妥协地战斗的一生。他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宽恕。他多次批判过“唯无是非观”，主张革命的战士应当旗帜鲜明，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他最憎恶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他曾经这样淋漓尽致地刻划过这类“正人君子”的丑态：“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他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无情地勾出了那种自称“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的丑恶鬼脸，指出“蒙蔽是不能长久的”。这真是对于今天某些自命“超然”“公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绝妙的画像。请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些以为“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正在暴露出庸俗不堪的修正主义鬼脸。我们要发扬这种对敌人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识破那些已落水之狗和尚未落水之狗的种种阴谋诡计，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中主义的假面具，剥出那些“虽然是狗，又很像猫”的叭儿狗们的丑恶面貌，坚决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我们要发扬鲁迅坚韧、持久的革命精神。鲁迅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他指出：“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这是因为一切反动势力和反动思想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须经过反复多次的较量和斗争，才能够逐步把它们消灭，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有具备最大的坚韧，才能一步步夺取胜利，巩固胜利，扩大胜利，才能够使旧势力的各种形式的反扑、软化一一破产。

鲁迅的一生，经历过多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曲折和反复，聚合和分化，革命队伍一次又一次的一分为二，“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但他像一棵在风霜中巍然屹立的劲松，不畏黑暗，不怕强暴，始终坚持着前进，毫不动摇地坚持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战斗，不断吸取阶级斗争的经验，终于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练出了一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

今天，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是毛主席总结了国际的、国内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集中了广大革命人民的深刻愿望而发动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这

是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改变了私有制之后，在更高阶段上展开的改造社会面貌、改造精神面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是一场极其伟大、极其广泛、极其深刻的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各个阶级、各种社会思潮、各种政治派别，都要登台表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样的大革命中，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旧势力的顽强抵抗，不能不遇到许多新的问题，遇到种种十分复杂的斗争，遇到不同形式的反复，十分需要发扬鲁迅这种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

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要有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考验，也要经得起糖衣炮弹的袭击。遇到暂时挫折，不消极，不埋怨，不灰心，不逃避，不怕围攻，不怕“孤立”，而是无所畏惧地相信真理，总结教训，坚持斗争，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大方向前进；获得一次胜利，不麻痹，不自满，不停滞，不漂浮，注意团结大多数，注意群众中出现的新问题，继续总结教训，坚持斗争，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大方向继续前进。只有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锻炼出这种坚韧的持久的革命精神，才能够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一步步去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担负起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历史使命。

第三，要学习鲁迅观察问题时的辩证的观点。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出了要学习鲁

迅后期杂文中分析问题的方法。他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后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克服了前期文章中存在的某些形而上学片面性的缺点，熟练地运用了辩证法去分析各种问题，使他的战斗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思想高度。鲁迅的战斗历程告诉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学会辩证法，克服片面性。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遇到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特别需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伟大的天才的哲学思想，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去进行阶级分析。鲁迅后期的闪耀着不灭的战斗光芒的杂文和论文，是我们学习分析问题很好的榜样。

第四，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学习鲁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我们在这里再一次重温毛主席的教导："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像鲁迅那样，对任何凶恶的敌人决不屈服，敢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鄙视它们，压倒它们，战胜它们。像鲁迅那样，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老老实实做人民的勤务员，做人民的“牛”，以平等的姿态同群众讲话，为群众办事，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服务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打掉个人主义，打掉各种自居于人民之上、“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架子。要像鲁迅那样热爱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热爱革命的青年，同革命的人民一同战斗，一同学习，一同前进。

我们革命的青年一代，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去掉私心杂念，团结广大群众，同工农兵相结合，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斗争中努力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战士。

鲁迅逝世三十年了。三十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鲁迅曾经满腔热情地呼吁过：“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这在他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今天，新战士已经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今天，亿万人民都是旧世界、旧文化的批判者，在批判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鲁迅那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亲眼看见：在严峻的阶级斗争中，涌现了一批批成千成万英勇的小将，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有了正确的方向和路线，代表了人民的大多数，就敢于向貌似强大的旧事物进行英勇的猛烈的战斗，而他们果然推翻了那些阻碍

革命前进的种种庞然大物。没有“学问”的人推翻有“学问”的人，革命的“小人物”战胜反革命的“大人物”，这就是历史的真理。这就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千百万革命人民所干的事业。而那些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同发展着的革命相抵触，由于他们的方向不对，路线不对，反革命，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终于从自己的宝座上跌下来，暴露出纸老虎的本质，由“大”变小，直到变成一钱不值。世界上那些愚蠢的反动派是这样。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是这样。周扬一伙人是这样。一切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这样或也将是这样。永不停止地前进的历史，总是要把一小撮抗拒革命的人一批批地淘汰掉的。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历史面前，鲁迅那种永远前进、革命到底的精神，更觉得珍贵。我们一定要像鲁迅那样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跟上不断发展的形势，永远跟着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闹革命，永远同革命的人民在一起，努力学习新事物，热情支持新事物，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烈火中，永远前进，革命到底，永不中途退却！永不掉队！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和好战士！

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 支持“工总司”的革命行动！*

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张春桥同志先同工人代表在室内谈判。一开始在张春桥同志休息的房间谈判，只有十来个人，后来人多了，由于屋子小，这时又移至文化广场西端一间大化妆间。）

文化革命不只是学校的事情，需要解决整个上层建筑。工厂的上层建筑、规章制度、管理方法，虽然五八年有所突破，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目前工厂还有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东西，个别工厂和单位还有封建主义的。这一切都需要彻底改。这主要靠工人，也要学生帮助。

这个文化大革命从六月一日算起，还不到半年，我们还需半年。我们要彻底搞，要很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工人起来究

* 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谈判和讲话。十一月九日，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否认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合法性。十日，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工人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 69 次特快列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造成京沪线中断二十小时，事态惊动了中央。十一日，张春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提出五项条件，张春桥接受并在文件上签字。十六日毛泽东同志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竟怎么搞？正在研究。靠群众起来，根据各个不同单位的情况来进行。工厂和农村不同，没有农闲，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搞乱了，曲折太多。曲折是有的，阶级斗争嘛！这会反复多次，革命力量起来，会压下去，又会起来，按毛主席的路线，文化革命一定能搞好。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苏联不就是这样嘛！生产大发展必须抓革命。人是最积极的因素，即使是最先进的生产也还要靠人。人是第一位的。不能说思想领先，生产就不重要了，抓革命促生产。这中间是不是会出现一时的混乱，肯定会有的。乱，倒是乱了谁，乱了资产阶级还是乱了无产阶级，只能乱了资产阶级。大惊小怪没有什么必要，包括打人（也没必要）。这样一个情况，支持革命，克服缺点。可以说，我来镇压你们的革命，我想都没有想。我想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研究一下工厂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法。

从昨天一天了解的情况，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成立工人红色造反组织的只有两个地方，北京和上海。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经验。我到这儿来，希望同志们和我交换意见，我愿意和工人、农民谈，跟学生谈。现在我脑子还是空的。中央文革小组这项工作抓晚了。中央要我们提出建议的时候，我们拿不出完整的意见，

但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的方针是明确的，放手发动群众，学生能自己解放自己，工人为什么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呢！

工人同志要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

十一月九日的会你们要求组织召开，我支持你们革命的行动。工人要求组织起来，当然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至于什么样的形式，还在研究。

你们要到北京去控诉上海市委，这种行为当然是革命的，但是这么多人去北京值得研究，派代表去，以免影响生产。

你们不了解，我们天天是受压的，他们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在攻击主席，因为它是为主席服务的。

什么叫左派呢？就是因为有右派，才有左派。没有压迫就没有革命了。不要怕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

（谈判结束后，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体工人要求》上签了字，并到文化广场前台来对全体上海市赴京工人同志讲话）

同志们：

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头一个问题：

一、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

的组织。

二、十一月四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了通知，你们回去后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你们回去但不能保证不受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理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象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会后我还要找工人同志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遇到什么问题，你

们如何解决，如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曹荻秋同志检查的时间，下一次会议的准备等，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最热爱毛主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一定能够走在全国的前面，如同工业上一样。

## 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全体工人要求

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

2、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派代表——张春桥同志加的）

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完全负责；

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同意　张春桥（签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 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

* 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讲话的内容刊载于《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大会上讲话的还有陈伯达、周恩来、谢忠镗和吴德。

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得到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他组织人写的。第二个阶段，我和一些同志才想到要改。并且还得自己参加改革工作。

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向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卅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廿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内容有许多是很难推陈出新的，如鬼神、宗教，我们怎么能批判地继承呢？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共产党员，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上帝。又例如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它们天经地义的道德，是要压迫人、剥削人的，难道我们能批判地继承压迫人、剥削人的东西吗？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度，坚决反对那些压迫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

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扫荡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扫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

旧习惯。虽然有的词我们还在用，但内容是完全不同了。例如忠这个词，封建地主阶级是忠于君王，忠于封建阶级的社稷；我们是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广大劳动人民。又例如节这个词，封建阶级所谓的气节，是属于帝王的，属于封建阶级社稷的，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这就是说，我们要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事业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决不向少数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敌人屈服。所以，同一个忠字、节字，我们还在用着，阶级内容是完全相反的。至于艺术形式、就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一个民族，总有它的艺术形式，艺术特色。我们如果不把祖国最美好的艺术形式、艺术特色加以批判地继承，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那是错误的。相反，全盘肯定，不作任何推陈出新，也是错误的。对于全世界各族人民的优秀艺术形式，我们也要按毛主席的“洋为中用”的指示，来做推陈出新的工作。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他们什么好作品都搞不出来了。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的所谓“经典”作品，也不过那么一点。他们有一些是模仿所谓的“经典”著作，死板了，不能吸引人了，因此完全衰落了；另一些则是大量泛滥，毒害麻痹人民的阿飞舞、爵士乐、脱衣舞、印象派、象征派、抽象派、野兽派、现代派，……等等，名堂多了。一句话：腐朽下流，毒害和麻痹人民。

试问：旧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古典的

艺术形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那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改革？我相信，大多数同志们和朋友们，会认为需要革命的，需要改革的，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又是一件非常细致，相当困难的工作。再加上过去旧中宣部、旧文化部长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领导，制造了种种理由，反对革命，破坏改革，就更加深了一般人的畏难情绪。还有一小撮人，则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破坏革命，反对改革。京剧改革，芭蕾舞剧的改革，交响音乐的改革，就是这样冲破重重困难和阻力搞起来的。

在今年五月以后，进入了全国性的几乎涉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派工作队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来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我很惊异，为什么一些出身成份很好的青年，从他们自己写的材料看，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逼得他们自杀，神经失常，等等。

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廿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

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们，我们才知道，所谓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个革命事件！他们把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这时，我才充分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

同志们、朋友们，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呀，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而据说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主席是那样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这以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社会，大破四旧，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拍手称快，但是过了些天，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于是我们赶快找材料，调查研究，这才又追上不

断发展的革命形势。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完全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从五月十六日到现在，六个多月了，就是这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因为注意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对文学艺术界的具体工作，就抓得少了。这点，我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今后，能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注意你们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斗争的领域太宽广了。对于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破与立的问题，目前，我不能集中精力专门搞了。这可能要等到运动的某个段落，我的体力也还能支持的话，再来同文艺界的革命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一块来建设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新文艺。

北京京剧一团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给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为工作忙一些，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关心的。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批想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的结果，旧北京市委和你们团的旧党总

支的某些负责人则是被迫接受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短短的几年内，你们在创造革命现代戏的工作中，确实做出了成绩，为全国的京剧改革树立了一个样板。我相信剧团的大多数同志和朋友，特别是青年同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自己解放自己的。你们一定能够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识破一小撮人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诡计，把剧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国庆节演出革命现代戏，我们做过多次讨论，支持了你们演出，反对了那种企图抹杀你们京剧革命成绩的错误观点。为了你们的《沙家浜》能够上演，也是为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等的演出，我们对红卫兵小将们和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向他们说明：这些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如果对你们这些革命成果不给予充分的肯定，那是完全错误的。只有那些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才对这些巨大的革命成果加以歪曲和否定。事实证明：广大的人民是承认我们的成绩的。世界上的革命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是给予我们以好的评价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

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我希望：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和锻炼之后，我们还要经常和工农兵相结合。这样，我们一定能够为京剧改革和其他文学艺术的改革做出新的成绩！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一定要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革命任务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你们剧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存在着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对于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你们还没有真正的进行深入、广泛的揭发和批判。在这里要严肃地指出：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等人，还没有认真地同旧北京市委划清界限，没有深入揭发旧北京市委的罪行，也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检讨。薛恩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我来过信，对旧北京市委作了一些没有触及问题本质的揭发。赵燕侠也来过一封短信，表示她没有尊重我对她政治上的帮助，作了一些没有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但在最近，薛恩厚、肖甲、栗金池三人联名来信，竟然用种种“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这种态度是不老实的。

你们剧团内，并不是所有干部、党员、团员都犯了错误，也不是所有干部都犯同样性质的错误，而是必须区别对待，摆事实，

讲道理，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至于上面我指出的那几个人，就是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旧宣传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的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否则，就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果实。薛恩厚等人必须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只有这一条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经过群众的充分批判，如果他们真正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们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如果薛恩厚等人真正努力改过自新，走上党的正确道路上来，他们还有可能争取做为好的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由于没有彻底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没有肃清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剧团的影

响，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彻底，你们剧团的运动就有可能走向邪路，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篡夺了领导权。这对将来剧团的建设将发生很不利的影响。我建议你们：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坚决把揭发、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你们对魏晋等三同志的去留问题发生了争执。必需说明：他们已经不是工作队，他们已经撤离了你们的剧团，在国庆节前，我接到你们全体成员来信，坚决要求把他们三位同志调回去工作，经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讨论决定，才又请回去帮助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做了一些好事，是本分；做错了，就应该接受群众的批评。这三位同志，我并不认识，更谈不上了解。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这三位同志有什么缺点错误，你们是可以批判他们的，他们也应当主动地进行检查。

现在你们中间既然有一部分成员坚决要求他们撤走，我们经过讨论，同意他们的意见。将来，另派同志去负责团里的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至于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根据中央的规定，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不

符合巴黎公社原则产生出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可以重新改选或部分改选。所有选举活动，都必需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充分讨论，不能由少数人把持。我们相信，大多数同志是能够自己分清是非的，是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下去的。绝对不允许利用这三个同志的撤走，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

在这里，我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我希望：全团同志能够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北京京剧一团建设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化的战斗化的革命样板团！

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

# 非造“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不可！*

## ——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代表的谈话

江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中央首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等同志接见了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者总团（简称“全红总”）部分代表。除了全红总代表以外，与会的还有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副总编辑胡痴、编辑邵一海和临时工代表十六人。

江青同志首先问了每个同志的姓名、工作情况后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临时工代表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并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感谢毛主席！”

代表：感谢中央文革领导首长对我们的关怀！

江青：你们不要叫我们首长，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叫名字算

* 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代表的谈话。

了。大家谈一谈吧。

代表：现行合同工制度，把工人阶级分为两个阶层，制造差别，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政治权力被剥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制度是刘少奇一九六四年三月到河北各地视察做报告后，劳动部根据其报告做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执行。（江青同志插话：刘少奇嘛，也是主席啦，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主席啦！刘少奇老婆的父亲是接收大员，刘少奇的老婆是个大资本家……）

代表们又反映了劳动部、总工会的斗争情况。江青同志让人马上打电话，命令劳动部部长和全总书记参加会议。

江青：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插话：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象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

代表：有人招合同工和转正合同工全靠拉私人关系。

江青：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

代表：彭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大合同工队伍，并给集中起来……。

江青：你们这些同志，完全可以斗争彭真一次，这是他一大罪状。封建主义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非常气愤地）等他们来了（指劳动部长和全总书记）让他们靠边站着，合同工就是没

前途嘛！真是气死人啦！都让他们当合同工去，你们解雇他们。

代表：现在有的单位搞破坏，要阴谋，如中国科学院在二十五日决定，把本单位合同工转正，用转正来瓦解工人斗志。

江青：你们不要他们转正，不要合同工，要革命！

（这时劳动部两个部长和全总书记王志杰进屋。戚本禹同志命令他们站到座位的后面去。）

江青同志问王志杰、希占元、李正享："你们是干什么的？"

王答："我是总工会的！"希、李答："我们是劳动部的！"

陈伯达、江青等问："你们认识他们吗？"（指工人代表）

王、希、李答："有的认识"。

江青：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的刘主席发明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服务，还是回家去的好。

代表：与全总签订的六条意见把"不得借口解雇"改成"不得无故解雇"。这是个阴谋。

江青：这是个政治事故，应该追查责任的。北京市的反动势力是很严重的。你们这些搞劳动部的工会的，算了吧。

陈伯达：你们和这些代表签了字的材料（指在十二月七日和廿日几次交涉出书面材料），为什么你们又作废了，不承认。

（王、希、李非常狼狈，回答不出。）

代表：我们昨天（廿五日晚）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

今天把北京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并决定明天封总工会。

陈伯达：封的好嘛，没有这个部工人照样工作。

江青：封得好！我赞扬你们。

江青问劳动部长道："你们工作具体内容都是什么？有多少人员？"

希、李答："有四百多人，工作是：一、劳动力调配。二、劳动保护。三、工资制度。"

江青："全国有多少合同工。"

李答："说不清楚。"

江青："你们当部长一天到晚都是干什么的？说不清楚！做部长！"

江青同志又问王志杰："你们工会负责什么工作？"

王答："负责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江青："你们不为工人办公，不为工人服务，你们既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又不给工人解决问题，你们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样子吗？你们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希占元：我们是执行这个反动路线的罪人。我有罪！

代表们既席控诉了在这个反动制度下，工人群众所受的政治迫害，经济上的压迫，这个制度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代表们在控诉临时工制度对工人的残酷迫害时，声泪

俱下，泣不成声。

江青、陈伯达同志听到了工人的控诉，都流下了痛苦、愤恨的热泪。在坐的人大会堂招待员都痛哭起来。

江青：我流泪不是软弱，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真正的同志。我感谢你们。你们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江青：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江青：同志们，这次反映的情况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我建议马上发给他们每人一枚纪念章，一本毛主席语录。你们把全国劳动力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给负责吃饭、住宿。（问王、希、李）你们听到了吗？（王、希、李答：听到了。）江青又问：能不能做到？王、希、李连连答到："能、能、能！"

康生：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

江青：同志们，我不知道事情这样严重，对不起同志们！

陈伯达：提个建议，你们明天不要封全总啦，你们工人全住到里边去，你们给他们封了门，他们就没事可干了！

江青：王志杰，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工作？

王答：在铁道部。

江青：吕正操那地方，是专门整理黑材料的地方。

康生：刘少奇六四年到处作报告，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订这个制度，关系到我们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工厂变为资本主义工厂，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在向资本主义道路走。

江青：我建议最近开一次合同工、临时工的控诉批判大会，地点就在人民大会堂。今天咱们当家作主了，希望你们回去向大家讲，并组织好，发言时，简单扼要，要说明问题，举出典型的例子，最好不超过半小时。

代表：有些单位负责人，对江青同志十二月十八日向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讲话，不信任抱怀疑态度。

江青：他们都是老爷，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

一、一切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必须允许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上述两点，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江青、陈伯达、康生对王志杰、希、李两个部长讲：不得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果发现合同工、临时工群众斗群众，拿你们是问，按党纪国法处理，你们心中没有毛主席，没有常委，你们也

就没有群众了。你们欺上压下，向中央封锁消息，不管工人，简直罪大恶极。

江青：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我是军人，我们是有解放军的！你们这些党内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地、富、反、坏可优待了！合同工、学徒工在他们眼里，已经不是后娘养的了！已经是私生啦！你们现在就是没有父母了！（“父母”意指党中央和毛主席）

陈伯达：就是有剥削！

最后，江青（对王志杰、李正享、希占元）说：他们（指工人代表）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的照顾他们。王等：能，能。

夜已经十二点卅分了，江青同志和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姚文元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

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倒垮了。

在最近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江青同志指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

* 此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

搞透。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这个报告，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的旨意，极力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这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这个报告，把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伪装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者，完全颠倒了历史。特别使人愤慨的是，周扬在这个报告里，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

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这个指示彻底揭露了全国解放以来，旧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文化战线上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和刊物，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工具，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彻底揭露了周扬这伙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当作正式文件发给了各级党组织，推动了全国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贯抗拒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周扬，竟敢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目张胆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来"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毛泽东同志揭露他们这一伙人"做官当老爷"，就是当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来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也被周扬删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

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装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周扬的黑手所能涂抹得了的。下面，我们将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指针，通过对十六年来阶级斗争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周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貌。

##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周扬在对青年业余作者的报告中，伪装出“一贯正确”的姿态，跳出来“总结”解放以来“五次大辩论、大批判”。他竟把自己打扮成是“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这是假的。这是撒谎。这是颠倒黑白。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

真相如何呢？

请看周扬在历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前后的真实面貌：

第一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当时土地改革和镇压反

革命运动正在全面展开，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向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他们抛出了《武训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狂热地宣扬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狂热地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反革命电影。远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中国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制这部影片，他们没有来得及拍完，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响了。解放以后，周扬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夏衍继承了国民党反动派未完成的事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拍完了这部反革命电影。电影一放映，立刻就受到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号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也就是要无产阶级像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他在为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写的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错误，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所说的“一些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周扬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他自称“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是经过他批准后在全国范围放映的。这部反动电影一出来，立刻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

当时，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趾高气扬地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老爷架子，十分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严厉责问下，周扬被迫出来做了几句假检讨。实际上他一直阳奉阴违，寻找机会反扑。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立刻就写了一封黑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于伶当时窃踞了上海文化局副局长，他包庇和勾结着一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所谓"慎重，仔细"，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细"保护资产阶级力量，保护那些披着文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谓"不可急躁鲁莽"，就是指示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量削弱毛主席批评中尖锐的政治内容，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化为一个"认识"问题。周扬在信中加了圈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要收集保护资产阶级右翼的种种材料，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周扬一伙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

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突破了周扬的重重抵抗，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锺惦棐的怠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这个团的调查结果，就是七

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时周扬见铁证如山，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变换了策略，赶紧换一副面孔，出来写文章，捞资本。他在八月发表的文章中，先说了两句什么自己“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然后摇身一变，出来做“系统的”总结，好像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不是别人，而是他周扬！

当然，周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决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刚过去，周扬就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动反攻，为《武训传》批判“纠偏”。他在题名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声色俱厉地说：“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接着就猛烈地攻击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批评），再加上党的领导不“支持”所谓“创作事业”，“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变的。”

请看，周扬在这里“纠偏”纠得多么彻底！他实际上把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把工

农兵的批评一把扼杀了，也把毛泽东同志对周扬等“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判推翻了！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周扬就大喊大叫“苦恼”了，“压抑”了，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映他那个阶级的呼声是多么敏锐啊！

请看，《武训传》批判前后，周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开头，他以文艺界“老头子”的身份，领着他那一伙放毒，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战斗一打响，他连忙来个假检讨，蒙混过去，欺骗党、欺骗人民。然后，他装出“正确”的姿态来“总结”斗争，把功劳算在自己账上。接着，他就逐步把运动拉向右转，向革命人民发动反攻倒算。同志们，请注意，周扬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老手，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周扬在各次斗争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其他已经揭露和尚未揭露的“两面人”的特征。

第二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使党内外的一些资产阶

级分子活跃起来。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则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压制和打击。他们全力支持极端反动的胡适派的唯心论，毒辣地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的严重形势，又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深刻地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愤慨地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1]，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压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对在《人民日报》转载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为首的就包括周扬，也包括丁玲、冯雪峰支配的《文艺

报》。

正是周扬，一贯执行一条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反动路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就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说什么离开了他们“革命就搞不成”，胡说什么进城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填补。”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用所谓“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十九期），不许无产阶级插手资产阶级“权威”控制的“团体”。周扬就是这样把资产阶级“权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补”到文化界的各界里，去作“领导力量”，压制一切革命者对他们的批判。

正是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展开前夕，还专门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五体投地地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民主倾向”，什么“有思想、有才能”，什么有“抱负和理想”，什么“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你们看，这不是简直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吗？

正是周扬，还在这篇文章中大捧特捧“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这里的“西方”，是指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影

响最大的就是胡适派的唯心论，即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把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说得那么神圣，这不是对俞平伯之流的资产阶级“权威”最大的撑腰吗？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资产阶级代言人吗？

正是周扬，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尽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一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看形势不妙，马上及时制造假检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等等。这个“检讨”，拆穿了说，不过是“错误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本不想稍为清算一下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只是想借此蒙混过关。什么“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人们都清楚：这个“我们”是不包括你周扬的。你的所谓“全面批判”不过是摇身一变的故技重演，这是为了保持你窃踞的领导地位，以便把斗争拉向右转，

开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据、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第三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一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之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锐斗争。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严重打击。周扬的思想同胡风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同胡风一样，反复鼓吹“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五二年），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斗争中去，甚至狂妄地说“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贵族老爷自居。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鼓吹所谓“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风一样，主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用所谓“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之类人性论的语言，来歪曲劳动人民的阶级面貌和阶级性格。他同胡风一样，提倡“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一九四一年）之类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方法。他

同胡风一样，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奉作至高无上的祖师。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谓“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甚至把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要攻击周扬等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攻击周扬的这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思想。可是周扬却利用反胡风斗争投了一个机，他抓住胡风攻击他周扬这个假象，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从此就神气起来了。从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了。其实，拆穿了，这是一场政治投机，是一个大骗局。

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果然，对胡适、胡风批判的革命硝烟还没有消失，周扬就急忙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拉向右转。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周扬写了一篇《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同志坚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表，中国农村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间。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中去，到火

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大写“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周扬却针锋相对地狂热地鼓吹堂·吉诃德的什么“高度的道德原则”，即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他特别狂热地吹捧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诗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他还从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种“新型的人”，当作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请看：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在这里，周扬用“劳动创造的手”这样一个迷惑人的短句，好像惠特曼歌颂的是劳动人民。不，《草叶集》中所歌颂的“人”，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更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化身。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过美国资产阶级。那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所欣赏和赞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地健壮，胸怀广阔”。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肠捧做“胸怀广阔”，不觉得肉麻吗？在六亿工人农民兴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刻，在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地涌现的时刻，周扬再一次把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当作“光辉榜样”，把堂·吉诃德的骑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则”，要人民去“学习、模仿”，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是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自己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顶帽子封了许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冲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这些“大师”保镖，多次用最刻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驳道：“有人对有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不要学语言？要不要跟大师

学？”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大师”的奴仆吗？连对资产阶级表示一点“不满”都不准，真是蛮横极了。

第四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的大出笼大泛滥，直接促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发展。周扬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和文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

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进步的艺术。……比如《居里夫人》就是很好的片子，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是很高的，这是十几年以前的美国片子，虽然不是正面宣传共产主义，但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好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影响他们，而他们也会影响我们。

这是一篇搞“和平演变”的计划书。《居里夫人》是美国罗斯福执政时拍摄的一部反动影片。它通过居里夫人的一生，集中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阶

级调和的反动观点，宣传了科学家的活动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要为“全人类”服务，实际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榨取高额利润服务。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拍出这种“传记片”，是想用比较隐蔽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影响”和腐蚀美国劳动人民，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幻想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用心极为恶毒。它比那些色情片、“西部片”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周扬把它当作宝贝，称颂它是“进步的艺术”，是要做美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即用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艺术变成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的修正主义艺术，为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同志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在周扬一伙控制下出了多少坏电影，这些坏电影同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就会懂得向美国这种“进步电影”学习的结果是什么了。

周扬说，“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这是一大发明。你们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讲“一致”，说明你们这伙“共产主义者”嘴上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即修正主义。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你们的一个大秘密吗？请看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同周扬一样，到处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讲“一致”吗？

不久，周扬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一文。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这是一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宣言书。

周扬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简单化”“清规戒律”“宣传作用”，认为党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反党口号。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由。周扬向党伸手要“创作自由”，是为资产阶级争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让牛鬼蛇神解除“束缚”，自由地搞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周扬所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他所攻击的“宣传作用”，就是反对文艺宣传无产阶级的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创作自由”和所谓“反教条主义”这两个反党口号，后来成为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还有人用“尊重创作自由”之类的老谱，来为各种毒草催生吗？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越凶，周扬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

得越清楚。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上发表讲话，眉飞色舞地欢呼“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为舞台上乱舞的群魔助威；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认为“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四月间，周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呼风唤雨，煽风点火，反对所谓“春寒”，要求“春暖”，鼓动右派起来争取“春天”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报告中疯狂地诬蔑共产党员“像特务一样”“像木头一样”，极力称赞当时成为章罗联盟喉舌的《文汇报》放火“胆子大”。他说，讲要杀几百万共产党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毕露。这完全证实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反右派斗争一打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周扬，立刻又见风转舵，巧妙地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周扬和旧中宣部负责人，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起，周扬却立刻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把自己这个大右派打扮成左派，俨然用“一贯正确”的姿态出来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他把“我们这些人”分

成“两种人”，一种人是“同党不是一条心”，“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种人就是他周扬，说是已经“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同党一条心了”。对照一下那些恶毒的右派言论吧，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多么卑鄙呵！前次，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扬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这次，在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又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他用这两次投机，把自己的罪恶掩藏了过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过关，把他黑线中的一伙人安插到文艺界各种领导岗位上去，扩大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还不算，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诬鲁迅是“宗派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要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总爱写什么三部曲。总起来看，周扬的一套把戏，原来玩的也是三部曲：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马上用假检讨或者伪装积极一变而站在正确方面；然后大搞反攻倒算，发动新的进攻。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扬混过了这四次大斗争，在第五次大斗争中，三部曲还没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剑彻底戳穿了。

#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周扬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了，政治资本更多了，加上有了旧北京市委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作后台，有了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的支持，可以更加放肆了。在这种估计下，他就抛掉了伪装的一面，赤裸裸地摆出了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更加恶毒、更加疯狂、更加嚣张地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毛泽东思想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

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猖狂地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牡丹》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洛阳宣教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说什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现在要颠倒过来，“要使人人敢于讲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周扬要动员起来的“人人”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被资产阶级“压抑”，就是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压抑”，有阶级对立存在，就根本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压抑”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最广泛的大民主，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就要进行坚决的专政。只有对敌人进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周扬所谓要“人人敢于讲话”，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来，只准他们“讲话”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总路线，不准无产阶级“讲话”批判他们。“也要让少数人讲话，因为他代表某种社会力量”。这是混淆黑白。对所谓“多数”和“少数”，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坚定的左派和顽固的右派都是少数。右派是极少数。左派争取、

团结了中间派才成为多数。你周扬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左派这个“少数”，却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登台夺权，这分明是要他们来专革命人民的政。

一九五九年初春，周扬为了贯彻他鼓动牛鬼蛇神“敢于讲话”的反动纲领，向周信芳推荐《海瑞上疏》的题材，并且提供了具体材料。他向周信芳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少数人”到了两个反党分子私下对话的时候，变成了“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他要通过《海瑞上疏》，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一九五九年，他到处宣传“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者就是周扬。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疯狂地攻击大跃进，奴颜婢膝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艺术叫做“国际水平”。他咒骂我们的党说：“有了一千万吨钢，就以为了不起了，连苏联也不放在眼里了。”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眼里”有五大洲的革命风云和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就敢于蔑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包括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内，敢于同一切妖魔鬼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鄙视它们，压倒它们，战胜它们。周扬“眼里”只有几个修正主义的狐群狗党，他当然要对着大无畏的中国人民

狂吠了。他还攻击我们的党“违背国际主义”。这证明了他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把修正主义奉为“老子党”，跟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奴才主义。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间，周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作了讲话。这个报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反革命路线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他诬蔑我们歌颂大跃进是“搽粉”，是“乱用群众的积极性”；他攻击群众运动，咒骂唱革命歌曲是“老太婆唱歌没有人听”；他咒骂劳动人民不配作诗，因为“做诗本来是要灵感的”；咒骂“中学生是些小娃娃，十二三岁”，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政治，如果要他们学习政治，是“庸俗的了解为政治服务”。一谈到大跃进，一谈到群众运动，包括工农兵起来掌握文化的群众运动，他就冷嘲热讽，指手划脚，极尽其挖苦打击之能事，这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憎恨社会主义、憎恨革命群众的阶级本性。这种站在群众运动对面的人，不管多高的职位，到头来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周扬，今天，不但从“老太婆”到青少年都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也正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全面的总进攻！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还极端狂妄地攻击说：“十年来”，有我

们自己的“科学著作”没有？周扬妄想把解放以后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伟大发展，一笔抹杀，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周扬这个家伙，你低头听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以来，党中央出版了光芒万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针，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等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进一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思想战线上的历次伟大斗争，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等著名文章，包括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直接批判你周扬的那些重要指示，这算不算“科学著作”？你的反革命面目难道还不清楚吗？

其实，拆穿了，你们所谓“科学著作”，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那些又臭又长七拼八凑的“条条”、“本本”、“教科书”，就是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牛皮，你们眼睛里只有洋菩萨的修正主义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群众手中的活哲学、活科学，你们一概疯

狂地反对。这充分暴露了旧中宣部一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本质。这种罪恶，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达到了高潮。现代修正主义者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对我国我党进行封锁、包围、诬蔑、渗透、颠覆。妖魔鬼怪纷纷出笼，修正主义逆流泛滥一时。周扬不但积极组织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也是一个发了狂、红了眼、自己出来打头阵的主将。他连续召开许多专业会议，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修正主义纲领；他还拔脚在全国乱跑，上海、长春、杭州、大连、福州、厦门……，到处开会，到处做报告，四面点火，八方煽风，鼓动和策划牛鬼蛇神起来夺权，起来翻案，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艺界的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是从周扬一伙那里拿到通行证，按周扬的信号弹行动的。一切接近灭亡的反动阶级，总是利令智昏地来个自我大暴露，以便革命人民看出他们的真相，群起而灭之。下面我们只举出几个突出的方面：

周扬疯狂地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周扬一贯反毛泽东思想，但过去总要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披上一件伪装。一九六一年以后，他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就要得逞了，索性抛掉伪装，赤膊上阵，跳了出来破口大骂。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跑到上海，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攻击

有的戏“把‘感谢毛主席’这句话直接表现出来，一遍还不够，感谢了三遍四遍”。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毛主席走，跟党走，这是几万万中国劳动人民从心里喊出来的，是每一个从剥削阶级压迫下得到解放的劳动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头等大事，为什么你周扬这样深恶痛绝？这完全表现了周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

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跑到福建去大骂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一条红线，太多了就不是红线，而是红布了。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灵魂不占地方，来去无踪。”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根“来去无踪”、“不占地方”的线，这不是明明要把毛泽东思想赶出各个领域，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去挂帅么？这一段十分刻毒的黑话，他到处讲，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恐吓说：“广播电视里不要老宣传拥护毛主席”。这是旧中宣部的阎王殿里的黑话。这充分显示了他的反革命嘴脸。你们反对宣传“拥护毛主席”，你们要宣传“拥护”什么人呢？岂不是想把一小撮被全党全国人民唾弃的反党分子“拥”上台，实现反革命复辟么？你们这种打算，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又跑到东北去反对“天天讲毛主席”。我们就是要天天讲毛主席，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天天温习毛主席

的指示，天天学毛主席思想。“天天讲毛主席”，一切牛鬼蛇神就没有空子好钻了，一出来就被识破了，一活动就被抓住了。

周扬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统统是骗人的。上面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面目是多么反动么？

周扬疯狂地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鼓动和组织过去被打倒的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权威”向党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燕山夜话》开张了。只隔一周，三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立刻抛出了一篇题名为《题材问题》的专论。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它是在周扬、林默涵授意、指导之下写的，并经过他们精心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口号，叫做“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没有什么抽象的“文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开”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资本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他们说，“广开文路”是为了“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对了，这就暴露了他们原来是要“用一切办法”

为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冷淡或压抑”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好让那些怀有反革命之“志”的牛鬼蛇神，利用报刊、文艺的工具，通行无阻、横冲直撞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你看：反革命复辟可以走“武路”，也可以走“文路”，我们一定要“用一切办法”粉碎他们由“文路”实行复辟的梦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请看周扬是怎样在各种“座谈会”上，接二连三地为那些被“压抑”的“有志之士”翻案，狂热地鼓动他们向党进攻：

他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说：右派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十分“宝贵”，那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人“很有学问”，要“注意培养他们”。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把一批穷凶极恶、腐朽不堪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扶起来，当作“宝贝”，网罗进他控制下的各种机构中去，高官厚禄，关怀无微不至。连老汉奸、大流氓周作人，也批给他一个月几百元，帮他吮吸劳动人民的鲜血！相反，周扬、林默涵一伙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对无产阶级左派，刻骨仇恨，咒骂他们是“头脑简单、情感简单、趣味简单”的人，因为他心目中“有头脑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他极力附和胡风的反革命言论，为胡风翻案，完全暴露了他同胡风站在同一个立场。他说：“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

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多么毒辣的黑话！胡风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周扬却把胡风的话当成祖宗的“家训”一样“一直记着”，就因为他十分欣赏胡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刻骨仇恨，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是有所指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那些坚持王明路线的人“言必称希腊”，其中包括了周扬，周扬一直怀恨在心，现在就破口骂出来了。你对“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感到“恼火”，因为你是个资产阶级，你是个洋买办，你要言必称洋人，言必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才觉得舒服。周扬还在一次吹捧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要作家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理论，去大写劳动人民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等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什么“批判”过胡风，统统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有什么“红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这种胡风式恶毒至极的语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念不下去！周扬用这种黑话来辱骂无产阶级左派，辱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农兵，只不过使人们看清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者的黑心黑肺。其实，把“红衣主教”这顶帽子回敬给周扬，倒是很适合的，当时披着红袍子，打着黑旗子，抓着文化战线印把子的，不就是你们吗！？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又提出“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这正是《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三家村”的“兄弟”们“破门而出”“失败了再干”的进攻的时期。在周扬伙同文化部前党组书记齐燕铭的指挥下，《谢瑶环》《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后出笼。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

周扬还说：“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周扬的目的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让“被统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海瑞，魏征，等等，变成“统治”者，一窝风上台专政，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

周扬到处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把各个协会、各个文艺团体、机关统统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艺十条”中攻击“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狭隘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周扬黑话原封不动的翻版。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

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扬所谓的“广阔”，就是“十条”中一再叫嚣的“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就是《文艺报》在《题材问题》专论中所说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任何事物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是革命的限制还是反革命的限制，进步的限制还是反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一定要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的限制，政治统帅文艺，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题材问题；不接受这种限制，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限制，变成资产阶级文艺。“借古讽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时，“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等等反社会主义的坏电影、坏戏、坏小说争相出笼，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限制的结果。揭破在“限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欺骗，是为了使人们看清周扬所谓“不应作任何限制”，其实是要求文艺不受六条政治标准的限制，不受为工农兵服务的限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各种大毒草统治文艺界，实行反革命的大复辟。

他们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美化和歌颂那些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多种“多样”的丑态。在周扬看来，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歌

颂无限壮丽的工农兵生活是“狭隘”的、“单调”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写资产阶级糜烂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样”，才有什么“美的享受”。他们所谓“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的红军战士同反革命白匪拥抱之类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飞、地富反坏右的肮脏手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欣赏剥削阶级阴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丑恶笔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无耻地吹捧肖洛霍夫时，就说什么《一个人的遭遇》的“伟大意义”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们要我们去写什么“生活的复杂性”，不就是要我们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学看齐吗？

周扬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提出了“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口号。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的苏共“二十二大”，公开宣布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面目。周扬急忙响应。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又玩弄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他把他手下的资产阶级“权威”，集中到北京，以“写文章”“总结经验”为名，发动了一个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高潮。这伙人在周扬、林默涵的领导下，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谋如何打击左派，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最

后抛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何其芳）、《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陈荒煤）、《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等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极其恶毒的歪曲和攻击。周扬亲自抓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三月十五日，周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对“社论”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定下了调子。后来又仔细修改。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

“全民文艺”是周扬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多次提出过“全民的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口号。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觉得有了洋主子作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的批准，就干脆把这个口号变成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强加给全党。

文章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极其恶劣的篡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

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对象，这是二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阶级路线，是决定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这样。周扬企图用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偷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硬要把资产阶级作为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是要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把资产阶级等革命的对象当成“工作的对象”，是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改变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用这条“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反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为资产阶级复辟“广开文路”！

文章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原封不动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修正主义口号。赫鲁晓夫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搞假共产主义的所谓《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就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写上：“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为什么苏修这样欣赏和热衷于“联系人民生活”的口号呢？因为这个口号就是抛弃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艺术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是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第二，赫鲁晓夫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密切联系人民”就是密切联系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

取消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放手写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第四，裴多菲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周扬把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当作“主要路线”的口号搬过来，是为了取消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统治中国的文艺界。

够了。此人是一个报告狂，我们不可能列举这几年周扬多如牛毛的大小报告中所有反动内容，从这一部分事实中，已经足以看出周扬的真面目。平时以两面派面貌出现的周扬，在这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了反革命一面派的本质。然而，“物极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气扬的充分暴露，反过来为革命派的反击提供了致命的子弹，周扬一伙就这样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周扬还在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阴谋活动。他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

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他们的反党阴谋很快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直接批评了周扬等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周扬等人，又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等待。但是周扬却又一次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中全会之后，他利用职权，依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窃踞重要职务的反党野心家的支持，压制左派的反击，力图再一次使用两面派的伎俩，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于是，在广阔的思想阵地上，接连展开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开过，周扬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罪行，急匆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向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作了一次所谓

“传达”。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不能说精神准备很充分”的左派；一面歪曲十中全会精神，说什么文艺界“基本情况是好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发表得……不多”，力图把许多大毒草都说成是香花，麻痹革命人民。又说什么“也不要走向另一极端”。就是说不要批判资产阶级，不要铲除毒草。无产阶级刚要开始反攻，他就决心抵抗到底了。

二、紧接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扬的批准、指示和亲自策划下，在山东召开了所谓“孔子讨论会”。这是周扬伙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对十中全会革命精神的一次反攻。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嚣张得发了狂的黑会，演出了解放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向封建祖宗鞠躬致敬的丑剧。

三、一九六三年元旦，柯庆施同志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倡议，希望文艺创作大力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这个革命的倡议马上受到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的抵制和攻击。一九六三年四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组织林默涵、邵荃麟等一伙人，从小组会到大会，围攻“写十三年”的口号。在这次会上，和接着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上，周扬还亲自出马，大讲“不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要以为只有描写现在，才是主导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当他向青年业

余作者作报告的时候，他却板起面孔批评什么“三年前”提出“写十三年”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曾经表示不能接受”。好像他当时还是个积极分子。这真是虚伪透顶了！怎么能够这样子厚颜无耻，用撒谎来吹嘘自己呢？

四、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对“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严厉指出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周扬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关于戏曲工作的讲话中，却说什么“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竭力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周扬还根据他投靠的反党野心家的谬论，公开提出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制造反对革命现代戏的理论根据。他还吹嘘什么戏曲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妄想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罪恶掩盖起来。

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专门召开了一次包括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和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带头围攻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这篇革命文章。他在会议上喊叫“李秀成是一个民族英雄，把他说成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指挥邓拓、翦伯赞之流出来“反驳戚本禹”。这个阴谋被毛主席及时发觉和制止了。

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是讲国内任务的，根本不谈当时思

想战线上严重的战斗任务，相反，却大谈“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他拿出了旧中宣部一伙人的黑话，拚命攻击所谓“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标签”就是指阶级分析。他在会上排斥左派，捧出了一大批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权威”来控制这次会议，在历史组做“反修报告”的就有邓拓。要邓拓来充当“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这是做政治交易。周扬要投靠反革命的野心家，就一定要支持他们手下的“三家村”。

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针对反党黑线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指示，同上面周扬吹捧戏曲

“巨大成绩”的谎话，针锋相对，当头一棒，完全揭穿了周扬的反动立场。周扬却继续狡辩，妄想蒙混过关。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扬就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文化部的错误不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包括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和我自己在内。”他以为这样一“包括”，他们就可以重演检讨几句、变为正确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把戏了。

八、由于周扬等人一再抗拒中央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

泽东同志又一次向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向周扬等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这就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被周扬篡改的那次指示。周扬见势不妙，再抗拒下去自己有灭顶的危险，于是在文化部搞了一次所谓“整风”。这是一次欺骗群众、压制左派、包庇坏人、掩护自己的假“整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周扬在一次“报告”中就利用“批评”夏衍等的机会，吹嘘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在主席教导下工作的”。“我的错误和你们的路线错误不同”，是“没有经验”。对他周扬是不准批判了，对别人的批判也要“有领导”，即“一律要经过”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的“批准”。这是《阿 Q 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手段：不准革命。

九、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一九六四年七月，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突然假装热心起来。周扬又扮演了作“总结发言”的角色。这篇修改了多少遍的讲话，虽然想尽量装得革命些，却仍然露了马脚，他把夏衍向香港报纸记者发表歪曲京剧革命的谈话，说成是“对京剧演现代戏估计不足”；他还公开宣称：“不是说《谢瑶环》整个的都反动”，尽量开脱田汉的反革命罪行。

十、一九六五年初，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对于杨献珍、周谷城的反动观点和一批坏电影的批判正在展开。周扬深知这些批判深入开展下去会危及自己的反革命统治，千方百计加以扑灭。

他用的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老办法：一面假装赞成批判；一面窥测时机，一有机会，就一下子把运动拉向右转。二月下旬，正当一个批判高潮起来，周扬、林默涵立刻以“总结”为名，在北京召集几个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谈话，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个时期发表的批判各种毒草的文章“打空炮”、“缺乏分析”、“教条主义”、“乱猜”、“夸大”、“光扣帽子”，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还攻击和嘲笑工农兵群众的评论文章“简单化”，“不能代替专家评论”，想把工农兵的批评打下去。他们公开说：“批判夏衍、田汉等人，过去与现在要分开，政治与学术要分开。”又说什么“有些人家已经不谈了，……就算了”。一个“分开”，一个“算了”，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反噬，是要强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此刹车。此计果然奏效，大批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就此被死死扣押在他们的阎王殿里。

十一、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扬等人以为他们已经把革命群众压了下去，稳住了阵脚，可以演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了，马上迫不及待地向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一齐登台，疯狂诬蔑毛泽东同志。他们还把夏衍、阳翰笙等人请上主席台去，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继续专无产阶级的政，周扬在作报告时一再安慰他们：“不要老是想到我挨了批评，批评得多一点，少一点……批评得过重或是不够，总是有的”。向他们暗示批评得太“多”太“重”是可以

翻案的，只要我周扬不倒，你们总是不会垮的，以后可以东山再起。并再一次把自己说成只是“觉察很迟，纠正很慢”，是“认识问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这一伙人全部保护过关，继续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十二、最后，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这一个报告。这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十九天之后，无产阶级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严重时刻。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坚决抗拒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妄想扑灭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周扬决心寸步不让，抗拒毛泽东同志彻底革命的指示。在他的报告中，只字不提眼前这场风雷激荡的斗争，就当作世界上根本没有批判《海瑞罢官》这回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扬的报告正式发表了。这时，距离他作报告的日子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革命人民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展开，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则在作最后的顽抗。周扬在他公开发表的报告里，公然继续篡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表示他决心抗拒到底。

同志们请看：他们是多么顽固地抵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啊！他们对无产阶级左派是抱着多么刻骨的仇恨啊！革命的

火焰要烧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就死也不肯后退了！他们就要动员黑线、黑店的所有力量反扑过来了！

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他们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尽管会发生各种争吵和排斥，但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批判”胡风的周扬又采用了胡风的恶毒语言，是他们本来就立场一致的缘故。周扬一伙用一打一拉、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相互吹捧等等卑劣手段，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都收罗进来，安插到各种岗位上去，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还竭力用种种方法，使青年中毒，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罪恶地把一批青年作者拖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这条黑线控制了文化界，控制了各个

协会，又伸展到各地，用所谓“会员”制度和重重迭迭的“协会”组织，养了一批资产阶级作家，排斥打击工农兵，搞了大大小小一批“裴多菲俱乐部”。这条黑线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砸烂他们一切“裴多菲俱乐部”，捣毁他们修正主义的阎王殿！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文艺单位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彻底夺过来！要把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坚决地加以摧毁！

周扬不是曾经自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由于周扬窃踞了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岗位，并利用党阀兼学阀的地位，把自己装成党在文艺方面的代表，不断吹嘘自己，吓唬别人，造成了这种假象。事物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常常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需要一段让隐藏着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的时间。这并不奇怪。这种情况，过去有，今后还可能发生。然而，当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人物”的真面目暴露之后，回过头一看他们的历史，便会从庞大的假象中发现渺小的本质。周扬公开的文章和内部讲话，只要仔细一查，充满反动的谬论，错误百出，一戳就破。至于周扬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不过是鸡零狗碎地从洋书中抄一些句子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

周扬不是吹嘘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吗？其实，在延安的时候，他同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等托派分子、叛徒、反党分子是一路货色。周扬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三十

年代，周扬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对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他仍旧顽强地宣告“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到了革命根据地，却极端厌恶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反党杂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诬蔑和攻击“延安也自有它一个圈子，它的一套。都穿同样的制服，拿相差不多的津贴，……你在路上走，会从前后左右到处听得见挂在人们嘴上的老一套的革命术语。多么的千篇一律，丝毫没有变化啊！”他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反革命语言，攻击延安“太窄狭”，“太呆板”，“容不下自己”，狂妄之极地要求“延安也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这是在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写出来的话啊！这样恶毒，同王实味的腔调有什么两样！一到无产阶级掌权的地方，周扬的资产阶级本性就爆发成仇恨的反党叫嚣了！“包罗万有”，就是要把牛鬼蛇神也“包罗”进来！果然，在周扬这三篇反党杂文带头之下，冒出了“包罗”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在内的一批反革命的奇文。周扬这种反动立场和思想，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尖锐批评。但是，他始终抗拒毛泽东同

志的批评，死也不肯同工农兵结合。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屡教不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转向的表面文章。揭露这种两面派，要靠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烧掉了周扬的伪装，暴露出他丑恶的灵魂了吗？

揭发出周扬这条黑线，文艺界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是。揭发出来，并不等于挖掉，更不等于肃清影响；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今后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到文艺上来的。战斗的路还很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

斗争任务，决不能因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就麻痹起来，陶醉起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种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但胜利必将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认真去做，善于总结经验，使我们的认识跟着客观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就能练出一身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真本事。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洗掉的，是一小撮旧世界的残渣余孽，是剥削阶级遗留下的各种腐朽制度和精神枷锁。中国人民将空前巩固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迈着革命的大步，朝气勃勃地去创造一个红通通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

[1] 《清宫秘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影片。一九五○年三月开始在北京放映。它一面无耻地宣扬屈膝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美化光绪皇帝和地主阶级中的保皇党，疯狂地叫嚣要依靠“洋人”打进来“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一面狂热地诬蔑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是“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拳匪”，极尽其丑化之能事。这个影片同美帝国主义一个腔调，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完全

适合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需要，而同毛泽东同志《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可是这部卖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竭力阻挠对这个影片的批判。他们实际上“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是真正的“保皇党”，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 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

王洪文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同志们：

上海市委究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已经给它做出了明确的结论。

去年十一月中旬的“安亭事件”，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海工人的革命造反队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了！全市、全国的革命造反派都为之欢欣鼓舞！就在革命人民的一片欢呼声中，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彻底地暴露了它的反革命真面目。

上海市委在“安亭事件”中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把炮口对准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镇压工人运动和一切革命左派。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走到尽头了，已经起了质的变化了。

---

* 这是一月革命中，王洪文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上作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发言，刊载于上海《工人造反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亭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残酷镇压工人的革命行动，疯狂反对两个“五项要求”。

去年十一月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准备成立，它预告了上海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上海市委的老爷们，顽固地抵制了这股革命潮流。早在成立大会之前，就有几位工人同志找了当时在交大的马天水，马天水说要回去研究研究。在大会前夜，又有四位工人代表到康平路找曹老爷，曹荻秋明明在书记处，但推说不在，由别人出来挡了一下。在大会的那一天，市委负责人一个都不去听取工人群众对市委的批判，态度如此恶劣，就是想把这个革命组织扼杀在摇篮里。

上海市委一手策划了镇压革命工人的“安亭事件”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及时派张春桥同志来到上海，正确处理了“安亭事件”。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同志在文化广场签署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要求。张春桥同志自文化广场回来后，躲在书记处的曹荻秋大为不满，恨恨地说：“难道我们都错了？！”当时在场的马天水、王一平都不同意签字。第二天早上，曹荻秋还在书记处大发牢骚，说什么：“春桥一签字，我们就被动了！”

十五日，张春桥同志和韩哲一、曹荻秋又在苏州共同签署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这个签字，

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当时，曹荻秋拒不签字，而且公然叫嚣：“我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张春桥同志对曹荻秋展开了两个小时的激烈斗争，最后，张春桥同志严肃地指出：“你不签字，我签。”这样，曹荻秋才被迫最后签了字。

第二，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疯狂对抗中央文革小组。

十三日，张春桥同志在文化广场签字后，回来就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陈伯达同志回电完全同意张春桥同志的做法。十四日，中央常委开会，正式肯定了张春桥同志的处理。过了两天，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已经知道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同意了张春桥同志的做法。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对我们工人阶级最大的支持和最崇高的鼓舞！

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常委开会的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上海市委都是知道的。但是，陈丕显、曹荻秋一伙，竟丧心病狂地进行对抗。请看事实：

十三日，文化广场签字后，张春桥同志刚给陈伯达同志打了电话，陈丕显，这个隐藏在幕后的指挥人物就亲自上阵，代表他和魏文伯、曹荻秋三个人也打电话给陈伯达同志。陈丕显在电话里态度极坏，一口一个“为什么”，提出了很多责问：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指张春桥同志）多大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同我们商量”呀！等等。针对这种猖狂的态度，陈伯达同志严肃地指

出，要让张春桥同志大胆地处理这个问题，要相信张春桥同志，给他这个权。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十分害怕这句话，对市委常委都不敢转达。十多天之后，在张春桥同志的责问下，曹荻秋才在常委会上简单地说了两句。

张春桥同志在签署第二个五项要求后，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曾给上海市委打来电话，表示支持。市委的黑打手——办公厅一室主任苏超，拿了王力同志的电话记录稿，在王一平面前公然露骨地谩骂，他说：“王力支持春桥五条，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们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这是什么话？这是反革命的叫嚣！堂堂的市委书记王一平，居然在这种反革命的叫嚣面前，一声不响，一言不发，这完全证明你们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路货色！

特别严重的是，陈丕显、曹荻秋等人，狗胆包天，竟然敢封锁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封锁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十四日中央常委开会同意张春桥同志的处理，十六日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上海市委一直没有传达。等到张春桥同志返京的前一天（二十四日），市委常委会上还没有传达。在那天的会上，张春桥同志质问市委为什么不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意见，同时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在会上宣布。就在会上，曹荻秋竟然还公开想不通，说什么“组织上可以服从，思想上不通，我有保留。”同志们！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是反对

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行为！曹荻秋，你回答，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你是十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敢这样猖狂！

第三，召开市委常委会围攻张春桥同志，恶毒攻击和诽谤工人造反队，形成在上海出现了炮打中央文革的一股逆流。

就在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正确处理了“安亭事件”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陈丕显、曹荻秋一手策划了所谓常委扩大会，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对张春桥同志进行围攻。这是一次典型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镇压革命群众行为、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黑会。这次常委扩大会表明，上海市委已经变质了，已经烂掉了，已经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了。

在会上发言的市委书记和常委老爷们，一致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同志，对准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现在，就让我们把他们的黑话拿出来示众吧：

曹荻秋胡说什么：“我思想是不通的，承认这个组织我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要把‘由华东局、上海市负完全责任’也写上去？对一部分不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对工人说清楚，你们不能支持这批人，如果你们要这么做，对你们政治上不利。”

这是对工人造反队的恶毒攻击，就是想把工人造反队打成反革命！

王一平胡说什么：

“那次签字（第一个五条）是使得我们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充分认识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要别被动为主动，在这个问题上主动了，在大量问题上又被动了。那天春桥同志一回来，我就感到突然。”

市委社教办公室负责人杨慧洁说了一套混帐话：

“多数派实际上是听我们话的，他们对荻秋同志的答复不满意，要找春桥同志，说张春桥怕死，出卖了工人阶级利益。工作队的话，多数派是听的，问题上工作队思想还没有扭过来。”

“多数派的老工人有阶级感情，对党感情很深。”（春桥同志立即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市委工业生产负责人周璧带有挑衅性地说：

“......纷纷责问市委：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为什么要签字？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条？问题提得很尖锐。......还要求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指两个五条的签字），还要采取革命行动，捣毁造反司令部。”“要找张春桥辩论。”......

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说：

“工厂企业有它的特点，正在搞四清，职工队伍比较复杂，有地、富、反、坏，肯定会有人翻案的。学生根本不了解情况，如果没有阶级观点，就上当了。”（张春桥同志立即顶回去：“你不能强调这一点，现在学生在调查他们的历史，不要把学生的觉

悟估计过低了。”

（张春桥又说，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在会上用几个生产数字的概念威胁张春桥同志，他说什么：

“我们现在要做最艰苦的准备，乱无非大乱、中乱、小乱，小乱就象眼前这样，影响百分之十，中乱影响就大些，大乱就影响生活，成为瘫痪状态。究竟怕不怕？不怕就不怕，让它乱。”

常委、副市长张承宗说：

“搞一条、五条，实际上影响了生产。是不是可以这样搞下去，方针究竟怎么样？思想上当然要准备大乱的。”

（春桥同志指出：“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他又明确地说：“承认这个组织，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在会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还大肆污蔑革命群众。

一个常委会，真是丑态百出！

大家看：他们究竟在开什么会？是什么党在开会？他们在干什么？是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还是在搞资本主义、修正

主义复辟呢？就在他们的叫嚷下，市内出现了一股炮打中央文革、“罢张春桥的官”的黑风。

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烂它！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 传达毛主席最高指示*

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友们：

你们好！我们好久没有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了。

十二号毛主席叫我们去北京的。毛主席当天很快接见了我们，以后又召集、主持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问题和其他工作，发出了一系列决定。临回上海时，主席又接见了我们。

首先要向同志们汇报的是毛主席身体很好，每次谈话时间都很长，但精力始终旺盛、愉快。对上海非常关心，非常了解，使我们很感动。毛主席对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贡献给了很高的评价。这次讲："上海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上海工人在安亭事件时才几千人，现在一百多万了，这说明上海工人组织得很快。"主席又问了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的情况。这是对上海革命造反派、上海工人、上海人民的最大信任、帮助和支持。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有再大的困难，阶级敌

* 这是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一月革命胜利后，张春桥赴京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毛泽东同志同张春桥讨论了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篇讲话是对毛泽东同志指示的传达。

人要出再多的花招也休想阻挡我们前进。

## 一 关于夺权问题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由上海的“一月革命”开始的。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如此。这次夺权和一九四九年从国民党手里夺权是不同的。毛主席讲：“这次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我们发动的。”那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写一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很重要。我们的理解是，毛主席在这里指明了十七年来，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而不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那无产阶级专政下又为什么还要革命呢？毛主席解释说：“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有一部分被篡夺了。”毛主席的话是辩证法的，先肯定了整体、后否定了局部。毛主席还指出所谓“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自己搞起来呢？因为我国建国十七年，十七年来都很稳定。中国经过一百多年动乱，终于统一了，稳定了。大家都很满意。但和一切事物一样，统一和稳定有它好的一面，又带来了不好的一面。一

部分被篡夺了，稳定中包含着不稳定，搞这次革命可以把修正主义根子连根拔掉。毛主席的概括力很强，把很深的道理归结成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二、在夺权斗争中，成为今天的关键的是“三结合”的问题。这是夺权和巩固好权的重要条件。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已经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日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夺过；一月二十二日上三司等四个组织夺过；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又夺过，但他们夺了些什么呢？夺了几间房子，夺了大印，自以为有了权，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到实权，他们也发表声明了，但他的话根本没人听。华东局机关也是这样。夺了几间房子，向魏文伯要了几部汽车，别的东西都没有得到。我看这样的权还是不要夺了。中央指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不能夺，因为它是党中央的代表机关，夺就是夺党中央的权。华东局机关的权可以夺，尽是些房子，夺过来也没意思。这说明，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才能真正夺过权来。一个、两个组织夺权，只能发展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实质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他们那里不是在搞工人“自治”吗！我们把话说的尖锐一些，目的是让这些同志明白这条路是不能走的。要想夺权，就必须找一个大联合的最好形式--这就是“三结合”的形式。缺少一方，就不算是大联合。大联合不是说群众团体多就算，缺少另外两方就不算大联合、就夺不过权来，夺过来

也不会巩固。毛主席这次谈这方面最多。

我们旁听了山西省代表的汇报：如果没有山西驻军的支持，山西根本夺不了权。山西省委反动透顶，组织了便衣特务，发了枪。刘格平对面住了两个特务，枪口对准刘的窗口。刘随时有被捉的危险。因为山西驻军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才使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夺了权。因此，必须要有解放军的支持。

那么没有革命领导干部成不成呢？也不成！一个战斗队还要有个负责人嘛！现在夺权也要干部，无非有新有老。为什么要有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老干部呢？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些工人表现很好，敢闯敢造反，很有工作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贡献，但如果把一个城市，比如上海；一个省，比如江苏，交给他们，他们就会感到很困难，因为没有经验，他们管理一个车间也许会熟练一些。不要说工人同志，我总还算做过一些工作吧！现在让我一下子管全上海市的工作，我也感到很困难。我过去也参加过市委的讨论，但不是我做决定。柯老在世时，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就跑去找他请示。他病倒后，我们便感觉担子很重了，现在更重得多了。对许多东西我了解很少，比如财政税收，老实讲，我过去根本就没有兴趣。对农村有些了解，但很不够.......。毛主席讲：一个大学生当大学校长不行，大学还没毕业，对整个学校还不熟悉。当个系主任我看也不行，因为没有教过书，没有领导全系工作的经验。还是应该由过去培养的教师、助教来担当。在

座的青年同志，不要泄气，毛主席还说：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让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我个人的理解也是这样，“三结合”的方式是对青年的很好锻炼。青年人二十几岁跟着老革命干部学习它七年、八年、十年，三十多岁当省委书记也还是很年青的。

拿上海来说，主席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开始成立时没有实现“三结合”的话，牌子恐怕老早就让人家砸了。没有这个危险吗？人家不是早在筹备第二个、第三个公社吗？连守卫公社办公大楼的警备连都向上请示过，如果有人来砸牌子怎么办？因此，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支持是不行的。我这里不是过高估计我和姚文元的作用，我们个人没有什么。但是由于我们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也使得某些人在砸人民公社时多考虑考虑。这说明“三结合”的重要性。有的人总想试一试，过去，有人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现在，有人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态度也很鲜明，谁敢试就让他来吧！

上海人民公社已经有了一定权威，今后还要加强它的权威。

上海市部（局）长以上干部六百多名，处长以上干部六千多名，难道这六百多和六千多中还愁找不出“三结合”的对象吗？这里面的大多数同志还是好的。当然，他们起来造反得很晚，直至十二月十八日开大会，但这在全国还算早的呢！主席知道了很高兴。那次造反的也多是一般干部，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中

没有一个。这当然不能怪造反派，只怪他们自己，也怪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些干部带坏了。许多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他们根本没有认真传达，使得许多干部听不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八届十一中全会，曹荻秋在市委常委会上只传达了一个小时。据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根本没有传达，因此北京红卫兵小将一冲，许多干部有抵触情绪。“安亭事件”，曹荻秋只传达陶铸的指示，而毛主席的指示连市委书记处都未传达，马天水就不知道。因此，在曹的鼓动下，竟然跑到中央工交会议上去放炮。所以陈、曹这些人不仅对上海人民和广大干部欠了债，而且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他们又利用“内外有别”、“组织纪律”来限制干部，由此，我们才理解到为什么柯老在世时，也是这批干部，把上海的工作做得不是还比较好吗！特别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期间，上海工作在全国还是比较好的嘛！还不是这六百多部（局）长，六千多处长吗！毛主席讲，不要只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而且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态度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很多，但只要我们引导很好，他们也会跟我们走。毛主席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相信群众的最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不相信最大多效。《红旗》第三、四期社论很重要。其中第三期里面有一段原文是“只要不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分子，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毛主席改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主席加这几个字体现了最伟大的思想，政策界限清楚了，宽很多了。

有的同志夺权以前还注意学习主席著作，夺权以后忙得一塌糊涂，不看书，不读报，这是很危险的。这两期社论应当逐字逐句地体会呵！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的。这不是我们造反派的思想，但对我们有影响，因为看到许多人那么顽固，十分气愤，于是在人家宣传时就听信了。其实这个口号根本不成立。首先喊这个口号的人就不打倒他自己，不怀疑自己，也不怀疑这个口号是否错误。阶级斗争就是两个阶级的对垒，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也打倒资产阶级吗？除非他们内部有矛盾。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走向自己的反面，被人家打倒。

在上海，当我们问到造反派组织怎么样时，他们总是说：我们组织很好，连一个科长也没有。中央有一个机关连副科长都不要，还自以为纯洁。简直没有一点阶级分析。最近，国务院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材料，一个市委机关造反总部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令，要求取消一切“长”。里面不少话是错误的。如“历来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我看将来也还是要这样。“带长的历

来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林彪同志是国防部长，他也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这是反动的。毛主席毫不含糊地讲：“连副科长都不要的，呆不了几天。”毛主席在五项接班人条件中讲：“......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就反对毛主席，《古田会议决议》中许多就是反对朱德的。毛主席对这种人多年来就是拉着他走。我们要向主席学习。

据我们了解，在上海，有些人一直没有发言机会，我们应该给他机会，让他们出来亮相，让他们串连，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然，也一定有一部分人就是给他机会也不行。我们不要等条件完全成熟再三结合，我们也不要一定找十全十美的干部来结合。可以区别对待。有的参加核心领导，有的搞一般工作，还可以有别的形式。

有人担心他们“投机”，这也没什么可怕的。投机迟早会暴露的，革命造反派什么都不怕，怎么现在怕起来了？这也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影响的结果，如果我们将来一旦犯错误也会立刻被打倒。回去以后，各单位要排排队，选标兵，也要对干部做工作，要他们站过来。他们之中，有的也承认站晚了，那就赶快站过来吧！“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可以这样办。

现在双方感情上过不去。斗了半天，现在又要结合。感情上不通，认为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斗是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天结合也仍然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首先要注意不能记仇，斗了一下，有时过分了，应当谅解。造反派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干部对造反派、对革命小将也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任何一次革命都要付出代价，这样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怎么能不付出代价呢？我们的代价并不大，比英、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代价小得多。有的斗完全对，有的斗过分了，也算是你对革命的贡献吧！老实说，没有革命小将的冲锋陷阵，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这样一次伟大的运动，上海市委的盖子能揭开吗？一些人能揪出来吗，不可能！这些伟大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还是看看大局吧！从国家的、世界的前途着眼，不要光看到自己。包括省、市委书记处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跟毛主席走，我们就欢迎。那些犯了错误的甚至是犯严重错误的同志，现在是你们选择道路的紧要关头。

三、毛主席说：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到现在已经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当时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我看现在也得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允许无产阶级公社存在这么长时间。十月革命创造了苏维埃，列宁很高兴，但没有科到这种形式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结果

让赫鲁晓夫利用了。......南越是总统制，邻国柬埔寨是君主制，我看还是柬埔寨的君主制好。印度是总统制，尼泊尔是王国制，我看还是尼泊尔的王国制好。以后，毛主席又举了周、汉等朝的例子，谈到王莽时说他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就和北京的红卫兵把所有街道名称都改了一样，结果，新名字记不住，还用旧的。因此名字不易多改，形式是次要的，内容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哪个阶级在掌权。比如苏联变了，但名称却仍然没变。我看我们还是稳当点好，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呢？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它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甭管叫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叫一贯道......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的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也还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吧！是不是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你们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优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上面一系列的问题。你们回去以后和大家商量一下，如果一定要叫，就叫是了。总之，既不要挫伤上海人民的热情，又不要影响大体。

从上面，我个人体会到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什么问题一到主席那里，他总是考虑得很细致、很多、很远。而且总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热情。以后中央会议决定一律不叫人民公社，但给上海人民留了余地，指出“除上海主席另有指示外”。我们回到上海后开会时，大家一致同意改名。

现在，有不少人讲，由于没有实行三结合，没有“红革会”参加......因此毛主席不同意叫人民公社。这些人请你们收回你们的言论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是不可抹煞的。

有一个人在会上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是少数人搞的。说穿了，就是因为没有包括他，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表明：“一切权力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一样，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的权力决不能和一些个人野心家分享。

那些喊“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也是根本不了解什么是一月革命。上海的夺权斗争在十二月下旬就开始了，那时“赤卫队”搞“三停”，如果再不夺权，只要一个月，不！二十天，上海就会不可收拾了。实际上远在公社成立以前，一月六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上海千百万群众起来夺权，这么雄厚的群众基础怎么会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有人还说是我搞起来的。谢谢你，我没那么大本事。我们今天只是把

名称改一下，有的同志提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是一个十分庄严的口号，现在可以提"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了。

有那么一小撮人，只是一小撮，搞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被"私"字迷了心窍，老实说、谁想从人民公社改名字上做文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劝你们不要枉费心机了。

## 二 抓革命、促生产

中央最近发出了一系列文件，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执行。我们革命造反派要下定决心保证党中央的指示得到贯彻执行。首先是农业。因为农业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强，晚一天就会影响很大产量。不管搞什么革命，大家都要吃饭，因此要促生产。但是要搞好生产，又必须抓革命。不要一提抓革命、促生产就无限制地增加革命的时间，抽出许多人脱产。林彪同志讲：抓革命是第一位，但在时间上，生产是主要的。特别是春耕季节，要按照现时的具体情况处理。

对于支农、支内、支疆的同志，我希望你们用心地领会中央的指示，你们去那儿是十分光荣的。那里不建设好，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用。我们应该记得，柯老正是因为关心内地建设才到四川去，而在那里逝世的。有的人想回到上海来，达不到目的，

就去斗里弄干部、安置干部，有些人吃人民的饭，不为人民服务，而且在城里干了许多坏事，就更成问题了。新疆因为许多青年都返回原地，生产已经受到很大影响。......在和平饭店住着一些国营农场的工人，你们在干什么？你们的岗位在农村，你们再在这里（饭店）呆下去，会学坏的。我们知道，你们之中有那么一小撮人是坏人，广大的工人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

懒懒散散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色。

## 三 镇压反革命

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则要重视。现在情况很复杂，而要我们认真观察。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有的更是削尖了脑袋钻到造反派组织内来了。镇压反革命，毛主席的方针从来就是专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我们要坚决支持人民解放军，不仅陆军，而且包括海、空军。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对上海革命造反派支持很大。在这里，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上海还有那么一小撮人反对军事管制，这些人如果是真正的造反派，那么首先应当向军代表赔礼道歉。否则，我们将采取另外的措施。

现在，社会上有那么一批人，就是靠造谣吃饭。如市委有人

假造了周总理的四点指示，又如关于“红革会”和我全不对的总理指示，“红卫军”的两次大喜报，王力同志关于上海形势的五点指示，全是伪造的。更可笑的是最近有人传出所谓中央文革接待站关于上海形势的指示。只要说一句就够了。中央文革根本没有接待站，连接待站都没有，哪有什么几点指示呢？真是见鬼了！我们辟谣很容易，但我们不愿意，也不值得。这些造谣的人自己要小心一点，假冒中央和国家首脑的名义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有理就来讲吗！不要靠造谣吃饭，造谣是吃不饱饭的。“红革会”那一小撮头头，你们有理就讲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是革命的。他们打电话给我，讲要开请罪大会，我说，你们有什么罪，有罪的只是“红革会”的一小撮头头，对他们也要争取，要看他们自己的表现是否悔改。

目前有人在挑动革干、军干的子女，我们告诉你们：革干中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军干中更是如此。这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我们绝不允许“联动”在上海扩大活动。

# 四 组织整顿

上海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是全国人民都看得到的。我讲的是造反派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我们内部

有些不纯分子，同时，我们要按斗争形势的要求进行调整。按系统、部门、单位建立组织。有的组织里面有工人、学生、干部……，很杂，大家都浮在上面，混进坏人也不知道，如果按系统组织起来，如纺织系统、冶金系统，那么解决本系统的问题就好得多。此外，有的组织本身就具有分裂的性质，如有的按年份，如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生组织一个造反司令部。不管你是哪一年毕业的，总有左、中、右之分吧！我们要按阶级，按左、中、右来组织，而不能按别的原则组织。有的组织则更明显地带有经济主义性质，如迁坟的那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什么造反司令部，我真不知道，他们要造什么反？我劝那些浮在上面的人还是回到本单位去搞斗、批、改，许多单位还没搞好。

革命造反派必须抓紧主席著作的学习，不要当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在北京和外地，我们发现有这么一批人，当然还是少数，我们很欣赏的人，很有才干，但现在都先后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这个教训大家都要记住。我的话，就是对这些人说的。总之，要去掉盲目性，加强自觉性。夺权以后，大家成了当权派了，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看今后的表现。弄不好，又会被别人，也许是这里的一部分同志所打倒。为了让同志们不被打倒，现在要记住打倒。

毛主席每天读一大迭报纸和传单。他再三嘱咐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出四小时读书读报。在座的能不能

拿出两小时来呢？

我在结束讲话时，我想讲，我们应当想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

# 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

姚文元 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

全市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友们！

现在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正在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议，边战斗，边整风，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来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促进我们思想上、组织上的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今天我们开一个会，目的就是要再促进一下，使我们的已经开展的整风运动做得更好。今天我谈这些意见，完全是一个同志和战友的意见，这样，我们就可以敞开谈。

* 这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共同起草的。在姚文元报告完后，张春桥也发表了讲话，张春桥说：“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做了系统的讲话，他的讲话我们两个是商量过的，他的讲话写了稿子，这个稿子我们两个共同修改了五次，那么我今天就没有准备稿子啦，因为说好了，他的讲话算我们两个的。”所以此处不再单独摘录张春桥的讲话。

下面我想讲几个问题。

## 一 为什么要进行整风？

为什么要整风？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要革命，要战胜革命的敌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决议草案里规定的四项任务，正在逐步地胜利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从上到下，在需要夺权的地方，都正在胜利地开展。抓革命、促生产，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各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复杂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林彪同志也经常提醒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革命在前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在思想上、组织上，都需要跟着前进，解决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矛盾。只有把这些矛盾解决了，我们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进行到底，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两个方面都去夺取新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掌握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不断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加强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不断地总结

经验教训，就要不断去掉我们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错误的东西。我们这支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只有不断用毛主席思想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克服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完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艰巨、复杂、光荣的任务。

同志们想一想：赤卫队会不会整风？红卫军头头会不会整风？还有那些什么“住房困难造反司令部”，“支农回沪造反司令部”会不会整风？还有什么“联动”，“国际打狗队”等等反革命组织会不会搞整风？不会，反革命组织，经济主义的组织，小团体主义、自私自利的组织，他们都决不会搞整风。因为他们的头头尽干坏事，见不得人。你瞒我，我骗你，有的组织专搞地下活动，他们如果一搞开门整风，立刻就要垮台，坏人就要暴露出来。想把革命停止下来、开倒车的人，也不会搞整风。只有毛主席教育下的共产党，只有我们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不怕整风。我们敢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听说有人说：我们起来造反，白天黑夜的干，又不是为了自己，为什么现在还要开门整风呢？我们说，正是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为自己，所以搞整风。这决不是什么“包袱”，相反，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特性，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前进的动力。

整风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是毛主席的一

个伟大的创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目的、方法，有一套完备的理论，这一套完备的理论，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象刚刚大家学了好多语录所说明的，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有大量精辟、深刻的指示，这些语录都非常重要，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整风过程中再三地学。

毛主席提倡的整风，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而又为革命服务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一定要肃清这本书的流毒。这本书讲的什么“修养”，就不是从革命需要出发，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但是，讲来讲去，离不开“个人利益”，教人怎样往上爬，怎样捞名誉地位，做伪君子，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那一套，就是不讲革命。刘少奇这本书讲的“修养”，是以“我”为中心，而不是以革命为中心。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讲共产党员应当怎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怎么对付蒋介石，怎么革命，而大讲特讲腐朽的孔孟之道，用地主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大反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大毒草是什么呢？这本书说明：刘少奇在民主革命中就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这本书里的反动影响，我们以后还要进行深入的批判。要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要用毛主席的关于整风、关于建党的思想来肃清

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同刘少奇这套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完全针锋相对的。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著名文章《整顿党的作风》，首先就是讲革命。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毛主席的思想非常鲜明：为了打倒敌人，兵要精，武器要好，所以要去掉一切阻碍革命、阻碍我们打倒阶级敌人的错误思想、错误作风。大家前几天看了《鲁迅兵团向何处去？》那篇文章，这是在整风当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范例。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提出了当前革命组织中阻碍革命前进的几种主要错误思想，运用毛主席的思想，进行了认真的透彻的批评。是为了革命而整风，不是离开革命需要去整风。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各个革命组织，都应当这样办。

可不可以这样说：“开门整风”包括了两重意思？一是我们革命组织虚心倾听广大群众的批评，革命组织负责人虚心倾听广大战士的批评，革命同志之间相互交心，敞开思想，不是彼此“关门”“保密”；二是我们的整风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紧紧为革命的需要服务，不是光为把我这个小团体整好，而是为了要把革命搞好，为了去解决那些广大革命群众都迫切需要解决的思想问

题、组织问题，把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工作大大推进一步。是为革命而整风，不是孤立的关起门来为整风而整风。现在有一些单位，整风中间没有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我们开门整风，应该紧紧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用整风来推动工作，推动革命，打败敌人。

从全市来看，整风要达到这样三个目的：

一、提高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使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深刻地认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思想，以及为了贯彻毛主席这条正确路线而规定的各项政策（如干部政策，抓革命、促生产的政策等等）。什么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各种表现。上次春桥同志讲过，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还不够，今后还需要继续的深刻的批判。通过整风，使我们能深刻地认识刘少奇、邓小平那一套反动东西究竟是什么，能识别和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阶级敌人的任何新反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本单位斗、批、改搞到底。

二、大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克服违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各种错误思想。使我们真正能夺好权，用好权。今天报纸上不是有一条消息吗？江南造船厂船坞吊运车间的造反派，他们就是通过开门整风，促进了大联合和“三结合”的，这是一个好经验。

三、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大大推动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使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工作以及学校的复课闹革命这些方面都能大踏步地前进。

简单地说，这次整风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能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再简单，一句话，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来干革命。

总之，大家一定要认识，我们这次整风，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革命的，不是保守的；是前进的，不是后退的；是有破有立，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毛泽东思想，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不是否定一切。这次整风，一定要整得我们大家充满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勇敢前进，而不是把人整得垂头丧气，灰溜溜的。各单位要根据这个精神，分别不同情况，确定自己整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二 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几个“怕”字

现在，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都热烈的欢迎整风，正在整风的不少单位已经在开门整风中取得良好的成绩。但也有少数同志，特别是有些负责人，对整风，特别是开门整风，还有很多顾虑，还有这样那样的“怕”。这一些“怕”，

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应该去掉。

怕点什么呢？

（一）“怕保守派进攻”“怕右派势力反扑”。我们一整风，保守派就进攻了，右派势力反扑了，怎么办？对这一个问题，我们要从毛主席教导出发：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怕也没有用，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不管整风也好，不整风也好，怕也好，不怕也好，那些还不死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坏人，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总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开门整风是对革命群众“开门”，绝不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开门”。但是，如果坏人借整风机会想整垮革命派，要“破门而出”，要跳出来，攻击革命群众，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让他来较量一下吧！准备着再来一场大论战吧！暴露了是好事，与其暗地里活动，不如公开说出来。已经有人跳出来较量了，只落得一个惨败。还有的同志说，有的赤卫队头头要跑出来了，不死心，要搞反扑，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反扑，最好公开站出来反扑，戴上袖章也可以，亮出来，再针锋相对地大斗一场，大辩论一番。老实说：革命群众是懂得怎样对付你们的！经过一次反复，增加一次锻炼，有什么不好，我们已经有过好多次这样的经验了。所以，我们要有反复的精神准备，不要怕。

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要轻易将提意见的群众都说成是“保皇

势力反扑”。有的人，开始“保”过，后来觉悟了，他善意向革命造反派思想作风提意见，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我们就要听。不要一动就扣上“捞稻草”的帽子。有一个厂的造反大队开门整风，群众刚提了一点意见，马上贴出大幅标语：“谁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就砸烂谁的狗头！”这样一来，座谈会成了哑巴会，结果这个组织又贴出第二条标语：“谁不向革命造反队提意见，谁就是反对革命派！”结果，群众更不讲话了。还有一个学校，两个造反派组织开门整风，大家都有些缺点，都怕对方揪自己的小辫子，怎么办呢？彼此都在对方办公室门上贴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这样整风怎么整得好呢？当然，这仅是个别的现象，我们提出来，说明我们有些同志还有怕。不要怕！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毛主席在估计形势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地看到这一点。坏人总是极少数。我们真的牢固地掌握了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就不会怕了。

（二）“怕当少数派，没有依靠了，再挨整没有靠山”。有的人怕通过整风，实现了按部门的大联合，自己回到车间、班级，变成少数，别人整自己没地方说话。有这样思想顾虑的同志还不少，阻碍了贯彻毛主席的“三·七”指示。我们认为这个怕是不必要的，第一，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有以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这是我们最强大的靠山。第二，现在上海市已经夺了权，有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把党、政、财、文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是用来支持全市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这是一切革命同志的支柱，怎么会没有依靠？第三，离开原来的革命组织回到部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扩大革命力量，不是削弱革命力量，是加强革命组织，不是取消革命组织。现在有一种误解，以为整顿组织就是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了，都解散了，这是一种误解。现在我们提到的整顿组织，是把革命组织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归口，加以整顿、提高，还是要的嘛！红卫兵还是要的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还是要的嘛！不过这是组织形式改变一下。加以整顿、提高之后，大大加强革命派的战斗力，怎么会“没有依靠”呢？这种误解是不对的。怕当少数派，这个怕字去掉它。

当然，现在因为全市运动发展不平衡，也可能回到部门之后，保守势力比较厉害，甚至还有坏蛋在掌权。在某个部门里，革命力量暂时还联合不起来，或者联合起来了暂时还不占优势。这种情况可不可能呢？可能的。但是，有这种情况出现，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任务。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开始不就是少数吗？我们起来造反的时候，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的时候，不就是少数吗？我们是通过斗争，团结群众，使自己从少数变成多数。

我们为什么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呢？因为我们贯彻了毛主席的路线，因为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还是前面讲的那个道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包括工人、学生、干部等等，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说：“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同志们，我们都要争取做毛主席所谈的这样的好同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什么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还是少数，正说明革命形势的发展还不平衡，还有些空白点，还有些弱点，需要我们革命力量到那里去，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那么，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当坚决去，开辟新局面。学校里不就有这样的情况吗？一些中学，还有一些大学，也有一些工厂，有这样的情况。那里革命力量按班级、车间来看还是弱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开辟新局面，使自己少数变为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就不怕当少数的，这是我们造反派的精神，这个“怕”字应该去掉。

（三）有极少数同志“怕丢掉个人手中的权力，怕失掉地位”。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

我们是无产阶级夺权，是为阶级夺权，是为劳动人民夺权。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把权夺过来，这是寸权必夺，寸土必争，是针锋相对，不能退让的。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权，一定要夺过来，夺过来之后，决不能让资产阶级夺回去。

但是，我们决不是为个人争权。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手里的权是哪里来的？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是革命给我们的。大家回想一下这半年多来的战斗经历，我们因为要革命，所以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革命造反派的战士选我们当领导，给予信任。所以，只有继续革命，才能继续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

有的同志开始造反的时候没有包袱，什么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被打成“反革命”都不怕，杀头、坐牢都不怕，现在怎么怕整风呢？就因为胜利了，有了权，掌管了一部分工作，背上了思想包袱，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同志们，无产阶级是没有包袱的，最近毛主席再一次指示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只有整个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剥削阶级消灭了，阶级消灭了，三大差别消灭了，无产阶级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我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话，就应该树立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争的无产阶级的权，劳动人民的权还多得很，将来应该全世界的权都归无产阶级，都归劳动人民，都归革命派来掌握。国际歌中不是这样唱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有了一点权力就满足了，就前怕狼后怕虎，只想“保”自己的权，就不敢再革命

了，就不能再为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更大的解放而奋斗了。如果不丢掉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不为革命造反派服务了，不为劳动人民服务了，走向了反面，即使你个人手里的权没有丢，无产阶级的权却丢了。因为你已经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去掌握了。所以，这种怕，虽然是少数同志，我们也希望坚决的去掉。

（四）“怕一搞整风，内部分裂，组织涣散”。有的革命组织因为运动开始以来，从来没有整过风，本来内部就存在很多矛盾，负责人之间相互意见很多，平常没有放到桌面上来，怕一整风，闹翻了，各干各的，不好收场。

我们的整风，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提高我们的认识。整风的结果，应该是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就是说，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但是，怎么才能有统一意志呢？大家不讲话，当面不讲，背后乱讲，搞自由主义，能够有统一意志吗？没有的！要有统一的意志，就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没有这一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革命组织的内部，总是有矛盾，否认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就是欺骗自己。一种矛盾解决了，另一种矛盾又会产生，及时地、正确地解决矛盾，我们的同志就会进步，革命就会前进，革命组织就会巩固；如果回避矛盾，就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大家意见分歧，心里想的不一样，做的不一样，怎么能够有统一的意

志呢？只有通过整风，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不同意见说出来，把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去掉，纠正。才能真正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才可能有统一行动，使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真正团结起来。最后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在已经建立大联合的地方，也有矛盾，也要通过讨论，整风，巩固革命的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如果“怕”揭露矛盾，让矛盾积累在那里，那一旦爆发，反而不可收拾。

（五）“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揪住缺点尽量夸大，揪住不放，把自己整得灰溜溜的。”有的同志有这种顾虑，现在要整风，人家假使揪住不放怎么办呢？这要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对别人提意见的同志，要认识整风的积极意义，不要把整风当作整人，也不要借整风的机会算总账，首先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要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要从革命利益出发，不要从个人恩怨出发；另一方面，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要挺得住。所以，这种顾虑也可以打消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革命同志，大多数的群众是能够分清是非的，还是毛主席讲的，相信大多数这样一个根本观点。

这些“怕”字，都因为“私”字作怪。我们一个人，一个革命战士，要无私才能无畏，一个人无私无畏，就得到了自由，你没有私，就不怕，你就能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你就得到了自由。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我们在造反的时候经常用，现在我们还要用这句话。我们向敌人开火的时候，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拚死斗争的时候，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在整风的时候，也要用这句话。毛主席这里讲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他没有私心杂念，心里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凡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利益的，就坚持到底，凡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就无所畏惧的去掉。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整风中敢字当头，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改正错误，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这样那样怕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不过对于整风的目的意义还认识得不太清楚，思想上还有一些私心杂念，所以怕。当然，也有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怕整风。毛主席说过，怕整风的人，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有某些错误的好人；"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如果所有的革命同志都是敢字当头不怕整风，混进革命组织的极少数坏人就躲不下去了，就会被揭发出来了。

## 三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说，但需要提醒。因为有一部分同志开始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

有人问：当前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很明确，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跟一小撮代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的斗争矛头应当对着谁？这个问题整风中首先要弄清楚，这也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基础。我们斗争矛头应当对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应当对准全国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等，以及上海陈、曹之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对准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复辟活动，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势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子。这是十六条及党的各项文件都规定了的，就是说，我们的方针应该依靠革命的左派，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我们从运动以来的一条基本路线。不管在学校，在工厂，在夺权以前或以后，都是这样。夺权以后，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以后，还要继续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到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影响，对于刘少奇等人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我们要展开广泛的批判，有些

就在报纸上批判，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文艺上（文艺上就是陆定一、周扬那一套）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工作搞好。应当看到：这个批判任务，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们面前有两类矛盾：一类是革命组织内部的矛盾；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同阶级敌人的矛盾。阶级斗争反映到革命组织内部来。我们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是为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破坏这个大联合；是为了加强对敌斗争，而不是为了削弱对敌斗争；是为了彻底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打倒敌人，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放着那些阶级敌人不管。忘了这个大方向，把斗争矛头主要对准自己的同志，而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战胜敌人，那就完全搞错了。有的地方，把主要精力，甚至于全部精力用在革命组织之间“打内战”，甚至混淆两类矛盾，把别的事情都不管，那就把大方向搞错了。

现在有好些地方，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很多。有一些是原则上的矛盾，这是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有很多不是原则上的矛盾。有的相互攻击，只想整垮别的组织，甚至要在红卫兵当中搞什么“上揪下扫”，人人过关，放着牛鬼蛇神不斗。有的地方甚至让牛鬼蛇神在那里养得胖胖的，但是把运动初期犯过一些错误的青年同志，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这样做是危险的。

有的地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跳出来说，要“自己解放自己”。你要什么“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口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还有的地方，坏人也跑出来反攻倒算。发生这类情况的地方，革命组织首先要端正斗争的大方向，把精力集中到对敌斗争上来。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前一时期，有人提出现在上海还要第二次“大乱”，还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大联合”的号召唱对台戏。这个口号不但上海有，在别的地方也有。它同样是抛弃了斗争的大方向。实际上就会走到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道路上去，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感到高兴。我们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一条路线下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同违反这一条路线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所以我们说现在大方向问题在一部分单位是存在的。

当然，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革命队伍内部某些人，如果坚持错误，就会发展到革命的反面去，甚至在阶级斗争的转折关头同敌人站到一起去，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进行整风，也是为了帮助这少数同志掌握斗争的方向，能够再沿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

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千万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看到在全国范围内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的，从北京到全国有的地区，都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我们要提高警惕。有的地方，白色恐怖又来了。镇压革命，抓革命群众。斗争是会有反复的。北京的红卫兵最近举行了几次反逆流的大会，打退了那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他们红卫兵报上揭露的材料来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人物，还不死心，他们还要进行垂死的挣扎，一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面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扶上台，把革命群众镇压下去，搞反革命复辟。同志们，从电视里不是看到陈丕显那副顽抗的样子吗？那么他还在幻想什么？他还在梦想什么？他无非是在想有朝一日再来一个反革命复辟。陈丕显不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代表人物。全国也有这样的人物。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已经经过了多次反复，再增加一次反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十六条早就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北京的这一股攻击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不就被那里的革命人民坚决粉碎了吗？我

们上海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夺了权的地方，上海的工人阶级，红卫兵战士，也应该针对这一股反革命逆流迎头痛击！正象我们历次表示过决心一样，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的工人阶级，上海的红卫兵，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永远支持全国革命造反派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谁敢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叫他垮台！

我们应当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当前的形势，充分看到运动的主流，正确认识运动的曲折，麻痹大意是危险的，只看到黑暗的一面，看不到当前运动的主流和大好形势也是错误的。应该看到：上海文化大革命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斗争还很尖锐，只要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搞好整风，坚持群众路线，整顿思想，整顿队伍，掌握正确的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使上海的大好形势继续发展，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何新反扑，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我们希望各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风当中，首先能够明确大方向。假使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各个单位的工作，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都会大踏步地前进。

# 四 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树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风头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这是最近中央给我们发出的号召，毛主席给我们发出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

同志们！按部门、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斗争的需要，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也是夺权斗争的需要。只有我们深刻地树立起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才能懂得为什么一定要搞革命的大联合，才能认识什么叫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是错误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是错误的。革命的大联合，首先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斗争目标。不是无原则的联合，也不是为联合而联合。我们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都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有一些地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已经有些很好的经验，就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通过斗争，通过整风，通过学习。

通过共同对敌斗争，团结起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通过开门整风，大家在毛主席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通过学习，明确了斗争的大方向，在批判、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基础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有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认识，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出的方向，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

我们有的同志，忘掉了还有敌人，忘掉了资本主义势力还千方百计的想复辟，忘掉了我们还有革命的严重的任务，还要反复辟，还要搞斗、批、改，忘掉了这一些，就不想搞革命的大联合了，心里想的范围很小，只有我这个团体怎样、怎样。林彪同志曾经说：要去掉局限性。个人主义是一种局限性，小团体主义也是一种局限性，只有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才能去掉这种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目标远大，要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能看到斗争的全局，去掉局限性。

任何一个正确的口号，都可能被曲解。革命的大联合刚提出不久，有的人就说成“要解散一切革命组织”，“这是要把所有的革命造反组织都取消，和群众合并”等等。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乱。我们说革命的大联合，是组织形式上的改变和整顿，不是不要革命组织，经过整顿以后，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革命的红卫兵，不但不能削弱，而要大大加强政治上

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战斗性。很明显，现在有一些地方实现了大联合不是造反派还存在吗？有的是误解，有的是一些人在挑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想搞大联合，就挑动“你不要搞了，搞了以后什么组织都没有了”。我们要识破。革命的大联合，决不是取消主义，不是“合二而一”，不是把革命派和保守派合并起来。

在中央指出的种种错误倾向当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危害性，我们在一月革命过程中有了深刻的认识。文汇报有一篇“风头主义”社论，写得不错，据说也有人讲它是大毒草，那可不是大毒草呀！其他的倾向也讲了不少。目前成为大联合比较普遍的思想障碍的，是小团体主义。所以今天着重要讲一讲小团体主义的问题。

要破小团体主义，就一定要树立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要树立这个思想，就一定要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闹革命？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各种革命造反的组织？这是因为我们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压迫，我不是指那些经济主义的组织，不是那种“一九六五年司令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司令部”，我是指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我们是因为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压迫，要起来斗争，要起来反抗，要起来夺权。那个时候，在上海市陈丕显、曹荻秋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掌握着党、政、财、

文的大权，使我们不可能从上到下来组织自己统一的阶级队伍，怎么可能呢？权在他们手里！那个时候我们革命造反派只能一个一个的突破，阵地一个一个的占领，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学校、工厂、机关，有一些组织形式完全是根据当时斗争的发展确立起来的。只能一个组织、一个组织的成立，要统一成立，自上而下的成立，只有赤卫队之类的御用组织，那是一个晚上就有五十万袖章发出来了。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只靠我们一个团体的胜利，是不能免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你一个厂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就能够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吗？工人阶级就能永远不受压迫了吗？不，决不是这样。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主席最近在“三・七”指示中又一次的教导我们。在中国，不但靠一个小团体不行，光靠你一个厂、一个校、一个区、一个市也不行，只有我们全国都彻底挖掉了修正主义的根子，只有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利，紧紧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手里，把革命进行到底，在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个方面确立毛主席的路线，批判刘、邓路线，批判修正主义，使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中，一步一步地取得更大的胜利，一直到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彻底消灭。这还不够，还要在全世界消灭了帝国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消灭了剥削阶级，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正的无

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有这个远大的理想，应该有这样一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毛主席讲的。现在，我们全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是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有力的支柱，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条件，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就可能，就需要把自己的阶级队伍进一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需要按单位、按部门、按产业这样子来归口。所以，所谓革命的大联合的问题，就是一个进一步组织阶级队伍的问题。应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珍贵的权利，是我们用艰苦奋斗，甚至用流血斗争争得来的权利。过去的革命造反派，怎么可能这样归口组织自己的强大的阶级队伍呢？现在有了这个权利，就应该认真地掌握起来。

有的同志想：有了一个小团体，可以保护我，我可以不再“挨整”了。这是一种天真的幼稚的想法。不消灭资产阶级，不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罢了一个修正主义者，不是还可以产生第二个修正主义者吗？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大革命，不是“罢官革命”，也不是小团体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一场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我们要从阶级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刚开始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志，可能抱着各种各样的目

的，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有的是因为被打成“反革命”，有的是因为别的原因。但是，革命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不想作一个保守派，我们要再革命下去，当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树立为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彻底解放而斗争的观点，坚决反对小团体主义。

小团体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里举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讨论，举得对不对请大家批评。

（一）在夺权的时候，不想搞革命的大联合，只想用一个团体掌权，只想“我”这个团体掌权，来代替甚至是排斥革命的大联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是想怎么发展“我”这个团体的势力，尽量扩大“我”这个团体手里面的权力，而不是想到怎样去搞革命的大联合，共同对敌。这样做的结果，革命的大联合也搞不成，把革命的力量抵销了。你说没有权吗？也夺了，你说夺了吧？又不能真正掌好权，用好权，对于无产阶级很不利。或者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内战了，忘记了还有一个外战，使夺权、使搞好革命都受到严重的妨碍。甚至于有这样的情况：几个造反派内部斗得很厉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坐山观虎斗，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在哈哈笑。不是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吗？一个革命造反组织，下面有几派，每一个派在一个厂里有几条线。结果这个厂里面的工作一天到晚闹矛盾，几个组织上面都有头头要抓革命，促生产也搞不好。据说有这样一个局：两个造反派有半个

月的时间尽打“内战”，就是相互贴大字报，相互辩论，不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抓工作，什么都不搞了。据说上海电影界有三个团体，搞了三部电影纪录片，名字都叫“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为什么不能够联合起来搞一个好的？反映一下上海一月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历史功勋呢？为什么不能这样，一定要搞小团体呢？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到组织组去登记的有六百六十二个组织，其中全市性的组织二百二十六个，除了解散的以外，全市性的组织还有一百九十二个。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搞革命的大联合，这么多组织，都往基层里布置工作，基层里吃得消吗？怎么抓革命、促生产呀？

现在革命的大联合势不可挡，已经有好多很好的单位了。今天报上不是登了江南造船厂一个车间已经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了吗？上海也有一批厂嘛，象爱民糖果厂，他们厂里就已经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控江中学的红卫兵，经过了军政训练，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也通过了学习整风，通过斗争，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据说，南市区公安局，几个革命造反组织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也成立了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昨天报纸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表了声明，支持下面的革命大联合，这个很好。据说杨浦区前一个时期，百分之八十的工厂有两个到三个造反队，每一个造反队都同上面挂钩，统一不起来，不晓得是不是这样？既然大家都是革命造反派，真正都是要干革命的，

为什么不能通过开门整风，联合起来呢？我想是可以的。还有财贸系统，也有两个组织，据说闹了很久，不能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一次整风，真正能够解决大方向的问题，真正能够在毛主席的路线上联合起来，那样对于财贸系统的工作不就是可以大大的推进一步吗？不就可以考虑筹备财贸系统的职工代表大会吗？大家都不要光想自己一个小团体的利益，考虑一下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怎么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更好的革命，更好的战斗。

据说有一个厂里面有这么一个口号，他下面车间里面有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厂部的组织就表示：“不支持、不承认、不提倡。”这个“三不”主义是不对的。这个是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志们回想一下，过去陈丕显、曹荻秋这些坏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待革命组织不就是不承认、不支持嘛？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能采取这种态度呢？不能够！

还有个别这样的情况。有的革命造反派为了自己这一派单独掌权，为了保持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任意把别的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就是你反对我就是反革命，甚至用武斗、扣押等等非法的手段，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夺权以后用这种办法来压制群众，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我们在这里先讲清楚。

（二）大联合我赞成，甚至举手赞成，但是大联合要“以我为主”，只能是你并到我里面来。有的同志很爱惜自己这个团体

的名字，大家在“杀”出来的时候，共过患难，共过战斗，对自己组织的名称有感情，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是要记住毛主席的话，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人民公社”这个名字不都可以改吗？这个名字是我们最热爱的名字，主席讲改，就立刻照办了。

对自己组织的感情如果发展成为一定要吃掉别的组织，只能人家并过来，那就错误了。每一个革命组织都有自己的理由，可以不搞大联合，或者是“以我为主”，革命早的说：“我是老造反”，所以要“以我为主”。那么革命比较晚的呢？说你老造反犯错误比较多，我新造反犯错误比较少，要“以我为主”。人数多的讲我是主要的力量，要“以我为主”，人数少的说你那个人数多的是大杂烩，要“以我为主”。那样的搞法就不会有什么革命的大联合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毛主席有这么一段话：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毛主席说：“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毛泽东思想真是说中了我们的要害，打开了我们思想上的窍门，我们不应当只看局部而应当看全局，一个厂的全局、一个局的全局、一个系统的全局。如果在局部看来有些困难，在全局看来是可行的，是需要

的，是必须的，我们就应该服从全局。我们应该从全国、全市以及本单位的全机关、全校、全厂的全局来考虑这个问题。希望在解决这个思想问题的时候，反复地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不需要我来多说了。

控江中学的红卫兵在讨论实现大联合以谁为主的时候，也是有过争论的，他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狠斗“私”字之后，认识到“以我为主”是搞不成大联合的，结果他们经过辩论提出了三条原则，根据这三条原则实现按班级的大联合：第一、组织不论大小，人数不论多少，看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第二、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第三、各个革命组织坚决打倒小团体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革命不分先后，各革命组织一律平等。他们提出了这三条原则，结果把很多分歧解决了，实现了大联合。我觉得这三条很好，可以供同志们讨论、辩论时参考。

（三）争功，就是把革命的功劳只归于自己这一个组织，甚至于只归于自己一个人，忘掉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忘掉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知识分子、革命的群众，艰苦劳动，日夜奋战，我们讲过多次，春桥同志跟我做的事情最少了，我们没有上码头，我们没有到火车站，在一月革命当中，我们的贡献最少，真正的贡献是那些广大的革命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是他们有贡献，工作是他们做的。我们应该懂

得我们不能为自己去争功。要说“摘挑子”，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摘桃子，不是个人摘桃子。还有些同志他们有了荣誉地位之后，只想保持自己团体的现状，不愿意团结更多的人，好象更多的人一团结，我这个桃子就被他摘去了。不愿意继续革命，不愿意随着政治任务的改变，改变自己的组织形式，结果思想上出现了一种保守的倾向。

同志们，革命是要前进的，时间是不等人的，任何人就是过去有功劳，也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保证未来。革命和保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革命派如果继续革命，继续前进，那这革命性就会越来越强；如果因为革命了一段，背上包袱，不想再革命了，就会不自觉地站到保守的立场上去。我们一定要做不断革命派，不要做半途而止的革命派。

革命的大联合，自上而下，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按产业的大联合，当然需要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上海跟青岛、贵阳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大家的创造性。有的同志说，在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成立之前，有一些市一级革命组织怎么办，我们说，市一级的革命组织如果积极支持搞下面的大联合，成为一种促进力量，就不会成为一种障碍；你如果反对大家搞大联合，那人家就要起来反对你。所以关键问题就是看采取什么态度。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应当促使我们团结广大的革命群

众。有一些人过去受过一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那主要是受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坏主意欺骗、蒙蔽，现在他们要起来了，要革命，我们要不要他们？我们应该是要他们，不是要排斥他们，我们团结的人应该越来越多，这样我们革命事业才越来越兴旺。

我们希望经过整风，去掉了小团体主义，能够大大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有若干厂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是不是可以考虑按产业（如冶金、纺织、化工、电机、仪表......），召开革命造反派职工代表会议，这个职工代表会议，可以讨论当前形势和任务，可以选出出席全市工代会的代表，选出自己的委员会，也可以选出参加局里面“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在一些主要的产业大联合形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召开全市的职工代表大会，这将是一个隆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大会。工总司的各级领导人，希望你们能下厂去，积极促进这个大联合。比如大学，我们是这样设想，假使有一半的大学，或者一半以上的大学，红卫兵真正的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筹备召开上海的红代会。也可以串连，学校里面、学校之间的大串连以后还是要的，可以相互推动。我们曾经对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红卫兵组织建议过，比如说，“五一”“五四”能不能开全市的工代会、红代会。能不能在这前后也能够开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全上海的工农学的革命的阶级队伍，进一步组织起来，这能不能实现，不决定于我们，而决定于大家的努

力。自然也不必赶时间，我们不是为赶时间而工作的，时间来不及迟一些也可以。当然，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的造反组织以后，矛盾和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一点现在就不要忘记。还会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会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在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之后，都要继续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而斗争。看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但能够说，因为共产党有两条路线斗争，而且这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就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了吗？当然不是这样。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共产党以来，中国革命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关键是在于领导权。有了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领导核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起来。集中到哪里，集中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团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这样革命就可以不断发展。我们就能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下团结更多的群众，组成一支强大的阶级队伍。

上面我讲了这么多道理，无非是希望一点，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去搞革命的大联合，把各式各样的思想障碍在这一次整风当中去掉。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能够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的。

值得注意的，最近有的单位不但没有搞什么大联合，反而冒出了一批新的组织，甚至于跨部门的组织。不是决议已规定了不要搞跨部门的组织吗？他们想干什么，说穿了，一句话，就是想

利用搞革命大联合的机会，篡夺领导权。有一个厂，近半个月之内就冒出了二十二个组织。看来，在有一些地方，随着革命大联合的发展，可能有一场激烈的夺权斗争。我们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四清下台干部反攻倒算，混水摸鱼。我看见了一张传单：这张传单署名是什么“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联络站”“红三司”从来没有个总联络站嘛，怎么工人里面有个总联络站呢？是否他们自己挂上这个牌号？明明规定不要成立工人学生的混合组织，为什么打出这个番号呢？这一张传单里说什么过去搞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他们执行“党纪国法”，受到了“种种的政治迫害，压得我们气都喘不过来”，现在要“杀”出来了，你们这一种杀出来要造谁的反呢？过去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碍起来造反的时候，你们强调“党纪国法”，现在我们搞大联合的时候，你们又要强调什么要“喘过气来”，反扑过来，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值得我们想一想。但是，在这种形势面前是不是说明不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呢？相反，正是说明我们更需要加紧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我们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真的实现了大联合，那么这一种所谓的“总联络站”，这一种在大联合浪潮里面冒出来的值得怀疑的组织，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暴露出来了，我们革命派都联合起来了，那些别有用心的、针对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就会迅速垮台。

# 五 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反对“打倒一切”，也反对“肯定一切”

我们要继续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坚决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一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实行“三结合”过程中，继续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真正革命的“三结合”，还是包办代替的“三结合”，区别就在于是否真正实行群众路线。

我们讲革命的“三结合”是为了要成立一个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这样一个机关。这样一个领导班子。这是一个做工作的过程，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团结——批评——团结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革命群众来说是一个学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提高认识的过程，对于革命的干部来说是一个在斗争当中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线、自我革命的过程。决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表态”。现在有很多经验说明，凡是在“三结合”的过程当中继续走群众路线

的，那么这一个机构成立起来就有威信，就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大家就比较满意。假使不是走群众路线，走另外一条路线，那么成立起来的机构就没有威信，就不能搞好工作。所以我们在搞“三结合”的时候，关键的一条，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一个问题也希望各单位自己考虑一下，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

下面两种思想都是违背群众路线的，都是违背革命的“三结合”的。

（一）由于“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思想没有肃清，对革命的“三结合”抱消极的态度，对于干部起来造反总是不放心，消极等待，不愿意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还有的同志认为我没有“三结合”，生产、工作也搞得不错嘛！为什么还要搞“三结合”呢？对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积极地创造条件去实现，而是消极地等待，甚至于拖延。

“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是革命造反派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遗毒。大家回忆一下，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这一张大字报里面，揭开了刘、邓反动路线的盖子，这一张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字报，在批判刘少奇的时候，就讲过他在搞四清的时候执行的是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路线，所谓形“左”而实右就是“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毛主席当时就批判过，站起来蚂蚁一个也看不见，蹲下去满地都是蚂蚁。毛主席批判了这种思想，产生了二十三条。

还有陶铸也讲过，陶铸不是说过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之外“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不是有一份传单很流行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来就是同这条路线相对立的，要算帐，应该算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帐上，不能算在革命造反派的帐上。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正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能够掌好权，用好权。因为只有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机构，把胜利的果实巩固下来。如果我们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革命成果就要受到威胁，就会丧失革命的成果，甚至于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夺过去。对于干部，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和中央的教导。相信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犯了错误，犯了路线错误，除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处，其他的人，除了他们自己应有的责任，还应该看到市委陈、曹他们所使用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扣压中央指示，害了很多干部。犯错误的同志应该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向群众检讨，做群众的小学生，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我们就要像中央最近给我们的信里所说的，“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应该看到经过这些日子批判、学习，大多数的干部觉悟已经有了不同程度提高，不要看死了。

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团结了大多数的干部，就能够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孤立，完全孤立，就可

以把他们彻底打倒。最近在电视里你们不是看到，一些领导干部，面对面起来揭露陈丕显、曹荻秋和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不是就使得他们丑恶面目更加暴露、更加孤立吗？这样做，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更加巩固，我们的胜利果实也就更有保障。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排斥一切干部，甚至于干部起来造反的时候还是排斥他，那就恰恰适合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愿。因为他们就希望所有的干部都抱成一团，不起来造反，不是一分为二，甚至于把矛头对准起来造反的革命干部。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就能把当前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生产，更好地抓起来（上海这地方生产对全国负有很大的责任）。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生产的妄想彻底破产。因为昨天专门开过会，今天不谈了。

我们对待干部，第一看错误的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严重呢还是不严重，同时还要看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就是说他是不是愿意检查愿意改，包括对第一把手在里面。因为总不可能所有的第一把手（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统统都坏掉了。在这里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要根据政策，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对于犯了错误而真正能够坚决改正的同志，要允许革命，要欢迎革命，不要不许革命。如果他是犯了一般的错误，能够同错误路线彻底决裂，检查自己的错

误，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那么过去的错误就能够成为今后做好工作的决心。毛主席“三·七”指示当中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

各级革命委员会究竟是不是能够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主要在于能不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离开了这一条路线，就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这一条路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正是执行这一路线的组织保证。我们应当从这里出发，去考虑如何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的问题，把毛主席这一条路线继续的坚决贯彻下去。

（二）另外一种错误思想，就是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而是采取阶级投降主义的态度。一听说要搞“三结合”，就忘掉革命两个字，放弃革命的原则，抛弃群众路线，以实现“三结合”为幌子、为借口，把坏人拉到领导岗位上来。甚至于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拉到领导岗位上来，搞假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种倾向，我们也是要坚决反对的。

有的地方不是搞群众路线，而是抢干部结合，大家抢，几个派别相互抢，有的地方搞包办代替。不通过群众，搞“拉郎配”。凡是这样做的地方，效果都很坏。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领导机关。

据说有一个医院，几个革命造反组织，他们不搞大联合，而大家都要想自己去搞“三结合”。怎么办呢？就去抢干部。不管干部大小，态度好坏，一律结合。有的说：“管他什么干部，先把干部抢到手，以后结合的时候可以派用场，现在不抢啊，以后要结合就没有人啦。”这完全是个人主义嘛！怎么能够采取这种态度呢？

还有的同志想“快”，就专门找一些平时不大管工作的，干劲不足的，所以犯错误不大的干部来结合，专门找这一些人，而不是找真正革命的干部。甚至有的地方找运动一开始就被斗而靠边、因此后来没有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搞“三结合”。这样的“三结合”，有什么代表性？有什么革命性？有什么权威性？

这还是属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认识上的问题。有的地方（少数地方），坏人上台，牛鬼蛇神篡夺了领导，地、富、反、坏、右搞白色恐怖，革命派被镇压，这是一种假夺权。有的地方坏人没有上台，但在背后牵线，挑动那些青年去夺权，夺了权以后就镇压革命派，这些单位的青年同志你们要提高警惕啊！我们决不允许权落在坏人手里，凡是被坏人假夺权的地方要坚决搞反夺权，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要搞反夺权，把权夺过来。

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三结合”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抹杀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攻击革命造反派。

决不允许利用“三结合”，把一切恢复到老样子，该打倒的

一小撮坏人（就是那些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要坚决揭露，坚决打倒。

上面这两种倾向，在整风当中主要解决那一种，由各单位自己判断。因为情况很复杂，运动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希望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能够逐步地，但是尽快地把各级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一切领导班子，都要有军队或民兵代表参加。

## 六 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加强三性，一定要从学习毛泽东思想出发，要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出发，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要破私立公。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不要以为我们革命性已经很够了，就是一个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了。不是的。我们前一时期曾经谈到，有一些红卫兵的战士因为在大风浪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革命精神好像不大足了。无产阶级的五敢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革命的精神，永远要发扬。我们这次会议不是也念《语录》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革命的决心永远要保持。我们面前还有严

重的斗争，要准备打退几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要有革命到底的革命意志。这一句话也不能曲解，决不是为了个人小团体的利益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为了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去争取胜利，那就变成坚持错误了。我们一定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保持我们的革命性，发扬我们的革命性，一切消极的思想，停止不前的思想，犯了一般的错误而抬不起头的情绪都要消除。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路线，掌握毛泽东思想，敢于提出新的问题，投入新的斗争，继续大大地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首创精神。路是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走出来的，革命的世界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斗出来的、创出来的。

在夺权以后如何继续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性？这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再革命下去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把权夺过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前夕，毛主席就警告过，有的人在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好汉，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可能要打败仗，后来果然如毛主席这个话说的那样。今天我们夺权，也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一月革命的英雄们，战士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说这个话是把我自己放在里面，虽然我在一月革命当中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被捧场、被胜利、被讨好、被权力、特别不要被物质享受冲昏了自己的头脑。我们永远不管怎么忙，

永远要学好毛主席著作，永远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要接受那些一九四九年有一些人进城的时候是革命者，后来就蜕化变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教训。

加强无产阶级的科学性。大家知道，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批判彭真二月提纲时就说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是加强无产阶级的科学性。主要是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要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如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什么科学性也说不上，调查研究也做不好。对于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阶级分析。这不是个人问题，要进行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一定要跌跟斗。现在有的人不是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是好好用毛主席著作来对照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中央有很多新的指示，不是一句一句地认真钻研，用毛泽东思想去做调查研究，甚至于凭道听途说的马路新闻吃饭，凭这个去判断风向，这就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前一个时期不是有的人就靠道听途说的新闻去投机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跌了大跟斗，就是因为缺少无产阶级的科学性。我们希望各革命组织之间不要搞情报，不要用相互打到的别组织内部去搞情报的办法，不要搞这个东西。要进行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原则斗争。同志之间要学会商量问题的作风，遇到不同的意见，我们要商量、要辩论。辩论我是赞成的。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天天听到一个学校里，一会儿这一派上去辩论，一会儿那一派上

去辩论。要辩论，不要用打、用砸、用抢等办法来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这股歪风要坚决煞住。毛泽东思想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一切武器当中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一定要掌握起这个武器来。办一切事情都要从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立场出发。不要搞投机。

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这里面最主要的一条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要坚决地、迅速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错误意见，我们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今后还是这样。反对奴隶主义，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这本来是要我们去反对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要盲从。这个口号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反对奴隶主义，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奴隶，不要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奴隶，不要做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奴隶。但是有的人后来歪曲了反对奴隶主义，解释成怀疑一切，这样就发展到无政府主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于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就变成反动的东西了。我们要巩固劳动纪律，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的秩序，坚决反对无故缺勤脱产等等妨碍生产的现象。有的工厂里脱产缺勤率太多这个现象一定要改正。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我们希望中小学的同学要回校去进行学习、整风，不要不愿意回去、老是在外面游逛。要加强保密观念，现在有些同志头脑里保密观念很少了。现在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千方百计在窃取我们的机密。我们还有个保密观念，反对泄密

的现象，必要的保密制度就是要坚持。各革命组织当中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建立民主集中制，既反对没有民主，也反对极端民主化。

这里顺带说一个整顿组织的问题。不是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里，除了指出要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按部门建设我们的阶级队伍外，还提出了两个意见，一个意见是：有一些违反中央指示的组织要主动解散。我们希望这一些组织，能自觉地回到本部门去，参加本部门的革命的大联合。还有一条就是这样说的，“在整顿组织的过程中，必须纯洁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把混进来的坏人清洗出去。”事实说明某一些革命组织当中因为相互不了解，确实混进了少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些坏人混进了革命组织，盗用革命组织的名义干了坏事，这些人我们应当通过整风把他们揭露出来，清洗出去。当然我们这里要有区别，一个组织里面有了坏人，假使他不在领导地位的话，就不等于这个组织是坏的。如果他是一个组织的领导层里面有了坏人，那么一定要把他同广大的战士严格地区别开来。对于这些混进革命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洗出去之后（这是极少数人），我们的革命组织就能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有力地去战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等阴谋诡计。

# 七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讲这样四句话。同志们，我们刚刚《语录》已经念过了，这一次整风一定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毛主席的方针，一定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从提高政治觉悟着手，从学习毛泽东思想着手，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

首先我们要学好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决议中规定的毛主席六篇著作，以及中央有关指示，和红旗杂志有关的社论。比如最近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在学校里传达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指示。我们特别要学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文章，其他文章也是一样，这是一篇万古长青的伟大著作，如果把这一篇著作的精神掌握好了，来建设我们的队伍，我们就可以象当年毛主席把军队建设成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我们今天也能够拿这个建军的武器来建设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使我们真正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整风才有武器，才有标准，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学。

我们要开门整风，听取群众的意见，在形式上可以多样化，也需要开一些小会，深入地辩论某些思想问题。有的还需要个别谈话，现在我们个别谈话，已经很少很少了。解开一些思想疙瘩，

有时还需要个别谈话的。一个单位各个革命造反派之间，如果大家都争论不休，而又找不出什么原则分歧来，那么各个革命组织就应该以自我批评为主，大家首先检查自己。要多看到别的同志的优点，要看到自己的缺点，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大方向上取得一致，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要像鲁迅兵团东方红造反队的小将那样，对于错误的思想要作透彻的批判。什么“材料挂帅”啦，“单纯军事观点”啦，“罢官革命”啦，“贪图享受”啦，批判得很透彻。对待错误思想要批判得透，但是对于同志，一定要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要反对自由主义。同时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揭发错误，批判错误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不是像水浒传里的李逵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管你是什么人统统砍，我们不采取那种办法。我们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正如毛主席教导的：“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要摆事实讲道理。一般的不要去翻老账。不要由远到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翻起，一直翻下来。这样辩到哪一天啊！还是着重解决当前的问题。对待革命的同志，我们要坦白、诚恳、严肃，有话当面讲，不搞背后活动。要注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在开展批评的时候要注意大的方面。拿我们现在来讲大的方面是什么呢？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我们掌握得对不对

呀？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究竟怎么样呀？这些就是大的方面。毛主席说，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即政治上、组织上的重大问题，不要只注意小的方面，使人人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人人变得什么事也不敢干了，那还行吗？你要干革命，总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要力求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坚决改，这个就是好同志。

要边战斗边整风，不是停下战斗。这里对于战斗也要解释一下，据说有的学校叫边战斗、边整风，战斗就是打内战，就是革命组织之间的战斗，那可不是这个意思。边战斗边整风，就是指当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说不要脱离当前的工作。这里工厂和学校不同，因为工厂要坚持生产，中学和大学不同，工厂、学校又和机关不同，根据这些不同的情况，在时间上要作适当的安排，要分别不同的情况。

在方法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一切争论的问题，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一分为二。毛主席指出：我们在分析问题、分析错误的时候，“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使大家都能接受经验教训。毛主席还说，在一般的时候不要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不要搞什么人人过关。比如小团体主义，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要看当时成立这样那样革命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又要看到在当前的

形势下，跨行业、跨部门的小团体和工作不适应。在看到这一些不适应的时候，要看到客观上怎么障碍了我们的工作，也要看到我们主观上存在一些什么思想障碍，这样子分析就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接受教训，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在学校里对一般的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在大风大浪当中，在这个阶段或者那个阶段，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应当从学习两条路线的斗争着手，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认识为什么会犯错误。这样我们就能够提高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而不是相互揪住不放。这样，那些什么“联动”之类反革命组织就彻底孤立了，他要挑拨离间就不能实现了。

总之，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毫不含糊，一定旗帜鲜明，对于同志要采取耐心帮助的态度，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要好好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好多文章都说了这个问题，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一个最伟大的榜样。

同志们，最后我想说一点，我们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反对风头主义，但是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上海对全国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都要懂得。我们在一月革命当中曾经有过光辉的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为满足，如果我们满足起来，不继续前进，我们就会落后，如果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就能够为党、为人民、为毛主席作出更大的成绩。我们一定要发扬一月革命的光辉传统，一定要百倍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希望通过这次整

风，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大大地前进一步；在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上，大大地前进一步；在组织阶级队伍上，大大地向前一步；在抓革命、促生产上，大大地前进一步。一名话，在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肃清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搞好斗、批、改上大大地前进一步。放眼看全国，我们一定要用新的成绩来回答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要把上海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铁打江山的一个红色堡垒，在任何逆流歪风中都巍然屹立，上海，一定要永远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为人民立新功*

江青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长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

---

* 这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经毛泽东审阅的讲话，后被人民出版社单独出版发行。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曾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对“触詟赵太后”的故事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其他修改包括：在“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之前，加上“就许多单位说”。江青原讲话稿还有：“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毛泽东删了这句话。

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和电报，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的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末新鲜。这篇讲话强调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论是十年内战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

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

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

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

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詟，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说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詟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

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

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

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

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

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对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

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

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的工作，不是份内的事，不管；要知道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

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音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

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

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

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

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的材料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

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

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的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

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

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们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

#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工作的总结*

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

---

* 这是张春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的还有陈伯达、康生。

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

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

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上海很有希望”。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

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一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就是九个工人组织了一个指挥部，抓起来的。他们本领够大的了。就这么九个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你说这九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也不见得，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是那些局长、党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

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旬，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竟属于那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它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

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

再讲一个对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局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是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市委在开头就利用上海市委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利用毛主席领导批判《海瑞罢官》时造成的好影响，迷惑了群众，迷惑了干部。又强调“组织纪律性”啊，“内外有别”啊，害了好多干部，好多党团员。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解放这批干部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也是群众问题。究竟实行什么路线呢？能包办代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搞“三结合”，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施令是没人听的。“三结合”，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过程、斗争的过程，不能随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特别是有一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江青同志上次讲话中说到陈丕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很难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谈到了，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对

他做了那样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还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必要时，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的很大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个饶漱石。（江青同志：所谓请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候完全可以出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他可以很主动，但后来越陷越深，没办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他的话，都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这个人，我们过去也了解一点，但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的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发出来了，《紧急通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制可能改变，谁要违反要以反革命论处，但他在十一日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十六日他还给“红

革会”签发一万块钱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转移到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犯罪行为。他到处藏，最后藏到那里，我给他打了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怕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了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总觉得他过去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对革命有利。但到现在毫无结果。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一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错？让他在小会上检查，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的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他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

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付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好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给他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里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限。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表现好，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是真正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一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一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

而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了广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干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它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有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的警备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从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那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一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那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

确实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份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太难的。我们自己也还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 整掉不良作风*

王洪文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已经处于掌权的地位。政治地位的变化，在我们队伍中出现了两种情况：大多数同志能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思想觉悟，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也有些同志的思想作风起了一些变化。

有的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以左派自居，不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逆流”、“老保翻天”、“反夺权”的帽子。有的同志抱住自己的“山头”不放，说什么“我是掌权的，大联合也得听我的”。有的同志不能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来识别干部，而是以对自己的“好”、“恶”来作为是否能结合的标准。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要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为所欲为。

---

* 此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为这一版添加了按语：“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中，特别是某些负责人身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就暴露出来了。它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影响斗争的大方向。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它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能真正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大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这些不良倾向的存在，干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影响大批判的深入开展，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削弱和损伤了革命组织的战斗力。

我们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狠抓世界观的改造。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绝不能认为革命造反派掌了权，就已经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没有改造思想的任务了。恰恰相反，政治地位改变了，对我们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过去不当权，有了错误影响还小一点。现在当权了，如果不注意改造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干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头脑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进行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改造世界观行之有效的方法。毛主席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那种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正确的，用不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的。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办了很多好事，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以左派自居，摆起架子，打起官腔，骄傲起来。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之所以能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了权，并不是靠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也不是靠拳头和棍子，而是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的广大革命群众。同样，我们掌权以后，也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永远当群众的小学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去掉沾染在身上的政治微生物，才能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才能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脱离群众，甚至反过来压制群众，发展下去，就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当然，革命派内部的互相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和风细雨的，是首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毛主席指出：“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坚决反对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也反对一批评，就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主流支流，而把对方一棍子打倒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一年来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们就取得胜利，就能飞快地前进；只要我们稍微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犯错误，就要遭到挫折和失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紧跟毛主席，就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地向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一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的队伍。

# 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

江青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同志们好！（高呼：毛主席万岁！）我来的很仓促，也不知怎么回事康老把我拉来了，我讲几句话，也没有准备，讲对了供同志们参考，讲错了的，同志们批评，炮轰我也可以，火烧我也可以，都可以。

现在讲一讲形势问题。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因为对形势如果孤立起来看，那当然在某些地区个别地方觉得严重，其实不然，形势从全国来看，从历史来看，如果从历史来看，今年同去年这个时候比较，是不是大不相同了！去年这个时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方上他们的爪牙，那他还是想当有活动能力的，而现在呢？瘫痪了，有的被革命小将打倒了。瘫痪了不是

* 这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时江青的讲话，参加这次接见会的还有康生、李富春、李天佑、姚文元、曹轶欧等。这篇讲话内容在十月六日由中共中央整理下发。此前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工人联合委员会等革命组织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由于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遭到了“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一司、工人三司、“红卫军”、“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反对。由此形成了认为“八·二七”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和认为夺权“屁得很”的“屁派”。，双方发生了严重武斗。

坏事，因为“走资派”不能动了，那么有的地方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那么现在呢？中央在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市的来解决。这个想想看，安徽省现在请同志们来解决问题。就拿你们安徽来看吧，也不同了，旧的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被揪出来了，甚至连刘秀山那样的坏人，还有程什么？是叛徒。（合肥代表答：程明远。）噢，程明远，不也暴露出来了！（好派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刘秀山是个坏人，我很早就知道了，不是现在才知道的。我有材料，他是一个坏人，在背后操纵。可能有些好的人上当，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能把好人和坏人搞到一块。当然上了当的同志受了蒙蔽好人就得注意这个问题，刘秀山一直躲在北京，现在不知道躲到那里去了。（合好派答：在合肥亲临指挥）现在不管怎么样，不管吵过咀、武斗过，打过架，现在都能坐在桌子上来谈了，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形势呢？（好派答：是）大好形势！（热烈鼓掌）

江青：（面向“屁派”）你们那里很多同志怎么不叫啊！怎么了，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形势？（“屁派”答：是的。）

从历史上看，从去年到今年有这么大的变化，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现在逐渐在全国展开。在各个战线上要向他开火，要批倒、批臭、批深、批透。要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我曾经在每一个场合，要家喻户晓，要把他搞臭，臭的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那样中国就可以不变颜色了。因为他执政很长的时间呀！两面派有一整套的干部路线保证他的错误路线，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将们就上阵就把这些家伙统统的搞出来了。当然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说的容易，我们在那斗的可厉害了。同志们，我们也斗的很厉害，

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如果谁要和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要还击。（呼口号）

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响应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样的情况，而现在不需要武斗，武斗总是要伤害人的，总是要破坏国家财产的，为什么要作败家子，我们为什么要死人呢？为什么要破坏国家财产呢？我说是这样的文攻武卫，不要抽掉了它的阶级内容，不要离开它的特定环境和条件，你们回去双方搞起武斗来，戴起柳条帽来，拿起长矛来就不好了。（康老插说： 不单是长矛，现在是机关枪了。）机关枪那一颗子弹就完了吗。总的说，我觉得形势是大好的，锻炼青年一代，锻炼了小将们，也锻炼了革命干部，锻炼了老年一代，象康老，（康老说：今天你们锻炼我。）所以不要以为你们安徽的问题可是不简单，安徽的问题可复杂啦！当然各有各的情况，安徽目前的情况比去年大好，现在你们比早一个时期更好，能够坐下来谈了吗！这是了不起了，不是那么动武啦，这是好事，是良好的开端，现在各省大体上这样，经过到中央来谈，当然个别地方有反复，反复也是正常的现象。此外不平衡，不平衡也是正常现象，总之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对这个要有以下几个好的条件，就是说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领导，这是重要条件；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配合全国范围的大批判。

那么目前呢？当然，从文化大革命起，我说从文化大革命起

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讲，首先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外，还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还有美国特务、苏修特务、日本、国民党特务等等，他总是要破坏的。他们有黑手藏在背后，是不容易识破的，他以极左的面貌或右的面貌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他也注定要失败的，同志们想想，允许不允许？（答：不允许）目前拿北京来讲，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叫它是东西，就是因为它是反动的。就是反革命组织叫“516”。他人数不多，这个表面上他是年青人，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的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多数是青年，他利用了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稳定。而真正的幕后人是很坏的人，你们安徽也有，就反对中央嘛，“九条”、“五条”下去都反对嘛！拒不执行嘛！如果按“九条”好好的办下去，就不致于现在又反复，有反复了。但反复也好嘛！可以嘛！你们多来一次嘛！“516”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切不可以上当。

（康老插话，你们安徽有没有派人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好派答：有，刘秀山是的，他收集攻击周总理的材料。康生：我说一句话，公平话，你们好派也有人来搜集材料的，不要只说屁派，刘秀山派人搜集材料，好派梁守富也来北京搜集材料。）

但我们不怕，心里没有鬼，怕什么，你们去搜吧，吃饱饭没有事干，不干革命干这个，我是不怕，他们过去就整过我的黑材料，有一个专案在上海去搜集材料，去拿来，我也没有过问，过去一大箱。最近我们发现现在有的地方成立特档，特别档案。这也都是以小的手法，见不得人的。（姚文元插话，这是小丑。）是小丑。从右的方面，就是今年一二月间有一股风反对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目前一股风反对中央，或者以极左的面目来反总理，这是很典型的，是反革命组织“516”，要提高警惕，对特务、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还有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的，他们要千方百计做垂死挣扎，那么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识别他，做宣传，向群众宣传，使群众觉悟起来，就是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都是见不得人的那一小撮，就是反对从左边，从极左，从右边来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这个问题。我劝同志们提高警惕。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前一段有错误的口号，叫抓军内一小撮。这就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答：不能）如果我们野战军被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答：不能）不要上这个当，这个口号是个错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那个军区差不多都受冲击了，即使我们军队有些同志，少数同志，个别同志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也不需要如此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彪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队，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好的军队？（答：没有。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抢他们枪、打、骂都不还手，世界上有没有？（答：没有。）所以现在不能这样上敌人的当，到处揪一小撮，乱揪。我就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这有错误，你们跑到外面去，去年点革命的火，大串联，现在又出去了，这就是帮倒忙了。他们说什么“军内一小撮你们揪不出来，我们帮你们揪”，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又上了别人的当，因为青年人非常爱动。斗批改可是难啦！要坐下来看文件看材料，然后动脑筋，写文章，这比较

苦，跑跑冲冲看看，甚至武斗，青年人喜欢跑，本性爱动，你们也会到处跑的，听说武汉造反派（康老插话：钢二司）刚刚翻身，又到处跑，全国都跑去了。所以这个要注意的，你们跑到那里去，不了解当地情况，一头裁进去就犯错误。凡事要相信本地的群众，不能去包办代替，就象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你们的革命一样，我们只能给你们商量协助你们。

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现在这股风已经开始刹住了，那么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内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军队的同志错误缺点是有，应当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不要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这也是常有的，这些老同志打起仗来可勇敢啦，可靠啦！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犯错误，说了错话，做错了一些事，只要他想改正，想自我批评，同志们应当允许他改正错误，应当遵照主席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

安徽的情况，我以前没怎么摸，我不知道，有人对 6408 很不欢迎吗？（康老插话：在合肥、在淮南都有些问题，一开始好派冲了 34 师的师部大楼，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合肥的问题你们知道了，你们采取这个态度，批评了你们曹在凤。梁守富，他们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淮南这方面。淮南极派代表说明了情况，康老又说，不管怎样，冲了野战军是不对的。

把野战军冲了可不好，不能开个头。我们的野战军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你想广大的指战员出身都是贫下中农、工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前不介入吗，后来介入他不摸底，介入以后犯错误是难免的，不信你们试试看，换个位置试试看，你们犯不犯错误？

我说的是犯一般的错误，不是犯路线的错误，这是原则问题。对军队不能这样，有的夺枪，他们不能开枪，有的战士哭，因为都是革命群众，枪被抢走了。在国防前线，现在下一道死命令，中央已经通过。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是夺我的枪，我一定开枪，当然开枪是不对，我要开枪，我是警卫战士，我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全国范围夺民兵的枪，大部份是保守派，不是夺是缴械。（这时双方争执吵起来）

同志们，如果我的意见能够起良好作用，就是我们要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不要成为张家派，李家派，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派性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是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姚文元插话：我建议你们要好好学习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你们多作自我批评，不是就不吵架了吗？我建议你们双方多作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好，因为你就是反对我的，我到你那里去作自我批评，你也作自我批评，这样冷静下来谈谈，那个方面是大同，求大同存大异嘛！大同是什么呢？就是说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走资派的路线上，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大原则前提下，如果你们都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什么理由不大联合呢！

如果是按你们的派性，那就不是革命，而是为自己，不是为人民，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如果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的要求自己，要求自己那个团体，而不是吵咀、武斗、打架、抢武器，这样就说不清是非，是非应该搞清楚的是容易清楚的，拿你们安徽来讲，看你是不是斗争以李葆华为首的走资派，你斗不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如果这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同吗！有些不一样的做法和某些看法，那是可以的。我们小组也经常有不同意见有些问题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的，我和康老有时也争论几句，我们在大前提下是一致的（康老：一个人对错误要改，就是要自己反对自己。）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可难啦！因为自己脑子里就有个阴暗面和一个光明面，阴暗面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如果不改掉，难免也会掉队的，那会走到反面去的，头脑里的“私”字、个人主义，再大一点就是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发展到谁的话也不听，把我们有良好的组织，良好的装备，良好的政治工作的解放军也冲了，枪也抢掉了。有的是有一小撮人操纵，你们不要上当，要心明眼亮，要冷静，要善于识别敌、我、友，你们现在有的时候连朋友都吵起来，自己阵营也吵起来，打的一塌糊涂。同志们！是分裂好呢？还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好呢？（好派答：大联合好；）。江青问：你们（指“屁派”）怎么不叫？不讲话？你们愿意不愿意联合？先搞大联合、三结合才能有领导，没有领导革命不好进行。

第三、谈革命委员会问题，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目前出来的这股歪风除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人民解放军；抓一小撮。第三，就是针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更难免混进一点坏人混进去，但他毕竟是个新生的事物，他是在群众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这么一股风，有的人就要把中央批准的革命委员会全部搞掉，这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挑动吗？同志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情？（答：知道。）你们逐渐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这个事情也要警惕，当然有点反复，我们也不怕。

所以我想在这个大好形势底下要警惕这三件事情，从极左到

右，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背后不仅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有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苏修、日本等等特务，我们有材料，我们搞了一大批，这是小将们的功勋罗，叛徒集团知道不知道？（答：知道）很大的特务案子都搞出来了，过去搞不出来的，所以这次大革命的功劳是大的，潜伏几十年的这些案件，过去都不知道的，这是红卫兵的功勋，当然对安徽来说揪出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是同志们的功勋！你们要很好的警惕这三件事情，有人要破坏党中央，我说的党中央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啊，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我只是想提醒同志们！我说的话不妥当，同志们批评我。

现在中央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物资的命令”。（念命令时，江青插话）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林彪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它和革命群众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联的。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尽一切责任，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爱护一切革命群众。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它担负着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艰巨的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时刻地警惕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

修正主义的突然袭击，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加强战备，保证装备完整良好，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江青：同志们，听懂了吧。（众答：听懂了。）我重复一遍，“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江青：再重复一遍，“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你想，把作战系统给打乱了，一旦有情况怎么办呢？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怕得要死，修正主义也怕我们，怕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是也不能说没有这个万一啊！〗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都必须严格遵守，切实执行，这是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爱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这是一切革命群众和一切爱国人们的共同任务，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尤应在这方面作出模范。

各革命群众组织一定要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江青：在这个问题上我说一两句，现在世界上有没有我们这样的大民主？（众答：没有！）你们想轰那个就到外面贴大字报、大标语，世界历史上也没有，总而言之这是最大的民主，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有的。〗正确理解人民解放军的“四不”，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随时提高阶级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利用，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严防美蒋、苏修、日本特务和地富反坏右破坏和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声誉。〖江青：不要在我们的军队脸上抹黑，人民解放军是

人民子弟兵，要爱护他们的荣誉。〗

为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月六日通令和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再次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那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江青：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了事情没有？我们援助越南的物资被抢了，炮弹啊！姚文元：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江青：那是美帝国主义的，接不上气了，没有了炮弹，后来我们下了一个死命令，管你是什么派，立刻交出，不交就缴械，他们吓坏了，都送回去了，这真生气嘛！还抢了外国的船。北京出现这样怪事，跑到外国使馆里去闹，英国代办处烧了，你们知道吧？（众答：知道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是肯定的，你们坐外头嘛，如果不是使馆内部，他们做任何违反我们国家的法律的，你们都可以有权斗他，并扭送。但是不要闯到使馆去，不要跑到外国轮船上去。尽出现这些怪事，这些，好人是幼稚，坏人是有意地破坏国家的荣誉。康老：还有人抢外国的轮船，还有人带着枪到塞浦路斯船上去，被缴了枪，还去避难，这是耻辱，是投降！江青：这是当汉奸！〗

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

三、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把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江青：有些地方，就发给了保守派，有些给了坏人，这就是可恶啦。〗

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江青：重念这一句，“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众：热烈鼓掌。）江青：我看大多数同志是同意的，是爱护军队的。〗

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众：热烈鼓掌）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众：热烈鼓掌。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希望同志们搞大联合！）

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众：热烈鼓掌）

此命令，望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遵照执行。（众：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江青：好！我看大家都拥护这个命令。我就讲这些，咱们都照办。）

# 评陶铸的两本书*

姚文元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战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个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清除修正主义毒素的重大步骤，是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斗、批、改的思想动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深入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犯星榉文采》（简称《思想》），就是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

* 此文发表于《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及《红旗》一九六七年第十四期。陶铸，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在此文创作过程中，毛泽东曾写过六次批注及修改，以下摘录第二处和第六处：“姚文元同志：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是否妥当，请韵定。建议在北京发表，前一天广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国各报发表。还要先送北京，在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以三四天时间加以讨论。如有好的意见，加以吸收。”“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活龙活现地刻划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一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

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哪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哪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1]。“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2]，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一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

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3]。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在《革命的坚定性》中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4]；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疾雨的打击”[5]。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6]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

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7]。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〇[8]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

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9]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10]。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11]。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

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要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2](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呵！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

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几以上”[13]。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心”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几”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

##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这两本书中宣扬一种什么“精神生活”吗？不须多看，取其“精华”就够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加上奴

才的“思想”。

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说过：“讲到政治的意义，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14]

陶铸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15]

陶铸无耻地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论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动观点。没有抽象的“众人”，“众人”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分为阶级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处理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16]。用毛主席这个观点去分析，政治，就是为巩固或推翻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为保护或摧毁这一种所有制或那一种所有制

而斗争；为夺取或维护这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或那一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就不但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政治活动的阶级内容，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直到搞“全民国家”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手法。蒋介石所谓“管理众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和屠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说成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幸福”，还要用什么“总动员”去欺骗，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奴才陶铸搬出这一套，则是要实现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为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利益效劳的奴才行为，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还要用什么“讲清道理”去欺骗，同样是卑鄙到了极点。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鼓吹什么“亲爱精诚的精神”，鼓吹什么“先知先觉”。陶铸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孙中山先生的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社会上是有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进步快一些，有些人进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进之心，终归是可以进步的……”[17]；

“马克思主义者应要求人宽，要求己严……对党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应象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18]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是抽去了阶级内容、脱离社会实践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

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9]那些死不回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累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硬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后知后觉”，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杀人犯和苏共叛徒集团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上进之心”，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执行的路线不管有多少花招，只能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反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障碍、突破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沉重的以至残酷的压迫而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这个集中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最高智慧的理论武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战越强，万难不屈，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今天陶铸吹捧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要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终归可以进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帮助资产阶级混进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破坏。

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纯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同一个词汇，不同的阶级赋予不同的解释。我们偶而也用这个词，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标下的团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我们从来是讲：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而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却是抛弃原则、背叛社会主义方向、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精诚团结”！团结和斗争是统一体的两个相互矛盾着的侧面，没有斗争，也就无所谓团结。团结是相对的、过渡的，斗争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一分为二，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

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20]哪里有陶铸那种永恒不变的“精诚团结”。算命先生挂出一块牌子说：“诚则灵”，那是骗人的把戏。蒋介石用什么“精诚团结”掩盖内部的狗咬狗，作为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铸则破天荒地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用来瓦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书中还说：“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顺应’了当时革命的客观规律”[21]。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胜利，不是归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政策，不是归于革命人民的斗争，而是统统归于国民党，这完全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把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国民党作捧场，这不是叛徒的腔调是什么？

够了！够了！这些肮脏的言论，难道不是暴露出陶铸“精神生活”深处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哲学的世界吗？

除了国民党反动哲学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养》中的垃圾。

《理想》一书不是欺骗青年说，什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不可分的”，只要装做“把工作做好”，就会得到“重视”“器重”“赞扬”以至“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吗？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投机商的市侩哲学原封不动的翻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九六〇年二月接见民建会、工商联常务委员时，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献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22]这句话相当精炼地总结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几十年“做人”的经验，概括了这个无产阶级

的叛徒人生哲学的“精髓”。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集体利益”，在他们这一小撮人统统是假的、骗人的，装出来给别人看的，是手段；而捞取“个人利益”、个人权力、个人享受则是真的，是目的，是丑恶灵魂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两面派混进革命内部夺取权力的诡计。现在用来毒害青年一代，这种软刀子杀人的罪恶我们难道能容忍吗？

《理想》一书不是还欺骗青年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23]吗？这也是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货色。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他在天津向资产阶级屈膝跪拜的丑行时，恬不知耻地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24]。你看他多么“从实际出发”啊！“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这是多么“公平”的法官啊！这个工贼的“是非”是多么鲜明啊！这个资产阶级的恶奴才对自己的主子的“好”处是多么念念不忘啊！他训斥工人“不好”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态又是多么清晰啊！而《理想》一书作者对某氏的出卖灵魂的哲学，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25]。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成了一纸空文！但仅仅这样批判，还是不够的，须知他之所以要宣传这种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就是要宣传一种随波逐流、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不是吗？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从资产阶级出发，听资产阶级的话，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于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冒充“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拆穿西洋镜，就是这么一个把戏。

陶铸不是还眉飞色舞地向青年说：“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26]吗？这立刻使人想起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句荒谬的“名言”：“一条牛加一条牛仍是牛……但是一条公牛加一条母牛就形成了新的关系，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便成了夫妻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27]在他们这一伙人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公牛同母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按阶级划分的、按阶级关系结合的。男女关系也不例外。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就说过：“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个基本事实，被他们抹杀了，践踏了。他们这种庸俗透顶的语言，不能够损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一根毫毛，只能反映出他们一伙心目中的相互关系及其“修养”，就是“公牛加

母牛”“男人加女人”之类资产阶级的丑恶不堪的东西。君不见大谈“修养”的那一伙人，无一不是腐烂已极的伪君子吗？

书中说，“一个人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决定其“成功与失败”，“就在于主观与客观的是否一致”[28]。你在国民党统治下究竟是怎样奴颜婢膝地把“主观”同“客观”去“一致”的，这“几十年”的“成功”中又是怎样同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致”的，难道还不该拿到光天化日下来吗？

##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出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副“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29]

“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在你眼睛里，岂但是“黑点”，社会主义简直就是漆黑一团。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

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

陶铸不是在《松树的风格》中赞美“松树”“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30]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抵挡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战，只能使自己从黑暗中堕落进更黑暗的地方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理想》再版时，“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这句话，忽然改成了“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真是欲盖弥彰，绝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贼心虚的贼子心肠！你删去“领袖”二字，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矛头是针对伟大的领袖的吗？如若不然，何必慌慌张张地删去？你在“党”前面添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吗？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脸上变色，就这样手忙脚乱了。一九五九年五月，陶铸不是在汕头一次报告中大喊“要学习海瑞的风格”以配合彭德怀的进攻吗？看来这个“海瑞”的“风格”并不那么“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这一改，配合彭德怀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却是不打自招，铁证如山，无可抵赖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庐山会议开过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被彻底粉碎了。这位修正

主义者在《胜利得来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一小部分人”的“热衷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31]表示了不满。可是，这“一小部分人”是谁呢？不就有你吗？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报纸上必须“刊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应该刊登”[32]吗？不就是你热中于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黑点”吗？这是赖不掉的。正因为有他一份，这篇文章中，他对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说什么“我们提起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转变立场，首先把身心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里来”[33]。这是劝告破了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伪装成“转变立场”，混进革命的“行列”中来继续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对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爱护，这就是陶铸的“感情”。剥去伪装的画皮，站着的就是这么一个恶鬼。

## 腐朽不堪的“文采”

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么“文采”，真是丑死了！活象那些附庸风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窍不通，硬要摇头晃脑哼哼几句八股调一样。

虽然没有什么“文采”，书中却十分卖力地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陶铸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文艺纲领，同陆定一、周扬完全是一丘之貉。一九六〇年春，旧文化部夏衍、陈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开所谓“全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会议”时，就把《思想·感情·文采》这棵大毒草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大家“学习”。可见他们勾

结之深。为了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陶铸几乎把文艺界流传的各种反动论点，什么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统统收罗进他的黑店中。下面略举一二，稍加驳斥：

“共产党员是讲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34]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感情，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感情。这里的“感情”指的是“爱”。“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要爱一切人”，就是要爱剥削阶级，爱叛徒，爱奴才，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向反动派屈膝跪拜的最无耻的行径。

“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35]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一切文艺创作，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阶级的政治而“自由”的文艺。任何一个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么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一定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的表现，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七亿中国人民有七亿种“自己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的什么“创作自由”，什么“独立创作”，就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击社会主义，宣传资本主义，而剥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他们的一切自由，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服务。什么“创作自由”，不过是死心塌地当资产阶级奴才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36]这就是那个“反题材决定论”，其目的是在反对“框框”的借口下，反对革命作家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反对努力去歌颂工农兵，反对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生活是多方面的”，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争生活，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抵抗历史前进的腐朽反动生活。我们应当以真正意识到自己历史责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生活为主体，为方向，为歌颂和描绘的中心，通过这样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来反映我们这个史无前例的英雄时代，来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和伟大胜利。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生活，只能作为批判、鞭挞、揭露的对象，决不能作为创作的主要的“方面”。“不拘一格”，总有一格，你心目中的“生活”，其实就是你赞不绝口的《三家巷》中那些资产阶级的下流情绪和靡靡之音，是一些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霉烂了的渣滓，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我看，它的作用有时也不在社论与报告之下。”[37]这又是胡风“写真实”论原封不动的翻版。任何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中，都表现着作者的政治的倾向性，表现着作者的阶级的爱和憎，没有什么抽象的、旁观的“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从本质上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歪曲工农兵、歪曲现实，则是它们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结果。提倡抽象的“写真实”，就是要反对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抹杀和掩盖文艺的阶级性，替那些美化剥削阶级、丑化无产阶级的大毒草找

一个“理论”根据。这已经是资产阶级文艺武库中最破烂最陈腐的货色了。

“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38]这就是“暴露黑暗”论，这是毛泽东思想早就痛斥过的“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反动理论的翻版。我们应当区别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只有抓住主流方面，才能典型地反映出社会前进的本质。支流只能作为主流的一种陪衬，作为表现本质的一种手段，作为全局的次要的侧面，作为前进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曲折，不能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以写光明为主，以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即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主，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震天撼地的英雄气概和斗争智慧为主，以塑造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而不是什么“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一半对一半。写人民公社，当然要充分歌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难道还需要把各种发展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统统罗列出来吗？有一支歌，叫《人民公社就是好》，难道还需要同时再加上一句“人民公社有缺点”吗？夸大、渲染和恶毒地捏造那些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造谣诽谤的老谱，这位老右派不过依样画葫芦罢了。以歌颂光明为主需要回避矛盾吗？需要回避敌人的挣扎和反扑吗？需要降低冲突尖锐性吗？不需要。社会是在阶级斗争中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总是在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剧烈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只有通过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典型的历史概括，才能够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雄伟地而不是贫弱地把光明、胜利、英雄人物写出来。陶铸的“暴露黑暗”论，将同他黑暗的灵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

圾堆里去。

##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人们不难看出，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书中贩卖的那一套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和其他毒素，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凡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都是篡党的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地自我吹嘘。陶铸抛出这两本书，不但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也是扩大他们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权力的一种手段。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西行纪谈〉序言》，这《西行纪谈》原来叫做《随行纪谈》，就是他带着几个黑秀才“随”

着他出去四处游荡，然后他信口开河议论一番，黑秀才们就当作圣旨一样“记”下来，加以修饰，在报上发表。“纪谈”，就是“记”他的“谈”话。这样，居然“共得二十七篇”！居然都拿出去发表！居然由他本人定名，作序，题字！这不是明明自己想当“南霸天”吗？《理想》及《思想》，在宣传那些反动观点时，充满了这类炫耀权力的自我吹嘘。他是要用这些“作品”，作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舆论准备。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那样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得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的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从这个反面教员中，我们不是可以找到识别赫鲁晓夫式人物的一个重要教训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忽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

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

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红楼梦》第五回里有一首曲子，叫做“聪明累”，头两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自以为“聪明”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暗底里玩弄了许多“机关”，一直到陶铸发明的“著名”的“换头术”（即为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在照片上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把他的头像剪下来装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可算登峰造极了，但到头来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这样一种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的蠢人。玩弄阴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广大群众一起来，什么坏事也隐藏不了。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坏蛋们必然垮台，这就是历史的判决。这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无论如何挣扎，如何诡辩，决计逃不过这个历史的判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来自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攻击、造谣、挑拨，

来自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诬蔑、歪曲、诽谤、叫喊，决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只能够证明他们自己无比的愚蠢和日暮途穷。同志们，举起双手欢呼这涤荡中国大地的大风雨吧！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将会看见：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段伟大而曲折的道路后，一个空前强大、巩固和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给予二十世纪的吃人魔鬼们以更沉重的打击。

---

[1]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77 页。

[2] 同上，第 61—63 页。

[3]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如何正确地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及五日《南方日报》。

[4]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5 页。

[5] 同上，第 20 页。

[6] 《文艺报》一九六五年 11 期，第 3 页。

[7]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51 页。

[8] 同上，第 45 页。

[9] 同上，第 112 页。

[10] 同上，第 95 页。

[11] 同上，第 50 页。

[12] 《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 37—38 页。

[13]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49 页。

[14] 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第二讲。

[15]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42—43 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68 页。

[17] 《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 21 页。

[18] 陶铸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对广东“民主人士”的讲话。

[19]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 1 页。

[2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 27 页。

[21]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67 页。

[22] 中国赫鲁晓夫：《同民建会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的谈话纪要》，（一九六○年二月十二日）。

[23]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68—69 页。

[24] 中国赫鲁晓夫：《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25]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69 页。

[26] 《文艺报》，一九六五年第 11 期，第 6 页。

[27] 中国赫鲁晓夫：《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一年）

[28]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67 页。

[29] 同上，第 9 页

[30] 同上，第 4 页。

[31] 同上，第 26 页。

[32] 同上，第 11 页。

[33] 同上，第 27 页。

[34] 同上，第 75 页。

[35] 《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 33 页。

[36] 同上，第 45—46 页。

[37] 同上，第 3 页。

[38] 同上，第 46—47 页。

# 工人阶级要正式武装起来*

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上海有枪，但上海还没有夺枪，有苗子，要求坚决不夺枪，因为一夺枪，有坏人，如广州很难说枪都是在造反派手里。

从长远看，造反派应该发枪，这是要正式发，不是夺，这个方针中央是定了的。

武装左派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有的地方造反派力量小，发了就被人家夺了去。如果势均力敌，你一发，对方也有人发了，结果就打起来。目前全国都把枪收回，昨天开始交枪了。交了后还要发，发给造反派，什么条件能够发？造反派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占优势。上海有条件。

七月份我向中央提，武装左派先从上海开始，中央也同意，但是要慢一点，考虑到上海一发，其他地方怎么办？我想上海先

* 摘录自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对上海“工总司”常委、委员的讲话。七月三十一日时，张春桥已经给毛泽东同志写信请示在上海试行建立工人武卫组织，毛泽东同志批示：“林、周、文革各同志阅示。”这一批示表示毛泽东同志同意试行工人武装的做法。此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逐步推行了“改造城市民兵、武装工人阶级”一系列办法，成立了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而后又改名为“上海民兵”。在一九七六年怀仁堂政变后，“上海民兵”组织被认为是“四人帮”经营的“第二武装”、准备“武装政变”。

从工人开始，可分几步走，先把工人队伍编一编班、排、连，再自己训练一个时期，没有枪用棍子训练，很多复员军人可以起作用。编队编到团还是师你们考虑。

哪一些单位大联合巩固的就先发一部分练习枪， 发了枪不能打也不行，特别是要害部门。如发电厂大联合巩固，编队一训练，就先发一部分枪，逐步再增加。否则发了不训练，不会打，坏人一包围就缴掉了。一个发电厂有一个连的武装，就谁也不敢动了。

现在军队制止武斗没有办法，不能还手，只能动口，不能开枪，还要挨打，真是举世无双的、世界上没有的好军队。我们有了武装可以开枪了，但也要有纪律，不能随便开。中央最近命令，开了一个缺口，对海岛、边防有人夺枪就可以开枪，不管哪一派。但还要教育，不能轻易开。如果这样，就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发枪。那个时候，其他城市的工人队伍组织的比较好了，也可能发枪。

我非常希望上海武装十至二十万工人，就放心了。国民党来了也不要紧，什么反革命暴乱都不怕。有这样个想法好不好？有步骤地搞，先编队再训练再发少数枪，能够发一万枝枪，再搞一些高射炮，真正把上海工人阶级不但从思想上武装，手里也有枪，文攻武卫就有办法了。文攻就是思想的进攻，武卫有枪，那个时候资本主义想复辟，陈、曹想上台是不可能的。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有更大的收获，使上海这个城市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堡垒，

什么样的敌人都能战胜。

## 附：关于上海工人要求成立武卫组织的请示

主席：

“文攻武卫”的口号提出来以后，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要求成立武卫组织。据了解，目前上海的武斗虽然不多，但是，小规模的武斗经常不断。出现武斗，一般是由市革命委员会派出少量徒手解放军战士去制止。他们人数少，到得慢，而且往往挨打，效果也并不都好。如果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成立工人武卫指挥部，在市区每个区搞一万人左右的队伍，十个区（不含郊区）搞十万人左右，从一百几十万产业工人中选拔并不困难。这十万人，当然不需要天天出动，每天有十分之一的人值班，就足够了，也不会妨碍生产。

这支由工人造反派组成的队伍，在目前可以制止武斗，更重要的是可能从中找出一条改造民兵的办法。上海原有的民兵，偏保的不少，枪枝弹药已经由警备区收起来了，组织瘫痪在那里。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卫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地建立起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

因为几次听到主席提出民兵的改造问题，造反派夺去的枪不

要急于收回问题，联系到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这个要求，形成了以上的想法，不知是否妥当。如果大方向不错，可否在上海试验一下，请批示。

敬礼！

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 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

王洪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

当前，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上海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革命大批判的推动下，上海市闸北、杨浦、普陀等区的工人两派组织，都已经联合起来了。其他各区、各单位、各工厂也都积极地准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全市八千多个工厂，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占百分之八十三以上。现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的工人，正在以最大的革命积极性，积极创造条件，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在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中迎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是一个伟大的战斗号令，是对我们工人阶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支持。让我们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

* 此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

席的这个最新指示，立即联合起来干革命，联合起来搞生产，联合起来筑成一道不可摧毁的长城，让帝、修、反、一切牛鬼蛇神无缝可钻，在我们强大的力量面前发抖吧！死亡吧！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闹分裂，搞武斗，这决不是什么“革命行动”，而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阶级敌人在制造工人之间的对立，在混水摸鱼。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只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就会把敌人暴露出来。

可是有些工厂、企事业单位，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

有的说，“你们是保守派，大方向错了，不能联合。”这种讲法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经过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经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揭发、批判，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绝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已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现在，在上海，作为保守组织来说，是极个别的了。现在工厂中，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绝大多数都是革命组织，他们的大方向绝大多数是正确的，都应该联合起来。革命的历史是在前进的，群众永远是革命的。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一定要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头头思想不通，广大战士就去促进他大联合；如果头头顽固不化，那么广大战士就踢开这块绊脚石，自己搞大联合。

有的说，“我们两派分歧大，情绪对立，联合不起来。”我们工人队伍中的各革命组织，不要分什么“东家”、“西家”，我们只有一“家”，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家；

不要分什么“张派”、“李派”，我们都是一派，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工人阶级生的一条根，牵的一条藤，我们同命运，共呼吸，心连心，都在毛主席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又有什么对立情绪不能消除，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有什么理由不能联合起来呢？

有的说，“你检查错误以后，我与你搞联合。”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应该求大同，存小异。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有广阔的胸怀，要责人宽，责己严，要多看对方的大方向，多想对方的优点，多找自己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各革命组织应该把旧账一笔勾销。对自己的阶级兄弟算旧账，是一种报复行为。如果要算，这些旧账应该统统算到阶级敌人头上，统统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账上，统统算到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上。我们要联合起来，对他们进行大批判，大斗争。

有的组织，总想吃掉另一派，压垮另一派。他们抓住对方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想以此整垮对方，“一统天下”。这是办不到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样做，就是大联合的阻力。每一个革命组织，都要正视现实，实事求是，要敢于承认对方也是革命派，既然肯定对方大方向是正确的，那么，就大胆地承认，主动地搞大联合。

我们工人阶级是亲兄弟，有共同的爱，也有共同的恨。我们

无限热爱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憎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是以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切阶级敌人。我们完全有力量、有信心揭穿阶级敌人分裂工人队伍的阴谋，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扫清各种阻力，排除万难，立即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 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姚文元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主席：

这次回上海过国庆节，住了十二天，作了一点调查工作，开了几次调查会，到基层去看了一下，前一时期打得最凶的柴油机厂也去了。一接触群众，学习到很多生动活泼的新东西，深深感到，主席最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指示，都是集中的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内心的要求，抓住了当前革命运动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譬如办训练班吧，干部需要，造反派头头也需要。有一个染化八厂，是生产活性染料的，七月份成立革委会，到现在自己已经办了八期学习班，每期一周到十天，学习“老三篇”和其它主席著作，造反派中队委员以上参加，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参加，着重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用主席思想为指针，作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2、正确对待群众，团结群众，怎样才能不脱离群众，新干部掌权后，工人主要一条意见就是到群众中去较少了。这样学，效果很好。这种短期学习班，厂可以办，其它地方更可以办。他们一听到主席最新指示，立刻感到真像说到他们心坎里。

调查了几个问题：一、“九大”和党的问题；二、精兵简政问题；三、大批判问题；四、大联合问题。现先将前面两个问题向主席报告，并望指示。

# 一 “九大”问题

在四个座谈会（革委会、红卫兵、工厂和学校造反派党员、军队同志）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征求了人们的意见，我们本以为大家会感到突然，其实不然，造反派中已经在议论了。可见群众心中是在思考这件事的。

什么时候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

代表怎么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的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认为不一定。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级党代会，比较有利”。“毛主席说过，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还有些同志提出：“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开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时开，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红卫兵说：“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

王明选不选？“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王明已经是苏联人了，还能选个苏修特务？”“叛徒都不能选，这是一条大原则。”“刘少奇是叛徒，要进一步批透，清除出去！”也有人说：“恐怕毛主席还是要保留几个反面教员的，那就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不要太多，并且先要批透。”对刘的情况，大家比较了解，对邓有些人不很了解。

党的领导机关怎么办？许多同志的意见是：可以参考革委会的形式，把党、政、军统一起来，革委会中有党的核心，执行市委会的职权。好处是一元化，容易联系群众，减少层次，有利于有力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有一种意见是：将来过渡到正式权力机构，还要分市委、市人委，不然开人代会有困难，由于忙于政务而忽略党务，有的人无处安排。

很多同志主张：在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党的领导核心，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和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这种核心，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不应主观主义的去建立，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并且在斗争中发展的，整顿党的组织。首先不是从基础而是从领导机关开始。上海各区、县、局及相当于局的单位，至十月五日，已经建立三结合班子的共三十五个，委员八百五十六人，其中，党员四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三。一批较好的党员实际上已被革命群众选进领导班子。有些优秀的革命派实际上起着党员的作用，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参考，不知是否妥当？

“一月革命”前，党员参加造反派的很少，一般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到今年一月以后，一批党员就陆续参加造反派，其数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十不等。阶级斗争实际，说明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建立在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的基础上，才能领导几万万群众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恢复党组织这个口号不妥，容易曲解为恢复原状。”应为整顿和改造。刘少奇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尚需继续大力批判。重点是：第一、党的性质任务问题。第二、建党路线问题（“生产好、听话、就可以入党”）。第三、对群众关系问题（这是根本问题，一些党员

谈到因受黑“修养”的毒害而当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受刘邓路线蒙蔽，而压制群众。无不痛恨，有极深感受）。第四、民主集中制问题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些都需要用毛泽东思想对刘少奇的那套修正主义观点作彻底的批判。不知这样综合是否对？

一致极其热烈地盼望：“九大”前“毛选”五卷能出版，能够有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许多党员（特别是工人造反派）希望更多了解党史，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了解某些人物的历史面貌。因为过去都是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那个东西已经不能用了。

## 二 精兵简政问题

这个问题很迫切。

这几个月中，市革委会人员大量增加。目前，有二十个工作部门三千二百二十九人。办公室下面就有七百六十三人。这还不包括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脱产人员，无论如何。这个机构太庞大了。机构越大，各种坏人就会钻进来，领导干部就会脱离群众，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就必然会滋长山头主义，其中有一些部门（不是全部）人员增加正是由于山头主义在作怪，同春桥同志商量，至少要砍掉一半，三分之二以至更多，这个思想工作还是很艰巨的，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我们已向领导干部传达了。

关于干部和群众关系问题、精兵简政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训练班等问题以及继续大批判问题，“人民日报”“红旗”是必须有专门的社论。主席的重要指示就在社论中分别引用。不知这样

考虑对不对？

一月革命以来，十个月了，造反派的头头，大多数在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学习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市和区、在基层中，我们见到了一大批敢于革命、敢于挑担子的生气勃勃的好干部。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志开始被宴会、鼓掌、捧场、小汽车所陶醉，个别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开始脱离群众，不再那样如饥似渴的去深入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有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批评了一些头头的“追求名利、出风头、享乐”的坏作风。希望“敲起警钟，起个革命化”。这使我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到“三反”的那一段短短的历史。除学习班外，春桥同志准备开一些小会，进行教育和深入谈心。

怕多占用您十分宝贵的时间，这封信就写到这。

另外两个问题以后再报。选了一份党员座谈会记录，请主席参考。

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姚文元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 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江青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十二日

我觉得很对不起，很长的时间没有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同志们对我们有什么意见，我是能够谅解的。因为同志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全心全力地跟同志们一块在搞戏剧革命、音乐革命。这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很严肃的工作。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所能办到的，一个样板，要立起来，不仅内容应该是革命的，而且应该在艺术上也是站得住的，否则，人家就要复辟。这需要很大的精力。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我反复地对有的同志讲过。自从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工作情况变了，我的精力就又全副用在别的方面。

---

* 这是江青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十二日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座谈会由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开召开，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等。这篇讲话于十一月十三日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转发的文件上附上了批语：“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晚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所作的讲话很重要。这个讲话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分析了当前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并对文艺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和今后的任务作了重要指示。现将这两次会的讲话记录稿发给你们，请组织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军队的文艺单位、大中学校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学习，并结合各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执行。”“陈伯达同志讲话：我有个建议，江青同志今天这个讲话讲得很好很好！针对我们当前文艺界的问题差不多都谈到了，系统地谈到了。可以把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在文艺界各单位放，北京放，上海放，全国放，大家座谈、讨论，使文艺界工作大进一步。”

所以，你们搞的戏、音乐、电影，我就顾不上看，不能象过去那几年那样，和同志们一起专门闹文艺革命。这一点说明了，同志们也可以原谅。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工作不是做文化工作，在文化界只是打遭遇战。进城初期，我是遵照主席的教导，想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树立两支队伍，一支就是创作队伍，一支就是评论队伍。但是，因为在这条战线上，人家专了我们的政，他们用各种手法不执行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艺路线。而我们呢，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又有一个工作岗位的问题。主席在这方面，那是很注意的！我不过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只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才能基本上解决文艺界的队伍问题。

在座谈会上听了一些发言，我觉得发言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能够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事实上也是不平衡的，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差一些，有的地方看起来是很平静，实质上是一潭死水。针对这样的情况，不能一律说都没搞好，都要重新大乱。象新影，象芭蕾舞剧团，这是属于捂着的，没有真正地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当然也就不能够很好地搞斗批改，大批判。这样的单位，再乱一下是有好处的。乱敌人！乱敌人！！有些单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但还没有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就应该在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批判，解决干部问题，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进行斗批改和大批判。对于有些搞得比较好的单位，革命的大联合搞的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搞斗批改、大批判。

总的说，是要树立革命队伍。树立队伍在文化界有这样一个问题，阶级成份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一个人是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的，还是可以看表现的。主席教导我们，树立阶级队伍，是要看阶级成份的，但也不唯成份论。大多数青年、革命小将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大多数干部、党员，也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满怀信心。

搞革命的大联合，最重要的是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两个组织都混杂了坏人，最好是不要你这个组织去捉那个组织的人，那个组织来捉这个组织的人，最好是由他自己的那个组织调查研究、自我批评，这样就容易搞联合。否则，每天吵架，这样敌人就容易利用。在这个方面，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同志们也学习了，不多说了。总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最好是多做自我批评，少批评人家；要是敌我矛盾，那就要斗倒、批臭。

文艺界是比较复杂的。从你们的发言里以及从你们送给我们的材料里，都可以看到这点。现在搞深搞透了没有？我看没有。因为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它又弄上一套，所以我觉得对文艺界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要稳、准、狠——对敌人；对自己，不要老打内战，对朋友也不要老打内战。打内战，就会被敌人利用；敌人有时候就是在背后操纵你们打内战，他就乘机溜了。这一点你们要识破。

新影厂最近搞了一个现代革命京剧的纪录片（叫现代革命京剧集锦）。当然你们是好意，也是花了功夫的，据说你们不是在舞台上拍的。但是对这几个戏的主题思想、它的艺术性在什么地方，你们都没有摸透，就搞了，每个戏搞了一点。我昨天晚上看了以后，觉得不安。你们是不是还能够补拍一点？现在这样子，到全国去放，工人、农民、士兵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戏，他就不懂

了。因为他们不象我们是摸熟了这些戏的。你们不要急着放映，你们讨论一下，看怎样把它改好。

北京京剧——团谭元寿同志，他就很急，说没有搞出戏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象过去那样很粗糙地搞出来，那人家还是要打倒我们的。宁愿我们这八个样板戏暂时占领舞台。这八个样板戏就已经把帝王将相、资产阶级赶下了舞台，赶下了银幕。而且在芭蕾舞、交响乐方面进行了改革，虽然还有很多缺点，有许多需要探讨的地方，但这在世界上也是震动的。象芭蕾舞团这次改《白毛女》——《白毛女》我相信一定能改好——由于急躁，搞得就很粗糙，这样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我有责任，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和同志们在一起搞。但是你们自己，是不是应该组织起来，认真地进行这个工作。

这里有一个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刚才有人说，要组织小分队下去搞一些片断和小节目给工农兵看，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现在的中心任务还是斗私、批修，组织革命队伍，否则，是不可能搞搞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符合工农兵需要的东西的。斗私、批修是很艰苦的事情，如果有人企图利用下乡下厂的活动逃避它，那就更不对了。这种思想，同志们不一定有，不过应当警惕。

现在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艺术尖端？大家知道，搞一个样板戏是不容易的，千锤百炼，总要改二、三年才成。因此，不可能每一个戏，每一个文艺团体搞的节目都搞成样板。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当然，也不能孤立地搞尖端，尖端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出现的、提高的，而且尖端也是要普及的。例如，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就要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通过拍成电影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因此，我觉得同志们还是要安下心来，搞好斗私、批修。这在当前说来，是最重要的，最

基本的。

在目前，十一月还有半个多月，十二月有一个整月，春节前还有二、三个月，在各个单位里，是不是把队伍先树立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批倒批臭！否则，创作思想很混乱，那就不能搞创作。在这个时期，有的单位要乱一下；有的单位乱够了，就不一定再乱了。有的单位乱一下，乱敌人，不是乱我们，这是完全应该的。把矛盾掩盖起来，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也不正确。我们不怕乱，但是已经搞的比较好的，搞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就不要再去乱了。这就是说，我们要有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革命同志、革命小将，既要有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格，不怕乱，顶得住，受锻炼；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动脑筋，科学分析，克服和排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真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还有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革命小将的见解是很好的。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同时把五十天同十七年分割开来，也就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对三十年代、对十七年、对五十天，都要一分为二。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那就更多了，纷纷起来反抗文艺黑线。工作队实质上是保护十七年，保护三十年代，甚至保护二十年代。有一些青年同志和革命小将，水平比较高，看清楚了这个问题。

关于参军的问题，你们不要着急，现在林副主席已经下命令，请杨成武同志他们军委办事组，挑选几个军、师一级的干部来管

这个事情。报告你们这么一个好消息。你们如果一天老是参军呀参军，就忘了别的了。

我今天没有准备，也许我讲的不完整，有的错了，同志们批评我。我就讲这样一点，以后我们再座谈。

# 关于当前形势与方针的几点意见*

王洪文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我们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大会，刚才有××二厂、染化十一厂和酒精厂同志们介绍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各单位要很好地学习他们，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好的经验，好的方法。根据这些好的经验、好的方法，我想提几点意见。

## 一 当前的形势

### 形势大好

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重要批示，给我们工交战线和各个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工交系统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的革命职工，通过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贯彻市革

* 这是王洪文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本选集在录入这篇讲话时对讲话内容重新作了一些整理。

命委员会扩大会的精神，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已经进一步行动起来了，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天会上介绍的三个单位，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在各条战线上面一小撮阶级敌人一个一个地被挖了出来，在这中间，革命的大批判也正在进一步地深入开展，形势越来越好。各条战线的工作，包括革命和生产，和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总的来说，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从最近有些单位的经验来看，说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发动起来了。比如说上海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毛主席历来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学习，他们就在这四百多人的单位里面揪出了一些国民党的特务、叛徒等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二百多名，通过进一步地发动群众，目前在全市许多单位隐藏的比较深的、比较久的、比较狡猾的一些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地区他们把曾经干了六十多年特务工作的一个老家伙揪了出来，有的单位把那个蒋介石的臭老婆宋美龄的秘书也揪了出来，把工贼头子陆京士的小妹子，张闻天的妹子——大地主反革命都揪了出来，这说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一小撮阶级敌人，虽然他们隐藏的比较深比较久，但是他们也逃脱不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眼睛。

总的来说，我们通过前阶段发动群众已经取的了很大的成绩，挖出了一些阶级敌人。

## 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

这里我讲的第一点，运动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总的来说有

这么几种情况，就是通过前一阶段发动群众的面来说，特别是深度来说，还是处于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

一部分单位群众发动的比较广泛，比较深入，比如刚才介绍的单位以及有的局，比如化工局，上海外贸局等等，由于群众发动得广泛深入，因此就揪出了一些隐藏得比较深的阶级敌人，在这同时他们的革命大批判也开展得比较好。

大部分单位群众已经基本上动起来了，有的也揪出来了一些阶级敌人，有的揪出了已经暴露了的面上的阶级敌人，但是群众发动的面还不是那么广，还不是那么深，还需要进一步地广泛地放手发动群众。

还有小部分单位群众基本上还没有动，其中有的阶级敌人还在幕后挑动，蒙蔽群众，制造分裂，有的个别单位，是篡夺了领导权，由于个别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就压制群众，掩盖了阶级斗争盖子，使那个地方的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来。

就是在一个单位里边运动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所以我们要狠抓二头，带动中间。对于那些群众还被压制的、发动不起来的那些单位，我们希望领导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要坚决地支持那里的广大的群众，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下，要说明一下地区里边有一些组织不要都随便插手，各系统所属单位的对敌斗争，如果各个地区都插手各个工矿企业里面的阶级斗争，就容易被敌人钻空子。还有一些里弄里的群众专政的组织，也不要去干预工厂里面的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组织，相互之间取得联系，大家共同商量解决，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点。

##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第二点就是前阶段斗争的新动向。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当前革命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但阶级敌人呢？也在蠢蠢欲动，利用各种办法进行破坏和捣乱，由于我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牢牢地掌握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敌人呢，他就采取了更加阴险更加隐蔽更加毒辣的手段跟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正象列宁早就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阶级敌人向我们斗争的新的特点，我们前一阶段初步的摸了一下，也还是很不全面。我们也希望各系统各单位在下一步的斗争当中，进一步地把它摸一摸，我认为有这么几点：

当前阶级敌人主要用，第一点就是造谣歪曲、迷惑群众。有一小撮阶级敌人，造出谣言，他们胡说什么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整造反派，有的就散布，“现在又要整老造反了！”也有的胡说什么“前一阶段是整当权派，是搞走资派，而现在就要整群众了！”也有的说我们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一些谣言。

比如在浦东最近就传出了在三十五岁以上的一些人都要经过审查，都要过关，也有的说，在市区里传出来说，四十五岁以上都要审查，等等谣言，制造这些谣言来企图扰乱我们的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

他们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乱打乱点名，把矛头指向了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已经搞清了的一些人，或者是在生活作风上有一些小问题的人，一小撮阶级敌人就狠狠整这一些人来企图转移斗争视线。有的还说，这一次凡是参加过护工队的一般队员都要开除出造反队，参加国民党的一般党员也要开除出造反队，参加三青团的一般团员也要开除出造反队等等。以上面的这些流

言蜚语制造混乱来扰乱我们的阵线。

也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把一些对他们知情的人揪出来，进行批判，进行斗争，企图进一步压制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或者他们打击一些次要的人物，把一些主要的阶级敌人保护起来，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丢车保帅”或者说是“丢卒保车”等等。

比如我举个例子：上海光学仪器厂，自从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以后，他们就回到厂里边揪出一批小业主，把一批早已被群众监督起来的，地富反坏右揪出来斗，打一顿，他们还说是什么“最大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呢？他们这里边有真正的阴谋，狡猾的阶级敌人还在他们幕后操纵着这个单位的造反队，他们就这样造谣或者打击一般的一些人员来转移斗争的视线。

当然，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绝对没有要你把主要矛头对准这些人，其他人就不揪了，我们更没有要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一些小业主。他们企图以这样来掩护自己。有一些阶级敌人呢，有意制造了一些小偷小摸来转移群众和领导的视线，比如有一个单位有一个问题严重的人，当群众发动起来时，他自己害怕了，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把人家的饭票、菜票、线票都偷掉，把自己的饭票，菜票，线票也拿掉，然后马上再去报案，他说我的东西丢了，因此就煽动群众要他去告状，以这种污蔑方法来转移群众的视线。

有些单位，还有些阶级敌人蒙蔽了部分群众去斗争一些站错了队的党员、团员和一般干部，企图压住这些人对他们问题的揭发。有的呢，一揭到他们的问题就是“老保翻天”或者就是“右倾翻案”，戴上顶大帽子，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搞右倾分裂，策划武斗，两派没有联合

或者联合不巩固的单位，敌人就充分利用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搞幕后操纵，制造分裂、策划武斗。

比如最近益民食品厂，他们单位揪出了一批特务，其中有的是国民党特务，有的是日本特务，有的是一些汉奸走狗。他们这个单位，同志们不知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武斗，但是他们最近两派的头头通过了坐下来学习，他们揪出了一批敌人，各自首先把自己这派的坏人揪出来了。

从这一些例子当中就证明了敌人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一些同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来制造武斗，挑动分裂，来破坏当前的运动。

那么也有一些革委会审批的时候，在“工代会”审批的时候，在“积代会”审批的时候，没有被批准，或对革命委员会，对工总司各级组织有些意见，因此以后阶级敌人就利用这部分人来拉山头，搞分裂，有的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革委会和各级联络站。

最近轻工业局，就出现了一个地下联络站，据我们了解，这个联络站本身里面就有那么一批是坏人，有的是被各级造反队清理出去的，有的一些同志是精兵简政回单位去的，有一些意见，而被阶级敌人利用了，因此呢，就搞分裂，企图把矛头指向轻工业局革委会，指向工总司。

另外就有一些人就是借用清理阶级队伍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你用的人他都去反，比如，有的一个联络站谁一上去他就反对，制造种种借口，加以反对、歪曲。那么有的还利用我们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在各个单位里边重新拉队伍，成立什么所谓战斗组。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在工总司各级组织里边重新拉队伍，成立什么所谓战斗组，如果有人要成立他们的战斗组，那么我们就奉劝这些人，你们退出工总司，不要做工

总司造反队员。

也有一些人，企图跟外地的有那么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勾结串通起来，企图分裂，大规模地分裂上海的工人运动，分裂上海的学生运动。我们在这里要警告那一小撮阶级敌人，你们的阴谋永远也不会得逞，如果要赛一场的话就请你们表演，我们会对付你们的！（热烈鼓掌）这些讲的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就是制造事故，有的是制造破坏生产事故。

比如最近有一个棉纺织厂，一个清花车间一共二十九个马达，一次在同一个时间里边全部烧掉，这个厂有两个班生产的布，全部是坏布，给国家损失了几万元。还有一个纺织厂，为了选择一个工长，这么一个小事，一群坏家伙就趁机挑动，挑动了这个布机车间有一千多台布机停工两个多小时。有的也制造凶杀事件，比如上海××厂出现了这么一件凶杀事件，把一个刚从部队回来的，五月份曾经见过毛主席的一个复员军人，现在是他们厂革委会的第一把手，把他拉出去毒打，打成了粉碎性的骨折，把胳膊上的筋也给割断了。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一小撮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也必然会利用各种机会去挑动群众来转移我们的视线，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敌人总是利用各种办法来对付我们的，正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根据当前的阶级斗争的动向，我们希望各系统、各单位要进一步地放手发动群众，严格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破坏生产等各种重大事故，也要防止阶级敌人逃跑、自杀，有的搞阶级报复，在这同时也应该做好各个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特别是我们一些要害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这项工作我

们建议不要由少数人去管，应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之下，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来做好这项工作。这是第一个问题。

## 二 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

第二个问题，我就说一下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当前我们的工作的重点，我们觉得还是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

### 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

第一点，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领导，各级领导是不是敢字当头，是能不能放手发动群众的关键。

据我们了解，在领导上面，还有这么三种情况：

一种是敢字当头，敢于站在群众运动的最前面，放手发动广大革命群众，相信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凡是这些单位的运动就搞得比较好，搞得朝气蓬勃。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按部就班，群众起来了，对领导上促一促，领导就动一动，或者有的是勉强动一动，所以有的群众就说，这种情况就是小脚女人踢足球不得力。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甚至群众运动起来以后，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给群众订了好多条条框框。比如有这么一个单位，自从这次市扩大会议以后，群众发动起来了，但领导不但不在运动的前面带领广大群众前进，反而给群众作了许多规定，有的群众要看本单位群

众的材料，他就讲要看材料，要经过市革会的批准。我们就感到非常奇怪，我们看档案材料是有规定，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规定过，看基层一些党员或者一般干部群众的材料，还要经过市革委会的批准。因此，造成群众意见很大。所以有的单位把领导踢开了，自己闹革命。所以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当中还有着一些右倾保守思想。我们觉得这些右倾保守思想主要表现有这么几种，一种是一怕二等三看四要。

一怕什么呢？有两种情况，老干部比如怕打击面宽了，怕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怕犯右倾翻案这样一个错误，怕人家说他右倾翻案。不是化工局有这么一个干部就说，上一次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已经是罪该万死了，如果我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那就更是罪该万死了，我永世不得翻身了。有一些新干部呢，也有些怕字当头，一个怕丢自己的乌纱帽，好容易自己造反造了个官，丢了怎么办？有的呢，也怕自己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有的就讲，如果我打击面宽了，整人家整错了，将来揪坏头头有我一份，所以我不干。所以有的就讲，抓抓生产比较太平，生产能够抓上去，还能够受到表扬，没有成绩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还是抓生产太平。

那么二等呢，等上面的布置，上面不布置，他就不动。我们这样讲，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老早就布置了，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如果上面没有具体布置，他就怕将来出了问题自己要负责任。

三看呢，是看了别的单位有了经验以后，我再搞，如果别的单位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自己搞，担风险，将来要犯错误。

那么四要呢，就是要办法，要具体政策，要派小分队，要军管。也有的单位就讲，北京新华印刷厂好是好，但是好就好在他

们有军管会。

所有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觉得不管军管会也好，小分队也好，它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要放手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够搞这场阶级斗争。如果离开了放手发动群众，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就是有小分队也好，军管会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关键呢，还是发动群众，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怕字当头，怕犯错误，怕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也就说明有一些同志，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很好地学，还没有真正的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就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个反动本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依靠国民党的一些残渣余孽来镇压广大的革命群众，来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一小撮阶级敌人，目的是为了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烈火，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现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依靠了广大革命群众，来狠狠地打击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是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现在搞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也可能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可能会错伤一些好人，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狠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果我们能够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把毛主席历来一系列的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交给广大革命群众，我们完全可以克服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所以有一些同志虽然在这一次运动中被错伤了一下，我们觉

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应正确地对待。当然我们也应该说，如果有那么一小撮阶级敌人，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来搞打击造反派，搞复辟，搞右倾翻案，那么我们是要认真对付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从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高度来分清大是大非。这是第二个问题的第一点。

## 团结对敌

第二点就是要团结对敌。

现在还有一部分单位两大派的联合还不是那么巩固，有的还在打内战，搞武斗，我们说这一些单位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在对敌斗争中来巩固大联合。

现在有的单位各自用资产阶级派性来对待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有一些同志对于对立的一派，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要无限上纲，而对自己的一派里面的一些坏人，即使是敌我矛盾也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不揪不斗，这样就给一小撮阶级敌人钻了空子。

有一些同志被资产阶级派性蒙住了眼睛，因此就掩护了阶级敌人，敌人也还是利用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制造武斗，挑动武斗，来保护自己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的高度警惕。

同时我们还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各方首先是揪出自己队伍中的坏人。染化十一厂和上海科大他们的经验我觉得很好。他们就是首先通过学习毛著，落实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首先统一思想，开展对敌斗争。然后自己首先揪斗自己一派里的坏人，或者是双方把自己所掌握的材料互相交换，集中起来，共同调查。这样他们通过共同的战斗，揪出了一些坏人，他们的联合就巩固

了。上面我们说的益民厂也是这样。

还有一些单位最近还没有联合，还在打内战，这些单位的头头们，如果你们自己不是坏人的话，请你们想一想，下一步怎么打算。这是第二点要讲的。

## 发动群众要靠搞好学习

第三点，能不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是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根本。

发动群众最根本的是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武装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广大群众都掌握了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就能在对敌斗争中发挥最大的战斗力，就能够有最强的辨别能力，就能去发现隐藏得比较深的敌人，把他们挖出来，把一切狡猾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就能够自觉地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能够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果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无所谓去发动群众。

因此我们希望各个单位首先还是应该通过办学习班等各种办法，首先是抓思想教育。最近有一些单位在这方面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比如有些单位举办了干部的学习班，党团员的学习班，老工人的学习班，或者是退休工人的学习班，通过学习班的学习，进一步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通过学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他们大忆厂史，大查敌情，通过大查大忆，就挖出了一些隐藏得比较深的阶级敌人。也有一些厂，原来由一些小厂合并而成的，那么这些单位呢，就把这些小厂的一些老工人，把一些对这些小厂比较熟悉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通过办学习班大家通过忆敌情，这样呢，效果也很好。所以我们

希望各级领导能够在当前对敌斗争中狠抓思想教育工作，还是要坚持办学习班，还是坚持业余办，群众办这个方针。通过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把这场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各级领导必须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当中，各级领导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号召。要区别各种不同的情况，根据本单位的特点，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抓住活思想，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我们抓住了活思想，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就能够把各种积极性都充分地调动起来。

## 当前要注意的三点

当前主要注意的，就是，第一点，要把广大的革命干部，党员、团员充分发动起来，因为他们对这一单位的阶级斗争比较熟悉，有一些同志他们都有对阶级敌人斗争的经验，可以在这场运动中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因为有一批同志在运动初期有的站错了队，有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他们有的同志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因此我们希望各级领导、各级联络站、各级造反派负责人都应当帮助他们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我们广大的革命干部，我们广大的党团员，也要勇敢地冲杀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很好地接受锻炼和考验，使之把我们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上港十区革委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充分发动了群众，充分地发动了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党员、团员，通过这样的发动，使这些同志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点是要发动一些老工人，一些退休工人。这些老工人和

退休工人，他们对一些厂的历史比较了解，他们对一些厂的老人马都比较熟悉，而且他们的多数同志也有斗争经验，也有不少单位在这些工作当中，他们通过启发一些老年人，回忆对比，激发他们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仇恨，因此他们的积极性也就调动起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能够发挥的力量都把他发挥出来，来共同地打一场人民战争。

第三点，我就讲一讲如何区别对待的问题。最近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人，一些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现在搞得比较紧张，有的也怕搞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觉得，如果自己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而自己已经交代清楚了，群众已经知道了，那么就不应该这么紧张，应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即使是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是也还不是敌人的，如果他们一贯以来表现不是那么坏，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没有什么坏的表现，我们也可以要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给他们打消顾虑，因为这里边有一些人，他们也都是一些知情人。比如参加过护工队的，那么他自己参加了护工队，他必然会知道一些人参加过护工队的一些情况。有的参加过国民党的也是如此。那么即使是对于敌人，我们也应该采取分化瓦解，利用他们的矛盾各个击破。我们要打击的还是那么一小撮顽固的阶级敌人，在这里边，我们一定要严格地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面我们说过，有一些人现在企图把这场斗争搞到一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或者生活作风上，我们也没有上他们的圈套。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来，就是有一些人生活作风上有一些问题，而且有的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够不上敌我矛盾，能不能当各级造反派的头头？我们是这样的意见，如果是基层单位的，那么请那个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去

讨论、研究，如果是公司、联络站以上的头头，根据工总司、工代会的政治条件来决定，如果你自己认为你不够当联络站头头，自己有问题，不够，那么你就主动的回厂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条件办事。

我们还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现在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了，广大革命群众已经基本发动起来，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还要进一步地充分发动群众，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敢字当头，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夺权这场对敌斗争的全面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姚文元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

---

* 此文刊载于《红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此文为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八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而撰写，前后共经过毛泽东同志十五次修改。这是《红旗》杂志编辑部被姚文元掌握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各项指示，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亿万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领导。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各地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各单位都应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旧北京市委那种抗拒毛主席指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中国赫鲁晓夫等一伙大阴谋家对抗工人阶级领导、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切识分子所垄断。从这

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

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知识分子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隐藏在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小撮坏人，只有在工人、解放军的参预下，才能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彻底揭发出来。

“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参加。”《十六条》说的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不算“群众”？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

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工人不了解学校情况，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志，不要着急，工人是会了解的。工人阶级比那些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一个小山头的知识分子，水平不知道高出多少。他们不是住三、五天，而要长期工作下去，要永远占领学校和领导学校。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工人阶级将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并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

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必须认真学好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历来教导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革命的纪律性，不断批判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侵蚀及影响。在文化教育单位，资产阶级有它的传统势力。在工人阶级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时，资产阶级总是力图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工人队伍包括其领导干部中的薄弱部分。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必须保持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必须警惕糖衣炮弹或其它形式的手段对工人队伍的袭击。还要认真地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厂企业的斗、批、改。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置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革命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使人们清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从政治上、思想上为清理阶级队伍开路，并且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起着发动群众、巩固斗争成果的作用。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

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纯洁自己队伍、清除钻到内部来的阶级敌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为大批判提供了生动的活材料。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革命的高潮推动着生产的高潮。由于几万万贫下中农努力，我国农业生产多年获得丰收。有了一个巩固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使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我们向工人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致敬。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业战线上也在涌现出许多新事物，不少地方已在改的过程中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技术革命。形势大好，振奋人心，一小撮妄想复辟的阶级敌人彻底完蛋了。现在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焦头烂额，分崩离析，走投无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则是光辉灿烂，前途无量。我们一定要努力跟上发展着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总结经验，做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打好斗、批、改这一仗。这是

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的一仗，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张春桥 姚文元等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由林彪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作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这份报告起初主要是由陈伯达起草的，三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讨论陈伯达起草的初稿，说：“政治报告只提刘少奇，其他不提；不要那么吹，列宁才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所以不能提三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报告主要是鼓气，但要讲点困难；要提出矛盾来，讲清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发明火、发明蒸汽机，是两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这两次小得多，过几年，连印象都没有了，何必那样吹？”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送审的修改第三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把第四节与第三节对调一下，末尾一小节当作第五节。这是郭沫若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见较好。是否可以，请你酌定。并告张、姚二同志。”

# 一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贡献，就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一八五二年，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在痛斥老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多次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九十九页）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三十五页）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的结论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

专政是必要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六页）

列宁还指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页）

列宁指出复辟的危险还来自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三页）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列宁的这些光辉的教导。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平演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

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

我们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毛主席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猖狂和我国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提醒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谓“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谬论，毛主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每一个胜利，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的。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一九三九年，当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时，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

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用鲜血夺回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但是，既然他们是反革命，他们的阴谋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特别当苏修伙同美帝国主义、印度等国的反动派，大规模反华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

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接着，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

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丝毫改变刘少奇一伙反动的阶级本性。一九六四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

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谈怪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总结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得出的这个新结论，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指明了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方向。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

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 二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我们要从政治上打倒他们，也必须首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他们的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

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

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

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

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 三 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

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最宝贵的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级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组织，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等基本群众。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解剖一个到几个麻雀，不断总结经验。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份是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粉碎帝、修、反的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

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这也是最好的战备。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 四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条》中，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

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执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我们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具体地研究本单位的情况。凡是革命大联合还不够巩固的地方，应当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凡是阶级队伍还没有清理、或者刚刚开始清理的单位，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抓紧做好。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单位，应当根据毛主席对斗、批、改各个阶段的指示，抓紧其他各项工作。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

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列宁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也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

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

## 五 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 六 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毛主席向全党指出的那样："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

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设起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我们的党，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国内外敌人极其强大、情况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党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深深懂得，离开了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

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建党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正是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重要时刻，刘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抄录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话时，再一次故意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明确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刘少奇还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反动谬论，就是妄图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使党员越“养”越“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各级党组织，广大的共产党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场大革命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

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保证我们党始终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航道胜利前进。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修改党的章程。中央已将党章草案提请大会讨论。这个草案是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共同参加起草的。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以来，中央收到了几千份草案。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党章草案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又一次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可以说，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特别重要的是，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相信，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以后，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 七 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的。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全世界的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许多友好国家、友好团体和人士，都给了我们热情的赞扬和支持。我在此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坚决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暴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正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

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八十二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四十九页）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主席指出的这个伟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引着我们在同帝、修、反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尼克松上台以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面临

着全世界人民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巨大反抗，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的困难局面。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样，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实际上更大规模地扩军备战。美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加。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把侵略军队派到很多国家，还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它搞了那么多飞机、大炮，那么多核弹、导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用来吓唬人民、镇压人民、屠杀人民、霸占世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它到处陷入与人民为敌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包围和痛击之中，并且必将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规模的革命。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纸老虎。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还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全党，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逐步学会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宣告破产。同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履行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

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派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就是苏修最近的两次丑恶表演。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样。列宁痛斥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百五十八页）这完全适用于今天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成的苏修叛徒集团。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一小撮叛徒集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由于苏联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中苏边界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苏边界问题，同我国和其他一些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根据这个主张，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圆满地解决了同他们的边界问题。只有苏联、印度同我国的

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由于印度反动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要我们承认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妄图进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国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而破坏了中印边界谈判，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纪下半叶，那时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这种强盗行径，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愤怒谴责。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伟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我国政府本着对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早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四年，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谈判。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主张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还坚持要我国承认他们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

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苏联政府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使谈判遭到了破坏。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三月二十二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月二十九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我们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坚持实行的政策。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我们历来主张，各国的内部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同苏修叛徒集团丑恶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兄弟党”、“兄

弟国家”，实际上把自己当作老子党，当作可以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新沙皇。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破坏和颠覆，而且对于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党，对于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国家，都摆出一副凶恶的架子，进行镇压、破坏、颠覆，甚至出兵侵占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绑架他们的所谓“兄弟党”的成员，无所不为。他们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行为，决定了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

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这是中国的光荣。他们猖狂反华，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今天，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帝、修、反，而是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各国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是新生的力量，有无限广阔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美国无产阶级、青年学生、黑人群众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持支持日本、西欧和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一切反抗美帝、苏修侵略和压迫的正义斗争。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充满了胜利信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

## 八 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刻，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我们大会的代表，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新鲜血液。产业工人党员代表、贫下中农党员代表和女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老红军战士，也有

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多的代表，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共同商量和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这就标志着我们的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我们的祖国空前统一，我国人民形成了极其广泛的革命大团结。这个大团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个兄弟民族，包括长期以来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好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爱国同胞，包括在美蒋反动派压榨下的台湾爱国同胞，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我们相信，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毛主席这个高瞻远瞩的雄伟展望，照耀着今后我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掌握党的政策，深入发动群众*

王洪文 一九七〇年

同志们：

今天的大会开得很好，开得很成功，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这对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一次很好的阶级教育。

自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发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等三个重要文件以来，我们上海对敌斗争的形势和全国各地一样一直是很好的。这次复旦大学政治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揪出了胡守钧反党阴谋小集团，这就是一个很大，胜利。胡守钧小集团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反革命能量很大。从这个小集团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材料，是很可以帮助我们一些好心的同志擦亮眼睛，受到阶级斗争教育的。

但是，当前对于打击现行反革命斗争的深远意义，并不是每个同志都认识得很清楚的。有些同志认为这场斗争仅仅是揪出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这就把斗争的意义和性质缩小了。我们和反革命的斗争，决不仅仅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的生死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党

* 这是一九七〇年王洪文在复旦大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胡守钧小集团反革命罪行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具体时间不详。

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潮摧毁以后，资产阶级又会重新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胡守钧小集团就是这种失败阶级的代表。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埋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帝、修、反的别动队清楚出来，将是后患无穷；把他们几个清楚出来了，就把坏事变成好事，真正做到了：揪出了几个，挽救了一批，教育和锻炼了广大群众。

前些日子，不是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都是听的打倒声，现在该听听机器声、榔头声了”吗？今天的大会，对于那些对阶级斗争有厌倦情绪的同志，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里教导我们：“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须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今天大会上揭发出来的事实，不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吗？你想埋头搞生产，不问政治，但是阶级敌人却时时刻刻想的是“变天”，看来，敌人的政治敏感性要比我们队伍中的有的一些同志高得多。胡守钧小集团里不是有人写了“腰中利刃潜有声”的黑诗没咋？这是什么意思呢？“利刃”就是“快刀”的意思。什么叫“潜有声”呢？古时候的传说中说，刀碰到要杀人的时候就会自己发出声音来，这就叫“潜有声”。“腰中利刃潜有声”，就是说他腰中的快刀发出了声音，要砍人头、喝人血！他们说：“将来要是我们上台了，就轮到我吗砍他们的脑壳了"。同志们！我吗千万不要因为只是几个书生造反，当心自己的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呢！

在这次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现在是“整

老造反，整那些犯错误的小将了”。讲这种话的人，有的是反革命分子在搞捣乱和破坏，想把局势捣乱，有的是一些右倾思想极为严重的糊涂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这种妨碍斗争深入进行的论调，必须进行批判。我们出来认为，对“老造反”一定要作阶级分析，大多数“老造反”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不少始终紧跟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一直在为人民立新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造反派的队伍中叶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坏人。正如毛主席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指出的：“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革命运动的潮流把各种人都卷进来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中也包括了胡守钧之流的所谓“老造反”。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毛主席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特点的一个重要分析，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事情的确是这样，由于敌人打着“造反”旗号混进了我们的队伍，不少人手里他们的蒙骗，有的还把他们当作好人。但是只要我们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完全能够弄清楚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本来面目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认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反革命阴谋小集团进行活动的各种特点。比如，胡守钧小集团就是混进群众组织来造无产阶级的反的，他们有反革命纲领，有反革命计划，还有反革命地下活动的策略和纪律。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专案组编的《胡守钧小集团的有关材料》的小册子，大家可以看一看。它能帮助住我们理解什

么叫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怎么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向无产阶级夺权的？又是怎么搞地下的阴谋活动的？这本小册子摘录的那些材料，都是他们亲手写下的铁的罪证，白纸黑字，铁案难翻，要抵赖也抵赖不了。

从这些材料来看，胡守钧小集团难道说什么“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小将”吗？不对，他们是一批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小集团的成员自己供认，“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反革命老将了”。其实，胡守钧早就是一个老反革命了。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什么：“我向太阳，太阳像钢刀一样，要把我的心脏挖掉”。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就是专挖掉这批反革命分子的狼心狗肺的钢刀。他们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属于防扩散的材料有四百多条，其中近二百条研究得到旁证，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这些材料的内容非常恶毒，简直叫人看不下去。

这些家伙，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如此刻骨仇恨，对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却崇拜得五体投地。有一本描写希特勒一生的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在小集团里被捧为必读的“经典著作”，指定在小集团内部学习、讨论。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不是有许多人都喜欢写黑诗吗？那些黑诗里都谈到什么“十年为期”。为什么要“十年为期”呢？据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交代，希特勒从一九二三年在啤酒馆发动政变失败，到一九三三年爬上了德国元首的职位正好是十年。因此，这些人信仰的，完全是一条道道地地的法西斯理论。他们的反革命目标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法西斯中国。这种人还能说是什么“犯错误的老造反”吗？简直是犯了滔天罪行的老反革命！

现在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是初步揭开了，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松劲麻痹情绪在这个时候也就往往又要抬头了。不是有人以为“问题揭得差不多了，深不下去了”吗？这种“深不下去”的思想很危险，它会使这场斗争走过场。目前这场斗争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继续，是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重要战略措施，决不能中途停顿下来，一定要深挖穷追，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深入发动群众，不断地分化瓦解敌人，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我们郑重地希望同志们能够好好地学习一次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光辉著作。这对于推动当前的斗争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里提醒我们，绝不要做那个对毒蛇怀有好心肠的农夫，绝不要去可怜蛇一样的恶人。同志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确是毛主席当时所指出的那样：“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办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问题就是这样明白又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摧毁这样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就非搞大批判不可。不搞革命的大批判，不开展政治思想上的斗争，阶级敌人就还会有活动的市场，有的人就会与敌人划不清界限，敌人就会有翻案的客观条件。现在看来，有些单位，包括复旦大学的某些系，大批判工作还做得不够，希望能够抓上去。大批判搞得好不好，实际上是说明你这个单位群众是不是真正发动起来了。如果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必定是大批判搞得轰轰烈烈。否则，大批判必然是冷冷清清，运动也肯定热烈不起来的。希望各单位认真检查一下大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把群众的革命热

情进一步鼓动起来，保持下去。

同志们，战友们！为了更好地开展这场伟大的斗争，我们一方面要克服右倾思想，进一步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同时，我们必须很好地学习党的对敌斗争政策和掌握政策，才能使运动始终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轨道胜利前进。毛主席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关于“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关于“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指示，都要坚决照办。一切违背毛主席指示，搞逼、供、信，搞体罚或变相体罚都是错误的，都必须立即纠正。同时，必须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注意区别对待。这里，我想谈谈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去看待一些现象，做到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问题：

第一，要正确处理批判反动思潮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关系。当前这场斗争，既是一次严肃的政治斗争，又是一场极其深刻的两个阶级的思想斗争。既要发动群众，在政治上查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又要搞思想斗争，开展对各种反动思潮的革命大批判，以便教育广大群众，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识别能力；同时也帮助那些受反动思潮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小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要明目张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有困难的，他们总是利用极“左”思潮来掩护自己和迷惑群众，利用极“左”思潮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向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进攻，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所以那些极“左”思潮泛滥到极点的地方，往往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那里活动，有的甚至就是这些阶级敌人在幕后操纵。因此，我们只有

坚持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批判反动的极“左”思潮，才能把那些煽动反动的极“左”思潮，并利用极“左”思潮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才能教育群众，识别敌人，堵塞敌人的后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被卷进各种反动的极“左”思潮的人，不都是反革命。我们一定要对那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进行具体分析，他们是一时一地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提出或赞同了某些窗口化呢，还是一贯地系统的提倡和宣传极“左”的理论？是在运动的前期、中期时一次后来已作了检查或改正呢，还是一贯坚持直到今天还在积极宣传极“左”思潮？是一小撮牛鬼蛇神向党、向无产阶级进攻呢。还是好人犯错误？这些都应该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特别重要的是，要区别哪些是至今还在坚持极“左”思潮的人，哪些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受过极“左”思潮影响的人，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一律乱揪，是不对的。现在有这样一种人，一面拼命地叫嚷现在斗争打击面过大了，一面或者躲在背后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或者自己赤膊上场，大打“横炮”，妄图捣乱阵线，造成一场混战。对于这种人，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他们这种的“一左一右”，不就是要破坏这场斗争吗？对于这些家伙可要查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们说要区别对待，并不等于说，过去卷进过极“左”思潮的调整，就不要自觉地进行“斗私，批修”了，决不是这样的以上。对一切反动思潮，无论右的，或是极“左”的，都应当坚决批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和教育犯错误同志，真正孤立和暴露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第二，要把犯过错误的群众组织与反革命阴谋小集团区别开来。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向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夺权的时候，曾经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当全国陆续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以后，特别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九大”以后的今天，一切跨行业跨系统跨部门的或者死抱住自己的小山头的群众组织，就都应该立即停止活动，归口闹革命。如果坚持不改，最后必然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有一些群众组织在运动的前期、中期或后期曾经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者有的曾经被坏人所操纵、利用，这就要把这个组织中混进来的一小撮坏人和广大群众严格区别开来，要看到广大群众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但是，象胡守钧小集团就根本不是什么群众组织，他是一伙混入群众组织的阴谋分子、反革命分子。胡守钧小集团有纲领、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组织，采用的是极其诡秘的地下活动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学生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办法，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搞秘密活动干什么呢？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才专门鬼鬼祟祟搞秘密活动，特别是到了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还继续这样搞，肯定有它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搞秘密活动的组织和人应该查清楚，那些屡教不改的人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胡守钧小集团里的骨干，有点曾经是炮司的头头，有的曾经是中串会的头头。那么，是否参加了炮司的都要揪呢？这是不对的。不能把胡守钧小集团和炮司混为一谈。对有些事情，我们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拿工学运动来说，在一九六六年九、十、十一、十二月间，对促进工人运动的兴起，有些学生组织当时起

了一些很好促进作用的。广大革命学生、特别是红卫兵小将在下工厂的过程中，尽管有的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大方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工人运动研究起来以后，特别是当一九六七年初中央发出了归口闹革命的号召以后，一些学生还指手画脚，想来包办代替工人运动，这就很不对头了。至于胡守钧小集团，他们是打着工学运动的幌子，英控制工人运动，甚至妄图与工总司合并，这是有他们的阴谋和透明度野心的。他们甚至背着工总司，搞了很多阴谋活动。当他们的阴谋被我们识破以后，就在背后骂娘。现在有些厂里对本厂的工人同学生串连过的，也不管是运动的早期还是晚期，都认为有问题，要调查，我们建议，对这类问题的调查要慎重，不能一律都去调查，都要搞。在运动的早期，在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初的时候，学生与工人串连是普遍的，也是很正常的事，有些在提出情况下，不值得怀疑和追查的，不然就很容易打“横炮”。如果有什么问题，那只是个别的。再拿中串会来说，曾经写过《一切为了九大》这篇大毒草，但这只是小部分人干的事，并且背后还有坏人在指使和修改，如胡道静，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还有这个反革命阴谋分子胡守钧，也是修改过这篇大毒草的。中串会的头头办了学习班，他们通过学习，效果也比较好，提高了认识。今天，不能因为有几个头头参加了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就认为要在中串会和胡守钧小集团之间划个等号，或者甚至认为参加过中串会的都要揪，那也是不对的。中串会是个犯过错误的群众组织，它与胡守钧小集团完全是两码子事。

第三，要把卷进“炮打”逆流的与搞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区别开来。

搞反革命必然要“炮打”，这是肯定的。第三，这和一般犯

过“炮打”错误的人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说什么“凡是搞炮打过的都要揪”，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搞“人人自危”，实际上是妄图把水搅浑，为一小撮反革命打掩护，值得我们引起严重警惕。

我们对犯过炮打错误的人，要看他是为首的呢，还是卷进去的？性质是不是严重？情节是否恶劣？不能一概而论。过你去犯过一般“炮打”错误，后来认识到了，已经作过彻底交代和认真检查了的，以后又没有重犯而能表现在行动上改正了的，今天就不要再“老账新算”了。思想上的批判、帮助是可以的，但是要重在教育，不能揪住不放，还是要容许人家改正错误嘛！但是对那些隐瞒了“炮打”错误，或是隐瞒了主要情节，特别是今天仍旧偷偷地窝藏“炮打”的黑材料、继续搞“炮打”活动的人、继续搞“炮打”活动的人，对于这种人，一定要揪出来，追查到底。当然，只要这些人能够痛改前非，彻底坦白交代问题，主动把黑材料交出来，今天交出来，明天交出来，还算是交代得早，肉鸽这样做了，我们都可以宽大处理。

总之，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行区别对待，防止“左”倾和右倾两种倾向。胡守钧小集团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一般“炮打”的问题。这个分段小集团在上海地区先后掀起的两次“炮打”逆流中，都充当了炮打中央文革的急先锋，这是他的严重罪行，但还不是它的主要罪行。这个小集团直到今天，还在疯狂地恶毒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且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妄图进行变天活动，这才是它的要害。

第四，要把犯错误的学生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我国革命青年一直寄予着无限期望。经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们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极大多数都更加热爱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更加愿意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法家朝气蓬勃。在处理青年中的问题的时候，既要注意将那些青年学生或青年工人，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犯了错误，受了批评，消极不满，说了些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同那些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的坏人区别开来；也要将那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和由于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走上反革命道路的人区别开来；还要将青年学生中那些出身不好又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同妄图搞阶级报复、时刻盼望复辟、变天而又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区别开来。对于前一种人，也要进行思想批判，特别是他们自己，必须认真吸取教训，只要他们不再发展下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欢迎他们回头改正；而后一种人，则就是敌我矛盾，必须狠狠揭发、批判、斗争。

胡守钧小集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小集团。这个小集团里的人是不是都一样呢？也不一样。其中也有的人是属于前面一种人，还有些人是属于所谓边缘性人物。但是，他们的性质与一般的又不同些，因为这是个集团，要看他们的悔改的表现，决心改正的程度，才能确定对他们的处理态度。

第五，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反革命小集团中的人，态度好的与态度坏的，也要区别对待。

毛主席明确指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原则，是永远适用的。我们对胡守钧小集团以及其它一切反动分子的态度，是很明确：一、罪行是客观存在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企图隐瞒罪行或者掩盖罪行是自欺欺人，你不谈别人会谈，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到头来还是得坦白，别人揭发不如自己坦白的好，

迟坦白不如早坦白的好；二、罪恶不管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竹筒倒豆子”，向人民彻底投降、缴械，就会得到宽大处理，顽抗下去，罪上加罪，就要受到无产阶级的严厉制裁；三、要将功赎罪，重新做人。不要看罪行严重，真正坦白彻底而悔改表现好的，还是可以考虑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四、坦白的根本目的是同反动阶级的思想彻底决裂，将破坏元素变为有利因素，这个转变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就是真正作了彻底交代的人，也还应该 2 狠触自己的灵魂，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检举揭发同党分子的犯罪行为，并对自己进行一清二批；五、辩证法就是革命的、批判的、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回避斗争是不行的。我们要正告胡守钧小集团的成员，农民或者经过七斗八斗，把问题斗出来，变好了，或者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两条路线任你选，做人做鬼随你挑。

经过这一阶段的斗争，这个小集团内部的各个从长远态度是大不一样的，我们根据他们的态度将作出不同的处理。现在坦白是不是来得及？还算不算你自己交代呢？也还来得及，也还算你自己交代。当然，迟坦白与早坦白，在处理上是有不同的；但是，还要看到迟坦白与抗拒坦白，处理更是不同的。现在再不坦白，到了定案的时候，就要后悔莫及了。最近我们根据这样文件杀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且还贴了布告。凡是想顽抗到底的人，我们现在警告农民，如果不立即转变自己的态度，那你们决不会有好下场。还有一些反革命小集团和反革命分子，我们野日忙于别的案子，还没有来得及触动农民，但你们可别高兴的太早，以为没有你们的事情了。奉劝你们还是不等我们动手，主动坦白投案的好，我们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你们想侥幸滑过去，那是决计办不到的。

最后，还有一点要请各单位来开会的同志们注意，学人家的经验还必须结合你们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照搬是不行的。复旦的基本经验，例如，始终以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党中央的三个重要文件为强大武器，用革命大批判开路，充分发动群众，注意调查研究，大搞政策攻心，严格掌握党的政策，实行分化瓦解和区别对待。这一些，是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但他们的具体经验，具体做法，就不能够完全生搬硬套。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牢记“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复旦揪出了一个集团，好，我也来揪集团；没有集团也要硬揪，这样做就不行了，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搞。我们说，胡守钧小集团性质是反革命的，是因为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反革命有各种各样，挖出来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最近揪“五·一六”，不是所有的反革命集团但是“五一六”集团。除了“五一六”集团以外，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反革命集团。有集团就揪集团，有几个就揪几个。总之，各单位搞斗争要靠毛泽东思想，靠群众路线，靠党的政策，而不是把别单位的经验全部照搬。

同志们，战友们！目前革命形势大好，“一打三反”的运动正在稳步地结界进展。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党的“九大”指引的胜利航向，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学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北大的三个经验，认真学习各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遵照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将这次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 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张春桥 姚文元等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

---

* 这是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的谈话纪要。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这份纪要刊载于《红旗》一九七〇年第八期。

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

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材料，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做，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人家都很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他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有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文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老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紧：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

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桩事情；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盖拆掉。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是专门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拼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

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一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的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二〇”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〇”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〇”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得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〇”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姚文元：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

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

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 •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为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〇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拼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

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起来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

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了。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

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

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

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 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张春桥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包括洪秀全、孙中山领导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感谢伟大的列宁，他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

* 此文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联合发表的社论。据张春桥在《张春桥狱中家书》中的回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张春桥给长女维维的信：“你还记得我寄给你一篇纪念‘七一’五十周年的文章吗？那篇文章我写得极不痛快。庐山会议林彪发动政变未遂，事情并没解决，因而文章很难写。写出来一个初稿，印发中央会议讨论，人们却热衷于争取在文中提到与他（有）关的事，其余的一言不发。整个会议本来应当是批陈伯达的，兴趣却集中在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他们明明知道这并不是陈伯达的事，却在批陈的名义下干得十分热心。实际上这是庐山会议的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写好文章呢？只好不痛不痒。聪明的周恩来见我一句也没称颂林彪，就在文中加了一句‘林副主席提倡毛主席语录’如何如何，使得文章更加四平八稳了。”。周恩来所加文字为：“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因此，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这篇文章就不再详细论述。”

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象毛主席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但是，这是新生力量，而新生力量本质上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也好，白色恐怖、特务横行也好，叛徒、内奸的阴谋破坏也好，都没有能够把中国共产党消灭掉。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斗争，已经发展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已经改造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不正确，即便夺取了政权，还会丧失政权。路线正确，没有政权也会取得政权。但是，正确路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林彪同志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正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引导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曲折的革

命道路上，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直到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全党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贯彻执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完成"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前，特别需要在全党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是党的事业继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 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谁否认它，或者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否认，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究竟在中国怎样才能实现这个任务呢？列宁根据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必须看到你们那里的特点，你们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列宁强调说，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显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谈不到

夺取政权，就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主席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武器。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条道路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这样四个历史阶段。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前后二十八年，才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问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在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具体分析。明确地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

敌人。”又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主席特别重视发动农民和武装农民的问题，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样，就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既反对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要国民党、不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

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派。他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叫嚷中国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不能成为领导阶级，污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他根本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放弃了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工农群众起来了，他唯恐吓坏了资产阶级。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刘少奇竟然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时候，广大群众手无寸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后来，陈独秀坚持托洛茨基反动立场，认为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建立，表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能去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就是取消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蒋介石的屠杀所吓倒。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了挽救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正确的方面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八七”会议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一九二八年四月，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农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红色根据地的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地的游击战争都先后有了发展。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很快又出现了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初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三〇

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个时期，虽然出现过陈独秀取消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以及其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的倾向，但是，主要是这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极大，教训极深。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却又说什么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实际上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如同其他“左”倾机会主义者一样，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不懂。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不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打仗，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他们对中国的阶级关系根本不调查，不研究，鼓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实行许多“左”的政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路线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转化为拚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实行宗派主义，夺了毛主席的权。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到处推行他的错误路线。结果，使我们党的力量，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使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革命根据地开辟了

革命根据地。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丢掉了革命根据地，使工农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王明“以我为核心”，自封“百分之百”正确，原来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这是流了多少鲜血，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遵义会议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一方面军组成了北上抗日支队，进军陕北，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接着，我们党又粉碎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路线。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同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时候，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不足三万人。我们党的力量，数量上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路线正确，质量上却比过去更强大了。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胜利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但是，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建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反映在党内，就是我们党同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叛徒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王明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

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不敢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革命军队，不敢在日寇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这样，王明又回到了一九二七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路线上去了。这个时期，刘少奇从白区跑到革命根据地。他表面上反对王明路线，拥护毛主席正确路线，把自己吹嘘成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把他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实际上，他早已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在白区推行的完全是一条错误路线。他抛出的黑《修养》，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学习什么孔孟之道，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宣扬的也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个时期出现的所谓“国防文学”、“国防哲学”，实际上就是卖国文学、投降哲学。它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也是刘少奇白区工作错误路线的产物。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了系统的彻底的批判。毛主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主席重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是，王明抗拒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报告和结论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驳斥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规定了党独立自主地领

导武装斗争的路线和政策。全会通过了毛主席的报告和结论。后来，毛主席又在《论政策》等著作中，反复地教育全党，统一战线“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由于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又纠正了在同国民党作斗争时出现的“左”的倾向，坚持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在对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们党战胜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紧紧地掌握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发展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个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从党创立的初期就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毛主席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和《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对全党的思想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四十年代初期，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党中央抓住了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这个极好的时机，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整风文献，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揭露各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收获很大。在整风中，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全党干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党的“七大”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鼓舞了全国亿万人民愚公移山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已经扩大到一万万人口。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决心发动反革命内战。我们敢不敢斗争，敢不敢胜利？“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这时，刘少奇抛出了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刘少奇鼓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我们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刘少奇要我们党把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交给蒋介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

去当官，同美蒋反动派“合作建国”。这条路线，是陈独秀、王明路线的继续，是美共叛徒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呼应。毛主席坚决地反对了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主席又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这是针锋相对。他们要谈判，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根据当时的形势，毛主席部署了击破蒋军进犯的作战准备，又亲自到重庆谈判，揭穿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毛主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毛主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率领全国人民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并且按照全国革命进展的不同情况，规定了土地改革、整党建党、整军建军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党发布了适合全国农民愿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纠正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去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右倾错误，又纠正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土改、整党中，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搬石头”、搞扎根串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等等形“左”实右的路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人民和蒋介石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

海上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埋葬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主席早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明确地指明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斗，只是朝着最终目的地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二步的开始。

我们辽阔的国土是逐步解放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军队，一边打仗，一边发动群众，同广大人民在一起，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政权，没收了占现代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全部官僚资本，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我们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在三年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三年，在进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后，毛主席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我们的实践，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坚定的，又是逐步前进的。对农业，经过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到公私合营，给予估产定息，实行赎买政策。有些害急性病的人，觉得这种办法不过瘾，过渡的时间太长了，最好一个早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左”的倾向经过教育较快地克服了。

社会主义革命是埋葬资本主义的斗争，受到全国劳动人民的欢呼，也遭到刘少奇一伙的猖狂破坏。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结成了反党联盟，妄图分裂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阴谋被党中央及时地粉碎了。刘少奇一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早在一九四九年，他就背着中央，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到处鼓吹“剥削有功”论。五十年代初，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就是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这个口号，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纲领性质的错误。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

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大砍合作社的右倾错误，批判了他们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和发展富农经济的谬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农、下中农实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全国五亿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由于无产阶级占领了广大农村阵地，工人农民两头一夹攻，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逼得他们不得不接受改造。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手工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大变动中，工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发展，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刘少奇一伙的答案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说要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到来的时候，他们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搬出这一套，不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照他们的说法，解决了所有制问题，阶级斗争就熄灭了，不需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了，只要抓生产就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太“先进”了，不适合中国今天的需要，应当退回去，应当发展资本主义。刘少奇一伙还背着毛主席，把这些黑货塞进了“八大”的决议，妄图

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

毛主席当时就指出“八大”决议中刘少奇一伙塞进的这些话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久，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毛主席指出：“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毛主席用战无不胜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彻底地驳斥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党。

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地用新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关

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列宁故乡复辟资本主义这一严重事件的出现，极其深刻地教育我们：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彻底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的。人们只要看一看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历史，就会明白：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当然要比历史上那些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要更加激烈，更加曲折。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利用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没有精神准备，复辟了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坏事，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它教育了苏联人民，教育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资产阶级在苏联的复辟只是一个暂时现象。苏联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一定会战胜赫鲁晓夫、勃列白涅夫集团，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走列宁、斯大林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胜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辩论的问题，主要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是否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这场大辩论，使广大群众分清了敌我，分清了是非，孤立了资产阶级右派，驳斥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促进

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了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条总路线，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这条总路线，确定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工业、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革命和建设迅速前进的大好形势下，刘少奇一伙改变了手法。他们先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破坏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具体措施，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跳了出来，又从右的方面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接着，刘少奇也不断地从右的方面攻击党的总路线。他们一伙极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合同、撤专家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党的总路线能够而且已经开始战胜了困难，他们公开地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三和一少”（对帝、修、

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支援要少）的对内对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已经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是打着白旗反红旗了。

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猖狂，并不表示他们有力量，而只能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使他们惊慌失措。历史经验证明，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政治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相互呼应的。刘少奇一伙，以为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猖狂反华，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事实恰恰相反。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是从来不怕困难的。帝、修、反的封锁、禁运、武装侵略、内部颠覆，都无损于中国人民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们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造社会。被孤立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帝、修、反，包括他们的走狗刘少奇一伙。

一九六二年九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新的进攻。毛主席在这次全会上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现在已经写进我们党章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还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林彪同志主持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广泛发展。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我们党向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

被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进攻，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开始登上了文艺舞台。同时，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对无产阶级进行猖狂反扑，反对毛主席明确指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方针，以形“左”实右的手段，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反对文艺革命，反对批判资产阶级。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刘少奇一伙在一九六六年抛出“二月提纲”相对抗。斗争的反复进一步暴露了刘少奇是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号召全党要警惕“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这个《通知》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主持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正式揭开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盖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

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也可以叫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很多同志开始是很不理解的。当着广大群众起来了，又分成两派，甚至发生武斗，一时似乎天

下大乱。有人问：刘少奇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权力，毛主席下命令罢他们的官就是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实践证明，罢官的办法用过多次，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次革命不单是为了罢几个人的官，而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刘少奇不但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我们不少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手里。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才能够清除出刘少奇叛徒集团，才能使亿万群众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受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取得把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来的经验。所谓乱，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他们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破坏捣乱。但是，他们只能暂时地欺骗一些人。广大群众带着《毛主席语录》参加辩论，逐步地学会了识别好人和坏人，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学会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样，全国变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广大群众在大风大浪里学到了他们平时学不到的东西。所以，这种乱，终究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军政训练），为人民立了新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从创立的那天起，就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有四十多年的群众工作经验。因此，他们能够很快地同群众打成一片，能够推动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较快的发展，并且使我们的军队得到了新的锻炼。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诞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军、干、群和老、中、青两个三结合。整顿后的各级党委的成员，不但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中年和青年一代。这就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更加朝气勃勃。正象毛主席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因此，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这篇文章就不再详细论述。

"九大"以来，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证明了"九大"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所确定的任务和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各条战线斗、批、改的任务，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进行斗、批、改的任务还很艰巨。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还需要我们长期奋斗。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们全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

#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回顾我们党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战斗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我们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我们党就前进，就胜利。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完整的总结。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在毛主席所总结的我党的历史经验中，那一些是今天应当特别引起全党注意和学习的呢？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总是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坚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对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正确地提出党的路线和政策，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以及其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为其思想特征的。他们都曾从右的和“左”的方面，以唯

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反对和歪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反对理论同实践的统一。他们也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装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孔，但是，这是为了吓唬和欺骗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而他们自己从来也不想照马克思主义办事，从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便必然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要求、同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要求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也就必然要在革命实践中遭到破产。我们有一些同志在一段时期内所以不能辨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从主观原因来说，也是因为或者不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或者虽然也读一点，但是不能够用毛泽东同志无数次强调的这个根本思想原则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这个历史经验非常深刻，一切新老共产党员都要牢牢记住。

当前，我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正在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认真读马、恩、列、斯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认真学习我党五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干部的学习运动同广大群众的学习运动相结合，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效果，我们应当长期坚持下去。在看书学习中，必须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要带着问题学，带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带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看书学习。这就是要把读书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把学习历史经验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把批判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从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到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对全党全军全国人

民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主席领导全党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辩论，更是对全党进行了极其深刻极其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是当代疯狂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全世界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继续揭露和批判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并且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是我们党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全党同志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批判国内外的现代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学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

（二）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加强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使党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去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

对于极少数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特务，对于里通外国的内奸，必须彻底揭露。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隐藏党内几十年终于被揭露出来，王明终于逃到外国当了“百分之百”的汉奸特务，就是例子。

对于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则必须采取另一种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主席解释这个方针时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

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了这个方针，指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毛泽东同志这个处理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既区别于右倾机会主义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论。我们要学习在各种不同历史条件下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党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三）必须力戒骄傲。对于一个取得伟大胜利的党，一个掌握了政权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党，一个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担负着国际主义伟大义务的党，这点特别重要。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

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四）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必须充分地看到和抓紧主流方面，同时逐一解决非主流方面的问题。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要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也要估计到我们还没有察觉而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成为主要倾向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注意反对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倾向。当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的联合破裂，革命转变到武装斗争为主时，毛泽东同志注意反对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倾向。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预见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主席号召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每当我们对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成为主要倾向时，毛主席总是重申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提醒我们要谨慎，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防止和克服违反政策的“左”的倾向。而当资产阶级向我们发起进攻，或我们党在前进中遇到暂时困难，或集中力量纠正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时，毛主席总是提醒我们要坚定，要坚

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区别主流和支流，不要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提防公开的、暗藏的敌人的破坏和反扑，反对和克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右的倾向。当某种倾向已经形成对党的事业造成危害的历史关头，毛主席总是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为我们稳稳地把住了航向。

（五）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本路线。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正是因为我们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把坚持群众路线作为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把是否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毛主席尖锐地批驳了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类假马克思主义者诬蔑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动观点，也不断地批判和纠正了党内的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毛主席反复教导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下，更要注意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遇事同群众商量。要办好五・七干校。要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防止重犯脱离群众的错误。同那种口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的人物相反，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并用毛泽东思想坚持不懈地教育群众，克服错误倾向，提高人民的觉悟。

毛主席历来关心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

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各民族在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斗争中结成的兄弟关系，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要在党内外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没有集中，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意志，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但是，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此，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一言堂，提倡群言堂。反对说假话，提倡说真话。把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要发扬我们党的传统的民主作风，经常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但是，我们的民主，无论军队或地方，都是为着巩固集中、加强纪律和提高战斗力，而不是相反。各级党委都要建立和健全党委制，加强一元化领导，防止分散主义，防止多中心即无中心，要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七）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主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破坏，发展壮大了我们自己的军队，成为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只要有阶级存在，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就不得安宁。今天，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实行霸权政治，妄图瓜分世界。日本军国主义也妄图

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因此，我们决不可忽视他们侵略和颠覆我们祖国的危险。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一天也不要忘记准备打仗，一定要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不但需要强大的陆军，而且需要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我们不但需要强大的正规军，还需要大办民兵。这样，任何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国，都会被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八）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毛主席一直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正确处理本国革命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的奋斗中，始终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支持，得到各个友好国家和友好团体的支持，得到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兄弟组织的支持。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同他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永远感谢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不但同阿尔巴尼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人民，同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美国、苏联、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完全一致的。今天，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所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一方面领导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搞好，一方面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同各国人民在一起，为打败美国侵略者及

其一切走狗而斗争，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政治而斗争，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斗争。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比较穷、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对世界革命的贡献还很少。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但是，就是再过几十年，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我们也决不可以有傲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党沙文主义。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我们应当学习各国革命人民的长处，永远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成千成万的烈士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不论还有多少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

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同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相比，全世界的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帝、修、反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谈话*

江青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江青：一九五四年元月，所谓两个小人物，山东大学的一个学生李希凡同志等，在《文史哲》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俞是胡适那派的），毛主席看了很重视。当时毛主席是不愿人家知道他的意见，从没展开争论，就叫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要他们转载，好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因为我给打了电话就转载了，周扬之流却跳出来说，他们不过是小人物，言下之意非他们那一些大反革命文章不能登《人民日报》。

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李希凡原来送《文艺报》，《文艺报》不登，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也不登，他只好回到山东，因为他是山东大学的学生，就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登出来了，这篇文章被我发现了，就送给毛主席看，因为胡适、俞平伯这一套，我们都有研究，他那篇文章比较击中要害。这时候，我看到《人民日报》、中央宣传部开过几次会，周扬等反革命说这样的小人物怎么敢批评俞平伯这样的大人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也不向他们打个招呼，他们在意识形态里要当毛主席、党中央的太上皇，毛泽东主席很生气，十月十六日曾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还

* 这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江青与美国作家维特克的谈话内容。

开了一个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资产阶级的所谓大人物压服小人物，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对这个问题，你如果有兴趣我可以详谈。

维特克：不但我有兴趣，世界上学中国文学的人，也会有兴趣听听江青同志对《红楼梦》的意见。

江青：胡适、俞平伯这一派对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用唯心主义的所谓考证来对待，脱离了历史，脱离了客观实践，唯心主义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同时问题的严重性还由于党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欣赏俞平伯这本书，即《红楼梦研究》，欣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他们是这样的穿凿附会，把这本书贬低到只是一部恋爱小说，看不到这本书是百科全书的写法。

当时曹雪芹从一个贵族家庭的角度来描写阶级斗争，这部书涉及到二十余条人命，写了三、四百人口，但是，真正的主子只有二十余个，其他都是家务劳动奴隶……等等，他们之间的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二十条人命说明这个问题。

由于我的外文不行，我看的外国作品不多，但我看了一些翻译小说，就我看过的小说，世界上没有一部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能够比得上《红楼梦》那样深刻、尖锐的分析社会。

俞平伯、胡适居然荒谬地唯心地说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一个人。还有他们把十六回本（甲戌年）、八十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戚蓼生本）等统统垄断了，群众看不到，而十六回本和脂评八十回本都只有一个抄本，就戚蓼生序本也要用很大力量才能得到，现在这三本珍贵的本子我都有，将来重印之后，我可以送你。他们垄断了这些珍物，然而说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一个人，一回事，说那个“注”与曹雪芹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舅舅，又说史湘云、薛宝钗如何如何，反正是主观猜测，这是

完全错误的，那个“注”的思想是反动的，它只提供了我们了解一些情况，而曹雪芹的思想《红楼梦》是当时十八世纪后半叶的著作，然后修改十余年之久，他的思想内容和文学技术在那个历史时代，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离开历史背景就不能说明问题。

《红楼梦》有好几个名字，最初叫《风月宝鉴》，后叫《石头记》，最后叫《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是有“注”的。我为了脂评八十回的本子，向北京图书馆去借，借来了后又挨了一顿臭骂。那些资产阶级权威不许借出。我借出来后，请了许多人用流水作业转抄了本，这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是抄本，不是原本，他们垄断了这些东西。我前面已经说过，曹雪芹二十八岁就写了这本书了，修改了十几年，红楼梦还有个名字叫《金玉缘》、《藤花榭》。藤本我没有看到，《金玉缘》我看了，这本没有意思。《戚蓼生序本》接近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研究过各种版本的目录，证明曹雪芹在八十回石头记后是有稿子的，但是他没有后代，给人家借去散失了。据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第二章上说，叹君或亦将军后，于今环堵蓬篙屯，可知曹雪芹为将军的后代了，雪芹为旗人，故曹家受封为军马之劳。其实李辰冬所指的“将军后”解释不太确切，因为我读过唐朝大诗人之一杜甫（公元 700 年左右）的《丹青行》是指曹为曹操之后，曹操是后汉期间（大约公元 150 年左右）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的皇帝，他不仅是一个封建的政治家，而且是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我很喜欢他的诗，在他的诗里流露出朴素的辩证法。例如他的《龟虽寿》，为了证明我的看法，请你看一下我送你的《古诗源》，就是其中有名的一篇。后面我看到一些回目，以及八十回本的内容来判断，他写的非常悲惨，抄家，坐牢，讨饭都有。

红楼梦的创造和历史背景有关系，曹雪芹的祖先都是当官的，他们的始祖（始祖以前未弄清楚）就是大官，到他的曾祖父已经是相当的官了，他的祖父曹寅的父亲是康熙的宠臣，康熙是了不起，很小就作皇帝，年青时就很有才干，这一点不能因为他是封建皇帝就抹煞掉。为什么要把曹寅放到江南作织造呢？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同时又很可能是汉族，他是正白旗仓农人，织造是内务府的一个差使，实际是皇帝的家务奴隶。他做江南织造，不时还兼管渠漕的职务，是地方官，他外出时都拿着一本书挡住脸，怕人家给他敬礼。这个人很有学问，能作曲（不是北曲），能做诗，有集子，他实际是替康熙作统战工作，用皇帝的名义，或用曹寅的名义，给这个送点银子，给那个送点礼物，就是做明朝遗老遗少的工作，凤姐不是说明她家里的银子像水一样的淌？

康熙皇帝立太子后，康熙又把他废了，想立有战功的皇十四子，那个时候迷信，康熙把遗嘱写好放到大殿的橱后面，皇太子雍正皇帝这个人很狡猾，残酷，也很厉害，他会使用特务手段，康熙皇帝写的那东西，在康熙皇帝死了之后才能看，雍正皇帝就偷偷地把十四子改为四子，他就作了皇帝。他一执政就把他的弟兄杀的杀，关的关，和他父亲有关系的大官、将军，如曹雪芹的家族，统统关的关，杀的杀。雍正皇帝自己就说，有人说我爱抄家，其实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权利与财产再分配，雍正不懂得披上一件骗人的外衣，他是赤裸裸的蛮干。

这时曹寅已经死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遭遇比高鹗继续的后四十回写的要悲惨的多啦，高鹗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就是写贾宝玉出家，但是因为高鹗当时只中了举人，所以他写宝玉中了举人，又是有了儿子后才出家的，如果高鹗中了进士时，写了四十回，那宝玉也一定写成中进士。周汝昌写了一部《红楼梦新证》，

他的基本观点也是胡适一派的，但是他拿出清宫的一些档案，这是比较可靠的资料，这本书值得看，他的考证方法可是不行，但是一个资料。

我举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的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怎样穿凿附会。例如戚蓼生八十回第六十三回叫“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连谁坐在那儿，谁怎样都画了图，说林黛玉、薛宝钗是合二而一。古人坐在那个地方，怎样坐的，他如何考证来，知道的那么正确呢？而且这是小说，又不是古物证明的，他说就是那样，完全是主观唯心论。他和胡适之流垄断了几个珍本批注，他拿着这个本子的注说，三元口说林就是薛，薛就是林（不是原话，是大意）。这两个人在统治集团里，一个是统治集团尖端顶儿上的，一个是寄人篱下的孤女，一个是挖空心思怎样害林黛玉的人，一个是天真烂漫的对待那些整她的人，当然啦，林黛玉也有点心计的，对自己言行相当谨慎的，曹雪芹写林黛玉都是批评她，批评她刁啦，说薛宝钗都是好的，好什么呢？一个是她的美，“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眼含水杏，脸若银盘”，中国那个时候算美，现在看来可怕的很，那么圆圆的一肥脸，又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装愚，今随时，自云守拙”，反正翻过来复过去就是好。但是曹雪芹写林黛玉是仔仔细细写的，没有说林黛玉漂亮，然后他形象的写了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的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什么“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什么“动如弱柳扶风”，那是形象的，写他们的房间呢？从刘姥姥眼睛里看，说林黛玉的房子，哎呀，还不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尽是书，而薛宝钗的房子是另外一个样子，矫揉造作，听说贾宝玉有一块玉，她也作了一个项圈金锁，原来是准备送到宫里争取考试贤人，没有选上，这样就看中了宝二奶奶的宝座了，而林黛玉从小是当男孩

子培养长大的，这两个人完全不同，性格什么都不一样，而且地位悬殊：一个是寄人篱下，实际无产者，没有户口，当然不是说她的思想不是贵族的；一个家里是富豪，是皇家的商人。这怎么能象胡适，俞平伯之流在他们的著作里，根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注”说，林黛玉就是薛宝钗，薛宝钗就是林黛玉呢？

曹雪芹写贾宝玉也是非常不成材的，说他什么也不行，就在第三回吧，而在林黛玉的眼睛里贾宝玉并不是象曹雪芹设想的那么个蠢才，这个你可以去看第三、四回，毛主席是告诉我们全党，告诉我们的子女，要看这本书不要单纯看哥哥妹妹，要看阶级斗争，要看廿几条命，这几百个人都吃着邬进孝那样的庄子收来的东西，还有高利贷，以及讹诈来的财物，那些大头，管家的，得意的时候都是很厉害的，但一旦失宠，马上就完蛋，就死亡。

我看的小说不多，欧洲的，包括美国马克•吐温的作品，是暴露的，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但是写的人物毫无例外，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斯丹达尔写《红与黑》，于连•索里已经爬到军官啦，这部作品我是欣赏的，主人翁已经爬到军官了，他未婚的老丈人准备要给他买一个贵族，这个没有作到的时候，另外一个与他有关系的贵族夫人给未婚的老丈人来了一封信，他就从上层社会跌倒底层，一方面由于那个社会不允许他再活下去，同时也因为他们个人的极端荣誉心，最后上了断头台。斯丹达尔的作品，我略有研究，特别是《红与黑》这本书，应该说是不朽的，在历史上，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写了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政治什么样子，政治怎样斗争，政府部门怎样斗争，教派内部怎样斗争，写得很复杂，法国修正主义者把当时的历史政治、经济情况以及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都抽掉了，搞成一个几角恋爱的故事的电影。这部书可以供我们了解当时欧

洲的形象的历史，因为他写于连•索里是从一个中小城市到巴黎，然后到伦敦，整个欧洲都跑遍了，他是一个很反动的人物，他就是给波旁王朝复辟做工作，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了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这样的，他写的本身就是一群贵族，但是贵族出了两个叛逆，一个贾宝玉，一个林黛玉。贾宝玉就是怕人情世故，就是不愿意做官，我看的本子上有这样的话，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他只管胡闹起来，哪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并图于何地？他说还是做个老百姓的，贾宝玉不愿去读书，不愿去应试，但是自己在家里读书，他说所有的书都是假，只有四书是真的。作者总说他无能，总说林黛玉小性儿，行行爱恼人，总说薛宝钗怎么大方，其实薛宝钗手里有钱，她用钱收买人心，收买特务，袭人就是她收买的特务。林黛玉是没有什么钱的，就靠贾母每月给她一点钱，因为她不使胭脂粉，什么她都不使。有一回薛家的老妈妈送东西给林黛玉，正好遇上贾母给她送月份钱来，她就把钱全部给妈妈与丫头了。

如果林黛玉跟贾宝玉活到现在，我看也是大右派，但是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就是十八世纪上半叶，他们在恋爱问题上，考试制度上，不向上爬，不愿意做官等等不少方面，反封建那样坚决是了不起的，总而言之，他们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

如何帮助读者比较容易看得懂《红楼梦》呢？我对这本书还有以下的看法，头五回很多人看不懂，他的小说实际上是从第六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开始的，天上不是一个虚幻的镜吗？那时作者幻想出那个地方，来逃避现实的，在地方上就搞个大观园，他说林黛玉是绛珠仙草，贾宝玉是神瑛侍者，可怜这颗绛珠仙草每天

以甘露灌溉，所以绛珠仙草得了个人形，她要下凡去用眼泪来还神瑛侍者的恩情，整个是虚构的，这是浪漫主义，但从整个部分来看，又有浪漫主义，又有现实主义。毛主席的教导，看这本书要用阶级观点，看那些人命，头五回非常重要，这部分作者都在前五回出来了，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作者在第二回就写了林黛玉，薛宝钗在第八回作者才让她正式出现，但是前五回总的介绍人物，都介绍了，薛宝钗也介绍了。

这五回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主题歌——“好了歌”的词，他有对比，有朴素的辩证法唯物论，这个歌的“注”是谁作的呢？是甄士隐。作者说他将真事隐去了，所以有个贾宝玉甄宝玉，甄士隐家道破落，孩子叫人拐走了，他们住的地方叫十里街仁清巷葫芦庙，他与他的妻子搬到他的老丈人封肃处，丈人看不起他，骂他懒，他晚年非常悲惨，最后就跟着和尚道士走了，他听了“好了歌”就说，我可以解你这个和尚道士的好了歌，他念到：“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笏是什么？就是大臣见皇帝拿的玉，“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就是现在那个破纱又糊在窗上，即穷人的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今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指与薛宝钗结婚，“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指贾宝玉。我看到有一个回目，贾宝玉作了乞丐，抄家，坐牢。“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这个我就不知道指的谁了，但是有一个批注本，就是指薛蟠、贾琏这些狐群狗党，薛蟠就是薛宝钗的哥哥，“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者巷，择膏梁就是选女婿，谁也没有想到流落作了娼妓，这里指的巧姐，你看这个一百二十回本上，写巧姐嫁了个大地主，高鹗虽然贬了她的贵族身份，还是嫁给了一个大地主，“因嫌纱帽小，

改使锁枷杠”，往上爬，这是写贾赦，贾珍他们，荣宁二府，贾珍是宁国府的长子，贾家的儿子，贾敬出家他就是管家的人了。贾敬出了家，老想当圣人，不管家务，任凭他儿子称王称霸，贾政是贾母的二儿子，贾政的妻子就是王夫人。王熙凤是王夫人的内侄女，薛宝钗是王夫人的外甥女，她妹妹的女儿，她是个管家的，这个荣国府统治集团里母党与父党斗争，母党胜利了。因为林黛玉是父党这个系统的，她的母亲就是贾政的妹妹，贾母的女儿。母党父党都争取贾宝玉，但是最后都失败了。“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这是写李纨的贾兰，李纨是贾母的长孙媳妇，贾政和王夫人的长子贾珠之妻，她有一个独生子叫贾兰，他后来做了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反认他乡是故乡”，这说明曹雪芹是汉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地方很明确，到头来汉人为满人做嫁衣裳。

贾宝玉游太虚幻境的时候，我看见有正册、副册，这几册都是很重要的。我先举副册的例子，副册的第一个就是晴雯，作者说“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这就说明晴雯这个人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她是个奴隶，“寿夭多因诽谤生”就是说夭折是因为人家诽谤她迫害她的，“多情公子空牵念”是指贾宝玉，她死的很惨。对袭人怎样说呢？“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她这个名字是从一句唐诗得来的，“花气袭人知昼暖”，是偷袭别人的。

在正册十二钗都有了，我讲头一钗，“可叹停机德”指的是公元前战国时候，乐羊子是个有名的将军，远征以后，无功而回，他的老婆就不织布了，为的是叫他去求功名，“堪怜咏絮才”指

谢道韫，是王羲之的儿媳，谢道韫有“咏絮诗”，这首诗在我给你们的《古诗源》上有。王羲之是著名的书法家，晋朝人，毛主席的字就是吸收他的相当一部分,还有其他人的。“玉带林中挂”，就是黛玉。“金簪雪里埋”就是薛宝钗，作者写到正册上有这么一幅画，画了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地下又有一堆雪，雪中有一股金簪，所以他写这么四句话。他这十二钗正册，十二钗都有诗都有画，你看就明白了，不需讲。秦可卿是贾珍的儿媳妇，她不是病死的，是吊死的，也就是她公公和她发生关系，叫她婆婆碰见了，她跟前有两个丫环也碰见了，因而一个撞死，一个出家。书中说了，宝玉看到一幅画，一座高楼，上有个美人悬梁自尽，这诗就说：“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情天就是讲这个人讲爱情的，她跟贾珍有关系，她也引诱贾宝玉，情天情海是说两个情碰到一块了，一定很淫荡，其实是她那个公公坏透了，秦可卿是出身于下层,她的家庭生活和弟弟秦钟靠她公公接济的,是个可怜的人，这个地方就是说，不要说荣国府尽是高尚的子孙，造衅开端，还是宁国府。底下十二支曲也是证明，另外的所谓十二支曲子，实际上还有个尾声，前头有个引子，共十四支，第十二支就是讲秦可卿，作者说，她长得很漂亮，林黛玉长的很像她，又说林黛玉比她更美，晴雯像林黛玉，风姐说的，十二支曲子就是说他为什么写《红楼梦》了。

曹雪芹这个人基本上不怎么讲迷信，他在结尾有点宿命论，这大概和他的遭遇有点关系，整个十二支曲子都是每一个曲子一个人，我只讲第一支和第二支，这说明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怎么在恋爱问题上要自由，坚决反封建的。第一支曲“误终身”写道：“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

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第二支是“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第一支曲写贾宝玉对林黛玉跟薛宝钗的态度，第二支曲子是贾宝玉与林黛玉恋爱不成。第一支曲子是混合写的，“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举案齐眉是一个典故，是东汉时的，指的是孟光和梁鸿，他们是夫妻两个，非常恩爱的，一个耕地，一个做饭，妻子给丈夫送饭的时候把托碗的盘子，就是案，举起齐眉，这么恭敬，她的丈夫也是恭恭敬敬的站起来托盘，这里是说虽然讨了薛宝钗，心里还是不平，他忘不了林黛玉，他恨薛宝钗。第二支曲子简单的说就是他们两个人互相爱，作者说他两个心想成双成对的人，但是就不行，就有人破坏。

曹雪芹并不是想变天，他是想补天。他有一首诗说：“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他不满意那种官僚制度等等，想去补天，他并不想去推翻王朝，这一点应该肯定，这部书是作者对封建贵族的一首挽歌，他自己说这是“假语村言”。这里头有个坏的官僚，叫贾雨村，贾雨村总想往上爬。那么作者又写了一个叫冷子兴，他是介绍四大家族最厉害的，是一个门子，这是葫芦庵的小和尚跟出去的，到衙门里头作了个门子、门人之类的工作，他知道很多情况。贾雨村做金陵的县官，因薛蟠为香苓打死冯渊，带着妹子扬长而去，贾雨村想判薛蟠的刑，这个门子阻止他，然后就把他弄到后头暗房子里，这个门子就给他说，惹不得这四大家族，在朝里头互相支援，关系多得很，惹了一家，还有另外一家，几家还有更大的亲属，你就完了。他就掏出一个“护

官符”来，上头有这样的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是秦始皇的皇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就是史太君）。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王夫人，王熙凤）。丰年好大雪（薛宝钗家），珍珠如土金如铁”。写他们贵族豪华。贾雨村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这个门子给他说了香苓就是贾雨村的恩人甄士隐的女儿。但是，他不替她报仇伸冤，香苓的身世只有贾雨村知道，香苓原来不叫香苓，这是后来薛宝钗给她的名字，这就是我对《红楼梦》前五回的理解，不一定那么准确，供你和在座的各位参考。

曹雪芹是位伟大的作家，也是语言学家，他的文学简练，你学中文，就必须读《红楼梦》。

《红楼梦》我读了多少遍不记得了，大概七遍以上，到延安以前看过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惨了。毛泽东主席后来批评我，你这么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不过说实话，后面的文字，也确实不好。

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曹雪芹很博学，他对诗歌，歌赋，医学，绘画都懂。

维特克：江青同志是否认为曹雪芹的多才多艺是无人能与相比的？

江青：象他这样的文学家很难的，另外他引证历史书籍、诗词、歌赋都是惊人的，他描写人物很简明，历史知识很丰富，如“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夜就不知引用了多少人的诗词，就考证了很多，我真正考证要查呀，他对中国历史很熟悉，前面讲的“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这两个历史典故，一出在战国，一出在晋朝。贾宝玉不愿意要功名，说只有林妹妹从未这样劝过他。有次贾宝玉还当面骂薛宝钗，曹雪芹写贾宝玉睡觉了，袭人坐在

他床前绣鸳鸯肚兜，薛宝钗去看望贾宝玉，袭人见她来了连忙起身，后在袭人装着有点事要出去，就对薛宝钗说，“好姑娘，你略坐，我出去走走就来”。薛宝钗无耻地坐在袭人坐过的位子上赞她绣鸳鸯。宝玉忽然翻身在梦中唤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为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很吃惊，但装着没事，她和母党合起来陷害林黛玉和好多大小丫头，凤姐是明的，薛宝钗是暗的，袭人也是暗的，她是特务，她密向王夫人、王熙凤告发别人，因而使别人受迫害，遭受摧残而死。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恋爱就是她直接向王夫人告发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节就可以看出贾府的剥削，夜宴开始，芳官唱曲，她唱了一支祝寿的曲，大家都说“打回去，打回去，把你最好的拿出来唱”，她就唱“赏花时”，“翠凤翎毛扎帚叉，陷踏天门扫落花，恁看那风起玉尘砂，猛可的那一层之下，抵多少门外既无涯”（门外既无涯是唐朝大诗人刘禹锡诗的末句）“洞宾呀，这戏是要吕洞宾下凡去渡一人上天，你休要再创斩黄龙一线差，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你与俺高眼向云霞，洞宾呀，你得早些回话，迟迟啊，错教人遗恨碧桃花”。这个诗叫“赏花时”，但是谁的曲子呢？查了很久，查到明朝汤显祖，汤是一个大的贵族戏剧家，剧名是“邯郸梦记”，“春明门外既无涯”是唐朝刘禹锡的诗，丞相宅的牡丹，当时唐朝有两个京城，一在洛阳，一在长安，汤显祖是引用刘禹锡的诗，曹雪芹又引用汤显祖的曲。

这一回小说与薛宝钗抽了签，签上画着一只牡丹，签下有一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宝玉一面听芳官的曲子，一面念叨“任是无情也动人”，但眼看着芳官。

黛玉抽了个什么签呢？芙蓉诗是“莫怨东风当自嗟”（唐诗）。探春抽的签是杏花，“天上碧桃和千牛，四边红杏倚云栽，芙蓉

走在秋江上，莫问东风怨未开”（唐诗）。探春结尾较好，她是贾宝玉父亲小老婆的女儿。

曹雪芹写林黛玉很有学问，但写薛宝钗也是有学问的，有一次过生日，唱醉打山门(水浒传)，贾宝玉装着没有听过薛宝钗说里边有个曲子很好哇，词藻也很好，贾宝玉说好姐姐念念给我听听，这曲子叫“寄生草”，是关汉卿写的，他比但丁还早，比莎士比亚早的作品，五个歌剧，它反映了当时蒙族统治汉族时人们的灾难，“寄生草”中有“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发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别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薛宝钗刚诵完，贾宝玉称好，林黛玉说还没有唱“山门”你就装疯了，说明斗争很激烈，彼此用学问斗。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红学家，我只承认我是半个红学家，这场争论涉及到对祖国的文化财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态度对待她呢？还是采取唯心、形而上学的态度，利己主义、卖国主义的态度对待她？是象奴才一样把她看成带有传记性的小说文学作品？是把她看成批判的现实主义为主，浪漫主义为辅这样一个高度的文学作品，能够表现中国社会，高度概括中国社会，还是把她搞成真人真事，尽是些觅碎的儿女情长这么一部庸俗的东西。是把林黛玉、贾宝玉写成封建阶级的叛逆，还是把林薛合二而一，把林黛玉和薛宝钗说成没有多大差别。事实上林黛玉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而薛宝钗却是封建贵族阶级，是封建贵族阶级利益的捍卫者，而是不择手段的陷害人。林黛玉就是她搞死的，她搞死了好几个人，她和王熙凤、袭人、王夫人合起来，还有她那薛姨妈。

对于这个评论，有些人一直是不服的，那个时候是在党外，到一九六零年左右，在我们党内就形成了几派了。我记得是一九六二年还是一九六三年，正是这两年吧，我在上海，华东局宣传部长（现在证明这个人不好，有叛变行为，当时还不知道），他有一天对我说，现在北京找到大观园了，好多人去看了，某某负责人也去看了，我说那《红楼梦》要改名了，要改成曹雪芹游记，这个人也是个蠢材，他没有听懂，我不理他了。

关于这个部分还要补充一下，在清朝自从他写成书后，就是禁书，越禁越糟糕，大家就抄，不胫而走，抄一部书的几十两银子，为什么那么多的版呢？就是靠的抄本，到了道光年间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有一个大臣，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说要把《红楼梦》当鸦片输出去麻醉外国人，高颚不敢写名字，也是个原因，当然旧社会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他不愿意注他的名字，因为小说当时不是那么好名誉的，叫杂书、闲书。

维特克：当时是否只有《红楼梦》被宣为禁书，还是所有小说都被宣布为禁书？

江青：不是全是政治上宣布为禁书。

维特克：因为是真人真事？

江青：因为这本书动摇了当时统治基础。《金瓶梅》在明朝万历年间也是禁书，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写的。《金瓶梅》也是部了不起的作品，是明朝，但因为赤裸裸写两性关系，所以不能与群众见面，即使删去了节本，还是不能入目，当然在历史上还是应该有它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

#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同志们！

现在，我受党中央的委托，就我们党的章程的修改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修改党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九大党章的修改问题。会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党组织，都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来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这同时，各地党内外群众还直接寄来了许多修改意见。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具体建议，在认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

在讨论修改党章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致认为，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深入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斗争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

---

* 这是王洪文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的胜利，积累了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是十分宝贵的。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

在这个方面，修改草案增写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尽管表现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千真万确的。修改草案根据各地的建议，把“三要三不要”写进了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第一条、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中，还吸收了北京市修改党章座谈会上工农兵同志的意见和有些省、市的建议，增写了“批判修正主义”

的内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个敢不敢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

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草案在总纲部分加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条文部分加了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注意培养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无产阶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单位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

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修正草案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总纲。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熟知的，但也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发扬的问题；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更有一个学习、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

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修改草案在条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话：“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这次修改草案，又写上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务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完全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不称霸”的原则，不做超级大国。全党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百年也不要骄傲，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同时在国内，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相信，全党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去做，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张春桥 姚文元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

## 关于九大路线

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

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

* 这是周恩来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该报告由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志们记得，毛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开幕的时候，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在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毛主席并且预言：“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

全国亿万各族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事实证明，林彪反党集团不过是一小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无碍大局。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被林彪破坏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得到发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加强战备、参加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方面作出了新贡献。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现在已经是由二千八百万党员组成的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人民战胜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财政贸易情况良好。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技术事业，也有许多新成就。

在国际方面，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九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孤立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中美关系有所改进。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推动着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因此，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讲。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目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

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五卷３８０页）

同志们！

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跨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

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

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 关于形势和任务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正是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

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南、老挝、柬埔塞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斗侵略的斗争，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坚持二百海里领海和经济区的斗争，都在继续前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表明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这是它们制造的各种假象掩盖不住的。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所识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不满。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今年六月美苏会谈及其以后的形势，更加证明这一点。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美苏两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国，咬不动；对欧洲、日本，也咬不动，更不要说广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国主义从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它公开承认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从越南撤退。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专家被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非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一系列的事实，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丑恶面目，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做的坏事、丑事越多，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来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等等。这些话，是说给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听的，妄图挑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掩盖新沙皇的真面目。更主要地是说给垄断资本家听的，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这是希特勒的老把戏，只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罢了。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难道要中国把长城以北统统让给苏修，才算表示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中国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应在不受任何威

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于前一种；列宁的判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只要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认清方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硬要发动战争，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的革命，加速它们的灭亡。

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因此，在国际，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

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台湾省是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同志们！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总是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很繁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某些不正之风，还有待努力克服。我们全党要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项工作做好。

首先，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

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希望，经过持久的努力，“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继续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组织要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做好调查研究，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学习毛主席《关于

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要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使那里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各级党委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领导水平。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警惕这种倾向，认真地改变这种作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创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经验，为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这项百年大计经常列入议程。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要经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因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能上能下，经得起几上几下的考验。不论新老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到党和人民需要的任何岗位上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同志们！党的十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将有深远的影响。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全党一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不态辜负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

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论尊儒反法*

上海市委写作组 一九七三年九月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国历史上，历来就存在尊儒反法同尊法反儒两种对立的观点和派别。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尊儒反法思潮的影响，儒法斗争的本质经常被颠倒和掩盖了。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弄清楚儒法斗争的阶级本质，对于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 孔子是坚持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顽固派

儒家的主要代表是孔子。尊儒也就是尊孔。歪曲孔子的阶级性，抹煞孔子思想的阶级内容，是尊儒反法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任何思想家

---

* 此文原载于《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九月刊（创刊号），而后《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红旗》一九七三年第十期、《文汇报》十月二十六日分别转载。原文作者署名为“石仑”，实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该文的创作为姚文元授意。

都只能是一定阶级的代言人，而不可能站在什么超阶级的立场。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种斗争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就成为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孔子生活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激烈大变动的春秋末年，旧的奴隶制度在无数次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正趋于崩溃，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度已经出现，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成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新旧社会的大变动中，孔子坚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成了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他把生产关系的大变革说成是“天下无道”[1]，坚决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任何改革措施。他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2]，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旧制度办事。他公开宣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3]，谁使用我，我就要恢复周朝奴隶制的那一套。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最鲜明地反映了他的奴隶主贵族本位的立场。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孔子所鼓吹的“仁”，深深地打上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烙印，想抹也是抹不掉的。“仁”的概念在奴隶社会早就存在了，本是奴隶主贵族的观念形态。[4]奴隶社会的统治者认为，只有奴隶主是讲“仁”的，奴隶们应该归向“有仁”的奴隶主。孔子说的“仁”就是“爱人”[5]，但决不是爱一切人，更不是爱奴隶，而仅仅是爱奴隶主贵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那种抽象的所谓“爱人”，正好表现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在奴隶社会中，所谓“君子勤礼，小人尽力”[6]，“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7]，也就是说，奴隶主贵族是从事统治的，小人则应老老实实地忍受剥削和压迫。

可见，孔子所说的“仁”，完全是奴隶主阶级的观念。

“仁”的具体阶级内容，集中地反映在“复礼”上。孔子反复地强调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8]。什么是孔子所维护的“礼”?它是奴隶主贵族用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9]的统治工具。对于奴隶来说，“礼，所以整民也”[10]，完全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奴隶主贵族是非常重视这种“礼”的，他们把“礼”视为“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11]，谁敢于“无礼”，就要被镇压，直到被杀掉。总之，“礼”是区分奴隶主和奴隶的贵贱尊卑、确保奴隶主贵族所有权的典章制度，而孔子所说的“礼治”，就是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那时，封建生产关系开始逐步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礼崩乐坏”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是，孔子这个顽固派却死死抱住“礼治”不放，念念不忘“复礼”。他以“好礼”、“爱礼”著称，口口声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2]。在他看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13]，“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4]原来，孔子提倡“复礼”，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犯上作乱”。只要做到这一点，就算达到了“仁”的境界。这一切说明，孔子的思想体系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目的是为了开倒车，恢复西周奴隶制全盛时代的政治制度，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残局。

## 法家和儒家是两个对立的学派

尊儒反法思潮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抹煞儒法的对立斗争，把法家说成是儒家的继承者，把“法治”说成是“礼治”的发展，抹煞和颠倒思想领域内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阶级界限。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个学派，都根源于阶级斗争，都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即使同一学派，随着社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发展变化，也是不断地一分为二的。当然，历史上一个新的学派的兴起，往往是以先前的学派为思想材料的，但这是流，而不是源。考察法家同儒家的关系，同考察任何学派的相互关系一样，必须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说明，而决不能用续宗谱的方法来代替阶级分析，用师承关系来抹煞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法家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并且是在同儒家的激烈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还在春秋末年，随着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法家的先驱者就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儒家的“礼治”思想。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逐渐壮大，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明确提出了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政治主张，并且在魏国、楚国、秦国实行了变法。魏国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权，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经济的发展。楚国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明法审令”[15]，实行“法治”，改变奴隶社会的风俗习惯，并废除了一部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大力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这些说明，法家一开始就执行了同儒家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到了商鞅和孟子的时期，法家和儒家在革新与守旧、“法治”与“礼治”等基本问题上的对立更加尖锐了。商鞅的变法思想，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对法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孟子则是战国时代颂古非今派的主要代表，孟子的

复古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反动学说的进一步发挥，是为奴隶主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的。

商鞅在实行变法前，曾经在变法还是“循礼”的问题上，同秦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奴隶主贵族打起“厚古薄今”的旗号来反对变法，他们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儒家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16]。商鞅针锋相对地提出“厚今薄古”的主张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17]，国家制度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如果不及时变法，拘守旧礼，就一定要灭亡。商鞅认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18]，反对古代的旧制度是无可非议的，而拘守“礼治”则不值得赞美。这场大辩论，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尖锐斗争的反映。

商鞅变法，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都提出了一系列同儒家对立的变革措施。商鞅的“开阡陌封疆”[19]、“变法修刑，内务耕稼”[20]的政策，进一步破坏了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从法律上确认了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同经济基础的变革相适应，商鞅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变法易俗”，取消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了以地区为单位的基层行政机构，以代替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统治。在这个基础上，改造了同封建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国家机构，把秦国分为三十一县，由国王直接派官吏治理，使秦国走上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道路。商鞅变法的实质，是用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扫清道路。

同商鞅等法家直接相对立的孟子，是一个“守旧术，不知世务”[21]的没落奴隶主阶级顽固派。孟子时期，奴隶制政权已支离破碎，正在被新兴地主阶级一块一块地吃掉。没落奴隶主阶级为

了挽救他们的灭顶之灾，对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孟子的思想，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孟子公开反对取消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保存“世臣”、“世禄”制度。他咒骂法家是“民贼”，要求严厉镇压。孟子提出了一整套颂古非今的反动理论，否认封建制比奴隶制优越，认为什么都是古代好，“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22]，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倒退到奴隶社会中去。他竭力用奴隶社会的“古之制”，对抗新兴地主阶级的“今之道”。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仁”的反动思想，提出了“仁政”的复古理论。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23]他认为古代存在过一种人人都有“恒产”、“恒业”的“井田制”，这是“仁政”的理想境界。其实，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们哪来什么“恒产”？至于“恒业”，那就是永远当奴隶。所谓“井田制”，只是孟子对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理想化，其目的就是对抗法家“开阡陌封疆”的政策，以挽救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

在思想领域内，也出现了许多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他们给了孟子时期嚣张一时的儒家思想以重大打击。真是物极必反！荀子是儒家的叛逆者，他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属于法家的，并对儒家各个派别作了一定的批判。韩非则大大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用“法后王”反对儒家的“法先王”，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论证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必然性，系统地批判了“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24]的儒家“显学”，批判了美化古代奴隶制的孟子的“仁政”思想，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根据

法家的理论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并采取了包括统一文字、修筑驰道、废除分封制和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进步措施。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

## “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

古往今来，一切尊儒反法派都把“焚书坑儒”当作秦始皇和法家的一大罪状，充满了恐惧和仇恨。远的不说，近代从资产阶级买办学者胡适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无不大肆攻击“焚书坑儒”，胡说什么这是一场“大劫”。对这个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焚书坑儒”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几百年来儒法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儒家原来对秦国是看不上眼的。春秋时期的秦国，还被看作“夷翟”之邦，儒家势力在秦国是比较薄弱的。“孔子西行不到秦”[25]。这位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忠实代言人，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为挽救腐朽的奴隶主专政而奔走呼号，但恰恰就是忽略了以后统一中国的秦国，真是悔之莫及矣！直到荀子入秦时，还说秦国“无儒”[26]。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儒家开始进入秦国。特别是在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招徕一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生，编了一部《吕氏春秋》，打着“杂家”招牌，大肆宣扬儒家思想，企图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世界观来改造即将建成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从此，失去了原有靠山的儒生源源涌入秦国。秦王朝建立之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

关和文化部门。这样，儒家势力就在秦王朝内部迅速膨胀起来了。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秦统一中国后，新兴的地主阶级虽然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儒家为代表的旧势力还十分顽强，并利用他们霸占的这个世袭领地，大量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企图颠覆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场斗争，即表现为法家与儒家的大论战。论战的中心，是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这是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国家政权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诸侯各自为政，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27]，结束了全国的分裂状态。但是，被推翻的奴隶主贵族坚决反对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他们的政治代表丞相王绾就曾建议恢复分封制。法家著名代表李斯驳斥了这种开倒车的反动主张，指出只有郡县制才是巩固封建王朝的“安宁之术”[28]，如果恢复分封制，就必然要重新导致诸侯“相攻击如仇雠”[29]的分裂和混战局面。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30]，分封制是分裂和内战的根源，坚决否定了分封制，坚持了郡县制。

但是，奴隶主贵族不甘罢休，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秦始皇三十四年，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坚持孔学的一派儒生叫嚣：“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31]，要求复辟殷周的分封制。李斯在一系列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是对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严重威胁。他严厉驳斥了“师古”的主张，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三代之事，

何足法也？”[32]他还进一步指出：“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33]鉴于儒家打着“私学”的幌子，结成死党，在街头巷尾造谣生事，因此李斯提出了“焚书”和禁止“私学”的建议，要求剥夺儒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权。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使天下无以古非今”[34]。这就是所谓“焚书”事件。

禁止儒家“私学”，实行“焚书”，是对坚持孔子思想的一派儒生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他们仍没有停止复辟活动。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竭力诽谤“法治”是“专任狱吏”[35]，攻击中央集权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36]，咒骂秦始皇勤于政事是“贪于权势”[37]，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就迫使秦始皇对这些“诵法孔子”[38]的儒生采取了进一步的镇压措施，亲自选择了“以古非今”情节最严重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把他们“坑之咸阳”。这就是所谓“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事件，是地主阶级在政治思想上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在此以前，商鞅为了巩固变法的成果，就曾提出过“燔诗书而明法令”[39]的主张。以后，有一些关于周代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古代文献，各国“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40]，也被烧掉了。但是，秦始皇以前的国王，都未能象李斯那样了解儒家反动思想的危害性，没有采取坚决镇压的有效措施。可见，新兴地主阶级实行“焚书坑儒”的措施，是总结了秦王朝建立前后政治思想领域内两个阶级的斗争的经验才逐步认识到的。

“焚书坑儒”事件的爆发，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那些顽固坚持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儒生，对新的封建政权采取了对抗的态

度。如果不坚决打击企图复辟的儒家，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国家政权。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华德焚书异同论》）秦始皇所坑的，只是儒生中少数复辟党，同时，书也没有烧光。然而，“焚书坑儒”这个镇压奴隶主复辟的革命行动，到了一千八百多年后的明朝，还“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41]。如果历史上的一次革命行动，能够在几百几千年后还使那些反革命死硬派胆战心惊，岂不令人痛快，岂不是一件大好事！须知，阶级斗争从来是不讲什么仁慈的。倘若让儒家的复辟阴谋得逞，奴隶主卷土重来，他们对法家的镇压，将会比“焚书坑儒”不知残酷多少倍。吴起被乱箭射死，还灭了族；商鞅车裂，全家被杀。这样血淋淋的阶级报复，为什么偏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呢？

秦始皇“焚书坑儒”，击溃了儒家的复辟活动，坚持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在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这一点，连封建时代的进步思想家也看到了。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就鲜明地肯定了法家的进步性，肯定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认为历史不能倒退，奴隶社会的旧制度不能复辟。他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秦始皇死了，秦的制度却存在着。明代王夫之也指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42]郡县制施行了将近二千年而不能改变，如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难道能够这样长期存在着吗？当然，封建割据势力总是力图恢复或部分实行分封制的，但其结果无不造成了分裂和混乱，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证明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法家同儒家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尽管道路是曲折的，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倒退、局部的复辟，但它终究会取得胜利的，在更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它以前，谁也没有力量把它消灭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 尊儒反法思潮说明了什么？

法家为建立地主阶级政权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它自己却经常处于被排斥被咒骂的地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也有类似情况。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是为法国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但后来资产阶级中许多人都骂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残暴”、“恐怖”。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汉袭秦制”。秦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都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他们实际上都是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容，可是又都要打出尊儒反法的旗号，痛骂法家，吹捧孔孟。汉武帝时，根据董仲舒的意见，封建王朝正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同时又“以法制驭下”。当汉元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向他的父亲汉宣帝建议“宜用儒生”，汉宣帝就骂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43]

封建统治阶级打出尊儒反法的旗号来代替尊法反儒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法家主要是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汉代以后，经过吴楚七国之乱，奴隶制复辟的

严重时刻过去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日益加深。陈胜、吴广起义显示了农民的力量，使地主阶级深为震撼。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不再是一个上升的进步的阶级了。它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是进行社会变革，而是全面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主张变革的法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地主阶级政治的需要，而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却同日趋没落的地主阶级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通之处。更重要的是，法家比较暴露，赤裸裸地主张地主阶级专政，阶级面目很鲜明，而儒家比较虚伪，更利于地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欺骗宣传。儒家那套反对任何社会变革，劝人安分守己的反动哲学，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作辩护。就这样，地主阶级打起了尊儒反法的旗帜，转而采用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

但是，地主阶级内部尊儒反法与尊法反儒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自汉武帝以后，日益没落的封建阶级的思想代表，如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曾国藩等，都是尊儒反法的。而地主阶级中主张搞一些革新的人物，如曹操、柳宗元、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等人，却是肯定法家，肯定秦始皇的。曹操为了消灭东汉末年封建军阀割据造成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曾积极主张实行“法治”。他崇尚刑名，立法很严，公开宣称：“吾在军中持法是也”[44]。王安石为了实行变法，也吸收了法家的变革思想。他强调指出：“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45]李贽赞扬秦始皇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是“千古一帝”[46]。所有这些，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守旧和革新的斗争的反映。

在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用革命的实践打击了尊孔思想，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孔运动。洪秀全砸掉了孔子的牌位，把孔

子列为“妖魔”之一，说“孔丘教人之书多错”[47]。这个革命行动，吓得地主阶级的反动头子曾国藩恐惧万状，惊呼道：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48]。这场反孔和尊孔的激烈斗争，是革命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斗争的反映。

尊儒反法问题对于资产阶级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驳斥康有为攻击法家“焚书坑儒”的谬论时，指出清朝统治者“尊事孔子，奉行儒术”，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49]。他宣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50]，并为法家辩护说：“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51]他在不少论文中肯定了法家，肯定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指出“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52]。但是，随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章太炎的思想也明显地倒退了，最后走上了“尊孔读经”的道路。至于胡适，由于他所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早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个尊儒反法派。胡适吹捧孔子是“气象阔大的人物”[53]，说他栖栖皇皇到处奔走，是为了使天下由“无道变成有道”[54]，并大肆攻击法家“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55]，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效劳。

历史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彻底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光辉著作，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反动的孔学。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半封建的文化是要打倒的反动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毛主席又深刻地指出：“现在

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写下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一系列的讨孔檄文，打击了形形色色的尊孔派。他针对攻击“焚书坑儒”的反动观点指出：“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华德焚书异同论》），揭露了尊儒反法思潮的反动实质。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共分子陈伯达之流就把孔子吹捧成“宇宙间之伟人”[56]，叫嚣要继承孔孟的“可贵历史传统”[57]，妄图阻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建国以后，他们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尊儒反法思潮。叛徒刘少奇曾亲自到曲阜向孔子“朝圣”，并再次抛出贩卖孔孟之道的黑《修养》，直接导演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尊孔丑剧。卖国贼林彪也吹捧孔子，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公然标榜要学朱熹的“待人”哲学。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大肆鼓吹尊儒反法思潮，竭力吹捧儒家，诋毁法家，攻击秦始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热衷于吹捧孔子这个古代反动派，目的是为了支持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现代中国的孔子。他们企图从古代反动派那里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请出历史的亡灵来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和颠覆阴谋服务。

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深入开展这场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助于我们识别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怎样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1] 《论语·季氏》

[2] 《论语·尧曰》

[3] 《论语·阳货》

[4] 在孔子以前的不少反映奴隶社会阶级关系的典籍中，都有关于“仁”的记载。《尚书·金縢》：“予仁若考”（仁爱而又顺从祖宗），这里的“仁”是指奴隶主贵族间的相互关系。《诗·郑风》：“洵美且仁”（有真正的美，又有真正的仁爱），这个“仁”也是指的奴隶主贵族间的相互关系。《左传》中关于“仁”的记载更多，例如：“亲仁善邻”（相亲相爱，又能处理好与邻邦的关系）；“仁以接事”（以仁爱的原则办事）；“参和为仁”（和睦共事就是仁），等等，这些材料都说明，“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准则。此外，《国语》中也有不少关于“仁”的记载。

[5] 《论语·颜渊》

[6] 《左传·鲁成公十三年》

[7] 《国语·鲁语上》

[8] 《论语·颜渊》

[9] 《左传·鲁隐公十一年》

[10] 《左传·鲁庄公二十三年》

[11] 《左传·鲁昭公二十五年》

[12] 《论语·颜渊》

[13] 《论语·子路》

[14] 《论语·雍也》

[15]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6] 《史记·商君列传》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史记·秦本纪》

[21] 《盐铁论·论儒》

[22] 《孟子·离娄上》

[23] 《孟子·滕文公上》

[24] 《韩非子·奸劫弑臣》

[25] 韩愈：《石鼓歌》

[26] 《荀子·强国》

[27] 《史记·秦始皇本纪》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

[33] 《史记·李斯列传》

[34] 同上

[35] 《史记·秦始皇本纪》

[36] 同上

[37] 同上

[38] 同上

[39] 《韩非子·和氏》

[40] 《孟子·万章下》

[41] 李贽：《藏书·秦始皇帝》

[42] 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

[43] 《汉书·元帝纪》

[44] 曹操：《遗令》

[45] 王安石：诗《商鞅》

[46] 李贽：《藏书·卷二目录》

[47] 《太平天日》

[48] 曾国藩：《讨粤匪檄》

[49]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50] 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51] 章太炎：《馗书·商鞅》

[52] 章太炎：《秦献记》

[5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54] 同上

[55] 同上

[56] 陈伯达：《原意志》

[57]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 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摘录*

姚文元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

## “批孔”问题[1]

新民主主义论，批尊孔读经。有人不懂，说早就批过了，为什么还批？可结合五四以来几个阶段，加以说明。真正能批孔，用马克思主义批孔，是无产阶级。毛主席，鲁迅是彻底批孔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批孔，几个回合就下去了，批过孔的，后来都尊孔。刘半农，发明“她”字，后来，嘲笑青年人，鲁迅说他是一条清溪水，较浅。钱玄同也如此。除从现实斗争来看要批孔之外，从历史看，批孔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从上层建筑，文化领域，几个阶段，总结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社会主义革命，也打几个回合。这本书有背景，前面讲政治，未点名，但批王明，陈独秀，有一处还讲刘少奇，主席讲也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可以写出来，这期或下期用。青海写，较困难，叫他写作风和路线的关系问题，主题明确。

（有人提自己试写）自己能写，好呀！我赞成，可试写。自

---

* 这是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间姚文元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摘录。自一九六八年八月起，姚文元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写，政治式的，不要太长。肯定文化革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胜利。有人说批林整风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有时可并列，也是在之中。如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和林彪斗争，最根本的问题是林彪改变基本路线，文化大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主要危险仍是修正主义。世界存在帝修反，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分析一下。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批判矛头要指向刘、林和林彪反党集团的谬论，林彪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谬论比较完整。可联系群众中某些错误思想。

前些时候流行谣言，首先是北京传，“扫清宇宙，请进尊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江西把小道消息在高级干部会上传达。主席改为“老帅带路，小兵提升”。江西检查了。

文章要回答为什么要批孔，简要归纳几句，不展开。要讲文化革命，路线，思想斗争。

批孔深如何深入，有三个方面：一、联系现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二、批错误观点，回答一些问题，如十批判书的观点，其他如中华书局那本书，问题如奴隶制代言人为什么成为封建社会圣人？联系对立面思想问题，深入分析；三、未涉及到的领域，教育领域，《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这篇讲得好。如孔子对历史的观点，还有音乐。

孔子哲学讨论集，除个别外，一片捧孔子声，包括关锋、林聿时，表面批，实际捧。说春秋以来，文化不移，孔子顺从这个潮流，开私人讲学之风，办学有唯物论。王关戚还不是右的？这样捧。还提仁学思想体系。仁学中有积极方面，当然，也说进步性有限的。他是折中主义的，为什么不驳一下？书中 95％捧孔子的。文化大革命以来，未清理过。刘少奇发动朝拜以后，一片尊

孔声。这本书值得看看，可见过去影响之深，怪不得留下深刻痕迹。

传达毛主席指示。批孔，你们读一点古代的东西。“十批”还不是古代的，陈独秀从打倒孔子开始，后来跑到托派那里去了。李立三又不能文，又不能武。瞿秋白也是孔子思想。刘少奇、林彪都是尊孔的。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的争论，郭又说孔子是奴隶制圣人，十批判书自称人本主义，孔子也是人本主义。问题是郭不但尊孔，而且反法，国民党也尊儒反法，林彪也尊儒反法。我赞成郭老说历史分期以春秋战国为界，但不能大骂秦始皇。李白的诗讲秦始皇，开头也讲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最后讲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尽想做官，结果充军到贵州，白帝城接到赦令，有名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

不仅批，这里有路线斗争，几个方面要深入，路线深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同波兰共产党的同志谈话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一，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响。”

（一九六八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针对林彪所说“孟子的王道还好一点吧”的谬论，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我赞成孔夫子是代表奴隶制旧贵族，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说法，要给韩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给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人定胜天是荀子第一个提出来的。”

（一九七三年）“十大”以后，九月二十三日主席接见沙菲时谈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史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

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广阔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中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主席指出秦始皇二十二项功劳，粉碎了林彪的进攻。

## 研究《红楼梦》问题[2]

红楼梦。（传达毛主席指示）。有人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没有看怎么知道，没有调查就下评语。我不然，我说是一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两大派，一派胜利，就是雍正，抄失败者的家。红楼梦写四大家族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凤姐讲坐山观虎斗，大有大的难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美苏就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是林黛玉讲的，也是讲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

贾母一死，大家哭，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心事。死了，大家哭，都一样，就没有个性了。死了伤心不同。哭是共性，目的不同，是个性。

要看柳嫂子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59、60、61 回。

柳婶有个女孩五儿，想到宝玉那里去，通过芳官，果然去了。曹雪芹原要写五儿，后来高鹗未写。秦显家的争夺厨房，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出茯苓霜，柳嫂子隔离审查，秦显的女人去管厨房，后台是林之孝，未经批准，就独断专行。后来宝玉、平儿支持柳婶，平儿决狱行权，秦显家的只管了一顿早饭。

要我们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红楼梦，旧红学，新红学，都未写过。

我们还没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红楼梦的文章，联系阶级斗争。例子举一而反三，其他也要如此。

## 关于批判《十批判书》[3]

“十批”中，主要是资产阶级观点束缚，不但有“人民本位”，也有阶级调和的。“剥削阶级代表全民利益”，得出这些结论，是资产阶级观点影响。在座的谁看过“十批”？研究方法受资产阶级观点影响，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书应该出，不出不行，二十四史都出，但旧观点不扫清不行，应搞清楚。“十批”说孔子把人当作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阶级上台，都是对另一个阶级推翻，打倒，讲专政，不是当作人。最文明的无产阶级把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劳动者，死不改悔的关起来，杀，多数改造为新人，把资产阶级的人改造为劳动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把人当人的事，这是受资产阶级观点影响。

十批判书中有些观点可批，但不指名。如“孔子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他想利用文化力量增进人民幸福”。上次讲，这是超阶级观点，人性论观点，抽象地讲人民“幸福”“利益”，都是资产阶级观点。法家也不是代表人民利益，是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仁者爱人”，“克已而为仁的一种利他行为”，过去抗日时期批彭德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孔子的东西。地主阶级、奴隶阶级、资产阶级都没有“克已为人”的，都是搞专政，无抽象的“利他”。西方“利他主义”，费边社，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养成

为大众牺牲精神”，“牺牲自己为大众服务精神”，怎么为大众献身？都是为本阶级服务。还有“增进人的幸福”。不用引号，讲观点。讨论集中也有，多得很。

所谓仁“就是人的发现”，“把自己当成人，把别人当成人”。典型的人性论。修正主义讲“自己活让别人也活”，离开阶级看人。我们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决定意识，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存在决定人的思想，革命要打倒一些阶级，无产阶级要消灭剥削阶级，要改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当机器。地主阶级也不是把被打倒的阶级（奴隶主）当人，每一新兴阶级比前一个阶级有所进步。为什么人性论观点未得到批判，总的是“人本主义”。

还说孔子不要刑法。

讲秦始皇，说打仗都归功于手下大将，要驳一下。里面还列表。我要上海写一短文，讲吕不伟和吕氏春秋，这个问题未谈。十批判书，主席看了五遍，你们看了没有？说打仗主要是王翦的功劳，说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统一是李斯功劳，说 17—26 年灭六国是王氏父子所建立的，王翦、王贲、王离，多半是父子三代的功劳。这问题没有人谈过。这个观点同说打仗是林彪的功劳，彭德怀也吹是他的功劳是一样的。当时名将很多，如廉颇，为什么不能成功？这是政治路线问题，不讲不行。查历史资料。

## 谈《盐铁论》[4]

看了下《盐铁论》，值得一看。里面批孔，相当尖锐。此文是汉昭帝六年，一场大辩论，题目是经济问题，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思想各个方面，是儒法两家在路线问题上一

场激烈争论。王充《论衡》批孔，偏重于批迷信，唯心论，批逻辑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联系当时现实，象《盐铁论》这样大胆的批判，是不多的。上海一篇讲桑弘羊的，批判不多，（计划里的）这一篇是否突出出来。《盐铁论》总结，大夫（桑弘羊）说四条（大论，第 59），讲孔四字：（一）强，是勉强的强，逆潮流而进。孔子治鲁不遂，在齐被赶走，卫不见用，围于匡，困于陈、蔡，“知时不用犹说”，强也。（二）贪：“知困而不能已”，贪也，境遇江河日下，不能“已”，追求功名利禄。（三）愚，“不知见欺而往”，愚也，愚蠢。（四）耻，怕死，“困辱不能死”，耻也。林彪不成功便成仁，困耻而不能死，耻也，无耻。总结四个字，驳孔很尖锐。桑弘羊最后失败，汉昭帝是傀儡皇帝，当权是霍光，桑弘羊被杀，废除烟酒专卖，归地方。批儒家是骗人的能言而不能行。驳得很多，粗翻一下，法家思想很活，桑弘羊是称赞陈胜的。（《盐铁论》的）编者桓宽倾向儒家，每篇用儒作结论，即贤良文学，材料本身显示真理在桑弘羊而不在儒家。

对外涉及打匈奴。桑弘羊主张屯兵，防止匈奴入侵。儒家之徒搞投降，和亲，仁义，不打仗。这个问题这篇写进去也可以，也值得专门写。杨荣国写过王充批儒家的唯心论，那是思想方面。《盐铁论》政治讲得多，王充在他之后，到东汉。

上海写了一篇，在《学习与批判》上。这一篇讲儒法斗争，要讲，但还可专门写一篇。

《盐铁论》本子很多，郭老编了个读本，这是 56 年出的。

王充讲到，两刃相割，利钝乃见。两派斗争，看出谁是谁非。林彪一套，贤良文学都用，如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联系批林容易，可以看出林彪的东西不是新鲜货色，是历代孔孟之徒多次

攻击社会进步阶级、进步集团的，包括地主阶级进步集团。地主资产阶级用以攻击革命阶级，也攻击本阶级内部进步集团，儒家之徒，整个就是这一套，克己复礼，仁义。

《盐铁论》文字不难懂，可以看的。

第 54 段，继承荀子天论精神，信人不信天。儒家之徒拚命讲阴阳，仁义礼智和迷信结合，桑弘羊就不信。他驳儒家“信往疑今，非人自是”，说“日月在天，其征在人”，很大一段。

专门写，结合批林写得尖锐点，尽可能翻成白话。加注解，或用刮弧。杨荣国文章较通俗，一般好懂，文字较平易。上海一篇朝此努力，上次对讲王安石的一篇提意见，不翻译，一般看，要查书。

从《盐铁论》看到儒家之徒非常想做官，爬不上去，搞仁义一套。爬上去，杀起人来，比法家还厉害。这一篇要讲到。江青也讲到，不要看他口讲仁义。

你们看找谁写好。在北京找，改起来方便，大学里找。《盐铁论校注》，56 年版。

## 谈自然科学[5]

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是歪曲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他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主席讲，首先是包括，然后才是不能代替。包括，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制造这个论点其办法是陈伯达在庐山上用的，断章取义。怎能说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没有用呢？马列主义也吸取改造自然科学成果。如说没有用，

对立统一规律，唯物论反映论等，还能不能成立？开门办所，和工农结合，还对不对？还有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关系，也有争论。基础理论是从应用科学来的，公式是实践——理论——实践，不能倒过来（主席同李政道讲话）。要有有说服力的文章，讲清楚。

所谓马列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要有自己钻研，要有亲自试验，才能发言。那么，列宁批判马赫是不是也要有自己的亲自试验，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力学，是不是也要自己去作试验来证明？主席和杨振宁辩论，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没有所谓基本粒子。是不是也要亲自去做实验才能证明。这种论点是根本上否定自然科学方面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过去在自然科学上唯心论许多都是党员，如卢那卡尔斯基。还有一种论点著名科学家不能随便批他唯心主义，恰好，唯心主义代表人物很多都是著名科学家，例如马赫，现在还用马赫数。牛顿也是有名的，自然科学上有名的，有成就的，很多都搞唯心主义。像这些很荒唐的论点，都放到汇报提纲里去了。

# 怎样批邓？[6]

邓的错误路线就是代表资产阶级。

最近接到一些材料，有些论点要继续批判。只有通过批判，才能把路线是非搞清楚，才能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自己。对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仍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历来的政策。作为人民内部的问题，引导的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不会象刘少奇、林彪那样。但有一条，要看

他是不是改。过去说“永不翻案”，这次是大翻案。

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说：“矛头是对着我的。”刘冰两封信都是邓小平同志送的，谁把矛头对着毛主席呢？就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送了不行，第二次又送。问题一开始就很清楚。毛主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要打倒迟群和小谢，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当时毛主席就指出，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随着清华运动的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深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在邓小平同志身上。毛主席说小平偏袒刘冰，就是说他是后台。

修正主义路线中心是“三项指示为纲”。他背着毛主席，不同政治局研究，国务院也不商量，不报告毛主席，自己就讲。过去毛主席就批评他搞独立王国，历来不抓阶级斗争，不抓纲。他不抓阶级斗争，是不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代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讲什么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三项指示为纲，好多文章都批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中主义都批了。他不仅有这些论点，还有教育中有的也批了，科技有些也批了，批胡耀邦、李昌，实际批邓的。他在科学院汇报会上有讲话。还有别的东西。

邓在这几个月讲话很多。在国防工业会上讲，老九不能走。主席根本未讲过。是对外交部的人开玩笑讲的。邓在国防工业会上讲话，讲设工程师有一大段。他说，提不提总工程师，有的说一提就是保守落后的象征，一提就修了，总要有人员，总要有责任制，要有人签名，现在很多文件没有人签名，等等。

工业二十条，未拿出来，此二十条还凶，好厉害。在全面翻

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所谓整顿，不是按主席路线、政策把企业搞好，而是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整顿的结果，在路线上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组织上大批撤换干部。结果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影响生产。铁路本来是好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撤干部，生产搞坏了。

二十条说所有一切专业队伍都撤掉，这样，理论队伍、民兵、文艺队伍，学理论等统统整掉。二十条讲总纲，抄邓的一段话，说三项指示是一切工作的总纲。照他的看法，纲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

邓又说，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既不懂政治，又不懂业务，一味整人，动不动就扣复旧保守的帽子。要把勇敢分子搞掉。邓的意思是指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所谓小知识分子，明明是他们要大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要把革命知识分子整掉。不是讲敢字当头吗？怎么不要勇敢分子了呢？

邓半年来大讲“敢”字当头，讲整顿“软、懒、散”。钢铁会议上大讲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我历来不同意“软、懒、散”的提法，看到就删。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讲这些问题，就没有标准。不是说班子没有战斗力，懒，是好的，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干部有五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所谓“敢”，有具体内容。他所说的“敢”，不是说敢于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是说敢于压群众，敢于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有的人搞革命是软的，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是硬的。最好有一篇文章讲讲。毛主席的五条，党章也有规定，批判那些脱离阶级分析的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向无产阶级进攻。这个问题容易讲。

整顿问题不一定写文章。邓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要敢于整顿，不怕干扰。他半年来“突出一个敢字”。不管老中青三结合，说老虎屁股都要摸，要敢于整，就是不讲路线。

为了纠正这一条错误路线造成结果，要做很多工作。一号文件之后，工作好做得多了。

还有一个论点，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对老工人，有经验的干部，要落实政策，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他们。这种说法完全抹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看党的历史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斗争，是伤害了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吗？这种说法，为历次批判过的机会主义头子翻案。老干部要一分为二，大多数要跟主席干革命的，个别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他说什么“教育危机”，不读书。他就是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的是资产阶级。

你们看看论点很多。

他的这些报告都强调家喻户晓，因此一批判群众就会起来。

这次大辩论的方针，仍是在学校、部分机关搞的，不搞战斗队，要有党的领导，不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也会波及全国。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搞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打内战。现在北大清华走上正轨，有党的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搞无政府主义，现在不是，比较稳妥。

邓接见新西兰记者，谈评水浒。看看主席批水浒是何时。我感觉当时主席考虑就要批右倾翻案风了，邓要引开去。

国内外资产阶级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想赶快复辟资本主义。对他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 关于唐山大地震[7]

批邓不限于地震，地震也是批邓课堂，说明邓小平一系列谬论破产。邓讲物质刺激，但灾区最少物质，积极性很大；邓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物质基础，正好是群众起来，四面八方支援，灾区人民自力更生；说积重难返，雷锋不在，实际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坚强；说软、懒、散，实际很有战斗力，在突然事变面前，能把唐山说是软、懒、散吗？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方面。有的地方派性厉害，但事变来了仍要共同战斗，要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唐山、丰南两篇文章都要说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此次抗震救灾斗争社会主义大院起作用。从路线上看，和 62 年是鲜明对照。那时白猫黑猫，资本主义泛滥。现在经过多次运动，文化大革命，主席路线贯彻了。

这次地震等于一次核战争，经验总结起来对付核战争很有用的。

有些观察到的材料，可以写进文章。英雄事迹，人民日报要继续报道一点，也不能很多。灾区干部，老中青都有一批经得起考验的，表现好的。赤脚医生，可以写进去。

唐山人民英勇无畏无私，报上有报道，原因何在，我们文章要写出来。邓小平说乱、糟、偏，真正碰见大问题，表现都很好，要看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变修怎么办？大风大浪中，涌现出一批人来。地震时，省委第一书记还在解决保定问题，自己搞的，赶快赶去。在困难条件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条件好了之后，如何坚持下去。小靳庄就有规划，震掉了一些私有观念，说震光

了不一定，但震掉了一些。

人们精神面貌好，次要的矛盾让路了。

在困难面前，坚持社会主义，批资批修，自觉性很高的，文章要讲出来。

唐山文章，要写得豪迈，要想到一两年之后，也能坚持下去。事实可以说明，不怕核战争，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地下的都未破坏。未预报出地震局有责任。

全国情况：唐山抗震救灾对大家鼓舞大，对全国教育鼓舞，支援灾区，有地震可能的地方也吸取教训，如山东、山西。阶级斗争方面，有的地方有谣言，包括政治、地震都有，坏分子有活动。第二，有人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要转变纲，去抓生产，这是个别的，属于党内的思想动态。是否仍然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唐山的抗震斗争说明文化大革命深刻意义还是相反？第三，有点忧虑，今年又是天安门事件，又是总理、朱总去世，又是地震，还会不会出什么事？天安门前和阶级敌人斗，战胜天安门广场政治地震，天安门仍壮丽，又战胜自然灾害，好的是主要的，生产好了，以自己努力把灾区损失补回来。考虑全国思想情况写文章。

唐山要写出一篇气壮山河的文章，我们自己写的要写得深刻一些。出版时间可以在月底，也可以早几天。

群测群防，如赤脚医生一样，可以发展，也不是乱发展。

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我们可以支援唐山精神的东西。

对地震的错误观点，地震史文章可以驳一驳。

---

[1] 这部分整理自姚文元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日的谈话、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谈话。

[2] 这部分摘自姚文元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日的谈话。

[3] 这部分第一段摘自姚文元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的谈话，后面段落摘自姚文元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的谈话。

[4] 这部分摘自姚文元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的谈话。

[5] 这部分第一段摘自姚文元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谈话，第二段摘自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的谈话。

[6] 这部分摘自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的谈话。

[7] 这部分摘自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二日的谈话。

#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

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给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触到一些情况，有些省老大难问题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闹，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初期受冲击。如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今天吹一下，希望起这么个作用，就是希望大家能把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指示重温一下。同志们正在学习毛主席最近五次指示的要点，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抽点时间学习讨论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很有必要。

## 一 为什么要正确对待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因为文化大革命这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件大事。同志们都知道，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都把文化大革命写上了，而且写进了党章。党的代表大会作了决定

* 这是王洪文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央读书班上的报告。

的事，全体党员都应该照着去做，而且应该做好。新的一年开始了，国际国内形势很好。对革命来说，形势一片大好。我们要发展这个大好形势，把革命和生产都搞上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大好形势下把我们国内的事情办好，把根据地建设好。要解决一些省、市的问题。首先要解决路线问题，把路线搞对头。主要是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从历史看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从现实意义看也是完全必要的，捍卫文化大革命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高中级干部更应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

为了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首先要重新学习一下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重要指示，这是我们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纲。现在有些人把毛主席这些指示忘记了。现在有少数地区，还搞资产阶级专政。

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刚刚揭开，即批判《海瑞罢官》时，毛主席就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明确地指出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决不是单纯学术讨论。运动初期有些人就上了当，以为这是纯学术讨论，实际不是。在刘少奇指示下，彭真一伙跳出来搞了一个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这实际上是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妄图把运动引向纯学术讨论的资产阶级轨道。毛主席毅然决然地叫彭真一伙靠了边，同时指出旧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机关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这里干坏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在杭州对许世友同志谈话时还讲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主席

反复讲了这个问题。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作许多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的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指示已经发表了。这些指示非常重要，但是九大、十大，有些人就忘记了，有些人就不承认有走资派了。

广大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时刘少奇一伙慌了手脚，急忙炮制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镇压群众，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六条》，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这样轰轰烈烈的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了。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鼓励革命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这同时，毛主席对广大干部也非常关心，亲切地指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毛主席亲切希望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扬光荣传统，保持革命晚节，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大好形势。当一九六七年来临时，

主席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讲：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就坚决支持了上海的工人运动，支持上海工人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工人运动起来了，主席很高兴，《十六条》讲，青少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运动起来了，主席很高兴，当时派了中央领导同志（张春桥同志）去上海支持工人运动，处理安亭事件，同意工人群众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毛主席指示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到一九六六年底，毛主席又指出：上海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驻沪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展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斗争。这不只是上海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夺权的。不然，这个权是夺不过来的。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常委会，热情支持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斗争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又向全军发出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毛主席还亲自总结了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并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在上海一月夺权，打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时，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贺电，指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命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毛主席亲自视察了三大区，对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高兴地指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同志们现在回顾一下，毛主席这些指示是多么重要！当时是第九次路线斗争，接着就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往往当时并不很理解，没有都懂，而是经过一段才理解了。我们很有必要学习毛主席这些指示，这对于提高我们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很重要。最近中央准备把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编一本印发，只有把主席的指示学懂了，才能识别那些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是修正主义的，有利于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为什么讲这么一段？因为现在党内有些同志不理解，主要是在这一段。

#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从上边毛主席一系列指示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是下了很大决心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现在这个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

首先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接着又粉碎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最大的胜利。同时，文化大革命锻炼了广大干部、锻炼了广大群众，促进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这个很多同志看到了，但有少数人看不到。特别是出现了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这个运动正在逐步深入。八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这段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要是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会怎样？

最近中央准备发一个材料，即《林彪与孔孟之道》（一九七四年壹号中央文件），发给全党，准备批判。林彪、叶群夫妻两个，加一个陈伯达，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这个材料给那些工作的同志谈了一下，大家感到很气愤。

关于这场政治大革命，国内国外的阶级敌人必然要百般攻击，这是毫不奇怪的，蒋介石不是天天的骂文化大革命？苏修的报纸、电台也骂了七、八年了。林彪在"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中用苏修的语言骂我们。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得是对的，搞得是好的。我

们的批孔运动一深入，蒋介石、南朝鲜、南越、苏修又都大骂我们批孔。这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我们队伍内部包括党内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象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象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十大党章中，党的决议中讲，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完全没有必要搞，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的。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意思是说，在这里看不到，在那里看不到，加在一起全看不到，那还有什么必要呢？前边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最大的胜利，怎么能看不到呢？要说看不到，就把自己置于全党全国人民之外了。刘少奇、林彪一伙要上台，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中国就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去，就会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成千上万的人头就要落地。到那时你还说看不到？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不仅从全国来看是必要的，及时的，从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单位来看，也是必要的及时的。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在那一个单位都有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多数地方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有的地方，修正主义路线是相当厉害的，如旧中宣部、中联部，两个重要的部都不在我们手里。不要说被资产阶级专了多少年政的文教战线了。就拿工业战线来说，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还是很深的，文化大革命后好多年了，专家治厂、管、卡、压，洋奴哲学这一套不搞掉，

工人阶级怎能成为工厂的主人呢？社会主义的生产怎么能搞上去呢？正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我们的钢铁生产才十年徘徊。有些企业形式上是在我们手里，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代理人手里，有的甚至在资本家手里（上海有一批厂，实际还是资本家当厂长）。在这样一些单位，如不来这场革命，怎么行呢？怎么能把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呢？毛主席高瞻远瞩，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一次还不行。现在有些省、市个别单位，问题比较多，关键是领导的问题，不能怪群众，不是群众不好，关键问题是领导。当然不是说那些人都是坏人，有些是好人，但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或者半修正主义的，一旦把这些问题指出来，这些同志是会改正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有些地方的问题应该解决了。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把原因找对头，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些不分青红皂白，把一些单位的坏事统统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是错误的。这本来是修正主义的后遗症，怎么能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呢？这些问题恰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那些地方路线不对头，那些地方就不能团结广大的群众和干部，坏人就挖不出来，有些是批林整风搞不起来。最近我们解决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深入批林，关键就在这里。我们认为，只要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大同××厂闹了几年，这次两个月就解决了。主要是原来的路线搞错了。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单位有坏人捣乱。但也要发动群众，把坏人孤立起来。把这些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实际上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再搬出来，那就会越搞越乱。江西省委有人就在干部会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把小兵全打下去了。最近看到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

造反了，把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压而不服”，这是一条真理。我们同江西一些领导同志当面说过，你们那里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十大以前谈过，十大中也谈过，但没有用。不过也不要担心，中央是知道这些事的。

还有人讲：“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就是说不能搞“四大”，不能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们不主张直接发动亿万革命群众，不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无非是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否定了这些，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实说，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把刘少奇这样一个藏得很深的叛徒挖出来呢？对刘少奇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历史问题，过去我们并不完全掌握，刘少奇的叛徒问题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到处查，搞出来的（当然对他的公开发表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是掌握的），同时，文化大革命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把他粉碎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形式，怎么会出现革委会，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呢？不可能。工农业生产也不会发展这么快。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不可能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文化大革命作为新生事物，它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毛主席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就是说要发动群众。现在，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

示，在有些地方，到个别人的那里就卡住了，不告诉群众。有的给群众讲时，那些是主席的话，中央的话，那些是自己的话，搞不清。

有些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后群众不听话了，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不很好吗？其实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个胜利。毛主席历来指示，我们党内生活要生动活泼，朝气蓬勃，不要搞得那么死死板板的。主席对王海容同志的谈话，说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打瞌睡，看小说，有人很不理解，我体会就是不要把学生搞得太死了，号召学生要敢于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

部队也有这样的问题，叫无条件服从命令，绝对服从。其实也是有条件的，就是服从你。服从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服从，不符合的就造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执行上级指示，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有些人对这类事看不惯，主要是怕战士难管，爱提意见，这是很显然的。要路线对头，执行正确的路线，正确的命令，不正确的就不能执行。现在部队出政治事故，主要是对战士的教育简单粗暴，不作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结果闹成堆，使矛盾激化。这里的关键也是个路线问题，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现在形势发展了，要研究政治思想工作怎么做。完全用过去那一套吃不开了。

这些事，在我们看来是好事，有些人不这样看。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兵是各项事业的主人，这一点不能忘记。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我们应当欢迎李庆霖、张铁生这样的人，敢于反潮流，敢于向上级反映问题。我们应赞扬这样一种精神。包括最近报上登的两个小同学，一个叫黄帅，一个是广东的，先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

要求支持，写得很有水平，很有感情。我们看了觉得应该支持。

主席最近又讲，牛为什么长两只角？就是要斗争。这个话一九五五年就讲过了。毛主席还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呢？要少吹多批。我们就是要靠头上长了两只角，敢于造修正主义反的工农兵群众。有些单位对十大提倡要运用“四大”武器怕得要命，到现在还不敢组织群众学习，群众起来搞“四大”，反潮流，我们应该赞扬，为什么要害怕呢？只有搞修正主义的人，才怕搞“四大”。凡是搞马列主义的，就应该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些人对毛主席这句话是听不进去的，他们就喜欢压，压不服就抓。

有人讲：“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中七斗八斗。”这话不对，这样说，也不符合老干部的心愿。应当说，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过去南征北战，有的负过伤。但他们并不因此就以为自己可以脱离群众，就以为自己可以摆官架子，而是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发现自己有错误缺点，就作自我批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这样的老干部不是一个、二个，而是一批。这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正代表。至于有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比较多，这是要具体分析的。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时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得，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象毛主席指出的这些人，为什

么就不可以批判一下呢？你可以训人家，群众为什么就不可以批评你一下呢？主席这些指示，本来是大家很熟悉的，但有人忘记了。这里弄得很狼狈的干部，也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从积极的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改了，坏事变成好事，取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成了真正受群众信任的好干部。这样的老干部不少，如上海的马天水同志，文化大革命后精神面貌不一样了，更加深入群众了，路线也对头了。

另一种情况是从消极方面总结教训，在群众面前扭扭捏捏，缩手缩脚。实际上还是脱离群众，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还有一种人，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关系到国家变不变颜色的事根本不想，面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江西省的干部就是如此。这样整的结果，势必整到自己的头上。三气不改，总是要摔跤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现在解放出来，将来还得被打倒。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帐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出气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要向这样的同志大喝一声同志！太危险了，人民群众欠了你什么帐呢？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要是一定向群众讨帐的话，群众就有权把你的权再夺回来。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不是极右而是极左，其实林彪修正主义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右得不能再右了。但不久前某一个大学有人说："极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不明是所谓"十七年功过谁与评说？"评过了，中央下发

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已早评说过了。就是说教育战线上十七年来基本没有执行主席路线，被修正主义路线专了政。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中说：北大清华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现在有人说这个纪要不灵了，说这个纪要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把这些屁话到处吹。对某些人来说，批极“左”，批林彪是假的，批文化大革命才是真的。我们的结论：“极右不批，是非不明”。当前，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要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不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断然不可能的。去年有一个单位写了一篇文章，说那个单位的青年都是极“左”分子。把青年说得一无是处，全都是坏的。如果这样，中国革命的希望在那儿，我们的班交给谁？中央在几个省召开团代会的报告上批示，指出大多数青年是好的。否则我们的革命就没有前途了，就不光明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传播反革命谣言。如“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不管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通通都归位，包括刘少奇也要请回来，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要统统打回去。这是典型的复旧，或者说复辟，也可以说是反攻倒算。这个谣言是从部队的两个高级干部那里传来的。传播这些东西是很坏的。象这样的反革命谣言，江西省还当作主席的指示在几百人干部会上传。这些怪事，也不怪，原因就在于我们一些干部头脑存在着谣言市场，谣言到手，立即贩卖，因此，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就不奇怪。有些不是坏人，但思想上早已解除了武装，那有辩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最近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兵带路，小兵提升。”毛主席的指示充分体现了在干部问题上的革命路线，我们应当发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帮、带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要大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不发挥干部的作用是错误的。但一讲老干部就论资排辈，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中的表现，也是错误的。过去南征北战，能打仗，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和表现。如果思想是修正主义的，能为无产阶级打好仗吗？我不相信。特别是在重大的关键时刻，考虑干部不应当光看历史，不看现实。主要的还是要看他在路线斗争中的觉悟，不管是地方的，还是军队的，老的，新的干部都应当这样看。

老干部犯错误要一看二帮，允许改正。对新干部也应该这样。但现在有的地方老干部犯了错误可以一看二帮，允许改正，解放了。但新干部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为什么老干部犯错误都可以教育，新干部就不能教育；就要打下去呢？这不公平嘛！不利于党的团结嘛！毛主席最近批评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指出：你们那个十几岁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那么高明？当然新干部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翘尾巴。要尊重老干部，向老干部学习。老干部要传、帮、带，新干部也有个接受传、帮、带的问题。

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措施，是百年大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大事抓好，从上到下地培养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地方阻力小一些，军队阻力大一些。我就主张找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当大军区的副司令员。

关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个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说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彭真的二月提纲，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都是要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林彪在本质上也搞了一条同刘少奇一样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伙同陈伯达在九大前搞了一个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报告，说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妄图以合法的形式对文化大

革命实行反攻倒算。毛主席否定了这个政治报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坚持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九大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斗、批、改运动正在继续深入。但文化大革命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还没有结束，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的翻案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如新疆的龙书金，四川的×××，河南的王新，都是这样干的。他们转移批陈和批林的斗争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这样作法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今后还会有。毛主席最近讲，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要看十年。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同志们最近看批孔的文章。讲秦始皇搞了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一场革命，被骂了两千多年，何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当然有人要骂，要准备十年，几十年后还会有人出来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几千年了，还有人崇拜。秦始皇当时还是革命的，结果被骂了两千多年。

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党的九大和十大这不是一般的问题，就是要搞修正主义，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我就是这样认识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要搞资产阶级专政。同志们不要以为现在没有走资派了。不对，有的地方刮起了一股风，说今后没有走资派了，甚至连“走资派”三个字都不能提了。有的地方在讨论修改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走资派，真是奇谈怪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资产阶级就会到党内找代理人，就会有走资派。如果没有走资派，那连过去的一切运动都要否定掉。三反、五反运动，五七年的反右派，五九年反右倾，还有四清运动，这些统统要否定。因此，坚持要写在党章上。这是大事情不是一般问题。至于有些

人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经过帮助已经改了，改了好嘛！但不能因为改了，就不存在走资派了。走资派不仅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少数人到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这些话那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共产党宣言》就是造反宣言。现在是毛主席领导我们造反。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说对了。共产党人就是造反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造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这有什么不好！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有什么不好呢？有的人过去是造反派，现在也骂造反派，可见他的思想变了，忘记了过去。过去打土豪分田地，难道不是造反？打日本不是造反？打蒋介石不是造反？不是造反那是什么呢？有些人把这些都忘了。当然一场大革命，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造反派中混进少数坏人，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最初组织工农红军时，就不那么纯嘛！不可能。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怎么能骂造反派没有好人呢？说造反派无好人岂不也否定了自己！他忘记了是谁带着我们造反，忘记了造反派的老祖宗。一个共产党员，不造旧世界的反，你要干什么？一个共产党员说这样的话，意味着对共产党的背叛！共产党员就是要造反，造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作为人民的内部矛盾问题，认识问题提出来的，也要从世界观上找原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一番，有少数人可能改造不过来。两类矛盾可以转化，有的向好的方面转化，有的向坏的方面转化。有的对错误认识了，好转一些，或者完全变过来，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

矛盾，有的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

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不是把文化大革命看成解放以来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好象是晴天霹雳一样，一个早上爆发的，甚至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误会，非常反动。他们有一整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误会。”这是思想问题还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他们既然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一场大误会，就对当前的一切看不惯，总是等呀、等呀，等到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就好。他们把发展不是看成螺旋式的上升，而只是看成在一个封了口的圆圈里打转转。在工厂他们实行管、卡、压，在学校里把智学第一的一套搬出来。总之，一切都照老格式重做一遍，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是一种典型的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向前运动发展中。这些主张复旧的人，口头上承认辩证法，实际上反对辩证法的，一提到企业管理，就主张把被群众冲掉的旧的规章制度全恢复起来，热衷于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等。他们说，这样可以调动积极性，他们就没有想想中国革命几十年靠的是什么？是靠奖金，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吗？不是，我们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亿万革命群众，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如果说搞物质刺激，苏修搞得很厉害，搞得工业停滞，内外交困，如果那东西灵的话；列宁格勒工人为什么要造反呢？文化大革命是靠物质刺激，还是靠群众的觉悟，还是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当然不是说不关心群众生活，但关心群众生活同搞物质刺激是两回事，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在技术革新、机械化方面想办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搞计件工资、奖金，这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莫大侮辱，我们的铁道兵修了那么多铁路，靠

的是计件工资？这些战士一个月拿八元钱，没有奖金，这完全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部门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中央两个部就是搞这个，到上海去试点，被工人赶出来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我在这里吹一吹，希读书班的同志回去，在这些部门，要组织斗争，起码要向中央反映些情况，有些地方提出来，能不能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规章制度？在计划会议上，有人回答得很干脆，说不能，他讲了三种情况，第一，管、卡、压的那一套我们反对；第二，搞奖金挂帅的我们反对；第三，过去是正确的一旦现在生产发展了也不能把老一套原封不动地搬进来套，就象成人不能再穿小孩子的衣服一样。这个工人很懂得辩证法，他讲的就是对，事物发展了，我们领导的思想和工作要跟上去，适应新的形势，我们要坚决反对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现在有些人就是想倒退。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我们要把批林整风运动深入搞下去，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全面的鼓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一切守旧的家伙都吹捧孔子，林彪是当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也必须结合起来，要打倒我们头脑中的"孔家店"。孔子生活在中国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仇恨社会变革，死命推行奴隶制，反对封建制度，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孔子在鲁国当宰相时，上台七天就杀了革新派的少正卯，他的学生冉求有革新思想，他就挑动另一部分学生鸣鼓而攻之。主席说：孔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作风，由于他倒行逆施，上台三个月就下了台。他虽然下台了，但复辟之心不死，他到处游说，看到大好形势，就叫喊"礼崩乐坏"，认为是坏事，昨天人民日报发的哲军的文章，希望大

家好好看一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有些人对马列主义没有感情，对修正主义却留恋顾盼，脉脉含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看不惯，对旧东西却非常留恋。

毛主席说："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对旧事物那么留恋呢？这是我们在座的同志应好好研究的问题，我主要是想提倡同志们好好学习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牢牢记住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三个原则。毛主席最近还说，中国如果要出修正主义，同志们要注意呀。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也不议政。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适应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各方面，就是告诉我们要抓大事，学习讨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这就是大事，很值得同志们议一议，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最近多次指示并亲自指挥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是要我们牢牢记住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有正确的理解，以便更好地贯彻十大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关于批“走后门”问题的讲话*

江青 迟群 谢静宜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迟群：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

江青：请同志们好好想一想，现在走后门猖狂到了什么程度。上大学、参军，没有门路根本进不了学校和部队，不给当官的送礼，不走歪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的几个老帅、老将，光他们写的条子就够一个营、一个团，把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完全变成了后门兵、后门大学。这样下去，我们的工农群众能答应吗？我主张彻底关闭后门，在这场批林批孔中要当作大事大抓。

迟群：所以当时江青同志要了一份关于南京一个大学生（的材料）走了，叫钟志民，就是一份申请退学的书了，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们是在路上听到了广播发表了这个消息，那个按语说得很好。讲了两条，根本问题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还是要

* 这段讲话摘录自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讲话记录稿。自一九七〇年开始推行工农兵学员推荐制以来，“走后门”问题日渐严重。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干部子弟钟志民拒绝父母“走后门”的安排，要求退学一事，而后“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口号被提出。一月三十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同志点名指责叶剑英“走后门”，同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写信作检讨，实则是告状。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回复叶剑英：“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走后门”问题应该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搞修正主义的问题，那批孔，孔老二就是嘛，学而优则仕嘛，我们有的人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私有财产，看成是商品了。

江青：叫钟志民。他的父母现在接受儿子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我们也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迟群：当时关于钟志民的问题，总理也有批示。就是当时他们叫说是退学，但是省里头决定，说是还保留他，在学校里学习，保留，就是继续学习。后来我们给他们打招呼，你既然申请退学，要造反你就彻底造反，不要人家造反，还不让人家造反。至于走后门问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有的单位，问题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很值得检查，那里首先就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的一个孩子，是走后门进去的，所以我们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开了常委会的，在书记当中也专门作了研究，坚决退回，从一外退回来。但是，不光这一个人。所以，要想到我们的教育战线现在有一亿七千多万人，你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就不得了，它关系到上山下乡的问题，关系到一些人参军、招工、上大学等等，我们接班人的培养的问题。希望错了纠正，纠正的越快越好。另外，还有的单位，有一些个扯皮的问题，但是看我们正确与否，就是看我们是否执行了主席的路线，你是否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没有做到这一点，谈不到正确，没有做到这一点，说别的统统是屁话！你什么正确，你正确你团结不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谢静宜：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啊，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它严重地破坏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破坏我党的优良传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下面搞座谈的时候，以及我们在底下到学校的，在学校的工作，我们经常碰到的是这些问题，群众极其不满意呀。走后门这

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持不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个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谢静宜：可是某一个领导人，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当兵上大学，什么一个批示，一点头啊，一个电话，比主席的批示都重要哎。这是为什么？几千年的封资修的流毒，孔老二的一些流毒，旧的习惯势力，还有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裙带关系，把一些人就给俘虏了，这些关系超过了阶级关系，超过了政治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我们的干部要坚持原则，要不受捧，不受压，不受软硬兼施这一套东西。

## 附：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

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

（这一文件发到县、团级、可向基层群众传达）

# 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江青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

有几个问题我想提出来和同志们商量讨论，跑专家商量商量。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刚才这个女同志年龄虽小，她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历史知识是很菲薄的。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但程度不同，都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孔老二那一套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后来被他的徒子徒孙粉饰起来的，完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吹鼓手，是过街的耗子人人喊打，他到过很多国家，想作官，到处都不要他，好容易在鲁国当了官。他本来不是鲁国的人，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叫孔父佳，是宋国的后代，是第几代记不清了。孔老二的父亲叫叔梁纥，是个没落的贵族子弟。孔老二到处想作官，到处劝人家要恢复奴隶制。那时候，春秋战国时期，经济上不平衡，有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的

经济，有的是落后的反动的奴隶制，所以在历史分期上我们的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功的。在尊孔问题上，他有点问题，特别是对秦始皇的看法上有些问题。他有一本书，叫做《奴隶制时代》，是值得看一看的。主席肯定这一本书，就是说中国奴隶制跟封建制的分界是春秋战国，这是对的。我看历史材料跟专家比起来看得少得多了，主席说郭老这一功是肯定的。

实际上，四书五经起到了束缚人们的思想的作用，最大的束缚人们的思想的还是宋朝，就是程朱理学，就是程颐、程颢、朱熹，他们是理学家。从宋朝以后，做官要用四书五经作考试，人就不要自己去想了，所谓十年寒窗就是自己去背四书五经，学了以后思想很受束缚。最近，《参考消息》上（同志们有参考消息吗？大家答有）有篇英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很长，他说，欧洲人的科学是从中国的古典的科学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们祖国的天文学最早了，指南针、造纸、火药、排字，这都是很早的，还有炼丹，从炼丹发展到火药。火药，欧洲原来是没有的，怎么到的欧洲呢？成吉思汗不是一直打到莫斯科，打到欧洲匈牙利嘛，同志们知道吗？这样就把我们汉族发明的火药带过去了。比如足球，宋朝就踢，这是我看《聊斋》知道的。就是说，不要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也不要肯定得过分，过分了就象主席批评我们的成了大国沙文主义了。对自己的祖先有哪些好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全部否定是不对的，当然全部肯定更是错误的。《参考消息》上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影响，有一些说的是不错的，有一些说得有遗漏，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学者，工农兵集中起来，整理起来。

我建议全国各省市都要建天文馆，这不仅对儿童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也很需要。北京的天文馆什么东西都是外国人的，只

有一幅是中国的，其实这一幅也是错误的。你们天津建立天文馆，应该着重从历史上整理我们自己的。二十四史同志们看一看，对天文学记载特别多。

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听到薛清泉同志讲到的孔子修《春秋》的问题。这本书可能是假的，我没有考证，据说是后来人搞的，当时他可能有这个意思。这一点请专家来考证。《论语》也不是孔老二写的，也是后来他的徒弟写的，他有那些话，他的徒弟给他记载下来的。《春秋》也不是孔老二亲自搞的，可能他有这个思想，传下来的。时代的问题不要说死，我们还要做一些工作。

刚才讲到“星火燎原”的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主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主席写给林彪的信，是主席批评林彪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林彪要主席改掉许多话，现在《毛选》上的不是那时候的东西了，我找到原来的东西看了，批评得很厉害。刚才那位同志批到：林彪的“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但是没有讲到这个情况，我补充一下。

奴隶、农奴、农民是有区别的，奴隶跟农奴有区别，农奴跟农民有区别，刚才那个同志提出西藏电影《农奴》就是奴隶，要注意奴隶、农奴、农民的区别。奴隶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而且带着枷锁，就是在井田上劳动，而他们本身是那样的不值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要四个奴隶一束干肉，才能换一匹马，殉葬的就很多了。刚才说的郭老的那本书，就有大量的证明。现在出土的大量材料更说明这个问题。农奴，就稍微好一点，就是不带枷锁了，个别的也有殉葬的。后来搞殉葬，大量的是做假人，就是墓里挖出来的俑。在我们家乡，我小的时候看到做童男童女，

也是一种殉葬的意思。解放以前，我家乡的土地还残存着“圈地”的痕迹，不象江南，当然这是极少数的。我的家乡主要是实物地租，江南是交货币地租。在我们那里地契都刻在地主的房基石上。在土改时候，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不敢要，问我们，你们分大地，房屋是真是假？我们说是真的。他们说你们跟我走，就到了地主房前，把房子扒开一看，房基石上都刻着×××欠我多少租子。农民，农奴，奴隶这三种东西不能混淆。西藏的农奴，就是比较偏向于奴隶制的，但是他们不等于完全的奴隶，不是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一些兄弟民族如海南岛，解放的时候，还是刀耕火种，就是用一把刀耕地，放一把火烧了草当肥料，就种田，单位面积产量很少，现在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海南岛收获三季，如果有水的话，恐怕四季都可以。水不够，东部，北部好一些。

解放以后，在汉民族帮助下，少数民族很快摆脱了类似奴隶制或者农奴制，一下子就过渡了，当然经过一个民主改革了。最近一、二年前还进行了人民公社化，现在合作化基本上搞完了。有些地方还残存着个体生产，象黑龙江、江西的山上，也有一家一户开荒种地的，这是少数，例外。整个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

我建议同志们看两篇文章，就是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原来登在十五日北京日报上，我当天就批给《人民日报》转载，十六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我看你们今天也转载了。现在人民日报又出第二篇了，我刚收到还没来得及细看。第一篇先秦的，也有遗漏，第二篇从秦始皇一直到西汉，有一部分没有写全，主要的代表人物写上了。有不少的遗漏，有一些缺点。

刚才薛清泉同志讲秦始皇是有功勋的。我想，他的功勋还不

单是郡县制，他统一全中国，实现郡县制，统一中国的文字，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等等，都是很先进的。我最近在《文物》上看到，商鞅变法用的斗是长方形的，现在出土了，秦始皇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改的。

还有一点同志们也要知道，所谓西周，就是指文王、武王。武王伐纣，他名义上统一了，实际上有八百诸侯。到了春秋战国时候，就是七雄，这在中国发展史上就是很大的进步。而秦始皇能够消灭六国，统一全中国，是了不得的。筑长城的不单是秦始皇，而是到了秦始皇时是大量的修。同志们看到八达岭吧，见了长城吧，我到过雁门关，沿着长城走过，很了不起，是很大的工程，是抵抗外来侵略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先进的农业国家，要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犯。当时顶住了匈奴的侵犯，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秦始皇的时候，就存在着匈奴，还有其他游牧民族，还有那些反动的，没落的奴隶主，一直到汉代初期还有很大的奴隶主。刘邦分封了同姓王，异姓王都干掉了。当时最大的是吴王濞。当时也存在着不平衡，四川的大奴隶主卓王孙（有个卓文君大家知道吧，她是司马相如的老婆，是卓王孙的女儿），他家有家奴一万，我们讲的一万是个数目字，可能还不止。吕不韦也有家奴一万。

自从我们进入批林批孔，世界上都很震动。苏修是尊孔的，拼命骂我们，美帝还不这样。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震动得很厉害。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日本的友好人士，来了说：不得了了，你们批孔老二，我们受不了。一个友好人士说：你们这么搞，我们受不住了，批到我们这儿来了。还有回教，批孔对他们也有影响，有人说“汉族兄弟批了他们的圣人，也批了我们的圣人，我们的穆汉默德也是这样”。对基督教也有

影响。欧洲的朋友说，他们那儿也有圣人，都受影响。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都受影响，有的跟着批孔，有的反对批孔，日本的反动组织青岚会反对我们批孔，苏修最卖力了。所以不要以为批林批孔这只是中国的斗争，现在是涉及到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大斗争。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跟中国人学，都是学的四书五经，孔老二是“大圣人”，你们怎么批起圣人来了？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荆柯刺秦王。当时燕太子丹要报仇，他是没落的奴隶主的头子。太子丹有一个征求人才的黄金台，荆轲是很反动的侠客，是个小丑，他一定要找一个人作助手，这个人叫秦舞阳。当时为什么要搞“图穷匕首见”？因为秦王在殿上，卫士在殿下，荆轲刺秦王，秦王跑到柱子后边，荆轲没有刺着，卫士就跑上去了。实际上荆轲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小丑。我们一个电影叫“狼牙山五壮士”，本来五壮士是非常英雄的，牺牲了三个，剩下两个，但是，电影还弄得凄凄惨惨的，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把五壮士比做荆轲，这是不对的。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秦始皇的时候。当时，儒、法对立一面是秦始皇、李斯，那一面是吕不韦、嫪毐以及没落的，搞复辟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就是皇帝的亲戚朋友、内戚、外戚。吕不韦不是秦国人，是赵国人。那时候，秦国有一个公子叫异人，被质于赵。吕不韦是大商人，他看到异人便和自己父亲说，这人奇货可居。吕不韦就要在异人身上投资，把他弄到他家去，把他的赵姬给异人做老婆。后来，他又到秦国去，买通了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要她把这个异人做为她的儿子，将来年老气衰就可以巩固她的位置。当时华阳夫人接收了异人为儿子。秦王死去后，就把异人接回去了，做秦王。异人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很年轻的时候就当政了。吕不韦为仲父，他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搞

了一部书叫做《吕氏春秋》。我建议同志们很好地看一下那篇文章，就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吕不韦勾结没落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内戚，一块搞政变，被秦始皇扑灭了。然后秦始皇任用李斯。

为什么秦始皇死了以后，秦就亡了呢？因为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信奉儒，秦始皇不喜欢，就派他到大将军蒙恬那里守卫边疆。秦始皇死在路上，政权落到宦官赵高手里，这是秦覆灭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个剥削阶级代表，封建帝王，有对人民剥削压迫的一面。要看到他的功勋，同时要看到他的剥削。同时他杀人太少。他迁了几十万户豪强到咸阳，把很多儒都养起来了。他坑的知识分子是儒家的一派，就是胡说八道搞政变的，而且是宣传天老爷的，宣传迷信的，杀的对。焚的书更少了，他下令保护好书，对农业，医药有帮助的书不许烧，只烧儒家的书，全国那么多儒家的书那能都烧掉。杀人四百六十个，杀的太少了。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年龄小，不懂事。代表没落奴隶主的赵高执了政，赵高是代表儒家的。汉朝打的时间并不长就灭了秦，统一了中国。刘邦有一定的妥协的，采取了分封制，封了同姓王，搞掉了异姓王。吴王濞最大，他可以自己铸钱，可以晒盐，他比中央集权要富的多。

刘邦，吕后是法家，以后的文、景、武、昭、宣帝都是法家。他们用的大臣不是儒家，是法家。汉武帝用的大臣不是儒家，主要是法家。有一个大臣叫汲黯，在朝上当面对汉武帝说："你内多欲外施仁义"。汉武帝一听，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罢朝后回宫去了。别人都替汲黯担心，都以为要杀他，结果没有杀，汉武帝说：汲黯戆也。

刚才说的刘少奇、林彪那一段，同志们提供了很新鲜的材料，我知道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一九六二年他亲自组织好多人到曲阜去，有上千把人吧。全国很多单位都去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去。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刚才讲了刘邦，就是汉高祖。吕后、张良、肖何、曹参、晁错、桑弘羊都是法家。

刚才有的同志说到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孔老二的东西到董仲舒才增加上夫为妻纲。其实孔老二老早就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过到董仲舒成了一纲。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唐朝的女人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自由，因为唐朝的女人不自由就可以出家，做女道士，尼姑；在劳动人民中就有更多的自由了。只有到了宋朝就倒霉了，这可能是与封建制的经济下降不是上升有关。他们奴役，束缚的厉害，反抗就更强一些。中国的农民暴动是上百万到几百万人，两汉有黄巾、赤眉、铜马，唐朝有王仙芝、黄巢，元末有张士诚、陈友谅，明末有李自成，清朝有太平天国，义和拳，这是最大的两次。朱元璋也是反儒的。

再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贫下中农为巩固的同盟军的革命，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使我们的国家得到解放。十年内战，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半，把蒋介石打得滚到那个岛上去了，蒋介石是个大儒。

我昨天晚上才把《盐铁论》的本子读完了。我建议你们读一下。斗争很激烈，主要是昭帝坚持执行汉武帝的路线，另一批王

八蛋要反对。刘邦开始不信儒，他不愿见郦食其，说老子不见儒生，郦食其就骂：“我不是什么儒生，老子是高阳酒徒.”刘邦当时正在洗脚，光着脚丫子就去见郦食其，他不是真的儒。刘邦为什么尊儒呢？因为他统一天下后，不好支配他的几个大臣。后来叔孙通给他制礼作乐，刘邦说我才知道当皇上的滋味。

《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叫《读〈盐铁论〉》，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林彪不是骂我们笔杆子压枪杆子吗，他的笔杆子可多了，反革命舆论多的很，造谣诬蔑我们中央的同志跟主席革命就是笔杆子压枪杆子。我也算笔杆子，我也不会动笔，我压了你们没有？你们今天来了一百多个战士嘛。造谣，他用这个骗人，什么“民富国强”！他是大叛徒，大卖国贼，是大盗窃犯！“一平二调”！我举一个例子，云南有他的一个相当大的死党，给他送茅台，一次一千，一次一千五百瓶，还有云烟几百箱，他有那么高的薪水吗？是不是贪污来的？（大家答是）“一平二调”！他吃的东西全国进贡，家里有很多灵芝草，他还抽鸦片烟，他想长生不老，过去我们不知道。毛家湾有工作人员去过，看到前面两间小房，后面可了不得，从来不让我们去。我去过几次，很隐蔽。他在北戴河也修了行宫，楼梯很宽，只有人民大会堂有那么宽的楼梯。有两个放映室，在中间还修了个大游泳池，说林彪怕水，混帐！造谣骗人。说他小腿出汗，其实他一走道走多少公里。这个人是胆小鬼就是了。主席在“九•一二”晚上回来前他就跑了，他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吗？他就是独往而没有独来嘛。他说吃茶叶还膀胱出汗，谁看得见？

诸葛亮虽然维护正统，过去以为他有正统思想，实际是法家。

曹操是很了不起的法家。他用的郭孝直很年青就死了，是个大法家。曹操很能用人。袁绍有个谋士叫陈琳，他写了一篇檄文

骂曹操，骂得很厉害。曹操正在生病，头疼，看了他这篇文章后，出了一身汗，连头也不疼了。后来曹操把陈琳俘虏了，他问陈琳，你为什么骂我骂得那么厉害？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没有杀他，留用了。还有个大将庞德被俘虏了，放回来也没有杀。在历史上法家杀人少，儒家杀人多。孔子上台三个月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影响很大，孔老二的门下三盈三虚，只有颜回一个没有走。孔老二上台以后杀了少正卯，七天不准，三个月可靠。少正是官名，是个大夫，杀要有手续，三个月比较可靠。

唐朝李世民，要做具体分析，恐怕法家的成分多一点，希望专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李渊，给隋皇帝守行宫，在晋阳，不敢起来造反。李世民手下有一个人叫刘文静（晋阳令），说要起来造反。李世民用了他的建议，取得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做了皇帝。他还用一批农民暴动的领袖，就是瓦岗寨的人，同志们知道不知道？比如李绩，原来叫徐绩，就是徐茂公。魏征是法家还是儒家，还值得研究。武后用武元衡、狄仁杰、姚崇、宋景、裴度等，这些人都值得研究。

后来有韩愈。韩愈是儒家有点法家味道，要分析。柳宗元是法家。王叔文是法家。所谓八司马，其中也有韩愈。韩愈被贬到了潮州，哭哭啼啼的，有一首律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而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就不那样。也有一首诗，题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辟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韩愈作为文学家不能完全抹煞。他是儒家，还有点法。对他不能绝对化，要具体分析。他就批评过孔丘，说：“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石鼓

歌》）当时对孔丘是不能批评的。

武元衡，裴度，李塑等是儒家还是法家值得研究。他们都是反对藩镇割据的。李师道派人去刺武元衡和裴度，武元衡被刺死了，裴度滚到沟里去了，没有死，这时就有人把刺客抱住喊“有贼”！刺客把抱的人的臂砍断逃跑了。

李塑在雪夜攻蔡州时，抓了一个俘虏，大家要杀掉，李塑不让杀。后来他写了一封信连俘虏带到皇帝面前，皇帝把这个俘虏赦免了。

八司马是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人。

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也要研究。

寇准是爱国主义者。岳飞也要研究，是法是儒，也许又是法又是儒。

王安石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变法除了维护较先进的封建制度外，还是为了防御异族的侵略。李世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游牧民族侵略我们，每到草肥马壮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靠轻骑兵，重骑兵。轻骑兵两匹马，重骑兵四匹马，不带干粮，吃马奶就可以，马奶没有了，就用锥子扎马腿喝马血。他们不要辎重，不象我们的部队要有很大的后勤。

汉朝的霍光有个兄弟，叫霍去病，此人很了不起。大将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奴隶出身。还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是卫青的姐姐，最初是平阳公主的歌奴。汉武帝用人很了不起。当时两派斗争，挑拨武帝父子关系，戾太子受一些人鼓动，反对汉武帝。武帝劝他不听，后来才把他干掉了，并且追查余党。戾太子的孙子关在狱里，在搜查时，邴吉拒门说：里面有皇帝的骨血，谁也不能进去。后来武帝觉得杀人太多，就宣布赦免。邴吉就这么顶一下，汉宣帝就这样保存下来了。

刚才那个同志的报告说孔融和弥衡都是曹操杀的，这不对。弥衡不是曹操杀的，是黄祖杀的。弥衡是个大文学家。要看《三国志》，不要看《三国演义》。小说不可信。李白有一首诗讲这个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衡，

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

唐朝有三个姓李的大诗人，二李是法家：李白，李贺。李白的诗说："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见《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中国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日刘彻、刘郎，……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我这是念的主席的原话，李白也是这样。主席讲学马列要有势如破竹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批林批孔，也要有这种精神，同志们说对不对？没有这种势如破竹、风扫残云的精神是不行的。主席讲批林比较好办，批孔就难了，我们就是要知难而进。

王安石变法，许多是针对外族入侵的，都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国家强盛起来。司马光的后台是皇太后，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王安石的后台是宋神宗。后来宋神宗怕了，王安石也就下台了。

明朝的李贽，他的书我没有全看，《焚书》翻过一点，不多。上海新发现了一种李贽的《（四书）评》，已拿到北京去印，不久可以发行。厦门大学还发现了一部《史纲评要》，现正出版。他是不能忍受凌辱，死在监狱里的。

对清，也要很好做点研究。比如康熙，康熙是顺治的儿子。有人说顺治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顺治的母亲下嫁给多

尔衮，多尔衮统一了全中国。康熙八岁登基，他的辅政大臣是鳌拜，他没有自由。他想了个办法，搞了一些小孩和他一起玩。到十六岁时，等鳌拜来的时候，这群小孩一下子围上去，将鳌拜捕捉下狱质罪，他就自己搞。十六岁他就过问政治。这样的人值得研究。要注意这些人，但不要过了，过了就要回潮，就又出来让步政策了。那来什么让步政策是绝对没有的，是反革命造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反对历史唯物论就来一个让步政策；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就来一个合二而一。让步政策实际是合二而一在史学中的反映。

同志们，我自己的历史知识也不多，你们讲得不够的地方，或者错了地方，我加以补充，少数地方加以纠正。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也向在座的两个写作班子的同志学习，向天津市的同志学习，我们共同学习吧！我可能说的有错误，有缺点，同志们允许我改正，不然，我以后就不敢来了，也不敢给同志们讲话了。我的话完了。

#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张春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各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大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发给各位代表。我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作一些说明。

二十年前，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一九五四年宪法，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总结了历史经验，巩固了我国人民的胜利成果，为全国人民规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前进道路。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宪法是正确的。它的基本原则，今天仍然适用。但是，一九五四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部分内容，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总结我们的新经验，巩固我们的新胜利，反映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共同愿望，就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主要任务。

二十年来，我国人民的新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在毛主席为

* 这是张春桥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月十七日通过。

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同国内外敌人的反复较量，特别是经过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九大、十大都再次肯定了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还是改变这条基本路线。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都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国家的生命线。只要我们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也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

现在提出的这个修改草案，是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是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反复讨论产生的，是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产物。序言是新写的。条文从一百零六条，缩减为三十条。重要的修改，有以下几点：

（一）修改草案从序言开始，记载了我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

辉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现在写进了修改草案总纲。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由于不设国家主席，草案对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这些规定，必将有利于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

（二）修改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又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政策。在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的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实行革命三结合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分别写进了修改草案。这样，就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各个阶级在我们国家的地位。马克思、列宁一贯教导我们：“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的机器”。我们的草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原则立场，同孔老二的什么“仁政”，同苏修叛徒集团的什么“全民国家”之类的谬论划清了界限。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二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它是我国人民战胜敌人、保护自己的法宝。我们必须很好地爱护它，不断地加强它。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加强国家机关的建设。要继续巩固工人阶级和它的可靠同盟军贫下中农的联盟，团结其

他劳动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发展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我们伟大祖国的独立和安全。

（三）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对敌人实行专政，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修改草案规定了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又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其中特别规定了各兄弟民族和妇女的权利。修改草案还规定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同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内容。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些规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一九五四年宪法提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我国人民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规定我国现阶段主要有两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修改草案对于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对于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作了规定。这些规定，把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刘少奇、林彪包产到户、取消自留地之类的荒谬主张划清了界限。

修改草案重申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

应当指出，在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象初升的太阳，还很年轻。它是在斗争中诞生的，也只能在斗争中成长。就拿国营经济来说，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许多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无产阶级的扫帚不到，这类垃圾决不会自动跑掉。修改草案关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纠正不正之风等项规定，就是要我们十分注意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阵地。

（五）根据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我们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写上了修改草案，表示我们国家今天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要永远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各位代表！

修改宪法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五年。这次大会将要完成这项工作，公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法。这是一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的大事。长期以来，为了争取和捍卫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权利，为了粉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妄图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卖国的阴谋，为了战胜国内外反动派，

我国人民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千成万的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这些斗争的胜利，产生了这个社会主义宪法。我们相信，全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一定会认真地执行这个宪法，勇敢地捍卫这个宪法，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 关于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讲话

王洪文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四日

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逐字逐句地领会，主席的指示我也领会不深，到主席那里问了几次。主席作了解释。现在我还领会不深。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深刻发挥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主席指示告诉我们，既要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又要搞好经济领域里的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斗争这是全党的任务。

主席几段指示，第一段是纲，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二段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及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条件；第三段是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关系中，指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对这几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也就是主席再三讲明白的，还不能说我理解那样深透。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提到列宁而未提到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

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有人问什么叫精髓）。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抽掉，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但马、恩也只有巴黎公社的经验，还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践经验也不多（指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对资产阶级法权无深刻认识，一九三六年提出消灭阶级，这个理论上的错误不小，后来有所认识，比如《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他宣布阶级没有了，但还是抓了阶级斗争，比如斗了几个主要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白俄罗斯反革命叛乱坚决镇压了。他有了认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著作多；（二）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面临的任务更实际，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有七年经验；（三）列宁对第二国际叛徒考茨基的斗争很尖锐，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经验，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所以毛主席在这里只提到列宁，而未提马、恩，是因为列宁捍卫、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只提列宁，而未提马、恩，并不是马、恩没有提无产阶级专政，是说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多，更接近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不好，不清楚就问嘛！我也想追根，找了主席好几次，哪些问题要搞清楚呢？如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经济制度中，有无资本主义因素、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怎样限制；对经济基础要不要继续革命，怎样革命；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什么说搞不好会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讲无产阶级专政，就讲这些，不讲这些东西，无产阶级专政就讲不清楚。理论上糊涂，行动上必然盲目，这就是主席讲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全国人民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么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呢？劳动群众的专政，是多数人压迫少数剥削阶级，这就是压迫新老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主席讲了有差别，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所有制变了即国家政权阶级性质变了，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关系变了，劳动人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但主席指示精神强调是没有多少差别是从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角度上提出来的。列宁讲了这么一句：“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一样的。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是私有制，或者叫核心。它的特点、特征是等级制，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它的阶级内容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不可避免地存在。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从内容上看，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个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社会主义社会如有按劳分配，一来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二来是资产阶级法权。说它是社会主义原则，就是消灭了剥削，这就和资本主义不同；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又分成了等级，事实上不平等，与旧社会差不多。从本质上看，主要从分配的等级制度沿袭了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资产阶级法权的特点、特征是等级制。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为什么要加以限制？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又清楚又不清楚。主席叫我想想自己，我又比较清楚了。从反面看，资产阶级法权又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苏修工资差距大，实行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就是这样产生特权阶层和特权阶级的。从正面看，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如

此巩固，有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正确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法权给了一些必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还没有消除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如不加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发展、扩大、自由泛滥起来，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进而发展资本主义。主席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说苏修那一套搞不得。刘少奇搞了危险很大，林彪也很积极的想利用这个东西发展资本主义。“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主席讲这个是主席预言林彪一类还要出来，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为什么？鉴于苏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我们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教训，回忆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就清楚了。所以，主席说“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如果不弄清理论上的问题，这些现象就搞不清楚。

主席为什么引用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当时列宁这段话，是小生产未进入集体农庄情况下讲的，现在我国已集体化是否适用？我体会主席引用列宁这段话是对列宁思想的恢复，因为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没有看清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巨大影响，主席提出这段话，说明了列宁的论断没有过时。那么，列宁的这段话是否符合我国的情况，主席反复讲了符合的理由，（一）我们有个体生产的残余（二）小生产包括原来个体生产的农民，他们是从小生产过来的，小生产固有的特点还存在，自私性（注黄冈版作私有性）、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习惯势力等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这样一讲，我就清楚得多，原来道理就在这里。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主席这个指示，开始我是很不理解的。为什么在小生产后面讲这个？主

席说，你想想你们工人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是从哪个阶级来的罗难道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吗？主席这个指示，是从分析社会主义阶级关系和社会主义现实阶级斗争情况提出来的，是对列宁思想的重大发展，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资本主义复辟有阶级性，不仅是地、富、反、坏、右，在我们领导阶级、先锋队内部也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无区别？我的理解，无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也包括一部分雇农，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有产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指的范围更广泛些；（二）资产阶级作风是多方面的，反映政治、思想、经济各方面各条战线；（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非常广泛，影响到个人变质、国家变修，影响到下一代。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这次我才搞清楚，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培植人们贪图享受的，搞特殊、脱离群众，它是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因素。

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就是从思想上、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不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就会变修正主义，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尖锐、肯定地提出的科学论断；

（二）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且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这是主席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关系、阶级关系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三）对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

讲了，斯大林没有讲，主席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

（四）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产生资产阶级的情况。这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而且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专政范围给予新的内容。

现在发表了“三十三条语录”，毛主席看过好几遍。主席说：“有两条顺序要颠倒一下，增加几条很好。”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无产阶级最基本的东西，有了这个纲，读书就开了路。

对资产阶级法权要一分为二，即要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又要看到它的消极方面，不能让它扩大、发展、自由泛滥。你肯定过了头，过于扩大它的作用，还要不要共产主义？不要一分为二批过了头，把它说成很坏很坏，似乎马上取消，你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一分为二辩证地看。三十三条主席看过的，它的顺序安排，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打乱就不好，重复可以，条条都有侧重点，看你怎么领会。

语录是按主席指示顺序编的，所以说它是完整的体系，为了深刻地理解主席的指示，是根据主席四段指示选编的。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讲“语录”，“语录”虽未分标题，一看结构很清楚，就是主席几段话，应该分四部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问题”注黄冈版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学习问题”。讲后面几个问题，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后面几个问题，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阐明。开始可能有百花齐放的，有个学习、领会过程，有个深化过程，不要怕讲，大家都来讲，认识就深化了，再认识，再总结，再认识，再深化。

有人说，只要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一定会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条件，但能否产生资本主义，

是否必然产生资本主义，不在资产阶级法权本身，资产阶级法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在革命路线指引下，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种情况，在受资本主义侵袭的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面前，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发展、泛滥、产生资本主义。所以说，重点决定的是路线、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就要讲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限制它的消极作用。这是向前看的，向共产主义看的，必须限制，要引导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毛主席特别强调看点马、列的书，强调提高三个觉悟，对共产主义除了消灭阶级这个问题以外，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物质；二是共产主义觉悟。没有这两个条件，“按需分配”是不能实现的。

我已经讲了“语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你颠倒就不利于理解毛主席的指示，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围绕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顺序选编和安排的。

有的同志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讲不清楚，讲不清楚的不要勉强，从实际出发，能讲多少就讲多少，讲不清楚就再学再讲，不要被讲不清楚束缚手脚。不讲不行，全国人民怎么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要乱讲、乱解释，实事求是。当然，这样讲不要怕讲，第一次讲错了，第二次纠正就深化了。不学，哪个讲的清楚。

# 经验主义是当下的主要危险*

张春桥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

下面我说一点意见。都已经差不多了。我看了简报，大家讨论也差不多了。我还是说一些关于学习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讲了，主席对这次学习抓得很紧。语录中特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在选这段语录的时候觉得，除了上面这句话以外，马克思的这段话本来用不着选入了，就是为了这一句。因为那段话当中，别的意思在其它选入的语录中已经有了，比如要把生产资料转为劳动者所有，以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等等，别的地方已经说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这句话，我们特别要选入。因为在讨论中同志们说，以前光想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国内反动派和国外的敌人。当然，这两条是主要的。主席说，中国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强大的军队。帝国主义现在不敢动手，也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军队。所以，把我们军队的工作搞好，这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最重要的条件。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要动摇。而过去我们在部队在任何运动里面，都是走在前面的。马克思也说过，过去新的生产方式，许多新事物，都是从军队里面出现的。不管地主阶级的武装，或

* 这是张春桥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关于学习理论的部分。

者资产阶级的武装，不是讲儒法斗争史吗？奴隶社会新兴地主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军队，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中国今天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武装。因为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办法夺取政权。我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是在什么条件下改造的呢？是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产生，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出现。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道理一样。今天我不讲社会发展史，同志们可以翻一翻《国家的起源》一书，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没得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非要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打碎了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所有制的改造。这里我为什么要多说几句呀？因为就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这个问题，主席曾多次发表过指示。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军队的学习，过去走在前面，我们军队工作非常重要，现在这次学习，我希望还走在前面。按学习的条件，比工厂、农村都好。工厂，八个小时，机器开动，工人就要管机器。而我们的时间安排就容易得多。其实，现在也不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不用占训练和其它工作的时间。我觉得还是屁股坐得住坐不住的问题。认真读书不要搞很多时间。还是主席说的，“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了。现在我觉得这股劲要用在多花时间学习。我们主席这样高龄，《参考资料》两大本，天天都要读，文件批得很多。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曾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不记得。主席写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庐山会议时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陈整风、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主席说：“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下面一段话很重要。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比如，对唯心论和唯物论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说天才，大家就跟着说天才。主席指示以后，确实读了一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也办了一些读书班。我不知道在

座的同志当时怎么样。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他不但反对学习马列，也反对学习主席著作，说学习主席著作是“捷径”。林彪高举是假的。五九年以后，对主席这段话，他再也不说了。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林彪不传达学习。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不重视理论学习问题，我这个军区，就让政治部搞一个班子，学习以后，写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一登，理论工作就算有成绩了，而不是感到，我们在革命工作中，必须学习；不学习就不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不是非常重视的。这方面，我不想多发挥。主席多次地讲，要学习理论的问题。庐山会议以后，七零年又学了一阵。“九·一三”以后，又学了。但已经变成了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主席说，首先是中央委员，以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干部。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很感动人的。群众中传达主席的指示比较晚，北京、上海的工人传达得早一些，我们也传达得早，他们学习认真，动脑筋，联系实际问题学习马列。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这里我再读一段，为了证明，主席说了多次，就是不听，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也是传达到支部，向党外群众

念了的主席的指示，林彪一伙是不会执行的。后来我问了一些同志，他们几乎把主席的指示忘了。主席说："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修改宪法的报告里面不是说了这句话吗？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不是我的发明。在讨论那个报告的时候，提出说那句话的范围要限制一下，说"一小部队"。我说，不改。主席说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这是主席在六九年讲的。接着，主席讲："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是主席在六九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七一年、七二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正如主席所说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我还给同志们念一段，主席讲要谨慎小心。主席说："大家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主席的这些话，当时林彪是不会去传播的，但印了中央文件。许多工厂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话主席早就说过了。我看了武汉的一些材料，很感动人，他们说，进城的时候，看到地毯，觉得脚踩上去很可惜。可是后来变了，如果看到房里没有地毯就要，说明我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里不是有没有地毯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是否脱离了群众。我还看了一个材料，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回忆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活，深有感慨。他们回忆打土豪时，搞到了一匹布，首先不是想到自己，而是想到我这个连队那个战士衣服破了，应该给他做衣服。现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有了变化。

我念主席的这几段话的意思，是为了说明，主席的指示不是今天才偶然提出来的，而是多年来主席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是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主席还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指示，希望同志们回去翻一下，我们还准备选编一些主席的语录，不知道主席同意不同意发。

对马列主义的主要著作，从理论上真正弄通弄懂，我们是有条件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对马列的指示，不是处于对立状态。有的人很难说，对马列的指示，他都同意，不见得。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违背了主席说的党员一部分，工人一

部分，他们不会接受马列主义的指示的。我觉得不下决心好好地学，搞一阵子是可以的，甚至于你可以把主席的话都背下来了，但没有真正理解、懂得。那样学下去，除了领导干部学不好，而且也没有办法领导下面的学习。下面会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我看到中国人民银行，他们在学习中钻的问题比较深，他们研究银行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他们仔细研究了，在经济领域中，银行怎样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那些地方没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银行是主要的环节。当然，有些问题究竟怎样办，以后还要研究。比如对公社的流动资金，他们管起来行不行？他们研究列宁当时是怎样做的。你不很好学习，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你就不懂得呀，对他们提出的正确意见，可能一下子给否定了；或者他们提出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支持了。因为，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多老同志，有很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学习理论，并且能反对现状作比较系统的调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能够加深理解。其它问题比较好解决。有些问题在学习中就能够解决。有些问题，要等到将来逐步解决。当然，象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增长的问题，也象毒草一样，你年年除，它年年长，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修正主义

几次上台，都垮了，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都完蛋了。如果我们学习得好，政策正确，主席的路线被我们充分理解，那么，我们的国家就非常有希望。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

我就说这一点。其它的具体意见，用不着多说，因为你们已经解决了。不对的，你们可以反驳，我们商量商量。

#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三月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此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红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一九七五年中共中央下发的《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毛泽东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此文即为姚文元写的文章。

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

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

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

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 工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坚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

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　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

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 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

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

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

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

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 一九七五年四月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怎样估计也

* 此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一九七五年中共中央下发的《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毛泽东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此文即为张春桥写的文章。

不会过高。

早在一九二〇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

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

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

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

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

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4）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 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

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

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

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

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 关于“评《水浒》运动”的讲话*

江青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

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人民日报》引了一段。我把全文念给同志们听听。这个非常重要，要结合学习理论，结合批林批孔，都可以结合起来学。当然你们前面两小段已经知道了。看过《人民日报》啦？学习了一次吧？我再读给你们听：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晁就是晁盖，是真正的领袖。前头还有一个“呀呀呜”的领袖，叫什么白衣秀士王伦。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段吧？我把底下的都读给你们听：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

---

* 摘录自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宋江的“替天行道”，是替天子行道。不替天行道的是那个方腊。宋江去打方腊了，是奴才，刽子手。他自己变成奴才，还带着广大劳动人民都变成奴才了，死的死，伤的伤了，最后宋江连李逵也给毒死了。你们有没有《鲁迅全集》呀？这篇文章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第四段：“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人，这是个坏蛋，杀了头，杀得冤枉。杀头冤枉，不是说别的，他是个很坏的文人，反而被杀，故说冤枉。

第五段（这是主席下达的具体措施）：“《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这是个什么讲究呢？同志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都是全的，写了宋江投降。七十一回是咱们搞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的，五四年搞的。砍掉了后头还不说，还伪造了一回，又把前面的楔子改为第一回，后头搞了个排座位。反正是没写到投降；里头把一些太露骨的还稍微改了。我最近查了一下，还有一个专门给儿童少年读的六十五回本，一九七三年出的。你看，用心何其毒也！毒不毒啊？不仅毒害我们大人，还要毒害儿童少年啊！小朋友，你们看到六十五回的那个本子没有？现在要改，增加到八十几回。你们可以看到宋江那个奴才，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面貌。

所以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

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宋江这个家伙，我今天看了两篇文章，它们作了一点分析。我推荐给你们。它根本上是好的，有一些小毛病。宋江这个家伙死也不肯上梁山。为什么梁山对他那么好呢？原因是梁山好汉被捉，他是刀笔吏，大地主，收买他好救梁山好汉。这个，我们过去在白区工作时也有这个经验，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是在租界被捕，可以请律师，可以出点钱买出来。宋江他是受贿，他对什么人都受贿。贿赂啊！我的语言懂不懂？他死也不肯上梁山的。他杀了阎婆惜，阎婆惜是他的小老婆。犯了罪，杀了人，关起来了。关起来，他也不肯上梁山。他说，我是忠臣，是孝子，我犯了法，犯了不赦之罪，我宁愿刺配江州（就是江西，江州在江西）。到了江州，他所谓题了一首反诗。那是什么反诗？碰鬼！他那四句诗是这样说："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哪儿是什么造反的诗呢？黄巢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呢！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黄巢，同志们知道吧？是唐朝农民起义的领袖。几十万农民大军。他自号"冲天大将军"，冲天子啊！他最后打败了，宁死不屈。宋江是笑话他的。宋江那个时候刺配江州，不得意，所以他"心在山东身在吴"，很感慨呀！他是感慨他个人。"他时"，他说另外的时候，我要是得了凌云志啊！上天了，上了他那个皇帝的身边儿啦""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冲天，所以不是大丈夫。这样子的诗，那些昏庸的官吏还是捉起他来了，要杀头呢！晁盖他们去把他救出来。他还曾说晁盖造反上梁山是灭九族的勾当，要灭九族啊！他批评晁盖，他说于法度是饶不得的，犯了弥天大罪啦！就是说造反无理。这是《北京日报》的文章上说的。他说他自己很可怜，不忠不孝。晁盖他们要给他开枷锁。

他说，这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律，不敢随便动。他自己哀叹他自己，年已三旬（大约三十几岁），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说穿了，就是他的个人野心没有实现，所以就要打个主意，钻到革命队伍里，抓住这支军队，你皇帝老儿就不能不招安，不能不封我大官。就是这个意思。他这是什么反诗啊？你们看，隋末农民起义的时候，我们山东流传过一个歌儿，叫《王铁匠歌》。说："要抗兵（要抵抗官兵），要抗选（要抵抗皇帝选妃子），家家要把铁器敛（家家要把铁器收敛起来），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这才是造反嘛！宋江那是什么反诗啊！你们找一本一百二十回看一看。有没有啊？没有，我有一部送给你们。今后还要出呐！不过你们现在没有东西学，就拿一部每个队传着看。把我的都给你们。黄巢作什么诗呢？黄巢有一首《冲天诗》。冲天啊！就是冲天子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他说，我的花开的时候，百花都杀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是黄金甲"。他要杀到京城去，满城都是他的队伍。所以黄巢才是英雄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英雄领袖多得很哪！我只举有名的：反对秦二世胡亥的陈胜，吴广。刘邦也算一个（刘邦做了皇帝就是了）。到了汉朝，就有赤眉、铜马。赤眉就是把眉毛染成红的，作为志；它的领袖叫樊崇。铜马的领袖我一下子记不起啦，忘记了。唐朝，那些小的我就不去说了。对了，陈胜、吴广同时还有英布又叫鲸布。鲸布就是修骊山的那个脸上刺了字的囚徒，奴隶呀，带了锁的奴隶呀，作苦工的。鲸布是农民暴动的领袖。不过他后来作了官，叫刘邦杀了。唐朝有好几股，最有名的是黄巢，还有王仙芝，好几个人。几十万，几百万的起义军。宋朝，最著名的是方腊，洞庭湖的杨么。方腊是在浙江。还是全国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独独是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

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象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他的思想上，阴阴阳阳地说要忠啊，要孝啊。他那个忠啊，就是要忠于宋朝的皇帝老儿，就是宋徽宗，叫赵佶。这个家伙是个俘虏，叫金国（咱们的少数民族）俘虏走了。这些起义的领袖，被杀的被杀，自杀的自杀。黄巢是自杀的，不屈服。明朝最大是的李闯王。李闯王，知道吧？还有张献忠；还包括朱元璋。他后来是做了皇帝就是了，他是个小和尚。满清的就多了，小的什么三元里，平英团就不去说了，我讲大的。象义和团，捻子，特别是太平天国，那都是几百万人哪！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建立了政权十年左右。他的队伍已经打到河北省了。后来，内讧，出了叛徒，先是石达开（石达开是个大地主）闹分裂叛变，后是叛徒李秀成。洪秀全是自杀的。满清勾结帝国主义的洋枪队。同志们，火药是中国发明的。据一个外国科学家研究，火炮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连马镫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科学家说，欧洲人的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中国的古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我们应该有一点民族自豪感，但是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噢，这个外国科学家是英国人，叫李约瑟。他的书已经出版了几部。我要送给你们一部分。你们看一看，他在社会科学这方面不通，什么儒呀，法呀，他弄不清楚；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比我们还系统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人那样研究过。这个满清啊，勾结洋枪队，来镇压太平天国。那时我们只有冷兵器。洋枪队就是热兵器。于是就被镇压下去了；再加上叛徒投降。噢，宁死不屈的还有一个英王陈玉成。他是被人骗了。他只有二十几岁，被人骗了。他很会打仗，后来没有粮食了。

一个叛徒骗他说，我这个县里有粮食，你来吧！一去就被捉起来了，让他投降。那个僧格林沁（满清的一个蒙族的亲王大将）可怕他啦，他不肯投降。他说，你满洲王朝是妖，他就骂妖。这就砍了头。这是多么勇敢壮烈呀！我们这个出版社，出版口，还有一些所谓学了马列主义的文艺评论家，说什么宋江是有农民的局限性。我问问大寨的农民同志们，你们革命有局限性吗？气人哪！咱们是要打倒帝、修、反。是不是啊？但是，有这么一小撮坏蛋，混到咱们的队伍里，吹捧这部美化叛徒的书。这部书在明朝就是官书，在清朝成了官戏。皇帝下命令排成连台本戏，水浒戏多的很哪！这为了什么呢？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封建统治阶级是有经验的，单杀不行，还要有软的一手。蒋介石嘛！“四•一二”事变就杀了我们好多人啊！到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他总结了经验。他不杀了；他搞自首政策；他搞反省院。有的人就自首叛变了，不少。王明，就是混进我们队伍里，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一来就是要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不行，飞行集会，飞行集会不行，还不就是杀头。我说是飞脑袋去。我是有点经验；我是一个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我是王明路线中期入党的。那个所谓的示威游行啊，到后来只是行剩下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放放鞭炮就跑了，还要捉人。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宋江的政治路线，他先是用思想来腐蚀，讲义气呀，搞什么小恩小惠呀。他哪来的钱啊？还不是剥削来的！受贿赂来的！收买人心。然后他的政治路线摆出来了，这就是说，要招安，要替国家，替皇帝效劳；就是贪官污吏不好；他同那些人有矛盾。其实他还不是贪的很！你看，他连晁盖，农民暴动领袖的贿赂都收嘛，这书上都有。把这个看一看。你看那个，我现在记不起在哪一回了，

他有一个“潜”字，潜藏他的爪牙。他说，上梁山是要潜伏，象一头老虎，潜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就是把他那个凶恶的面貌藏起来，一有时机他就要出来。唉，这个跟林彪不是一样吗！

你们看过林彪那个《“571 工程”纪要》吗？还有那个批林批孔材料之一，其中有一条。我到林彪家里去，他那个现场破坏了，我让他们恢复了。他那个床的对面的墙上，挂着这么两幅东西。一幅就是“克己复礼，唯此为大”，另外一幅，叫做“勉从虎穴暂栖身”。这是《三国演义》上的。他说勉强在老虎洞里头，暂且藏着。他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毛主席领导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样好的地方叫做老虎洞啊“暂栖身”，就是暂且住一下。这个材料你们都有，找来看一看。也许他是从宋江那儿学来的。这首诗是写刘备对付曹操的。他改了一个字。宋江这个我记不牢了。他就是说潜伏起来，把爪牙收敛起来，一句话，伪装起来。外国人叫“木马计”，咱们中国叫（鲁迅也说过，咱们的主席也说过）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总而言之，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宋江干的事情，现在有些工人同志，有的地方贫下中农也批了，批到这一点上了。说公开的敌人干不到的事情，打着革命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在我们党内做公开敌人做不到的坏事。你看，不远嘛，林彪嘛！林彪不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嘛！是不是啊？跟宋江比一比看。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搞和平过渡。他说我们中国是“黄祸”。过去帝国主义说咱们黄种人是“黄祸”，是祸害，是对他们白种人来说。赫鲁晓夫上台就同阿登纳（西德的那个总理）就讲这个。那个人不同意。那个人厉害，那个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是政客。勃列日涅夫天天喊缓和，缓和，缓和个屁！他自

己内部就缓和不了。他那个民族问题可大了。他那个地方自由市场可不得了啦！凡是干部，家家盖小别墅。盗窃集团可多啦，可大啦！苦了老百姓啦！不象咱们这儿。我到你们家里去吃了两顿饭了。我准备每家都去，能够轮流去吃派饭。你们欢不欢迎我？要跟国内的修正主义对比。要跟古代中国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农民起义及其领袖）对比。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领导的，这是二十世纪的事。这以前都是农民革命的问题。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替我们党作了思想准备，组织准备。我们党的成立是一九二一年。我们党自从成立就存在两条路线。先是陈独秀。那个时候我还在桌子底下爬呢，所以我说不清楚。到了王明时候就知道一些了。王明以后这些我就知道了。王明先是“左”，骨子里头是右。后来又从莫斯科回来，在抗日战争中又搞了一次极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叫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把我们当时的根据地也叫人割掉了一些。要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党史。小朋友们也要学。不学就不能够识别坏人嘛！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坏人也可以伪装好人。林彪就学冯玉祥啊！我就从来不知道他家里那么阔气，不得了啊！而且他是个大盗窃犯，大贪污犯；工业、农业，全国一平二调。他那个院子前头，就有这么两个小房间，什么都没有，有个门洞。我们只能到他那个小房间。墙上什么也没有，只挂了一张主席像。他的吹鼓手，就说他怎么样苦啦，怎么艰苦啦，他是睡硬板床啦，什么烧煤球炉啦，什么一块馍馍干吃不完留着下次吃啦。才见鬼哟！我去看了。他那个床头上有很宽很大的一块大板。上头尽写着吃什么，吃什么有营养价值；其中还有很滑稽的事情，说什么吃茶叶膀胱出汗。请问，膀胱出汗谁知道？还说吃杏脯，吃一个不出汗，吃两个出汗。我

说好，我来试验试验，结果我吃多少也不出汗。我不吃反而拼命出汗。我有出汗的毛病，就是汗腺不平衡，因为做过放射治疗。那个家伙他是造谣。林彪那个家伙，他一走就是多少里路；他不是走不动；他不象我这样，每天要坚持锻炼。我每天要打拳哪！“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所以，不要把学评《水浒》看成是文艺界的事。不是啊，不是那么回事。你看嘛，主席对学马列的指示这篇讲话，有人就不提了。我刚才讲的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个，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嘛！你看，宋江怎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晁盖那个厅叫聚大义。晁盖托胆称王啊，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义，象咱们这样，聚在一块商量大事啊。宋江一下子改成忠义堂，要招安。反对招安的他就要杀。李逵差一点就给他杀了（大概在七十回上，记的不太清楚）。最后还是被他毒死了。为什么呢？皇帝老儿还是不相信宋江，最后赐给他毒酒。他吃下去了。他想，糟糕了！留下李逵，还是要造皇帝的反，这不好。他就把李逵叫了去，劝李逵吃酒。李逵就吃了。吃了以后，宋江就告诉他，你吃了毒药了，我跟你一块死，我们要忠于天子，我怕你造反。你看，多歹毒啊！宋江这个人啊，两面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要好好地读一读。然后，把主席在今年四届人大要我们学理论的指示联系起来，与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这样可以使理论学习深入。没有理论的指导，革命不能成功。没有实践的理论，那也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总是有人要搞破坏的。我们不要作“阶级斗争熄灭论”者。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发明的。那么我们不仅承认阶级斗争，不是熄灭了，而且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所以有人说，哎呀！学理

论怎么困难啊，理论不怎么样啊。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几年的经验，哪儿批林整风好，批林批孔好，那儿的工作就好，那儿的生产就好，那儿的战备就好。今年以来，哪儿的理论学习好，那儿的生产就翻几番。你们今年就翻了，我知道。究竟翻到什么程度，我可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最后落实。这就说明问题嘛！可是，有的人就不以为然啊，因为群众都在学啦，能够鉴别两面派，投降派，修正主义是个什么玩意儿，他藏不住了。同志们明白吧？我们的毛主席最相信广大群众，广大的党员，干部，广大的指战员，要大家都懂。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学习。我现在年纪虽然大了脑力也不好，被迫害的，身体也差，但是，我努力学习，我向同志们学习。我看我的话就这样完了吧！

#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上海市委写作组 一九七六年四月

伟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乘胜前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了毛主席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深刻批判。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从根本上指明了“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

有少数人曾经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只是一个“提法”问题。那么，好，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篇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使下炮制的文章。此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它以更露骨的语言，彻底暴露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 此文刊载于《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四期，作者署名“程越”，实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

# 一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 25 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包括今后25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在我们党的《章程》《第一章　总纲》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我们党的这个基本纲领，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不仅当前，而且包括今后25年在内的整个社会

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我们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呢？要不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呢？当然要，但这只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而应该完成的一项任务，虽然是一项宏伟的任务，但不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更不是我们党的全部任务。本来“四个现代化”是在谈到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任务时作为一个规划提出来的。但是《总纲》却偷天换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当前和今后25年各项工作的一个大前提提出来，要我们各项工作围着这个前提转。这充分说明，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当前，今后25年，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的任务是搞生产建设，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不要了。这就彻底否定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彻底篡改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

《总纲》在提出这个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前提后，笔锋一转，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而且包括今后，是今后25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样，它就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的人是反对辩证法的，是不讲辩证逻辑的，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却连形式逻辑都不讲，连个推理都没有，只是用“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为借口，硬搞出与一个“三项指示为纲”，并立刻变成全党全国今后25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不是强加于人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用这种手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炮制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与毛主席

的指示毫不相干的修正主义纲领。

《总纲》全文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今后的历史路程包括今后25年应该如何走？我们认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更加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老路？今后几十年必然是这样两条道路、两种前途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为实现第一种前途、反对第二种前途而斗争。而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所以，毛主席一再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既然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他就是要走第二种前途，反对第一种前途，他的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只是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张蓝图。对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然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

## 二

“三项指示为纲”难道真的是包括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吗？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人们只要看看《总纲》是怎样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就可以明白修正主义者所玩弄的把戏了。

前年，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继续革命的方向。可是，《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际内容，表明了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毛主席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指出了党内那个不肯改

悔的走资派所犯的路线错误及其煽起的右倾翻案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限制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来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些挂着“共产党人”招牌，实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在马克思主义革命锋芒面前，怀着本阶级即将灭亡的恐惧，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磨钝它的革命锋芒，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事情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是，那些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从来只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总纲》在反对阶级斗争的同时，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正是表明了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口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总纲》在这里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一

个名词，却故意掩盖它的阶级内容。这是指谁呢？是指党内走资派吗？不是。《总纲》对党内走资派这一概念，如同阿Q对自己头上的疮疤，不仅自己讳莫如深，也不喜欢别人提。是指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吗？也不是。因为《总纲》明确说明了这些人不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之内。其实，从他们认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违背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来看，这里所谓“把革命口号加以割裂”的“阶级敌人”，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革命的人们宣布为“阶级敌人”。他们在文章上这样写，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极“左”，这样，就可以用“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类语言来攻击一切批判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革命人民，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而把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都当作宝贝供起来。什么“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点也不继承刘少奇的衣钵！），什么“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这种胡风式的语言，对于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人来说，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高兴。

《总纲》还攻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说什么“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过：“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总纲》说的那些话正是从这里抄来的。“运动一来”这句话，把我们党进行过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都包括在内了，也就统统予以抹杀了。请

问：从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到批判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了”有经验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吗？都“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了吗？这不是对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歪曲和诬蔑吗？在这里，《总纲》完全暴露了它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面目。我们说，“运动一来”是要“伤害”人的，但决不是“往往伤害”有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而是要“伤害”那些“老”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伤害”他们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如果不同他们的错误路线斗争，我们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从民主革命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到共产主义。正因为“运动一来”要“伤害”修正主义路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为此而感到悲伤，要为之翻案，要把我们党的历史倒过来写。但这只能是痴心梦想！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各个领域进行复辟活动，是很猖狂的。他一再叫喊“整顿”。怎么“整顿”呢？《总纲》说得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好家伙，九大“整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统统不行，统统要“整顿”，点滴不漏，简直是天罗地网。我们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整顿”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教育、科技、艺术、卫生等领

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用“整顿”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回到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如果象《总纲》说的，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那么，这正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的自画象。

## 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

大家都知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并没有全部完成。在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也还存在改造与反改造，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分配方面，都还有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总纲》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因而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攻击，恰好暴露出《总纲》坚持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立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对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包括对他们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种大批判，是无产阶级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总纲》所诬蔑的“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但是，大量生动的事实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大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群众为刘少奇、林彪一类戴上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对不对呢？很对！这两顶“帽子”很合适，万万不能摘掉！列宁说得好：“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否定对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就是为了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唯生产力论。

说我们“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这无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试问：八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有饭吃，有衣穿，建立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体系，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讹诈，这是“不讲经济”、“不讲生产”吗？吃着人民群众种出的粮食，穿着人民群众做成的衣服，坐在人民群众建造的房子里，发出这种所谓“不讲经济”、“不讲生产”的昏话，简直是对我们党，对长期战斗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无耻诽谤！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好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生产关系调整好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必定能促使生产突飞猛进。而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那样，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让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成功，那么发展起来的经济、生产和“四个现代化”，都会变成压迫、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力量。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一再提醒党和人民：“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这样起劲地攻击别人“不讲经济”“不讲生产”，他真的是热心社会主义生产吗？不！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心目中的“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那一套，这在《总纲》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暴露得很清楚。《总纲》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知道，规章制度是反映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有鲜明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是压迫 、榨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我们主张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对工人和劳动人民实行

资产阶级专政的“管、卡、压”。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就是社会主义企业规章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纲》对此只字不提，却大喊大叫要建立“愈来愈严密”的规章制度。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确实是十分严密、十分严格的，工人们连拉屎撒尿也得计算时间，如有超越，就要受到各种惩罚。《总纲》居然把这种规章制度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这不是主张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这不是主张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又是什么？联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其它种种言行，就更清楚地看到，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也当作“纲”，就是为了贯彻他那条“不管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 四

“三项指示为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折中主义的手法炮制出来的。它是一个虚伪而又反动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宣扬“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也反映了这样的特征。

它是一个在理论上十分贫 乏，在手段上十分恶劣，支离破碎、东拼 西凑、逻辑混乱、思想矛盾的大杂烩。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政治纲领，可以是长期的论述，也可以是简单的概括。

但无论前者或后者，它总是包括着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原则问题，包括着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原则性和纯洁性，总是旗帜鲜明地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纲领作不调和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它们进行深入、彻底的批判，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明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就说过："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当机会主义者杜林冒出来反对党的理论思想基础的时候，恩格斯就打算批判杜林，马克思坚决支持这一想法，恩格斯便毅然地"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上，必须采取严肃的战斗的态度。因为理论基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口号，都会由此而彻底背离 马克思主义，走上修正主义的斜路。当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趴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当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时，毛主席就觉察到这是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当林彪抛出"天才论"这个修正主义理论纲领时，毛主席及时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

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大是大非问题，号召全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同林彪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而是涉及到是否坚持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问题，涉及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不使它受到篡改和歪曲，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对“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相信，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通过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彻底批判，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 批判洋奴哲学*

上海市委写作组 一九七六年四月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 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崇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同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一样，这股风攻击的矛头，也是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洋奴哲学，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

* 此文刊载于《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四期，作者署名“方海”，实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此文常被误传为《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洋奴哲学》、作者是张春桥。这种说法不实，但是本文确实是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指示下写作的。

的走资派所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反动本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建立在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定地相信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有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搞好生产关系方面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就是这么一条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

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跳出来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正是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人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报据我们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个省、一个地区，直到一个工厂、一个公社都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何况是一个国家？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喊

了二十多年“建设”，他们的所谓“建设”，不也是把眼睛盯在外国资本家身上拿国家的资源和主权去换取洋设备的吗？他们换了二十多年，弄出个什么名堂呢？国家主权、经济命脉全都落到了帝国主义的手里，旧中国经济那种衰落破败的悲惨景象，人们不是记忆犹新吗？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〇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党的基本路线，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

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在谈到引进技术、设备的“理由”时曾经说：“外国的产品，一剖开好多东西也是别的国家的。”外国者，资本主义国家也。难道我们的国家发展经济也可以按着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一条路子走吗？外国产品剖开来，确是好多东西都是别的国家的。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在一国出现，就象瘟疫一样，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三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

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一概看成是先进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们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即便是先进的东西也有落后的因素，决不能不加分析，说成绝对的好。何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在某些部门已经出现技术停滞的趋势。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这种洋奴哲学很不得人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和批判。对于这种抵制和批判，他们极为不满。但是，其理不在他们一边。资产阶级“大人物”妄图扼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压制人民群众，是办不到的。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条。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批判修正主义，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姚文元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

* 此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作者署名“本报工农兵通讯员 本报记者”，实际上是姚文元。

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

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 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

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

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 关于“批邓反右”运动的讲话

张春桥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同志们：

我受中央的委托，向参加学习班，来自中央各直属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的同志们问好，并与大家讲几句话。

## 暴风雨式的斗争

“四·五”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主席的建议曾作出两项决议，及时的向全国人民指出斗争的大方向，粉碎了以邓小平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镇压了破坏捣乱的反革命份子，顶住逆流煞住歪风，巩固了社会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正乘着两项决议的革命东风，以实际行动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

“四·五”反革命事件，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发展，两个阶级在政权问题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所出现的必然结果，它和历次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以反革命的失败，革命的胜利而告一个阶段的结束。这场暴风雨式的斗争，告诉全党全国人民一个重要的课题：“阶级斗争仍然存

在，走资派仍然在走，一切革命者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了”。

当前党内必须首先认清斗争的新动向，“四、七”发出两项决议后，许多同志都只是看到眼前那个小圈子，而缺乏一个对全局、对整个形势的充分估计和认识。不少同志甚至提出：“过了这一阵子该松一口气”的论调，而想偷懒一下，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是不切实际而且有害无益，因为阶级敌人正希望我们能够松懈下来，也就是“你松一口气，他多喘口气”。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点斗志松懈，都会给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过去云南省委提出一个“把生产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真落实在生产任务中去”的不正确口号，结果不但生产抓不好，任务完不成，相反的由于忽略了抓阶级斗争，而使阶级敌人乘机破坏，资本主义倾向到处泛滥，甚至一发不可收拾，这次云南省委的负责同志在学习班中深有体会的说：“脑子里少了一根弦，工作上丢了一个纲，任务完不成，悬崖不勒马还要丧权”。小靳庄把大抓阶级斗争贯穿在各项工作上始终不移不误工误时，使革命生产更上一层楼，处处都呈现一片社会主义朝气蓬勃的新景象。这例子各地都有，我不再提，这里要提的两项决议公布后，各级干部所出现的几种情况，可以肯定的说，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对中央的决议是拥护和不折不扣的执行，而且以身作则带好领导班子里一班人，在群众中同群众一起学习领会决议精神，认真的去贯彻，还带头展开大批判，抓好工作搞好生产，由于党委这一班人有这样的好班长，因此这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局面新气象。

# 领导班子“怕”字当头

另一种情况是干部同志特别是领导班子中的班长，“怕”字当头，对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不敢放手支持，对社会上所出现局部的乱子，看成为天下大乱束手无策，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不敢采取果断的行动，在整个运动中举棋不定，显得软弱无力，发挥不出党组织是战斗堡垒的作用。这些干部中的“怕”字归结起来是怕乱，是世界观的问题，中国有一句古话“一朝被蛇咬，一世怕见绳”，由于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或者受了一些委曲，以后又没有对自己以往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冲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态度，因此凡运动一来，就前怕狼后怕虎就怕革命到自己头上，革走自己的乌纱帽，凡有“怕”字当头的干部，在这次“四、五”反革命事件以后，就表现出敌我不分，既没有大胆出来支持新生事物，也没有敢对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群众说：“我们的干部好坏摸不清，是非不分明，墨守成规，把运动搞得冷清清”，对这一部份干部，要鼓励他们把“怕”字换成“敢”字，首先必须自己有一个自觉革命的决心好去领会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从世界观上去寻找“怕”字的原因，才能领导运动。要不，便会迟早被时代所抛弃。

# 反右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种情况是党内走资派在那个地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就会与那个地区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相互勾结，压制群众中不同的意见，压制民主，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大兴资本主义

之风，使那地区运动受挫折，生产促不上，真正的革命群众受压，正气抬不起头来，这些地区酷似独立王国，他们对中央的决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也开了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拥护中央两个决议的大会，不落人后的打电报或写信拥护两项决议，实际上尽管他们的旗拉得多大，口号喊得够响，但始终掩盖不了他们的本质与原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指这些人，从眼前也许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中蒙蔽群众，但从长远来看，总要露出狐狸尾巴，原因就是他们的本质是反革命的。

邓小平之所以敢于负隅顽抗，就是因为有这样大大小小邓小平式的人物追随他，有公开露面摇旗呐喊的，也有躲在幕后射暗箭，放毒药的，不管幕前幕后，他们既要反革命就必然要露出其反革命的面目，现在，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狠抓阶级斗争，把批判以邓小平为主要对象的反右倾翻案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更大规模追查反革命的高潮，今年搞不透，明年继续再搞，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必要的话五年，十年也要搞下去”，我们可以少吃饭少睡觉，不必怕掉几斤肉，可以扎紧裤带，可以损失一些其他东西，但丝毫不能因顾此而失彼，放松对政治斗争的进行，这是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事关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有人说这是“权利欲”，这句话我们曾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告诉他们我们的权力是工农兵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共产党为这政权的存在而向一切反夺权者实行专政决不动摇”。毛主席又说“什么叫做权利欲；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权利欲，既得权一点都不能分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欲是什么？就是一点也不给无产阶级，我们是向他们学来的，而且学得更好”，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的斗争历史，就是为了这政权，为创造这政

权我们流血牺牲，为保护这政权我们也随时准备流血牺牲，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为止。

## 极“左”思潮正在抬头

目前必须注意的是在这“反右”运动中有一股“左”的倾向，极“左”思潮正在抬头。

“用一种正面的倾向去掩盖另一个反面倾向”历来是反革命份子惯用的伎俩。当着革命的形势在不断发展，大大不利于他们时，为图生存，他们就必然接过革命口号，你右他更右，你左他更“左”，干扰斗争大方向，混淆视听。

在一些地区最近出现一股不正常的逆流，党内资产阶级份子退居幕后，让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别有用心的人，以反邓小平为名大搞打击一大片，提出“无官不错，无错不反”，不管多大干部沾着“干”字就唯他是问，现在弄成县委没有一个可信，地委也没有一个可信，省委、中央除了毛主席都没有一个可信。山西省、陕西省那来的这样中央指示：“大小干部驱上楼，一个一个下楼过关检查”。这不变成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假四清，桃园经验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方的领导机关，遇到这些事不闻不问岂非咄咄怪事？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或者中央一些负责同志老虎屁股摸不得，反不得，同样的中央任何一个负责同志有错误，严重的有反党行为，不但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还要把他斗倒，肃清其流毒，但必须有一个领导，有充份证据；乱轰一通，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既不能肃清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也不能通过运动肃清修正主义流毒，达到教育广大群众的目的，使广大群众分清

什么是是非、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相反会挫伤大多数革命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反右倾、清查反革命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关人人要过，但矛头主要指向一小撮，对大多数干部要一看二帮，对群众的思想问题只能是教育，当前出现在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和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歪风，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方面各级党组织要努力去扭转，另一方面绝不能因为有这股逆风的存在而放弃当前主要的大方向。

## 关于“镇反”的作法

某些省市和县出现了一些问题。北京镇压了一批反革命份子，粉碎了他们的破坏和扰乱，这件事放在一些出现反革命破坏事件的地方，如郑州、长沙、武汉、南京等地方，用坚决果断的行动去处理是对的，只是必须注意掌握好政策，不要由于政策的不落实而造成肃反的扩大化，把一些不是敌人的推向敌人一边去。但作为没有出现类似北京反革命事件的地方，也是一样借中央对反革命份子进行镇压的指示，乱抓乱揪，不管有意识无意识的都是错误的“抓人”，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只能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对群众中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出现过火的行动，经常会有，但这与反革命破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中的矛盾，如处理不当，可能导致走向敌我矛盾的问题，这只能是利于敌人而不利于自己。

不可否认，有个别地区是党内走资派篡了那里的领导权，这一小撮人害怕群众起来革命，害怕革命的东风吹走他们的“仙山

琼阁”摧倒这批吸血鬼的大楼，因此当群众起来他们就怕了，他们开始时是千方百计阻挠群众运动，进而施阴风，放暗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实在日子混不过去就露出狰狞的面目，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真正革命者，以致不惜动用专政工具，用专政的办法来压制正确，扶植错误，但这一抓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既吓不倒真正革命者，反而暴露了他们自己。对革命来说早暴露好过迟暴露，目前一些地方控告团有些来北京向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有些通过书信或其他方式向中央如实报告那些地区的情况，这些情况中央会逐个处理。华国锋同志、江青同志等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在接见各省市有关同志、学生代表或首都参加镇压“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代表时也已经代表中央一再提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要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一个地解决，“运动要搞下去；混进党内资产阶级异己份子要清除，地方的问题要解决，这是我们的决心，也应该是在座每一个负责同志，同时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和决心。”

在此我们也希望，有不自觉执行错误路线或政策，有过去因路线觉悟不高，直接或间接执行邓小平那一套，做错了事的同志，能够自觉改正，不要顽固走到错的方面上越走越远，只要是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党和人民还是欢迎的，顽固下去，那绝对没有什么好结果。

## 当前几项重要工作

以下和大家讲当前的几项重要工作：

（一）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保证反右斗争胜利的关键；我们的

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和支持的党，这样一个伟大的党绝不会因为有资产阶级份子的存在而有损其伟大；相反地，我们的党是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揭露矛盾，无愧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党，在这问题上各级党组织必须向群众反复说明，指出个人的错误或者出现在党内的极少数资产阶级份子，绝不能同整个党混为一谈，而用少数人的问题来否定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必须时刻牢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削弱、抵制和破坏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的行为，而做为领导或干部本身也必须“抓好权、用好权”、要坚持一元化领导，在党内做到：“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政策，统一目标，统一行动”。老、中、青干部要互相尊重，大事讲原则，小事求大同，不计小节、不搞山头，不搞派性。

（二）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运动中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群众发动工作，继续做好整党工作，要把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借运动东风揪出来打倒，清除出党，在这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能手软和施“仁”政，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坏人，不只要揪出来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经济与各项领域里斗倒斗臭，但不要急于去处理，事先要请示，在整党的同时也要做建党工作，把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工农兵群众，注意去培养提高，条件够时，应大胆吸收到党内，并注意提拔和培养新生的血液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有十数百万在运动中、在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先进份子入党，这是大喜事，正是我们党兴旺的象征，也是对邓小平最好的反击，做

好组织建设首先要抓思想建设，离开党委思想建设这一条路，党组织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胸中无大计，形成漫无头绪，更甚至使党组织涣散，群言堂变成一言堂，纪律松懈而在运动中寸步难行。

（三）开展革命大批判：大批判不能越批越乱，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无的放矢，批判是马列主义的重要武器，这批判必须有骨有肉，说出道理，揭发出错误，才能使人们从批判中分清那是对的应该坚持，那是错误的应该抛掉，批判不但在理论上要说得透彻，而且要言之有物，要防止为批判而批判，把一场政治斗争引向纯学术批判的邪道上去，同时也要防止简单粗暴漫骂式的批判，要记住鲁迅的话“漫骂不等于战斗”。我现在提出几点意见请大家考虑：

1、今后的批判应该是深入的揭，重点的批，看准靶子，找好武器，要一个个问题有系统的批，每一击都要击中要害，在批判中干部党员要带头，要做到在革命大批判中领导干部要坚持同群众边学习、边批判、边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把自己摆进去，而不是光批邓不去自觉改造世界观，不要像广东黄三洞生产队贫农说的那种干部：“革别人的命是打冲锋，革自己的命就打退堂鼓”。结果越批自己的思想越搞不通，这样搞不好大批判也带不好群众，应该做到三个结合：（1）将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结合起来，这是方向问题；（2）要开展把革命大批判同本单位的阶级斗争联合起来，把批邓反右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结合起来。（3）要把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反修防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封建主义意识、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结合起来，绝不能一面开展革命大批判，一方面仍让资本主义倾向泛滥。结果批邓批完，这单位也烂完。

2、现在大字报很多，批判文章也不少，但质量高的比较少，所见的不是通篇大论，罗列一大堆引自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语录，便是三言两语、言泛语空的文章，不少单位求数量不求质量，一枚实弹总好过一百发空炮，这次开展革命大批判不是秀才打笔墨官司，比谁抄语录背的马列著作多，也不是蓝球比赛看谁投球得分多，这是阶级斗争，是一场革命，要认真的抓，不能够马虎敷衍，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战线上的新兵”讲的那几句话很好：“春雷激荡，催我走上战场”、“虎穴深入为了打老虎”，“武器要精，才能击中要害”、“不断革命坚持长期作战”，这些都说得很好，都能够说明问题，大家有空也要多看报纸，报上刊登不少工农兵的批判文章很有代表性，他们不见得是一大长篇，只短短一篇，但胜过抱卷数十载的知识分子，这些工农兵的批判文章未必在座同志们都能写得出，他之所以好就是文章本身语浅言深，而且联系到实际，不是空空洞洞，是不是这样，同志们不妨自己研究研究。

在谈到这问题时顺便提一下，人民日报很需要各地能提供一些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和能反映地区工农兵先进事迹的文章，这点做为在座同志们也应该为党的一项工作，共同支持办好党报。

（四）落实政策，开展清查反革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执行错了或出了偏差都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政策执行的好坏重要在党的领导对政策要不折不扣执行，在许多时候党的政策往往中央往下贯，中间扣一扣，到地方就走了样，当然政策执行有偏差，大多数还是由于干部对政策不很理解，是无意识的，但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造成的结果却是我们失去了群众，当然敌人也给溜走了。不少干部从主观愿望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积极工作，总想执行好政策，但由于学习不够，平时又独断专行

惯了，不喜欢多向群众请教，多向上级汇报，结果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失去了民心也带给革命损失，就这样呆不下去，不是停职便是调职，这情况又怪得了谁呢？因此毛主席把政策提到党的生命这样的高度上来谈，目的就让同志们务必注意。

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全国正在掀起追查反革命高潮，在这高潮中一个政策是调查研究，凡事重证据是最重要，在处理“四、五”反革命事件时，我们始终站在主动的位置上，靠的就是政策和群众解释，开枪是反革命分子所希望我们这样做，他们想当烈士来挑动群众的情绪，我们就不上当，实践证明这一小撮反革命就是怕群众，怕批判。这次各地搞大追查，军队和公安机关非万不得已，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别轻易开枪，绝不能像毛主席告诉泰国总理，不要制造烈士，反过来我们自己制造烈士，必要时当然可以，但也要先请示。再说开枪打死的往往是群众，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才不会拿胸膛挡子弹。原则上政策要求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详细政策界限和要求，中央除了将有关规定文件分发给各级机关外，同时汪东兴同志也会代表中央向大家做更具体的解释，现在需要防止的是“宁左勿右”的“左”的倾向和“无敌论”的右的错误思想，在追查过程中要全民动手，单靠公安部门不行，但只强调群众专政而不要领导和专门机关的配合是不行的，要三结合，重要的是稳、准、狠、要重视调查证据，反对逼供，不搞武斗。要给出路，讲究策略，才能有效的打击敌人。

这次北京抓的人多了些，开头还不开枪讲政策，以后就差了一些，一个北京抓了四五万人，每一个单位你斗一个他揪一个，也搞出几个人命，冤枉了一些人，还好，一经中央指出就很快的纠正，这点要当作一个教训。

“在处理人的问题应起慎重的态度”这一点在这次追查反革命运动中各单位要确实做好，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有效的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只有有效的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才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保护。

（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批邓反右中，全国条条战线呈现出一片社会主义朝气蓬勃的新景象，数十万工农兵学员走向社会，走向农村，参加阶级斗争，进行调查研究，把书本上所学的东西同实践工作结合起来，一批批大学毕业学员奔赴边疆、农村、山区、走毛主席指引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五七干校”、“七二一工人大学”就像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结果在工业战线我们也取得很大成绩，四川省石油管理局七零零二钻井队的工人打成我国第一口六千零十一米超深井，国产自制的三十万千瓦双水冷汽轮发电机组胜利投产，一大批工矿企业进入六月份时已提前完成一九七六年上半年的生产任务，这几天来更是喜事不断，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在农业战线形势大好，学大寨赶昔阳的社会主义竞赛热潮方兴未艾；全国农村有三分之二公社，二分之一大队普遍有了电，十年全国农村建了大小五万六千多座水电站，今年春播情况良好，三麦、水稻等粮食夏收丰收在望，一句话：形势大好，这大好形势不仅给全国人民带来精神鼓舞，同时也对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四个现代化”提出最有力的反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批邓反右的伟大胜利。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而不能忽视，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滋长，使得功效不高，开工率不足，造成一年工业项目未能完成任务。无政府主义不是没有政府，只是他不要的是无产阶级政府而要资产阶级个人的政府，

自己那小圈子的政府，这思潮要引导，要善于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轨道上去，这是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必须开展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保证生产，但要注意这里所存在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性质问题，不能把他和前面所讲的对敌斗争一样看待，否则非闹出大“乱”子不可。

干部中在我们批判用生产压制政治的错误作法，绝不能因此而放任生产不管，目前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工业、汽车制造、建筑、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还有一段距离，特别是机械工业母床的生产只维持在前年上半年的生产指标上，这些情况都要扭转过来。

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搞上去，相信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的任务一定会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祝同志们在学习和工作方面创造更好的成绩。

#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上海市委写作组 一九七六年九月

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既是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贯穿这一过程的，是一系列的矛盾运动。它的集中表现，是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现在，这一科学结论已成为指导我们斗争的准则了。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这个科学结论的产生和它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为了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自然的、永恒的生产关系，曾经力图证明资本家的利润是由生产资料，即资本的物质要素产生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是由土地或自然产生的，而不是由劳动创造的。庸俗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化，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说成一个仅仅是人和自然之间发生的过程，以掩盖资产阶级贪得无厌地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罪恶。但是，这种图谋被马克思所粉碎了。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是一台永久的吸取剩余劳动的抽水

---

* 这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及其所属经济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十三章的内容，此处收录的是一九七六年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的版本。张春桥、姚文元参与了此书的编写。

机”。经过层层解剖，马克思终于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大路上悬起了一盏光辉灿烂的明灯。

同庸俗经济学一样，现代修正主义的经济学则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生产关系，并且把这种生 产关系物化。斯大林时代的走资派沃兹涅先斯基起劲地鼓吹这样一种观点：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谁战胜谁的问题已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坚定不移地有利于社会主义方面而得到了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消灭”，“社会需求和物质生产水平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内部矛盾”。这样，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就同庸俗经济学描绘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样，仅仅是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再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被否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物化了。这就是沃兹涅先斯基以及后来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吹“唯生产力论”的理论基础。庸俗经济学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化，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现代修正主义经济学否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物化，则是为了掩盖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罪恶阴谋，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暂时在苏联得逞了。

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毛主席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

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毛主席的这一系列科学论断，给了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鼓吹的谬论以沉重的打击，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实地描写为一个极其丰富的生动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个矛盾运动中，由于所有制发生了变更，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诞生了，并且日益向前发展。这就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这种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中，也就是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由此而形成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

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

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为着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交换，同这种生产和交换相联系，组织、维护和发展这种生产和交换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劳动阶级——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那末，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呢？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的直接社会性生产，但是，它又仍然是商品生产。所谓商品生产，就是价值生产。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这种价值的生产，同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作为商品生产，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一种交换价值，它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去交换其他的商品。这样，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就会转化为物和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就会转化为物的能力。这种情形，在社会主义生产单位总是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人所以能对于别人的活动或对于社会财富行使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底所有人。他在他的钱袋里随身携带着他的社会权力以及他同社会的联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商品制度，每个企业（事实上是每个企业的领导人）也被赋予这方面的一定权力；也只有赋予这方面的权力，才能同社会建立联系。这就是为价值而生产、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条件。

这种经济条件，不断地诱使企业和经济部门的管理人员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走上为价值而生产、为利润而生产的道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旦走上这条道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就受价值规律和利润规律的支配了，企业的生产实际上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而不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在进行

了，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在蜕化变质。这样原来按照计划规律建立的供求关系也就被打乱了。某些商品供不应求、某些商品供过于求的现象就会受供求规律的支配。

一些人就会利用供求矛盾的扩大，把自己掌握的某些供不应求的商品当作筹码，取得一定的社会权力，迫使别人服从自己的某些要求，把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的一部分，通过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占为己有，转化为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这样孵化出来了。恩格斯指出：“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财富只要包含着对人的支配，它就主要地、几乎完全地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新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也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的。这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交互作用的过程。对于个别生产单位来说，完成较多的产值、获得较多的利润，是直接反映出来的，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搞利润挂帅所造成的 严重社会后果，并不一定都能在一个企业中直接反映出来。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流通领域的规律的时候，曾经指出：“对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个别企业的领导人来说，也会是这样。只有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总联系中，人们才能认识到，当一个企业走上追逐利润的道路的时候，就在实际上孵化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了，而领导这类企业的人员，也就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功能。

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形成的。走资派贯彻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维护和代表的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党内资产阶级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一面孵化着新的资产阶级，一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

从而使自己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因此，只反对党外资产阶级，不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事实上起了保护整个资产阶级的作用。只有首先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才能在阶级斗争的一个战役中从根本上打击整个资产阶级。

党内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同其他剥削阶级一样，也要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至于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的方式，则依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不过是分享垄断资产阶级的残羹剩汁，因而只能作为后者的附庸出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党内资产阶级则已成为全国物质财富的占有者，囊括工农创造的一切剩余价值，并且在这个阶级内部论功行赏、坐地分赃。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党内资产阶级还不是全国物质财富的占有者，他们一般是在商品制度这块土壤上，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的功能，通过扩大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占有大量社会产品，并且采取各种隐藏的手段，对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进行再分配，攫取他们能够攫取的一个份额，并且把这一部分转化为剩余价值。党内资产阶级原来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对于占有社会财富表现得特别贪婪，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特别迷恋。他们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这是这个行将灭亡的阶级的经济特征。

党内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总概念。我们说，党内资产阶级是在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这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必须从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但这决不是说，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没有它的政治的思想的根源，更不是说，党内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没有它的政治代表。毛主席指出：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不论是在幕前的还是在幕后的，不论是在下面的还是在上面的，党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阶级利益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它的政治代表、挂帅人物，并且以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把他们联系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党内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特别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掌握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多，危险得多。

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既要认识资产阶级那方，又要认识无产阶级这一方。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要从这一点上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也必然会不断壮大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我们要从这一点上莫定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制定的正确路线和实行正确的领导展开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中，将日益提高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程度，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更好地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分配社会产品，使按 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日益成长。所有这些，必将加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把包括党内资产阶级在内的新老资产阶级驱逐到越来越狭小孤立的阵地上去，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消灭这个阶级。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科学论断，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党内资产阶级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走资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鼓舞和指导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和实行共产主义而英勇斗争。

#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上海市委写作组 一九七六年九月

无产阶级为了胜利地开展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保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因素逐步增长，使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逐步削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整个社会 主义历史阶段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曾经作过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列宁也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

* 这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及其所属经济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十四章的内容，此处收录的是一九七六年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的版本。张春桥、姚文元参与了此书的编写。

毛主席的指示，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呢？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它作了具体的说明，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要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直到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半途而废。

为着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必然要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继续革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联系了起来。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列宁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列宁总是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等一切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决不能中途停止。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总结无产

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主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又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号召无产阶级必须把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在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础上，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 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制定的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示了社会主义

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唯一正确的路线。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就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是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航程。

我国人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率下，遵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进行了多次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在斗争过程中，找到了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样的一种斗争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也可以叫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领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反复的较量，广大革命群众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伙叛徒、卖国贼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极右。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我们党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

鲜经验。

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毛主席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毛主席又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 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我们要始终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这样形式的斗争，直至把一切毒蛇猛兽消灭干净， 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显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原形。苏修叛徒集团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全民国家”。这种谬论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关于国家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科学论断。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在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掩护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为着防止资本

主义复辟，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懂得资产阶级在哪里，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 任务是什么，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 我的一点看法*

江青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张起诉报告，满纸胡说八道。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动。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暗中嫁祸他人。

转移人民视线，妄图洗刷臭名。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

* 这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江青在公开庭审法庭辩论上的辩护词，此前该庭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三日、五日、九日、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上午，已经先后六次开庭。该辩护词为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稿，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八日交侦查审讯员（两页），此稿略有修改，一九八〇年十月九日于秦城监狱。

我对他（公诉人江文）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

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

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

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

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

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

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而成为现实。你们暂时地得逞了。

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篡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

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

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

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脚的。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一案），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清君之侧，目的在"君"。罗织陷害，血口喷人。利用专政，

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难尽。破坏政策，凶悍残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这就是我的回答！

# 《张春桥狱中家书》摘录*

张春桥 一九八五年至二〇〇三年

## 评“优胜劣汰论”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我最近心情比较平静。因为局势的发展，大体上和我的估计差不多，而且有些戏剧性的场面很好看。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时间没多久，狗咬狗的事一幕又一幕地演出了。看电视《动物世界》，好像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谁该由谁吃，吃剩下的，比如狮子吃剩下的，由狗吃 ；狗剩下的，由鹰吃，而且吃得干干净净。赵紫阳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1]，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其实，人类社会有它自己的规律。希特勒曾经是优势，斯大林是劣势，结果呢，劣势转化为优势，斯大林淘汰了希特勒。全世界无产阶级现在是劣势，总有一天，要淘汰掉资产阶级。看这个世界，忘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说什么全世界谁也离不开谁之类，不是自欺，就是说梦话。好在，现在许多人眼睛睁开了，虽然人数不多，真正的希望是在这里。

* 摘录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张春桥狱中家书》，这本书收录了张春桥一九八五年至二〇〇三年间给家人的 58 封书信及对张春桥长女张维维的访谈。

# 评深化改革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八日）

当今世界上，靠“自我”的似乎越来越多。农村里，一个农民得了病，过去还有人管，现在就要靠自己。公费医疗也在“改革”，改来改去就是在工人自己出多少钱上打主意，还说这是一大进步。据说现在住院的多了，因为住医院还是公费，而门诊“自我”要负担百分之二十。真不知道决策者们打的什么主意。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报上已登了，据说颇有“特色”，多数人赞成。我看不出特色在那（哪）里，不过是按“国际惯例”也就是把西方现行的办法改头换面地搬过来罢了。有人称赞深圳在工资改革、人事改革、住房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这倒使我明白了所谓“深化”改革的方向是怎么回事了。你们都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不了解旧中国的具体情况，摆在你们面前的往往是你们不大了解而又被迫适应它的事，这也只能靠你们“自我当心”在落水以后再学游泳了。我相信，经过这十几年的熬煎，你们会越来越适应，越来越聪明起来的。

# 给外孙十六岁生日的寄语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二日[2]）

在北京，我们谈了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问题。

你读过《八连颂》[3]吧？有一位大人物很喜欢念诵其中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另一位大人物到好八连视察，指着墙上的《八连颂》说 ：“最后两句最重要。”这样理解对不

对呢？我看至少不完全。《颂》一开头就问“为什么？”答曰 ：“意志坚。”坚在哪里？“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这是非常明白，不该误解的。其中，“为人民”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为人民，几十年”，哪有军民团结如一人？世界上“意志坚”的人不少，蒋介石反动到死，能说意志不坚吗？但他是反人民的。越坚越反动。昨天听广播，又在吹嘘丰田、松下如何节俭，赞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付小账一分也不多给。服务员问他为什么不多给？他说，因为这样我才成为富翁，才不落到你的地位！现在中国的宣传工具就是掌握在这些昏头昏脑的人手里。他们分不清为人民，还是反人民！是为剥削阶级还是为被剥削阶级！分不清这个根本事实，也就不可能理解《八连颂》和世界上的人和事。只有为人民，才能做到那八个“不怕”。“不怕帝，不怕贼”，只有共产党人和真正的爱国者才能做到，卖国贼没有不怕帝国主义的。

你的生日很好记 ：过了“五四”就是。因此，希望你读一读毛主席纪念“五四”二十周年的两篇文章。那里提出了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而且说这是区别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青年的唯一标准。也希望你读一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那里提出了为什么人和怎样为（人）的问题，特别提到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问题。这个首先是，不仅是文艺也是一切工作的根本问题。这些年，这个观点不但不宣传了，而且横遭批判。口口声声为人类，而不敢说为大多数，为工农兵，为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人民，甚至说这是极左，是假、大、空。从脱离工农，到站在工农的对立面，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所谓和平演变虽然多种多样，但总是从脱离工农开始，演变到资产阶级专政的。没有阶级观点，就不可能理解苏联、东

欧的变化，就不可能总结那里发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教训，也不可能正确地观察中国的国情。“分析好，大有益”，只能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导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鲁迅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对国情作了分析以后，对敌人、对人民采取的不同态度。

十六岁了。再过两年就要进入青年了。未来的道路还很长。遇到的曲折也许比这十六年还要多。但是，困难固然给人带来苦恼，也会使人得到锻炼。你现在还是个“孺子”，希望你健康地成长起来，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孺子牛”。

# 谈苏联解体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信中提到人们对苏联解体不理解。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各国、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作出了不同的理解。有欢欣鼓舞的，有悲观失望的，有先高兴后忧虑的。我们不必跟着别人跑，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不要只看现象，而应当看本质。早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党就指出：赫集团的上台，是资产阶级上台。这不是乱戴帽子，而是事实。是他们自已宣布苏联是“全民国家”、苏共是“全民党”，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虽然他们没有改变名称。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党对内压迫无产阶级和各民族劳动人民，对外搞大国霸权主义，这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早在六、七十年代，我们就公开称呼它们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国家了。我还记得，

在人大会堂的国宴上，每当我们一讲“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词，苏联大使及其追随者就慌忙从餐桌上站起来，边吃边退场的狼狈相。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不过是扮演了赫鲁晓夫五世、六世的角色，全面地公开地实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罢了。据说，莫斯科、列宁格勒这些城市，小汽车仍然很拥挤，夜总会还是通宵达旦，高价商店里什么都有，俄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依然十分方便，受苦的是千百万工人农民以及下层干部、小知识分子，一旦失业那就更惨了。苏联人民上了当，受了骗。我觉得叶里钦这个人很可爱，他公开讲反对共产主义，雷厉风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羞羞答答，拖泥带水，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打着苏联、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旗号。叶利钦的可爱之处，就是他能够擦亮苏联人民的眼睛，启发人民的觉悟。当然，他的真面目还是掩饰起来的，不然早就被识破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苏共、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各国各个政治派别做出了各种分析。有人说是经济没搞好，有的说不该与美国争霸。我以为，从根本上说，是苏联内部阶级斗争的结果。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但是新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不但处在外国资产阶级的包围中，而且处在国内资产阶级包围中。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被我们从前门赶出去，又从后门回来了。苏维埃机关里充满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培养出来的干部，一到岗位就陷入资产阶级包围中。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是从亲身感受中坚持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本来就占少数的无产阶级真能经得起这样众多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浸泡？是不是只有亡党亡国路一条？不是。列宁在世时，条件极其复杂，布尔什维克始终没有忘记阶级斗争。斯大林也不

是完全放弃阶级斗争，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与外部势力斗争，国内一出事就说这是外国间谍、特务，而不注意国内的阶级矛盾。他的肃反扩大化，多抓了反革命，又采取杀头政策，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而他长期不承认苏联内部有矛盾，不重视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或者注意了某些事件，又没有区别两类矛盾，把许多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把中间势力推到敌对阵营，也有人指出过。我以为，他长期不重视“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这条原理，以为自己培养的都是无产阶级战士，都是为苏维埃而斗争，实际上人家早就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去了，以至二十大赫鲁晓夫就代表国内外资产阶级，站在苏共的讲坛上发表反共演说，人们想反也无力反对了。无产阶级认识这些问题不容易。但是，既然世界在矛盾中发展，阶级斗争在继续，赫鲁晓夫的后代总有一天要垮台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真的不灵了。

## 毛主席是人民领袖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看到一篇文艺评论，说现在的电影，“把毛从神变成人，把蒋从鬼变成人”，据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没有机会看这些伟大的作品，不敢评论。但是，他的这个论断，同我的脑子里的毛、蒋形象就根本对不上号。毛在我脑子里从来不是神，蒋在我脑子里也从来不是鬼，他们从来都是人。但是，人是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毛是人民的领袖，蒋是人民的公敌。不讲这种根本区别，抽象地谈神、鬼、人，只能把读者、观众带到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里。有一条消息说，为纪念毛 100 寿辰，要拍毛的“三次握手”，一次同孙中山，一次同蒋介石，还有一

次没听清是谁，看来毛又回到 1927 年以前跨党分子的地位了。革命领袖的形象，在这些资产阶级艺术家手里，好像可以任意塑造似的。但是，我相信，在人民的心里，他们的形象是不可能改变的。

# 鲁迅与“国民性”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日）

你上次来信中，提到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论述，并且说回过来看看鲁迅的书，懂了许多。你举了些例子，火车撞坏汽车，有人持刀杀人却无人过问，等等，于是问道 ：上海人是最自私吗？国民性又回到三十年代了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而且几十年来一直争论，头几年报刊上也不断地有议论，并且有人提出中国的国民性需要殖民统治两百年才能改造过来这样的奇谈怪论，最近又有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改造国民性的高超理论。

国民这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除国民经济、国民教育这些包括全体国民的活动以外，一般不用国民这个词。孙中山喜欢用国民，蒋介石又继承了这些名称，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大会、国民革命军，等等，为了和蒋加以区别，也为了更科学，我们采用了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共和国、人民大会堂等等名称。有趣的是，东欧各国资本主义复辟以后都把人民这个词抛弃了。鲁迅早期著作中，研究国民性的相当多，几乎成了他关注的中心，从学医到学文，也是为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说的国民性涉及很广，但是，据我看，他始终没有研究清楚。所以，你也难以看懂。正因为这样，有些学者往往抓住鲁迅早期思想的弱点，加以发挥，攻击中国的国民性，或曰中国人愚昧无知，只

配做亡国奴，或曰只有教育救国、或实业救国、或科学救国，而不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死了多少中国国民，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才能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鲁迅和这些人不同。他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他对鲁四老爷、假洋鬼子是痛恨的，对人民是满腔热情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宣布封建制度是吃人的制度的，是鲁迅，是他的《狂人日记》。在今天，要想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鲁迅的作品是极生动、极重要的材料。他笔下的那些“国民”，正是当时的农民、小市民。他不是藐视他们，而是他自己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说他当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虽然是站在时代最前列，却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看不到阿 Q 们中间蕴藏着的力量。这也难怪，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阿 Q 参加的“恐怖活动”，农民的自发斗争即“不准革命”的革命不可能使鲁迅看到希望。他当时的思想武器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相信人类会进步，一代会比一代强，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但是他看到的却是这样冷酷的事实：包括他的一些学生在内，同是青年，为什么这一些青年杀另一些青年呢？鲁迅在研究国民性的过程中是极其痛苦的，很长时间找不到答案。读鲁迅早期的作品，要了解他早期的社会环境和他的政治、思想状况，否则很难看懂。

鲁迅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是后来的事。这些条件促进了他的转变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创造社对他的批判[4]，使他冷静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认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这把解剖刀，解剖社会，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他不是轻易地相信共产主义的，而是蒋介石的屠杀，血的事实教育了他，马克思主义教育了他，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教育了

他，使他相信 ：“唯有无产者才有未来”，并为此奋斗终生。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找几篇他自己描述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看一看，如《二心集》、《三闲集》的序言，还有瞿秋白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是第一篇正确地分析鲁迅思想的文章。这几年没有人提这些文章了，因为它们都是讲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过程的。资产阶级最怕的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武装起来的鲁迅，对社会的分析，对论敌的批判，都面貌一新了。他不再停留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地位，而是和无产者站在一起了，他的文章也就更加锋利了。你如果找到他同梁实秋教授的论战文章，就不难发现，他已经不再一般地论述国民性了。因为有人说梁实秋反对无产阶级文学、是资本家的走狗，梁极不满意，怒气冲冲地去查英文韦勃斯特大字典，得知无产阶级不过是一些无知的穷光蛋，就写文章嘲笑“无产阶级文学”这个口号如何如何可笑，鲁迅就写了一篇批梁的文章，叫《资本家的“乏”走狗》，嘲笑这位大教授连什么是无产阶级都不懂，只能算一条“乏”走狗！鲁迅这个论断极其准确，以至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反共分子的文章内容如此贫乏，就不由地想起这个题目。人是分为阶级的，这是客观事实。只讲国民性，不讲阶级性，只能使自己难以正确分析事物，如同早期鲁迅那样。你看，《毛选》第一篇就是分析中国的阶级，不但承认阶级，而且做了具体分析。对一个阶级，又分析它的大、中、小，上、中、下，左、中、右，又分析它在不同形势下的表现，等等。这种分析，在整个毛泽东著作中是贯彻始终的。讲实事求是，就要讲这个“实事”，“求”其中的“是”，毛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是 90 年代，不是 30 年代。现在中国的国民性和 30 年代也不相同。你看到人们自私、麻木，这是事实，但人们的表现还

是不一样的。俄国作家爱伦堡在他还没有反斯大林时[5]，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用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苏联。在当今中国，在一个又一个"热"、"潮"、"大战"中，那些人可不麻木。在那些旁观者中，也有昨天的或者明天的革命勇士。对立统一规律是基本规律。国民性中包括着对立物的统一和斗争。阶级内部、政党内部都包含着对立斗争。先进、中间、落后，总是存在的。不会都先进，也不会都落后，很可能仍然是两头小，中间大。我们家原来有一张毛在天安门上谈话的照片，面对百万欢呼的群众，他仍然冷静地说："左派能有百分之十就了不起了！"而希望就在这里。

写了这么多，只是说我在头几年读那些关于国民性的文章时，想过一些，很零碎，也算是春节期间我们的一段闲话吧。但愿不至于给你增加思想混乱。你既然想研究点问题，我总是支持的。

##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世纪"成了使用最多的词儿。"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甚至按欧洲人的习惯，说什么新百年、新千年。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也不少。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暴（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为你高兴，你是同革命一块成长的。我们住马棚的时候，正是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张家口失守，蒋介石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当总统。但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你一周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石家庄。1948 年，你又去了济南。1949 年，你就到上海了。我们就住在叫庆丰大楼的地方。这座楼里原来住着《大陆报》(英文)、《时事新报》、《大晚报》，三家都是孔祥熙办的。我们就住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睡在办公桌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吧。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黄浦江。这时，江面上已经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军舰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一切，当时你还不可能理解。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到青年宫去开

会，搭错了电车，一位踏三轮的叔叔把你从十六铺送到淮海公寓吗？那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新上海了。

我还为你高兴，你和你的妹妹、弟弟一样，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在工厂、在农场、在部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没有工人作工、农民种地、士兵放哨，这个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一切活动都会停下来。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联结在一起，是最光荣的。头几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是纪念高尔基的，说什么“可以告别苏联，可不能告别高尔基”，他似乎忘记了高尔基的伟大之处恰巧在为工人解放、为苏联革命贡献力量。“告别苏联”，是不是连十月革命、卫国战争都告别呢？我们反对的是苏共领导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大国霸权主义。“告别苏联”如同“告别革命”一样，不过是骗局。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 谈“仁政”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

在那些似软不软的作品中，也有耐人思索的。比如，有一位

著名学者叫季羡林的，就写过这种文章。这位作者不是自封的“著名学者”，我青年时期就读过他的作品。后来，他到了印度，解放后才回国，成了印度文化艺术的专家。我想，他如果向我们讲解梵文、佛经，一定很内行，虽然印度文化很复杂，他也不一定能讲得好。没想到，头几天读到他写的一篇短文，却是讲的中国历史，说中国的开国皇帝，全凭厚、黑、大三个字得天下。厚，就是脸皮厚；黑，就是心黑；大，就是胆子大。他举秦始皇、刘邦为例，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我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作品竟自出于著名历史学家之手。如果这样来分析历史人物，都可以称为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就太容易当了。

说来凑巧，正当我解不开季老先生的谜的时候，《新民晚报》又说“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又有新作在北京首映，内容是荆轲刺秦王。电影导演分几代，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位先生的作品我一部也没看过。奇怪的是，这部作品，据记者报导说，全部角色都是丑角，许多观众不解。我也不解。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被司马迁的描写震动过。“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至今仍被人吟咏。我不赞成荆轲，因为这种个人冒险即便杀了秦王，也解除不了燕国的危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赞成这类行动。但是，把秦王、荆轲都描写成傻瓜，就莫明其妙了。历史就是历史。不论我们赞成不赞成，荆轲在当时的燕国被赞美是理所当然的。秦王的历史地位也是历史决定的。那些骂秦始皇是暴君的人，当了皇帝，为了维护地主阶级专政，杀起农民来，决不手软。所谓施仁政，也只限于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对象。蒋介石就说“剿匪就是施仁政。”杀红军，就是对地主阶级施仁政，就是对日本侵略者施仁政。蒋介石不愧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现在西方资产阶级也在反

暴力，但是，他们只反对革命人民的暴力，从来不反对用暴力镇压革命。你看，北约部队在南斯拉夫面前耀武扬威多么神气，他们却说这是为了人道主义，为了阿尔巴尼亚人。我不愿对这一老一少两位著名人物发表评论，也不值得评论。只是想到 ：历史唯物主义地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这种思想，对某些人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的口头上说要马克思主义，有的连口头上也不说。在软些、再软些中，发表不软的东西，也许是辩证法的最新发展吧？

## 资产阶级革命一去不复返了，<br>无产阶级革命还刚刚开始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有一个问题，都怕谈，又不能不谈，只好转弯抹角地说一点。这个问题就是革命。我欣赏叶里钦，他比较鲜明。在十月革命节，他以沙皇的口吻说 ：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早已下了命令，取消了十月革命节，为什么又总是念念不忘这个十月革命，年年在这一天咒骂一番十月革命呢？他心里怎么想，我们不知道。我以为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好像经过他的金口这样一说，革命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我想，把叶里钦的话改一改，可能更接近实际，接近真理。我想应当这样说 ：资产阶级革命一去不复返了，无产阶级革命还刚刚开始。

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学家都说要从荷兰革命开始，但真正有影响的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史称法国大革命，影响特别深远，《马赛曲》至今还为许多革命群

众传唱。这几场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不同之处是，英国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盟反对国王和贵族、教会，人民群众参加了，却没有得到利益，特别是农民没有得到土地。美国革命，争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得到利益的却是大封建主，印第安人、黑人的地位没有改变。这场革命的总司令华盛顿就是属于革命右翼的大农场主，属左翼的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宣布人人是生来平等的，但是他不反对奴隶制，他家里就有许多奴隶。法国不但出现了许多启蒙运动的领导人，而且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纲领，在人民中长期宣传，比较深入人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同贵族、而是同人民群众结盟，人民群众参加的越来越多，革命高潮越来越高，革命的领袖一批又一批地被更换，新的领袖越来越激进，在他们的进攻下，国王东躲西藏，最后被送上断头台。我们都看过这方面的电影、小说，至今仍然感动人。人民群众不但直接参加斗争，而且得到了实际利益，主要是农民得到了土地。这本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但英、美革命都没有解决，只有法国大革命解决了这个任务。但是，革命到了高潮，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看到人民群众要继续前进，就害怕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得到了最大的胜利果实，得到了政权，得到了财富，废除了封建制度，得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就不想再前进了。人民要前进，就同资产阶级发生矛盾。法国大革命的左翼领导者马拉、丹顿、罗伯斯皮尔和那个喊出“在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地方，平等是空话”这样的资产阶级决不能容忍的口号的人，都被暗杀或上了断头台。在“热月党”执政以后，革命也就终结了。革命热潮中互相称呼“公民”，这时又恢复了老称呼“先生”。以后就是“拿破仑”上台、复辟、反复辟。我想，法国革命内容极其

丰富，几乎可以说是以后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特别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更值得重视。他们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有力量 ；当群众的利益同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立刻转过来压迫群众，这几乎是普遍规律。在当今世界，人民群众的要求往往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资产阶级怎么还能领导群众革命呢？革命一旦涉及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转过来和敌人合作，反对昨天的同盟者。各国资产阶级没有不这样做的。他们已经不能领导了，他们已经成为反对革命、“告别革命”的人了。叶里钦说得对：“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是前面要加“资产阶级”这个词。

无产阶级却不同。马克思说得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索（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任何真正的革命都会为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创造条件。因此，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地识破了资产阶级的本质，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独立地领导革命。1871 年的巴黎公社，1917 年的十月革命都是这样。资产阶级的复辟并不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当初不该革命，而只是证明俄国无产阶级缺乏经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从但丁写《神曲》算起，用几百年的时间在全世界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现在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资产阶级面临的问题，他们一个也解决不了。只有无产阶级有能力解决。既然十月革命可以突破帝国主义的索（锁）链，为什么不会再一次突破呢？这只是开始，不是终结。叶里钦说错了。

---

[1] 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于 1984 年 10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其中指出：“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根本不同，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计划和法令的管理下，在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优胜劣汰。”

[2] 原文在日期处还标注了“列宁的生日”。

[3] 《八连颂》为毛泽东作于 1963 年 8 月 1 日的杂言诗。该诗全文是：“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4]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团体之一，其成员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张资平、郑伯奇等。

[5]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新闻记者，代表作品有小说《解冻》和回忆录《人・岁月・生活》。